

美國通史

著合 斯文納 格瑪康

譯合 澤先陳 風末曹 棋尊劉



上海中外出版社發行

裝 幀
莫 志 恒



著合斯文納 格瑪康·美

史通國美

譯合澤先陳 風未曹 棋尊劉



行發社版出外中海上

美國通史

每冊基本定價國幣五十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 作 人	美 國 A. S. Nevins H. S. Commager
翻 譯 人	劉 曹 陳 孫 伏 先 未 尊 園 澤 風 棋
發 行 人	孫 陳 曹 劉 伏 先 未 尊 園 澤 風 棋
發 行 所	中 外 出 版 社

上海(5)溧陽路(狄思威路)
第一二五三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S) 0001-1000

作者原序

美國脫離混沌時代而進入歷史，迄今不過四百年光景。美國是世界上大國之最新者，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最饒趣味。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的歷史綜述着民族的事蹟，包括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力量 and 因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移民，工業，科學，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大部分發源於美國，而這些力量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其在美國歷史上所表現者，較在他國歷史上所表現者更為顯著。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年紀雖輕，却為今日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國，具有最老的民主政治和成文憲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其人民自最初期即自覺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是因為它是人類希望之所繫，是因為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和實現這種種希望。

美國的故事，是一種古老文化對一種荒野環境的衝擊力的故事。美國跳過最初六千年的歷史，而以英勇和成熟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因為最初移殖美國的人，並非原始的野人，乃是文明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文化移殖到美國來。但「新世界」並不僅僅是「舊世界」的延長物。它正如其初期的殖民者所預料和其建國元勳所策劃——是歷史中的新事物。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的拓荒者，他們所碰到的未經征服的荒野，大大地改變了遺傳下來的制度，而人民和種族的混雜，又改變了遺傳下來的文化。結果美國在民族混和上，在宗教自由上，在社會平等上，在經濟機會上，在政治民主上，都曾作過最大膽的實驗。

歐洲的歷史家和旅客，雖承認美國人民本質的美德，但他們一向堅持着，說美國歷史平凡而沒有光彩，缺乏多樣性，不豐富也不瑰麗。這和事實正相反。美國歷史栩栩如生，具有驚人的戲劇性，而且是英雄的範型。一些弱小的人民，由一個大陸的這邊迅速地展拓到那邊去；一些散漫的殖民地轉眼蔚為一個最富最強的大國——這種戲劇在現代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美國的山隘，與歐洲的封建堡壘同其雄偉；美國城鎮的集會，與皇家的朝廷同其堂皇；美國人民向內地湧進，與諾爾曼人或阿剌伯人的擴展同其動人；而美國的民族英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可與任何其他民族的英雄媲美而無愧。美國有一代人曾經為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從事劇烈的鬥爭，故美國的歷史，充滿着有關自由民主的成長之令人愉快的故事。

這一部歷史書並不是為學者而寫的，故不想包括原來的研究資料，也不想作嶄新的解釋；這不過是一本通俗的讀物。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美國人民的敘事體的簡史，這本書的寫作便是想滿足此項需要。因為篇幅有限，作者對於材料不能不多所割愛，這是迫不得已之爭。同時作者不受誘惑，決不涉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歧途，以致提及已經遺忘了的人物，而引起錯綜複雜的爭論。作者並不認為美國歷史的基調在於政治或經濟，或在於一串的問題，而認為美國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如果這本書有它的題旨的話，則是包含在它的書名之內——一個有充分智慧以要求自由並願為自由而工作而戰鬥的民族之發展史。

納文斯 (Allan Nevins)

康瑪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美國通史目次

上部

作者原序	一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三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四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六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六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一〇
第七章 全國統一	一七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一〇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一四
第十章 區域鬥爭	一六
第十一章 閱牆之戰	一七

下部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一六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三五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三五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六六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六八
第十八章	躍起爲世界強國	一一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一三六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一四一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一七四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北美的形勢

英國人在美洲殖民的歷史，肇始於一六〇七年一個美麗的四月清晨，牛波特船長所率領三艘飽經風浪的船，在齊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口附近下錨，然後派人登陸，發見陸地上「綠草如茵，樹木參天，水清可愛。」同行者之中，有諾斯安伯蘭伯爵的英俊的兒子波士和史密斯船長。波士紀述着他們怎樣發見壯麗的森林，地面長滿着花草；美好的草梅，「比較我們英國的大四倍」；蠔「大而味美」；許多小的獵獸；「大批火鷄巢穴和火鷄蛋」；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城鎮，那些未開化的人在這裏給他們送來玉蜀黍的麵包，和用附有銅壺的盜烟筒吸着的煙草。在弗吉尼亞的初期經驗，最初很是迷人。據波士的「觀察記」（Observations）所描述，新來的人，很喜歡當地五光十色的飛鳥，水果，鮮美的鱧魚和可愛的風景。可是這充滿原野詩篇的英勇故事，是以悲劇結束的。他寫着印第安人怎樣攻擊殖民者，「自四面八方的山間爬來，和熊一樣，把弓啣在嘴裏」；登陸人員怎樣受脹腫病，痢疾和熱症所侵襲；有許多人怎樣僅僅因為饑餓而死，「他們的屍體由茅屋裏拖出來，像死犬一樣地掩埋了。」

在美洲樹立一個新的國家，並非一蹴而幾的事。這是一種堅忍殘酷而艱險的工作。這裏是一個幅

員廣袤而地形參差屈曲的大陸，其東部三分一的地方，佈滿着沒有路徑的森林。它的山脈，河流，湖沼和平原，規模都是宏大的。它的北方地帶冬季嚴寒，而南方區域則夏季酷熱。這裏充滿着野獸，居民好鬥，殘忍而奸詐，其文化尚在石器時代。這裏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片禁地，只有經過極艱險的航程之後纔能到達，而登陸者多難望生還。雖然有這種種險阻，但此地還是適於作爲一個有活力謀進取的民族之家鄉。

北美是一個大約三角形的太陸，最大的部分位於緯線二十六度與五十五度之間，是一大片肥沃而灌溉便利的區域，氣候很合健康；溫暖的夏季既適於穀類的生長，寒冬又可激勵人民活動。歐洲人可以不必經過痛苦的適應環境之過程而在這裏居留。他們能在此地種植農作物：小麥，稈麥，雀麥，豆，胡蘿蔔和洋蔥。他們在這裏發見兩種極有價值的食物——玉蜀黍和馬鈴薯。玉蜀黍如在五月裏種植，七月即可結穗，除可作糧食外，又可作牲畜飼料。此處隨處可以狩獵，鹿和野牛數以百萬計，野鴿成羣飛過的時候，天都會被遮黑。海岸一帶魚類極多。北美蘊藏鐵，煤，銅和石油的豐富，實非他州所能比擬。它的森林幾乎是無盡的。東部海岸有許多港灣，可作爲避風港，而寬闊的河流——聖羅稜士河，康涅狄格河，哈得孫河，特拉華河，薩斯基漢那河，波多瑪克河，詹姆士河，比地河，薩凡那河——則便於向內地發展。獲得立足點之後，要擴大它並不必碰到太大的困難。

這個大陸的某些天然形勢，對於美國的前途發生了顯著的影響。大西洋岸的許多港灣和海口，使殖民地不成爲少數的大單位而成爲多數的小單位。很快建立起來的殖民地，把諾法斯科細亞和魁北

克算在內，總共有十五個，這些使初期的美國有着各種各樣的制度和習慣。每個殖民地固保着它自己的特性。美國獨立的時候，國家由這麼十三個單位組成，只得出之以聯邦的方式了。在海岸平原的後面，便是廣大和荒野的阿巴拉契安山脈。因為這個障礙物極難渡過，故在殖民者用九牛二虎之力越過它向西展拓之前，海岸的殖民地越來越密集。他們越過阿巴拉契安山脈之後，便發見前面是一大片中央平原，那便是密士失必河流域。這一大片平原，幾乎佔合衆國面積的一半，佔全國已墾土地一半有餘，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由東亘西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威斯康星河，衣阿華河，伊利諾斯河，俄亥俄河，康伯蘭河，田納西河，阿肯色河和紅河——而由北至南則有密士失必與密蘇里的大河流系統。由海岸各部分和西歐各國來的人，至此都在平等的條件下雜處着。這裏便成爲一個大鎔爐，一種新的民主主義和新的美國情調從此滋長起來。

再往西是高地平原，空氣乾燥，又有高峻的洛磯山阻障着，故延緩了殖民者再向西猛進。在這些半乾燥平原從印第安人手中奪過的數十年前，遙遠的太平洋岸傾斜地帶的金鑛和其他礦產，就吸引着一些冒險的拓荒者。加利福尼亞在那時是一個著名的地方，雖然一條寬闊的未墾殖地帶還把它和美國其他的舊部分隔離着。經營牧場的人，跟着水牛獵戶迅速來到了這些平原，而當鐵路把征服無樹區域所必需的物資運到的時候，人口就漸漸多起來。鐵路帶到的物資是鐵絲網，風車，木材和農具，同時灌溉的農場數目漸多。到了一八九〇年，邊疆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荒漠的西方也成爲過去了。

美國殖民者的移動採取由東亘西的路線，那是自開始時即不可避免的形勢。聖羅稜士河和大湖水

道，是通內地的便路，這些河道大約都是東西流的。摩霍克河谷切入了北部阿巴拉契安山脈，又是一條由東亘西的路線。移民第三條大動脈的俄亥俄河谷，也是大略循着東西的方向。由大西洋岸到洛磯山的移民，都是採取與緯線平行的路線。因為這個緣故，在說英語的美國人推進的時候，法國對路易斯安那和墨西哥對加利福尼亞的主權就跟着消滅，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勢。殖民時代，眼光銳利的觀察家，即指出控制着俄亥俄河谷的人即同時控制着密士失必。同樣的事實，控制着密士失必流域的人，結果也必控制着它西面的整個區域。美國人用其優勢的人數和精力，大大地利用了地理上的便利。

北美的印第安土人人數太少，文化也太落後，不能成爲殖民運動的嚴重障礙，這是白種殖民者的大幸。土人雖予以困擾而有時阻緩了殖民運動，但他們從未能真正堵塞了這種洪流。當第一批歐洲人到達的時候，密士失必河以東的印第安人，爲數不逾二十萬人。墨西哥以北大陸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會超過五十萬人。他們的武器只有弓，箭，棍，斧，而除伏兵之外，不懂得任何軍事技術。這樣的人，自然不能與機警的白種人抗衡。土人表現很缺乏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他們的生活，主要仰給於漁獵，故其來源是不穩定的。墨西哥以北五十九種土人的幾百族，大部分人數甚少，不能集結一支強大的作戰隊伍。印第安人團體中最有力量的，是伊羅華斯族的五國（後來是六國），他們的根據地在紐約的西部，有一個會議，採取一種侵略的政策，爲其毗鄰阿貢奎各部部落所畏懼。在東南部，克利克族建立一個強大的同盟。遠在西北部，在較北的平原上，希奧克斯族成立一個比較鬆懈的組織。

殖民時期中移民與印第安人間的鬥爭，經過幾個劃分得很清楚的階段。在第一批殖民地建立起來不久之後，殖民者即與毗鄰各土人小部落發生尖銳的局部衝突。例如新英格蘭的庇古德戰爭（Pequot War）是短促而劇烈的，一六三七年戰事結束時，居於康涅狄格河谷的庇古德部落完全潰滅。又如弗吉尼亞殖民者與波瓦丹部落間的戰爭，是一六二二年爆發的，結果也是印第安人完全失敗。可是當新來的白種人向前推進奪取大片土地的時候，印第安人即組織大規模的部落同盟以資抵抗。例如斐律普王就聯合了幾個重要的新英格蘭土人部落，在被擊潰之前作兩年的英勇抗戰。在杜斯卡洛拉戰爭（Tuscarora War）中，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碰到一個同樣的同盟。在耶瑪西戰爭（Yamasse War），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是一樣。這多次的鬥爭是劇烈而大規模的，使白種人的生命財產損失奇重。最後到了印第安人與歐洲人結盟的一個階段，有些北方部落與法國人聯合；有些南方部落接受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鼓勵。幸而強大的伊羅華斯族採取友好的態度，積極協助殖民者對抗法人。結果，在這第三階段的戰爭中，敵性的印第安人和在以前兩個階段一樣，遭受決定性的潰敗。

早期的殖民者

最初的英國殖民者到新大陸來，是組織一個個冒險的團體。牛波特統率下的船隻，於一六〇七年五月十三日載運人員駛入漢普頓水道。他們在詹姆士城外停泊。這城有一座砲台，一座禮拜堂，一個倉庫和一系列小茅屋。當他們遇難的時候，史密斯船長表現得機智而有精力，故第二年即被推為主

席和殖民地的實際獨裁者。農業是緩緩地發展起來；一六一二年，羅夫開始種植烟草，因烟草在倫敦可售高價，故人人爭種，結果連市場也種起來；豬牛的數目也漸漸增加。

但發展是遲緩的。在一六一九那一年，弗吉尼亞的人口還沒有超過二千人。那是一個可注意的年份，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國來了一隻船，載來九十名「年輕的婦女」作殖民者之妻，由殖民者償付一百二十磅煙草作為運費。這一批貨物受到熱烈的歡迎，故類似的事不久便接踵而至。與這件事同樣重要的是美國代議政府的創立。七月三十日，詹姆士城的禮拜堂，召開美洲大陸上第一個立法會議；總督一人，評議員六人，市民二人（每十個殖民地推出一人）。第三件大事是八月間一艘運黑奴的荷蘭船到達，以二十名黑奴售給殖民者。

當弗吉尼亞如此繁榮起來的時候，一羣在荷蘭居留的英國卡爾文教徒（Calvinists，即信奉法國神父約翰·卡爾文的教義者），即策劃遷移到新世界來。他們因為不承認英王在宗教上的最高權力，想自己成立一個獨立的教會，因此遭受迫害。他們在多方面看來都是個非凡的團體。他們有三個具有顯著能力的領袖：教師羅賓遜是劍橋的畢業生，學問淵博，頭腦開明，心腸慷慨；他們聰明的老大哥布魯斯特，也是劍橋出身；還有柏拉福特，機警，富理想而有魄力。他們全體都正直，勤勞而嚴肅，同時也勇敢堅忍。他們在英國忍受着普遍的敵視；在荷蘭忍受着孤獨和辛勞。此時他們領得到美洲殖民的執照，一隻船叫「五月花」的和一批糧食，準備去面對荒漠的嚴酷。他們一行共一百零二人，由普利穆斯啓程，於一六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馬薩諸塞的海岸登陸。那年冬天，過一半的人因為寒冷和害壞血症死亡。但翠年夏季，他們種植的收成頗佳，而秋天又有一隻船運到新的

殖民者。他們的決心從未動搖。當拿拉甘色特的酋長康農尼卡斯送來一把箭和一條蛇皮表示挑戰的時候，柏拉福特即把蛇皮實以槍彈，連同一封侮蔑的覆信送回去。

以後，其他英國殖民地繼續成立。英國的總蜂窠準備遣出大批蜂羣。一六二九年一個五月天，倫敦的碼頭上呈現着擾攘和高采烈的景象；五隻船載着四百名殖民者和差不多二百頭牲口——是一次送過大西洋最大的一批——啓旋向美國的馬薩諸塞灣前進。在六月杪之前，他們到達賽林姆。安底各特和一個小團體已於上一年的秋季在此建立起一個城鎮。這批殖民者都是清教徒——那就是說，他們本來屬於英國國教，起初想把它教理予以改革或予以清淨化，結果竟退出教會——他們發動了一個清教徒的大規模出走。一六三四年春天，溫特洛甫率領運載九百名殖民者的船隻十一艘抵達賽林姆，足以建立八個新的城鎮，包括波士頓在內。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發展極速，不久即向南向北設立分支。威廉士是賽林姆一個牧師，他因為大膽宣傳政教分離的學說，和其他有激烈主張的人被驅至羅特島的荒野。他於一六三六年把勃羅維頓斯港建立成一個完全宗教自由的地方。那一年裏，第一次遷居康涅狄格的工作，也在剛毅的胡克牧師領導之下開始。胡克牧師把他的會衆的大部分組成一個團體由劍橋西遷。當馬里蘭在自由思想的加爾維特領導下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的時候，另一個著名殖民地於焉成立。初到那裏上流的人物，大部分和其創造人一樣是英國天主教徒，其餘平民則大都是清教徒。因此宗教自由是重要的，而馬里蘭便成爲宗教自由的家鄉，吸引着各種各樣宗教信仰的人們。不久來自弗吉尼亞的殖民者冒險進入現在的北加羅林納，一部分人約在一六五〇年取得沿阿爾比馬爾地峽的土地。

有一個肥饒的殖民地是征服來的。荷蘭人遣派英國航海家哈得孫去探測一條後來用他的名爲名的河。這工作實行於一六〇九年。荷蘭的皮貨商人跟着他前來，於一六二四年在曼哈丹島建立一個小的居留地，「新荷蘭」地方緩緩的成長起來，但不能發展自治政府的制度。這個時候，英國人對於整個海岸的權利毫不放棄，康涅狄格的殖民地也亟想奪取他們這個麻煩的鄰家。爲什麼讓異邦分子插入英屬美洲的中心呢？查爾斯二世便把這塊地方封贈他的兄弟約克公爵，約克公爵即採取強硬的行動。一六六四年夏，三艘戰艦開抵新阿姆斯特丹，來了一批軍隊，此外尚有康涅狄格駐軍的增援和馬薩諸塞及長島答應出兵。荷蘭的殖民者大部分厭惡以往的暴政，故對於主權變易並不反抗。年老的史都維桑特雖聲稱甯死不降，但他也無能爲力。英國的國旗從此在改名爲紐約的城頭飄起，而除短期的英荷戰爭（一六七二年——一六七四年）外，英國國旗從未離開此間。的確，英國國旗至此飄揚於肯尼貝克至佛羅利達之間。

但最有趣的殖民地中的一個，在這世紀的末期之前尚未有確定輪廓。一羣殖民者，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進入後成爲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的區域。當仁慈和眼光遠大的賓氏（William Penn）於一八六一年治理這個區域的時候，他準備根據教友派（Quaker）的道理建立一個模範的共和國。他以仁慈的姿態，用友善的購買條約取消了印第安人的名義。他爲吸引殖民者起見，提出寬宏的條件，保證全體的人都能夠獲得土地，建立繁盛的家庭，並能夠與鄰人在公道與平等之下相處。基督教徒不應遭受宗教的歧視。民事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人民必須是法律的一方。賓氏指導着費城的建設工作，這是他的「手足愛之城」，每一家屋都有花園圍繞着，使其成爲「一個綠色的農村城市」。

……常常保持衛生」。一六八二年他親自蒞臨，帶來了一百名殖民者。賓夕法尼亞奇異地繁盛起來，吸引着大批各式各樣來自英國和大陸的殖民者，但還是保持着教友派的外貌。

大略言之，用來使英國人和其他人民渡海建立新國家工作的有兩種主要的工具。建立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的是特許的貿易公司，其組織目的主要在於牟利。倫敦公司於一六〇六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四度至四十一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普利穆斯公司也於同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八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這些公司能夠分配土地，開礦，造幣，為殖民地組織防務。批准特權的英王，對殖民地政府保留着最後的司法權。倫敦公司於財政嚴重虧損之後，一六二四年特權被取消，英王把弗吉尼亞改為皇家殖民地。普利穆斯公司推廣各個北部殖民地和漁場，但也無利可獲，於改組之後，一六三五年取消特權，自稱「僅是一個沒有氣息的屍體」。

倫敦公司和普利穆斯公司在財政上雖無利可獲，但在殖民工作上却都有了功績。倫敦公司實在是弗吉尼亞之母；普利穆斯公司和其後繼者新英格蘭會議，在緬因新漢普廈，和馬薩諸塞各地陸續建立城市。第三公司叫馬薩諸塞灣公司，具有特殊的性質和目標。它是一批證券握有人所創立的，他們大都是清教徒，其動機是商業的和愛國的。他們不因爲從前各公司的虧損而不敢前進，他們認爲有更好的管理還是足以謀利的。查爾斯一世早於一六二九年批准一種特權，以後便有一種奇異的發展。當英王和勞特大主教主持下的高級教會成爲英國國教的主席時候，許多清教徒領袖都想離國。他們有財產，有社會地位，也有獨立精神。他們不願到馬薩諸塞灣去作一個設於倫敦的公司的附庸。此外他們希望得到自由，建立一種他們所喜歡的教會政府。因此，公司中的主要清教徒，乾脆

收買全部股票，接收特權，一同帶到美洲。這樣，一個商業公司一變而為一個自治的殖民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

殖民工作的另一種主要具是業主的封贈。業主是屬於英國上流社會或貴族的一個人，他有錢財可以使用，英王便以美洲一塊土地贈給他，如同贈給他一塊國內的地產一樣。依照英國法律的規定，一切土地如果不是這樣取得的，都屬於英國國王，故美洲也不能例外。巴的摩爾爵士獲得了馬里蘭；賓氏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海軍上將，是英王的債權人；還有查爾斯二世的一羣近臣獲得加羅林納。這些業主都得到大權，可設計一個政府。巴的摩爾爵士具有斯圖亞特王室的專制思想，他反對以立法權授諸殖民者，但最後還是對一個大眾所創立的會議讓步。賓氏便比較聰明。他於一六八二年召集一個會議，全體都是殖民者所選舉的，並讓他們制定一種憲法或「大憲章」。這個憲法把許多政府的權力授與人民的代表——而賓氏居然接受這一計劃。

當美洲的生活證明是可能繁榮和可能有希望的時候，歐洲方面大批的自然移民即行開始。這種向美洲的移動，其進出之勢是不平均的，而動機也各有不同。最初兩批到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自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英國的清教徒處於不景氣和憂患之中，遭遇很多實際的迫害。王室恢復教會的老方式，並決定使教會完全依賴於王室和大主教。至此整個國土佈滿着政治和宗教的騷亂，英王解散國會，使英國的政治沒有國會者達十年之久。他監禁他的主要政敵。當王黨似乎有顛覆英國自由的傾向時，許多清教徒認為最好的出路便是離開島國到美洲去建設新國家。在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的大移民中，大約有二萬個最堅決的英國人離棄祖國。船隻運載殖民者，牲口和家具橫渡

大西洋的下一千二百次。波士頓成爲世界上重要海港之一，爲一個忙碌而充滿活力的地區服務。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於此時成立。在殖民者之中，有佛蘭克林，亞當斯，愛麥生，霍桑和林肯等偉人的祖先。這個運動的最驚人的特點，便是許多清教徒的移徙，不是個人的或家庭的，而是整個社區的播遷。有些英國的城鎮，因此幾乎人口減去了一半。新殖民地不僅包括商人和農民，還有醫生，律師，教師，企業家，工匠和牧師。新英格蘭成爲舊英格蘭的縮影，孕育着未來發展的種子。

到了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爆發時，清教徒出走的潮流便鬆弛下來，但可以名爲「保王黨出亡」（Cavalier Exodus）的不久之後也跟着開始。到了一六四九年查爾斯被處決時，出國人數漸增，而且直至一六六〇年的復位時強烈地繼續着，和清教徒的移徙使新英格蘭的人口增至三萬以上一樣。英國保王黨的移徙，使弗吉尼亞的人口，至一六七〇年增至幾達四萬人。人民的移入，帶來了可觀的財富，因爲新來的人雖極少是保王黨，但許多來自興盛的階級，他們有資金，可以購買和開墾大批土地。弗吉尼亞本來是一個窮人的殖民地，至此充滿了小康之家。這些移徙，給美國歷史帶來了一些偉人的名字。華盛頓的曾祖父約翰華盛頓，是一六五七年來到弗吉尼亞的。馬歇爾家族的傳說，謂他們的祖先在英國戰爭時，曾任皇家軍隊的上尉，後來皇家軍隊敗北，他便到弗吉尼亞來。在人口流入之後，我仍在弗吉尼亞的歷史中遇到顯著的家族如哈里遜，加里，馬遜，卡特和台勒等。

但我們在馬薩諸塞與弗吉尼亞的殖民者之間，不能劃出真正的社會的區別。組成兩個地方人口的

人民，是吸收自同一個大的中等階層。華盛頓家族在英國，簡直是鄉村紳士。約翰馬歇爾的祖父似乎是本匠。弗吉尼亞的第一個蘭道夫是來自華威克夏一個鄉紳的家族。這些保王黨沒有一個比較清教徒約翰·溫特羅甫有更好的身世或更多的大家風範。他們沒有一個比較沙敦斯多爵士有更好的出身。在一六六〇年以前移到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的人，大部分是自由民，機械師，店員，和財產微薄的書記；而在美洲各部分的很多人，則是簽定契約的僕役，他們以限期的勞役來償付船費。他們的真實財富在於他們的堅忍，自信和精力。

自治政府的興起

殖民者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們在理論上總帶同着自由英國人的權利，繼承着英國人爲自由而鬥爭的傳統。這一點特別在弗吉尼亞的第一憲章裏予以確言，該憲章聲明殖民者有一切自由，選舉權和特權，「正如他們生長的英國國土然。」他們將受到「大憲章」(Magna Charta譯者按：即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國貴族迫其王約翰在隆尼密特所頒發者)和普通法律的保護。這是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基本原則。但要使它生效，殖民者必須經常警醒，有時並須作激烈的鬥爭。幾乎是從他們歷史的開端起，他們即開始慘淡經營其立憲政府，力爭更強固的代議制度，對財政的控制，和對個人自由的更充分的保障。

弗吉尼亞的議會產生於一六一九年，即刻開始制定各種法律。當英王撤銷弗吉尼亞公司的特權時，議會(House of Burgesses)繼續表現其毅力。的確，在數年之內，它對於自己的權利立下

某種基本的法規。它揚言總督沒有得立法方面的授權，不得徵收任何捐稅，籌得之款必須依照會議指定的用途分配，不得逮捕議員。不久之後，議會宣佈，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違背立法的規定，同時採取步驟以陪審官制度保護審判。當共和政治在英國持續着的一天，弗吉尼亞的議會還是一個有力的團體。不幸在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之後，它便衰弱起來，但它雖服從着皇家的總督，可是已經有一種劇烈的反動發生了。

馬薩諸塞灣不久也有一種代議制度在發展着。憲章的規定，似乎授權給溫特羅甫和其十二個幫辦，管理全體殖民者。一個神權政治或教會國家便這樣的建立起來。同時十二個幫辦決定，除非由自由人投票改選，他們應一年過一年地繼續保持其職位。因為他們實際上握有一切司法和立法權力，故這種任期造成一個小小的寡頭政治，總督，幫辦和牧師把整個殖民地操在掌握之中。

幸而不久便發生一種反抗。一六三二年在水城徵防稅的時候，沒有選出代表的市民即發出怨言，並拒絕納稅，深恐「自身和後代受到束縛」。為平定這種怨言起見，不久即決定總督和幫辦徵稅應受一個委員會的指導，這個委員會由每城派出兩個代表組織之。事實上，這個城代表所組成的團體，與總督，和幫辦集議的時候，無異是一個一院制議會。這個委員會於一六三四年開會，取得充分的立法權力，制定法律，承認新的公民，並辦理宣誓効忠的手續。這樣大陸上第二個人民代表團體便告成立。因為一院制的成績不佳，故在十年之後又分成兩個團體，幫辦組成上議院，城代表組成下議院，馬薩諸塞殖民地繼續保持為一個清教徒共和國者達五十年，由其自己的立法者統治。當一六九一年它在新憲章之下成為皇家的一省時，議會依然還是一個有力的團體。自此以後，總督

由英王任命；議會由人民推舉，而議會緊緊地控制着國庫。

同時，兩個固定的小共和國在美洲土地上生長起來——一個是維特島，一個是康涅狄格。一個是從馬薩諸塞灣分出來的，已經在康涅狄格河下游建立幾個城鎮。一六三九年，他們的公民會於哈特福特，擬成康涅狄格基本法，是為美洲共和國為自己而制定的第一個成文憲法，也為西方世界的第一個成文憲法。它規定設立一個總督，一批幫辦，和一個下議院——這個下議院由每個城選舉四個代表組成之。在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之後，康涅狄格從英王得到一種特權（一六六二年），但其條件異常寬厚；公民有權任意自行管理，只受到一種模糊的限制，即不能制定與英國法律相違背的法律。羅特島也是同樣的順利。當它的城鎮初次組織起來的時候，威廉士替他們請求得自治的特權。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使他們必須從新請求特權。但一六六三年的新憲章，使羅特島像康涅狄格一樣，成為不列顛帝國內的一個小共和國，而且維持這個地位直至革命的時候。它可以選舉全部自己的官吏，制定全部自己的法律，也許可說是地球上最自由的社會。

到了一七〇〇那年，一種殖民地政府的普通制度已經形成。康涅狄格和羅特島取得完全自治共和國的特別地位，選擇他們自己全體的官吏。其他的殖民地不是屬於業主便是屬於王室，但無論如何，它們的政治結構大略是相同的。國王或業主委任一個總督。在總督的周圍，在相當程度上是擁護他的是一個參事會。這個參事會在馬薩諸塞之外，也是由國王或業主任命的。但總督幾乎常常是一個英國人，而各參事則往往是美洲人；他們普通雖代表着資產階級，但他們的見解常常與總督見解大相逕庭。最初，他們的職務主要是行政的和司法的，可是後來漸漸發展為一個參議院。每一個

殖民地有它的下議院，其議員由符合某種財產或其他條件的成人男子選出。這個下議院掌管立法，分配經費，決定賦稅。它的力量得自它代表輿論和控制國庫的權力——這同一因素使一六八九年以後的英國國會有極大的力量。

殖民者對於爭取和保持代議制度多所努力，這不但爲了他們自己，也爲了他們的後代。有三種基本事實使他們的改制爲人所注意。第一是他們重視成文憲章爲他們的自由的保證。英國是沒有成文的憲法的。但從初期開始殖民者即知道尊重寫於特許狀上的權利的的神聖性，無論這些特許狀是領給貿易公司，業主或是人民本身。這種對於基本法的成文制度的關心，對於美國歷史發生極大的影響。第二種重要事實便是總督與議會的經常衝突。他們代表着兩個敵對着的分子；總督代表着既有的權利和皇家的利益；而議會則代表着大衆權利和地方的利益。最後，殖民地政治的顯著特點便是議會堅持着要控制經費的分配。他們力爭要達成各種目的——常常舉行的選舉，對皇家官吏的排除，選擇他們自己的議長的權利；最首要的，他們堅決主張只有他們纔有權分配經費。他們碰到了很多的反對，但他們往往使這種要求獲得進步。

英國殖民地受暴政之苦一事並非事實。就大體而論，他們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實爲十七十八世紀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但他們的確經歷過許多階級政府的苦難。神權的新英格蘭有它的少數人的統治，這種權力是必須打倒的。在南方，貴族的地主和商人企圖成立一種政治上的壟斷。

階級的暴政不時抬起一個醜惡的頭來——而殖民者則對之痛擊。最初的一擊發生於一六七六年弗

吉尼亞的「柏康叛變」(Bacon's Rebellion)。訂立契約的僕役，種植邊區農田的移民，人數較少的種植家，與衆多的勞工和奴隸監工，都感覺自身受到虐待。一六七〇年以後，沒有一個無地產的人能獲得選舉權。在其他許多方面，他們都不能對政事發言。議會的議員事實上十四年未曾變動，職位都爲皇家總督的親信和有錢的種植家所包辦。教育非貧苦者所能同津。他們沒有得到周密的保護，不能避免印第安人的襲擊，因爲總督和其僚屬，都覬覦着皮貨的貿易，袒護土人。捐稅奇重，而市場又遠離外部的農田，故當煙草價錢跌落的時候，農民感到極度的困苦。

最後，一次印第安人對無保護的殖民地的襲擊，引起了一次富於戲劇性的叛變。殖民者鼓噪要求保護，而當總督柏加利和海岸種植家的答覆顯然是有意遷延的時候，他們暴動了。有柏康者起而領導詹姆士河和約克河上游的暴怒的人民，發動襲擊，攻毀了印第安人的主要堡壘，擊斃土人一百五十名。他後來去參加在威廉士堡舉行的會議時，那個傲慢的總督把他逮捕了；但兩條河各處即刻發生暴動，總督不得已把他釋放，以後他便逃亡了。他歸來的時候，是帶着四百名武裝壯士。柏加利和各參事趕快跑出議事廳來迎接這個堅決的種植家。柏加利總督看撕開衣服，袒着胸喊道：「我在這裏！開槍吧！打準點！」可是柏康回答說：「不，總督，我們不想動你的毫髮，也不想傷害任何人。我們此來的任務，是要從印第安人的手裏挽救我們的生命，這一點是你屢次答應我們的，現在我們在離去之前必定要達到目的。」他的羣衆在議會窗門上搖槍吶喊，用合唱的腔調高呼着「我們必定要達到目的。」柏康在羣衆中作半小時的高聲演說，其說話和暴風雨一樣，要求保護殖民者，要求對公款作適當的稽核，要求減稅和其他的改革。

這次暴動好像夏天的風暴，很迅速地捲過弗吉尼亞的田野。總督柏加利和其僚屬當時答應了，但聰明的觀察家不相信他們會履行諾言。總督立刻召集格羅斯特和密特塞斯的民團達一千二百名，要他們幫他解決叛黨柏康。「柏康，柏康，柏康，」一片深刻憤怒的怨言立刻發出。這一批民團厭惡地離開時，還喃喃說着「柏康，柏康，柏康。」跟着就是戰事爆發，柏康進攻詹姆士城，而在夏季一個美好的日子把它全部放火燒燬了；他奪得詹姆士河上的一艘二十門砲的軍艦。之後，他在作戰的緊要關頭中患瘧疾病逝世，他的叛變也即解體。這次的叛變，開始時是替小農民，工人和邊疆居民爭取保障，以免遭野蠻土人的襲擊，並要求在政治上和財政上獲得公道的待遇；但後來演成爲反對皇家政府的公開叛變。心急復仇的柏加利，此時對着俘獲的柏康的一位副官鞠了一個躬，用譏諷的口吻說：「特魯門先生！我們很歡迎你。我高興看到你甚於在弗吉尼亞的任何人。特魯門先生，在半小時之內你便要縊殺了。」無論這次叛變怎樣流產，它究竟讓我們看出獨立和堅定的自我主張的邊疆精神——美國精神——形成一種引人注意的方式。這是令人難忘的史事。

殖民地的教會和國家

在美洲，當對政治自由的渴望日強一日的時候，宗教自由的精神也漸形發達。不列顛的殖民地自早期起即是許許多多教派的樂土，他們在這裏知道怎樣和協相處。

英國的教會，與初期的殖民者一起移殖到弗吉尼亞。在詹姆士城的初期建築物中，有座禮拜堂迄今尚屹立於詹姆士河畔。特拉華爵士於一六一六年來任總督時，曾把這座禮拜堂予以修建擴充，使

它成爲一座莊嚴的建築物。有西洋杉的座位，胡桃木的祭壇，一個高高的講壇，一個讀經臺和一個洗禮盆。殖民者在這裏與由船隻運來的婦女結婚；他們的兒女在這裏受洗。當弗吉尼亞正在發展的時候，新的教區和新的禮拜堂先後成立，由公家稅款予以維持，如同英國的國教一樣。每一個殖民者抽穀一蒲式耳，煙草十磅給教會。這種辦法行了相當歲月，後來不夠了，一六三二年議會通過法案，強迫每個殖民者於舊辦法之外，須再爲牧師保留他的第二十隻小牛，第二十隻山羊，和第二十隻豬。在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之後，牧師每年所得的煙草數量更爲增多，同時也更爲確定。此外，牧師可獲得教會領地和其他賞錢。英國國教的收入，在弗吉尼亞的確可觀，其南部各部分也是如此，最著的是馬里蘭和南加羅林納。

但弗吉尼亞的教會在物質上既不發達，在精神和智慧上又不足以影響殖民者。社會和經濟的狀況，對於它的發展是不利的。大部分教區都在殖民者稀疏的廣闊區域。許多教區的境界是緊緊地沿着河岸，其長度自三十哩至六十哩不等。赴教堂參加禮拜的人，必須在極壞的路上跑很遠的路程，或須由水道上水或下水辛辛苦苦地划幾小時的船。這樣，教徒參加禮拜自然不會經常一定來的，甚至名人如喬治·華盛頓（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者，他雖是一個虔誠的教區委員，也受人指摘，說他參加禮拜是無常的。逢到冬季的惡劣天氣，牧師常常看見教堂的座位多數是空的。有一個人發出怨言，說他趕了五十哩路來禮拜，但結果發見參加者爲數寥寥。在這些殖民者稀疏的教區中，牧師的經費常鬧恐慌。價錢跌落的時候，地方的稅款，不均衡地抽自煙草和牲畜的便不夠支持，而當議會決定增稅的時候，較窮的教區又作痛苦的怨言。

因爲薪俸薄，任期不穩定，還有許多艱難困苦必須對付，故很難請到有能力的，虔誠熱心的牧師。最好的教士不會由英國移到殖民地來，因爲他們可在國內從事更好的事業。來到殖民地的教士，多數是腦力遲鈍，身體懈怠或是道德頗成問題的人。我們不久便發見殖民地的總督們和其他人士發出怨言，謂弗吉尼亞的牧師團是「一批無恥的傢伙，好咒詛人，酗酒而好鬥。」不久便舉行改革運動，其結果之一便是於一六九三年創辦第二個殖民地學院——威廉瑪麗學院——其主旨在於訓練青年牧師。但當地情形直至獨立革命之前還是不能令人滿意。

在弗吉尼亞和南方各部分，英國國教接受公衆的援助，但對於國家沒有任何控制力量。在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清教會數十年來即與國家成爲兩位一體的東西，對政府施以顯著的管制，並且在事實上早就形成一種嚴格的宗教專政的局面。

清教徒移民馬薩諸塞的基本原因，在於建立一個「教會國家」，而不在於尋求宗教自由。清教徒在宗教上並非急進派；他們在宗教上乃是保守派。他們在英國相信英國國教，但希望緩和它的教會政治的專制主義，並用廢除天主教形式的辦法予以改變，嚴格的遵守安息日，密切注意道德。他們因爲不能奪得產業，轉而到美洲的荒漠中另求出路，希望建立他們的「特殊教會」，由公家稅款支持，與國家混而爲一，不容忍反對派。安底各特在賽林姆創設第一個清教會的時候，他們一羣中有兩個人從行李中取出一本英國國教的主禱文，準備在禮拜時宣讀。安底各特立刻把這兩人和那本可厭的主禱文送上船去，催他們快快回返英國。清教徒的領袖們即刻創建一個嚴密的「教會國家」，其權力操諸一批意志堅強，能幹而專制的教會領袖。

這個加爾文教派的「教會國家」和其嚴格紀律的勝利，意味着自治會衆的參詣聖地者或離教派（Separatist）思想的消沉。參詣聖地者在普利穆斯建立一種小小的教會民主制度，會衆不必服從主教或宗教會議的意見，可以自行處理他們的宗教事務，但清教徒主張嚴格的中央統制，認為這樣是無政府的和敗壞風紀的。

這個教會國家在馬薩諸塞建立起來，有四個步驟。第一是一種基本的規定，一個人除非是清教徒而有良好身分者，不能投票選舉或獲得職位。第二是強迫每個人都須參加禮拜，這樣便保障教會和殖民地以反抗不信教者。第三是規定教會和國家都准許任何新教會的合併。不從國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己不能在馬薩諸塞開店；不嚴格遵守清教規矩的人，必須遷至美洲的其他部分。最後一種規定，國家對教會的支持，使兩者行動一致，能夠處罰任何叛變或破壞紀律的人。清教會的宗教會議於一六四六年頒佈一種所謂「劍橋綱領」（Cambridge Platform），規定任何背叛宗教會議或教會法規的會衆，政府即停付其牧師薪俸，予以開除，並另以服從者代替之。

這個馬薩諸塞的「宗教國家」，這種教士與官吏聯合統治的局面，漸漸地鬆弛，直至一六九一年威廉和瑪麗批准一種改良的憲章，把馬薩諸塞變成一個皇家省分。這種神權政治只有一件功績，頑強的清教徒組織，堅決反抗查爾斯二世的侵入，這在新世界政治自由的發展上，發生了莫大的作用。這種反抗對於下一世紀政治獨立的取得上，實有很大貢獻。但此種神權政治有許多劣跡。它是一種壓迫人的暴政；它幹了一些迫害教友派和其他分子的可恥事情；它敵視思想和言論自由；它的宗教狂的風氣，助成了賽林姆的巫術的誘惑，以致十九個男女遭受絞刑。及至人口漸漸稠密，新思

想漸漸生根的時候，一個強有力的自由派在馬特和其兒子可頓領導之下勃起與保守派抗爭。馬特父子都是波士頓有名望的牧師。神權政治的衰落，便是美國一個快樂的時期。

馬薩諸塞有兩個宗教自由的偉大使徒——威廉士和哈金遜。威廉士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英國劍橋的畢業生，一個極虔誠的基督徒。他激烈反對清教徒神權政治的整套思想。他認為政與教應完全分開；強迫人參加禮拜堂集會是愚蠢的；對不從國教者應採取和平的容忍態度。依照他的見解，政府對一切循規蹈距的教派，應同樣予以保護。馬薩諸塞當局令威廉士回英國去，可是他在雪中逃脫，逃到羅特島去，把它變成一片可以實施他的理論的土地。哈金遜並不是個很顯著的人物。她所宣講的道理，與日後愛麥生時代所稱的「超絕哲學」者相類似。她說，每個人都有責任跟隨一種內在超自然的光的提示；實在拯救人的不是任何數目的善舉或假裝的虔誠，而是聖靈的降臨的內心。她在羅特島住了一個時期，結果死於紐約一次印第安人的屠殺。

在中部各殖民地間，宗教自由早成定規。單就紐約一地而言，雖有人在那裏努力建立英國國教，但也幾乎等於完全失敗。人民的大多數屬於其他的教派。正如史家威廉·史密斯所說，人民擁護「一種清教徒的平等和普遍的信仰自由。」猶太人則擁護一個猶太人禮拜會。在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的教友派殖民地，多種教派一律受到歡迎，許多小而特殊的宗派，主要的是日耳曼人，在這裏已經奠定了根基。天主教徒並不受困擾，他們在費城公開舉行彌撒禮。馬里蘭一地，各種長久敵對的信仰，一般都能夠和協相處。一六四九年一部分天主教徒和一部分清教徒所召集的大會，通過了一種信仰自由法案 (Toleration Act)，這個法案是宗教自由的重大界石之一。它嚴酷地對待非基督徒

和一神論者，但對情教徒天主教徒則一視同仁。馬里蘭信仰自由法案中有一句是意味深長的。它的起草人宣稱信仰自由就是智慧，因為「在宗教事務上強迫良心的結果往往是危險的。」這樣數十年過去之後，殖民者便認識讓人們隨其意願信仰是公道的和聰明的。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發展中的美國主義

在殖民時代，美國即發展一種特別的美國國風，及至獨立革命開始時，美國的國民性已經相當定型了。美國國風有兩種主要的因素可以辨別出來。第一因素是一個新的民族——許多不同種族的混合物。另一因素是一片新的土地——一個富饒而荒涼的國家，新來的人需要更有勇氣和經得起辛勞。到了一七七五年，出現了一個特別的美國社會，有其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特點。在某些方面，它很近似歐洲的方式：波士頓和紐約的商人，自由職業者和工匠，與倫敦和不列斯多爾的容易區別出來。但美國的大眾，漸漸與古舊祖國的歐洲型式有顯著的不同了。

美國的移民，幸而使英語和英國制度到處佔着支配人的優勢，使全國獲得普遍的團結。日耳曼人和法國耶穌新教徒本來可以另建殖民地，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與初期到美的英國人混雜起來，接受他們的語文和希望。英國移入的人，不久淹沒了哈得孫河流域的荷蘭人。但這種語文和基本制度的大致，與不同國源的種種風俗共存着。

我們對於殖民時代各種族的混和，既不誇張也不估計過低。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獨立革命時期，也許四分之三至十分九的白種殖民民還是屬於英國血統；但是荷蘭人、日耳曼人、法國人和其他大

陸人民的輸入也是相當重要的。初期的移民是英國人，新英格蘭和南部低地部分幾乎是純粹英國人的領域。但當原來的移殖運動繼續着的時候，在十八世紀來自歐洲的另有兩大批移民——日耳曼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獨立革命爆發時，每一種都有數十萬人。

初次成爲重要事件的是日耳曼人的移入。當時德國西部區域尤其是萊因區充滿着災禍和不滿的情緒。路易十四法軍的蹂躪最爲暴虐。接着就是對馬丁路德教派和其他教派的一種有計劃的宗教迫害，而日耳曼小王的暴政又使局勢惡化。故當安后政府和其繼起者提出英國國旗下有安上和宗教自由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日耳曼人湧入英國和英國各殖民地。克里法特的一個前衛隊早在一六八三年就到了賓氏的領域，把日耳曼城變成一個手工業繁盛的地方。雷登豪斯家族在那裏創辦殖民地上第一個造紙廠；他們又釀造啤酒，紡織布匹。但真正的潮流是在一七〇〇年之後纔開始的。有些人到紐約的摩霍克河谷，有些到新澤西的新布朗斯威克，但他們大都到賓夕法尼亞。不久以後，一年之間有數千個日耳曼人和瑞士人移入。

這種移民的流入數量是大的。據佛蘭克林估計，在獨立革命之前，賓夕法尼亞的人口，三分之一是日耳曼人。在許多區域，英語甚不流行。一七三九年，一家德文報紙在日耳曼城發刊。馬丁路德教派，一致兄弟教派，門諾教派和聯合兄弟教派的居留地點綴着整個區域。史蒂格爾男爵的鐵工廠和蘇爾的印刷廠都是有名的。但大部分的日耳曼人都是勤儉的農民，他們的勤苦工作，使賓夕法尼亞的石灰區域成爲一個龐大的麥倉。他們並不作最初的開墾，甯可買入已經有人居住，受到保護和一部分改良了的地帶。他們徹底把土地清除，在未用巨量精力建築房屋之前，即蓋好很大的倉庫。他

們把牲口養得又肥又壯，把圍牆築得又高又牢。他們的生活十分儉約，把產品儘量售出。他們的婦女在田間工作，但也撫養着一個個的家庭。

蘇格蘭——愛爾蘭人，一個比較帶侵略性的人種，他們的主要移殖地區是賓夕法尼亞的森納多亞河谷和加羅林納的高地部分。他們也是在祖國被迫逃出的，因為他們一方面在愛爾蘭遭英國國教的虐待，一方面英國法律又反對愛爾蘭的製造品，不利於他們的紡織工業。他們一船一船地移到美洲來，帶同着強烈的反英情緒。他們屬於英格蘭者較多，屬於愛爾蘭者較少，大部分屬長老會，在過去一世紀間移入烏爾斯特；而長老會的組織，使他們對於民主制度具有一種天然的了解和愛好。他們有些居留於新漢普夏，有些居留於烏爾斯特和紐約的一部分，但他們主要的避難所是賓夕法尼亞和向南伸入弗吉尼亞與加羅林納的各河谷。他們深入荒漠，打獵爲生，開墾土地，建築木屋，在森林中開墾出最初的粗糙的農場。這些「勇敢而貧困的新客」——賓夕法尼亞的官吏這樣稱呼他們——不能忍受當地法律的限制，也不能忍受賓氏家族和其他地主的免役稅。他們憎恨印第安人，很容易和印第安人爭吵。他們的性格令人記起一句古諺：「他們保守着安息日和其他一切他們能夠染指的東西。」他們是有驚人效率的打先鋒的殖民者。這批蘇格蘭——愛爾蘭人向南向西散佈，到達高地的喬治亞，並在獨立革命之前滲入肯達基，蕃殖大的家屬，在政治上和與印第安人鬥爭上表現顯著的貢獻，開始在美國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中間，這些名字後來是著聞的——柯爾豪恩，傑克孫，波爾克，豪斯頓，麥金萊。

在森納多亞和其他的內地河谷，蘇格蘭——愛爾蘭人，日耳曼人，荷蘭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液，不

久便混雜成一個新美國民族的大鑄鍋。奧格里特荷浦將軍由其他慈善的英國人的支持，於一七三二年取得皇家的特權，把這個區域劃為窮苦的負債者和其他不幸者的避難所，同時作為抵抗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侵略的前哨站。世襲的受託人把精選的英國人，大批日耳曼清教徒，和一批蘇格蘭高地居民移到喬治亞來。最初奴隸制度是禁止的。一切非天主教的信仰都受到鼓勵，英國國教徒，一致兄弟教派，長老會派，再洗禮教派，馬丁路德教派和猶太人在一起禮拜。在薩凡那的英國國教會有兩個著名的牧師，魏斯里和白田。

其他非英國人的團體規模比較小，但並非不重要。南特法令 (Edict of Nantes) 的撤消，使數以百計——或以千計——的法國耶穌新教徒移到英國殖民地來，分佈極廣。與日耳曼人同來的有少數的瑞士人；沿着特拉華河有不少的瑞典人和芬蘭人；在城鎮之中又有小批義籍和葡籍猶太人。城鎮的名稱如賓夕法尼亞的拉諾爾和布林摩爾，南加羅林納的威爾斯地峽，提醒我們威爾斯人也有其貢獻。這是明顯的，甚至在殖民時代，美國已經相當成爲一個鑄鍋了。

造成美國國風的第二種大因素是土地，尤其是它的邊疆。在最初的時候，插入黑暗森林的沿海地帶的本身便是邊疆。初期的殖民者都是極無經驗的。旅客在普利穆斯叢林中搜尋香料，聽見野獸的叫聲便認爲也許是「獅子」；詹姆士城一些豪華的公子們，以爲他們在那裏可以過着與倫敦一樣的生活。但是新來的人不得不把自身適應殘酷而原始的荒漠，否則他們只有待死而已。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知道有史密斯船長和史丹底斯，他們的勇敢和堅忍，使我們想起後來的英雄們如羅傑士，波恩和卡爾遜之輩。殖民者從印第安人學得怎樣種植玉蜀黍，怎樣施肥料，怎樣養玉蜀黍豆，怎樣

造獨木舟和雪鞋，怎樣打獵，怎樣鍊製鹿皮，怎樣成爲森林專家。這些打先鋒的殖民者，在辛苦的經驗中成爲一身兼備獵人，農民和戰士的人。一種新的農藝，一種新的建築術，一種新的地方經濟，從此產生出來。在十年時光之內，「新世界」上的人民，即與留在英國的老鄰人很少有共同之點——他們的子孫更甚。他們對於生活，具有更倔強，更實際和更直率的態度。邊疆給推着向後退。到了一七〇〇年，邊疆退至各河道的最高通航點。到了一七六五年，退到阿里芬尼斯山。到了獨立革命前夕，退過了這些山脈。以後的一代代人，受到這種力量的影響，由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範型所重新塑造的經驗中成長起來。

在邊疆地方，社會狀況具有一種大路上的平等，——的確，這種平等盛行於少數大城市之外。在美國社會中，沒有特殊的階級。英國的贖身者，須作工五年以付價盤費；窮苦的負債者從獄裏釋放出來；日耳曼人從被蹂躪的王族領地逃逸出來；英格蘭——愛爾蘭人被英國的商法驅出——一律都是一無所有的人。他們必須辛苦奮鬥才能獲得產業。他們是平民，所以他們不喜歡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也不喜歡由經商和投機而發財的人。但無論他們怎樣窮困，一般殖民者都感覺到美國是機會和獨立的象徵，這是歐洲所沒有的。這種感覺的發生，是因爲美國幅員的廣袤和天然財富的充裕。有一個法國人叫克利維哥爾的，約於一七五九年到了美國殖民地，他寫道：「有錢的人留在歐洲，只有中等階級和窮苦者才移殖美洲。」他又說：「每一件事物都在再造他們——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情調，新的社會制度；他們在這裏成長了。」他在其生動的文章中，描述滋長中的美國主義，是以地大物博中毫無拘束的活動爲基礎。

當美國主義正在滋長的時候，至少到了一七五〇年很少殖民者真正意識到這種事實。他們不過自認爲英國皇家的子民，其次便是自認爲弗吉尼亞人，紐約人或維特島人。到了那一年，十三個殖民地都已奠定了根基，人口幾達一百五十萬。他們分佈在整條沿海地帶，自產虎尾縱的安特羅斯哥金河谷（Androscoegin Valley）以至產扇狀櫻樹的聖約翰河。他們都有其自己的特性，分成相當清楚的四大區。

第一區是新英格蘭。這裏有崎嶇而耕種得極好的小農場，有木材，有各種不同的海事職業；其建設事業正如詩人朗法羅（Longfellow）在其「船的建造」詩中所描寫，其捕鱉魚的職業，正如英詩人吉百齡（Kipling）在其「勇敢的船長們」詩中所刻畫，其海外貿易正如丹納（R. H. Dana）在「桅檣前的二年」詩中所述繪。第二區是中部殖民地，一部分是小農場，一部分是大地產，還有許多小規模製造業和紐約及費城的活躍航業。第三區是南部殖民地，有大規模的農場，由大批黑奴從事耕種，出產靛青，米穀和烟草。第四區是最具美國特性的一區，這個龐大的邊區由緬因伸展到喬治亞。這裏打先鋒的殖民獵戶，住在木屋裏的耐苦的移民，和少數結實的農民向着內地推進。這個邊區地帶南北一樣。在馬薩諸塞西部，賓夕法尼亞西部，和加羅林納西部，都一樣產生進取而機警的人才，他們忽視書本的學識，不願受拘束，而且具有頑強的樂觀態度。

新英格蘭殖民地

新英格蘭的海岸殖民地，具有巨大的展拓力量。此種向外展拓的特性代代相承，把一批批清教徒

的後裔向西移殖，直至他們抵達太平洋岸爲止。

在整個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人口，保持着極顯著的單純性，它的七十萬人民在獨立革命時期，其血液幾純粹是英國人的。他們的語言，舉止，虔誠，和思想的方法，一般說來都是相同的；只有小小的羅特島有些與人不同，因爲它的政治上的急進派和不從英國國教的教會團體，給予它一種特殊的標誌。美國人大部分出自堅毅，獨立和聰明的英國種，他們對其祖先具有一種堅定的驕傲。他們之中從事耕種或從事漁業的，都過着舒適的生活，而商人船主和小廠家往往積聚着相當財富。就波士頓一地的國外商業而言，一七七〇年即需用六百艘船舶；馬薩諸塞的漁業，大批出口至歐洲和西印度，每年總值一百二十五萬元。鯊魚成爲此地的象徵是很有道理的。新英格蘭家庭大多數是給自足的，自己織布，自己製鞋，自己種植食糧，自己製造家具。美國人的特質是耐勞，節儉，進取和虔誠。

在新英格蘭，教堂和學校都有特別尊嚴的地位，一切清教徒的社區，都認他們的牧師爲學問上和宗教上的良師。教士都是厲害的有力人物，不僅學問豐富，而且有領導社會的才幹，故教徒敬而畏之。他們精於神學和古代的語文。哈佛的騷西校長要求學生上午以希伯來文讀舊約，下午以希臘文讀新約，而他自己則用拉丁文予以批評。其他許多牧師都有這種本領。哈佛創立於一六三六年，從此十年內各處都舉辦初級學校。當馬薩諸塞尚在嬰孩時代，議會即規定每一個有五十家人的城鎮必須辦學校一所。

過了相當時期，新英格蘭早期的嚴酷生活便漸漸和緩下來。商賈不只帶入財富，而且輸入新的思

想。律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漸增。在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安息日必須嚴格遵守，其儀式由星期六日六時開始直至星期日日落時止。在這個時間，禁止行旅，禁止旅館接待客人，禁止遊戲，甚至一羣人在街頭聚談都要遭受逮捕。可是新的時髦東西如假髮等輸入了。英國國教徒介紹入一種慶祝聖誕的快樂的儀式。政治，生產，戀愛和宴會，開始在生活上佔得較為重要的部分。

西華爾是哈佛一六七一年畢業生，他的日記描繪出馬薩諸塞由舊時代轉入新時代的一幅生動的畫圖。我們讀他的日記，即看見一個小小的波士頓城在地峽上給實地建設起來，有三個小山，尖閣，堡壘，和帆船擁擠的港口。我們聽見更夫在叫更，我們感覺到全城在戰慄，當海盜在海岸出現或佛隆特納克伯爵率其法國人和印第安人部隊準備侵入新英格蘭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市民在追逐迷路的牛，從城東追到城西。可是緩緩地，我們看見往昔清教徒的嚴厲生活，漸向摩登時代讓步了。

在儉約而有秩序的新英格蘭，犯罪和貧苦比較其他殖民地為少。訂約的僕役最初是沒有的，到了十八世紀則成為尋常的事，可是他們和其他的勞工容易獲得獨立，故奴隸制度並不盛行。城的政府制度是鼓勵自信的，一切公共事務在合格的投票人所組成的城鎮會議中解決。波士頓，新哈芬和其他大地方漸漸有多數的貴族出現，他們有精緻的住宅，徽章和金銀器皿，階級的界線十分明顯的了。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都不如此地平民自尊心的堅強。

中部殖民地

中部殖民地的社會比較複雜，寬容而帶世界性。它雖較少興奮，但也較少嚴酷。賓夕法尼亞和其姊妹特拉華，在獨立革命時人口共約三十五萬，紐約和新澤西的人口總共也離此數不遠。這一大批人民，也和美國其他各地居民一樣，都是依土地爲生。在此各地的較好部分，地主很快的發達起來。例如賓夕法尼亞教友派教徒農場，有磚築的房屋，房裏裝護壁和糊紙，有很多的傢具，精美的瓷器和玻璃。用餐的時候，農家是主僕同席的，桌上有簡單而多樣的菜式。他們每日三餐有肉食，這是歐洲所少有的。此區的農業較其他各區種類較多。哈得孫河谷有不少采邑地產，有大廈和大批僕役，頗帶封建性質。但長島和紐約北部則雜有小塊地產。

賓夕法尼亞和紐約除耕種者外，商賈和工匠的人數逐漸增加。運輸的生意，主要的是木材，皮毛，穀類，其他天然產品的出口，和製造品，糖，酒的入口。這種生意規模相當大，也很有利可獲。剛在獨立革命之前，特拉華灣有船舶將近五百艘，船員七千人，孜孜經營這種生意，而當時的哈得孫河和長島海峽，船舶也極爲擁擠。費城和紐約都成爲內地商業的分發大中心。一個發財的方法便是運穀和魚乾到西印度，而運回奴隸或糖蜜；另一個方法是在阿爾巴尼運載皮貨，然後在倫敦交換精美織造品，磁器或傢具。小廠家已經獲得立尼之地了。許許多多熔鐵爐在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建立起來，鐵製品的出口促使議會通過一種封閉軋鐵廠的法案。紐約會製造玻璃器和氈帽。當財富增加的時候，專職的人員也成爲普通的了。各主要城鎮的律師，取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這對未來的獨立革命有相當的貢獻。

紐約和費城的社會，比新英格蘭的社會較爲混和而淳化。商人和運貨者與歐洲保持着密切接觸，

對遠客採用高興和時髦的款待。當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即美國第二屆大總統——譯者) 赴費城道過紐約時，紐約的精緻房屋，銀器和考究的烹飪法使他印象很深。那個城誇耀着它的俱樂部，跳舞廳，音樂會，露天遊藝花園，咖啡館和私家劇場。紐約的一個殯禮，有時花錢數千元。荷蘭人很會享受假期，這種習慣英國人也漸漸學得了；有錢的人，穿着倫敦最時尚的服裝，絲的和天鵝絨的，還戴着假髮，佩帶短劍；而宗派和種族的混雜，使思想能夠迅速流通。費城街道廣闊，人行道打掃得乾淨，具有一種比較恬靜的風雅。但它是以公共制度著稱的，它培養科學研究的空氣，佛蘭克林，拉區 (Benjamin Rush) 和植物學家巴特拉姆 (William Bartram) 從此得名。這個城的簡潔，質實和繁榮，在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即美國第三屆大總統——譯者) 看起來，其印象比較倫敦巴黎還深——而傑斐遜的判斷決不是平庸的判斷。紐約的宗教變成極度自由，使教徒們也抱怨起「自由思想」來，而政治在此地比較在英屬美洲住其他地方能引更多的熱情。在教友派佔優勢的賓夕法尼亞，思想是比較保守的；但剛剛在獨立革命之前，教友派在政治上的得勢，受到了蘇格蘭——愛爾蘭人的猛烈的搖撼。

在整個中部殖民地中，有大批黑人人口增加了此地生活的顏色。教友派很反對奴隸制度，在殖民的後期產生一個國際聞名的反對奴隸制度的領袖烏爾曼 (John Woolman)，文學家拉姆 (Lamb) 稱他為「美麗的人」。蘇格蘭——愛爾蘭人是靠自己操作的，故奴隸制度也不能在他們中間盛行。但奴隸制度在城市裏面和沿得孫河的采地上是很平常的。一般的說，生活在中部區域比較在新英格蘭有更豐富的素質。中部的氣候土壤和人民比較溫和。

南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尤其是最富饒和最有力勢力的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有三種特點。他們都是過
的農村生活，查斯頓和巴的摩爾是兩個僅有的略具重要性的城鎮；大地主佔有重要的地位，養着大
批奴隸，有顯赫的大廈，過着豪華的生活；社會劃分成若干階層。在白種人之中，上層階級是由有
錢的貴族種植家所組成；中層階級的組成分子是小種植家，農民與少數商人，代理人和工匠；「貧
窮的白種人」則組成了下層階級。在這三階層之下是奴隸。一七七〇年弗吉尼亞的奴隸數目，佔全
部人口四十五萬人中的一半弱。在馬里蘭，人口二十萬，奴隸整整佔三分之一。在南加羅林納，奴
隸人數比白種人多，比率是二對一。

這裏人口的分散，一部分原因在於種植制度，每塊地產都很能夠自給自起，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南
部人的厭惡城市。大地主們與英國和北部城市進行直接貿易，不需要大批商人。奴隸的盛行，破壞
了很有希望的手工業制度。弗吉尼亞雖通過法律，策劃建設大城市，但結果都失敗——例如一項法
律規定每郡在威廉士堡建屋一間。當獨立革命開始的時候，這個殖民地最大的中心是諾爾福克(Nor-
folk)，人口約七千，而威廉士堡只有零零落落的二百戶。柏特上校 (Col. Byrd) 於一七三三年
描寫弗里特烈克斯堡 (Fredericksburg) 的情形，說除「該地的一個首領」外，只有一個商人，一個
裁縫，一個工匠，一個平常店員，和一個婦人，她是女醫生兼咖啡館的老闆。「南部其他地方的情
形，大都如此。查斯頓剛在獨立革命之前，是一個粗俗的城，街道是沒有鋪平的沙路，居民中一萬

五千中一半是黑人；巴的摩爾是一個簡陋的港口，大小也差不多一樣，仰賴於邊區農產的貿易。南部殖民地缺乏城市，有很不好的結果。波士頓早在一六九〇年即有報紙，但「弗吉尼亞新聞」(Virginia Gazette)到一七三六年纔問世。弗吉尼亞到了革命前二十五年纔有職業性的戲劇。

馬里蘭，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的大殖民地，散佈於低地區域，普通是面向着河流溪溝，以獲得運輸上的便利。每家人都有他們的住宅，平常是磚或石造的，有倉庫，打鐵店，桶工場，附屬建築物，和黑人區的零落茅舍。許多大家的房屋設計十分華美，內部有裝護壁的大廳，精美的樓梯和寬大的房屋。最好的房子有華貴的桃花心木傢具，有些是美國製的，大部分是自英國運入的。有倫敦製的銀器，絲質或天鵝絨的帷幔，精緻的家族畫像，雕刻品和相當豐富的圖書室。許多種植家在安那波利斯(Annapolis)，威廉士堡，或查斯頓各城都置有城內別墅，他們每年秋季乘着家裏馬車入城度跳舞，宴會，牌戲，賽馬和議會活動的季節。但大規模的農場，需要許多的勞力和心思；華盛頓在維爾農山(Mount Vernon)的監督工作即相當喫力，卡特(Robert Carter)則是在不斷地操勞着。種植家雖被人批評缺乏知識，但他們對政治有很濃厚的興趣，佔得大部分選舉的職位，用其非常的能力討論着政治問題，而且有很多對科學極有興趣，被推舉參加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南部的種植家和農民，可以用傑斐遜的父親彼得傑斐遜為典型。彼得在邊疆購得極便宜的土地，用自己的力量開墾。這些南部的人民，都極若幹，聰明而勤儉。他們在荒漠中闢草萊，建房屋，置產業；許多用奴隸為助，耕種很廣闊的土地；有些像彼得傑斐遜，與貴族聯婚。他們是一個堅決的

種族，在性格上是自信而獨立的，決定保持他們的英國的自由。如果說他們缺少禮貌和教育的話，他們有的是堅韌的意識，產生具有民主見解的光輝的政治領袖，例如傑斐遜，瑪迪遜（James Madison）和亨利（Patrick Henry）。的確，南部的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分界漸漸模糊不清了，聯婚把這兩個階級結合起來。特別在馬里蘭，十八世紀有一種趨勢，即將大的地產分碎成爲小的和有效率的農場。

南部社會中最低級的白種人階層，是很清楚地給人劃分出來。他們是罪犯，被解放的債務人，訂約的奴僕。他們來自歐洲，受邊疆環境的敗壞，結果變成一個文盲，粗鄙和懶惰的團體，甚至黑人也對他們表示鄙視。總之，南部有很多無賴，不求進取和好亂的分子，他們是懶惰的農民和惡劣的公民。

黑人奴隸大部分是從非洲西岸運來的。在十七世紀結束之後，當「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 專利權終止的時候，販奴的買賣落入美英多數公司和私人之手。在波士頓，牛波特港，紐約和南部港口，許多人因這種買賣大發其財。最活躍的黑奴市場也許是查斯頓的市場，該地有許多商行在競爭着販奴的生意。據一七五〇年以後在此項貿易佔重要地位的羅蘭斯(Henry Laurens)告訴我們，種植家遠道趕來，渴望買得壯年的黑人，出價達四十英鎊。在北部，奴隸平常由入口商直接售給購買者，都是現款交易。在南部，奴隸是整批交給商人和其經紀人，而換得烟草，米穀或靛青。在農場工作的奴隸，穿粗衣，住簡陋茅舍，於殘酷的監工監視之下在農場上辛苦工作；在人家住宅當僕役的奴隸，則有比較好的待遇。不久，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的黑白種混血兒，當南部奴

隸數目增多的時候，種植煙草和稻的大農場，便沒有訂約奴僕和其他白種人勞工了。

很明顯的，新英格蘭和低地的南部很不相似，而中部殖民地則具有南北兩區的一些特點。新英格蘭只適合於採用小農場的制度，而低地的弗吉尼亞，南加羅林納，和喬治亞，則適於經營大農場。在新英格蘭，人民在氣候刺激之下用自己的手足工作；在弗吉尼亞，幹苦工的是大批的奴隸，他們於監工驅策之下在烈日中勞作。在新英格蘭，小規模的財產和廣大的無人居住的土地，鼓勵作父母的把地產平均分給他們的兒女；在南部，有奴隸工作的大地產，很少能夠分開而不致有經濟上的損失，故人們由於「長子繼承」和「限定嗣續」的法律將土地保持統一。在新英格蘭，人民有密集的鄉村以維持教會的集會；在南部的地方，人民不注重教會的集會，而農場分佈的區域極廣，使鄉村無法建立。在新英格蘭，城市是政府的自然單位（雖然郡Counties已經產生），而在南部，那是最重要的。在新英格蘭，依照一般的法律，地方官須由人民選舉；在南部，一部分由當局委派，一部分由一個貴族集團選出。例如教區委員並非由教區住民選舉，而是自己選擇其繼承人。清教徒雖非有宗教熱狂而不快樂的人，但他們有頑強的自覺，並且能夠自制；南部人民則比較樂天，自由，愛玩。中部人民的特性，在許多方面都是介於南北兩區之間的。

可是，當十八世紀將告結束，人口和財富增加，社會漸形複雜的時候，社會和經濟的結合衝破了區域的界線。

邊區

第四區是邊區，在十八世紀時已經很顯著的存在着。這區域起自勇敢的青山居民出沒之地和摩霍克河谷的崎嶇的森林地帶，南下沿着阿里芬尼斯山的東面邊緣，經過弗吉尼亞的森納多亞河谷，而入加羅林納的比德蒙特區域。這裏居住着一種粗魯，簡單而勇敢的人民，他們都是美國型的。

他們購買便宜的土地，每畝一二先令，或乾脆用武力奪取。他們在荒漠中闢草萊，種米麥於樹木殘幹之間。他們用胡桃木或柿木建築木屋，木材在屋的四角處互相鉤住，用黏土封糊罅隙，鋪木材地板，以浸豬油或熊油的紙製窗扉。男人穿土織布獵衣和鹿皮護腿，女人的衣料，都是每家必有的織布機的產物。他們用木片釘成椅桌，用自製的木臼碾食糧。他們吃飯時用的是白臘調羹和松木碗碟。他們走跑時或是赤足或是穿鹿皮鞋。他們的食物有豬肉，玉蜀黍粉，配以烤鹿肉，野火鷄，鷓鴣或附近河溪裏捕得的魚。爲防禦印第安人襲擊，這些分散的殖民者在中心地點建築砲台以及能夠禦彈的碉堡和木柵。他們有其自己的豐富的娛樂方法——政治集會時舉行犧牲宴會，有全隻的烤牛；新婚讌樂有跳舞和飲宴；有狩獵和弗吉尼亞式的跳舞會。宿仇和械鬥引起了許多刺激人的場面。在賓夕法尼亞的邊境，蘇格蘭——愛爾蘭人挑起復仇的戰鬥。在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私鬥是平常的事，挖眼睛的比賽，使路上常常看見單眼睛的人。邊區的居民，對印第安人都是敵視的；有些部落是友好的，但一般而論，殖民者往往向荒漠和紅種人挑戰，這樣一來，便養成機警，勇敢和種族團結的習慣。

邊區產生了與印第安人貿易的勤人而精勤的商人，產生堅決的拓荒農民。這些人漸漸地擴大移民和文明的地帶。這個邊區雖是危險和辛苦的所在，但也有其新奇事物和足以令人迷戀之處。柏特

(William Byrd)的書，對此地的迷人的迷人處有很動人的描寫。他說到他怎樣沿着邊境走入荒野，那裏有香甜的黑葡萄，滿滿的盤繞在樹上；野火雞成羣結隊地在旋轉着；鴿子羣在海灣和加拿大之間飛行時，把天空都遮暗了，有時把桑樹和柵木的枝幹都給衝折了。他描述肥熊笨重地游渡河澗；美洲袋鼠以野果爲食；狼於夜裏的大半時間都在「期待」他們；還有緩慢在喫草的水牛等等。他告訴我們到印第安人紮營地點時的驚心動魄，銅色女郎的貌美如花，她們雖然並不十分潔淨，也並不十分貞節，但在白人之前顯得嫵娜可愛。許多拓荒者一旦嘗到荒漠的快樂時，他們便戀之不捨了。

文化

到了殖民時代的後期，文化發展很快。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上面。當殖民地還在孩提時代，除羅特島外，各區都實行相當強迫的初級教育。當時已經有不少小學校。兩個發達的學院，哈佛和耶魯成立起來，還有達特茅斯學院和羅特島學院（即現在的白朗學院）也獲得立足之地。哈佛有一個藏有五千部書的圖書館，有好的科學儀器，有神學，哲學和古典文學等課程，實不遜於歐洲的最好大學。

在中部殖民地間，馬里蘭獨有一種公立教育制度，但組織不好。教友派和日耳曼人所辦學校，多少是歸教會監督，而在賓夕法尼亞，尤其在費城附近，則有許多私立學校。在紐約，長島有些好的城市學校，紐約城有些初級學校，但教學的一般制度尙付闕如。在南部，教育大部分操諸私人之

手。牧師們和其他人士開辦許多私立學校；例如弗吉尼亞教區長鮑吉爾 (Jonathan Bouc'er)，即徵收學費每名二十鎊，華盛頓前妻之子便是他的學生之一。那裏和加維林納的有錢種植家，由英國和北部殖民地聘到私家教師，教授讀本，作文，實用數學，拉丁文和希臘文。此地僅有兩個自由學校，一個在弗吉尼亞，一個在南加羅林納。中部和南部殖民地也創辦了一些學院——在弗吉尼亞的威廉瑪麗學院，造就了傑斐遜和其他不少著名人物；費城學院（即現在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是佛蘭克林所努力促成的；在普林斯頓的學院；在紐約的英王學院（即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是漢密爾敦 (Alexander Hamilton) 和摩理斯總督 (Gouverneur Morris) 的母校。紐約和南部的有錢人家，常遣派子弟赴英國各大學或送入倫敦法學院 (Inns of Court)。

報紙、雜誌、歷書，甚至有持久性的書籍已經在殖民地出版。美國最老一家印刷館早在一六三九年即在劍橋成立，其活動從未停頓過。在獨立革命的前夕，波士頓有報紙五家，費城有三家。書商成爲殖民地的重要人物，有許多圖書館也宣告成立（波士頓圖書館創立於一六五六年）。一個費城的出版家於一七七一年運入柏拉克斯頓 (Blackstone) 的「評論集」(Commentaries) 一千部，他自己又再發行一千部。有兩個人在歐洲享有持久的作家的聲譽，一個是愛華士 (Jonathan Edwards) 精於神學和哲學，一個是佛蘭克林，精於科學和美文學。守舊，頑固而勤勞的行政家西華爾，皇家學會會員和弗吉尼亞第一位君子的柏特上校，都寫有令人不能忘記的日記。簡樸的教友派農家約翰·巴特拉姆 (John Bartram)，是一個正確的科學觀察家，林那亞斯稱他爲世界上最偉大的「自然植物學家」；紐約的精勤的戈登 (Cadwallader Golden) 因其「印第安五族史」一書而成名；賓

夕法尼亞的雷登豪斯 (David Rittenhouse) 成爲國際知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弗吉尼亞的密却爾 (John Mitchou) 是皇家學會會員，在植物學，醫藥和農學各方面都有所成就。博學的教士馬特 (Cotton Mather) 被稱爲新英格蘭的「文學巨人」，他出版了三百八十三部書和小冊，其中「美洲的基督神奇」一書本身幾乎便是一個圖書館。殖民時代後期馬薩諸塞有一位歷史家叫湯馬斯·哈金孫 (Thomas Hutchinson)，他的書到現代還有閱讀的價值。殖民地也有好的美術家，而著名的魏斯特 (Benjamin West) 在獨立革命之前不久到英國去，繼雷諾斯爵士 (Sir Joshua Reynolds) 任皇家學會會長。

財富的積聚越來越快；更好的房屋蓋起來了，衣服和食物講求精美了，時髦的習俗成爲更尋常的事了。到了一七五〇年，沿海岸一帶是一個繁盛社會，懂得歐洲的最精萃的思想。在波士頓和紐約，在費城和查斯頓，與倫敦巴黎以外的英法城市同樣優美。但同時邊界是漸漸向西推移，而第一批移民的洪流，由阿巴拉契安山脈的各個隘口湧過俄亥俄和肯達基。邊區耐勞的拓荒者，執着他們的長槍和利斧，毫不重視豪華，時髦或種種思想；他們的生命和使命在於馴服荒漠。一方面是時尚的種植家和商人，一方面是殺戮印第安人的邊疆居民，介於其間的是大量的樸實的中等階級人民，他們是一七七五年的典型美國人。自由農民和小種植家，強壯的工匠和忙碌的店員，他們由幼長大起來，只具有美國的真實知識，只珍重美國的生活方法。他們是英國皇室的忠順子民，他們羨慕英國，誇示他們英國與生俱來的勝利；但至少他們下意識地感覺到美國有其自己的命運。

殖民地的傳統

殖民地遺留給這個新國家的一部分傳統，是很容易看出的。共同語言——英語——具有無限的價值。它是一種偉大的聯繫力量，使一個真正的國家有組成的可能。另一部分珍貴的傳統，便是對於代議政府的長久和廣泛的經驗。我們記得，法國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沒有代議和自治的政府；只有英國准許殖民地組織人民會議，成立選舉人和代表均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政府。結果是英國殖民地有政治頭腦和政治經驗。尊重民權是殖民地傳統的又一重要因素，因為殖民地和英國人在祖國一樣，享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這種權利並非完全穩固，但它們是受到培養的。殖民地一般宗教自由的精神和對於各種宗派能夠並應該完全和協相處的認識，也是不可忽視的要點。在英國國旗之下，每一種信仰必須受到保護；雖然在英國天主教可以引起傳統上的恐懼，但議會甚至被某些殖民者抨擊，說它袒護天主教。種族平等的精神也有同樣的價值，因為不同血統的民族——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法國耶穌新教徒，荷蘭人，瑞典人——互相混雜和互相通婚，絲毫沒有想到他們有任何差異之處。

我們又必須提及私人企業的強烈精神，在殖民地有良好的表現。這種個人主義的精神，在英國本身已經常常受到重視，但現在在一個富饒然而蠻荒險阻的地方，生活的壓力更令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起來。法國和西班牙的屬地，有專利制度，這種專利制度在英國殖民地是不准許存在的。企業不受壓制地隨着機會發展。這種殖民地的傳統，其價格遠大於多量的黃金和寶石。

有兩種基本的美國觀念也在殖民時期生了根。一種是民主的觀念，認為一切人都應享有平等的機會。一大批移民之來到「新世界」，為的是要替本身爭取機會，替子孫爭取更多的機會。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社會，在這社會裏面，不僅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而且有一個好的機會；在這個社會裏面，他可能由梯的最低級爬到梯的最高級。這種機會平等的要求，是增加美國社會機構的改變，破壞各種特別權益。它要促使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顯著改變，把美國變成世界上教育最普遍的國家。它要產生出偉大的政治改革，給予普通人以對政府更直接的控制。綜言之，它是改善大眾生活的一種有力的發動機。

另一基本觀念便是一種感覺，認為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在期待着美國人民，認為他們前面有一種其他國家所不能實現的希望。這便是美國的一般的財產，人民的精力和自由的空氣。它賦與美國人一種新鮮而活潑的樂觀主義，和一種進取的自信心。幸運的奇特觀念，是美國人迅速橫過大陸展拓的主要力量之一。這有時發生不良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它需要操心危慮患深的時候，它會很容易地聽天由命——當它需要自我批評的時候，它會自滿自足。可是它與民主觀念而俱來，給予美國生活一種無與倫比的新鮮，寬宏和愉快。這新的土地是一片有前途，有希望，和範圍逐漸擴大的土地。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法國戰爭

當美洲英殖民地強大起來向外展拓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與其北鄰，西鄰和南鄰的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發生衝突。英法西在「舊世界」的齟齬，自然也影響「新世界」，因為此時和以後美洲並未與西方世界的其餘部分隔離。北美歷史上史詩般的故事之一，便是拉丁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間的一串嚴重的衝突，這種衝突是更富戲劇意味的，因為它不僅包括民族的衝突，同時還包括思想和文化的衝突。這些便是專制與民主間的戰爭，嚴酷的獨裁主義與自由制度間的戰爭，偏執一種信仰的人與容納許多教派的人間的戰爭。有廣漠的荒野為背景，有印第安人參加其間，具有極高本領的軍人為領袖，故發生了殘酷英勇和卓越的戰略插話。這種種衝突的原因，在於爭取大陸的控制權。

西班牙人最早在北美獲得立足之地。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他們不久有效地佔領了西印度羣島的主要島嶼。一五一九年，一個毅勇的軍人柯狄茲 (Hernando Cortez) 帶領一支小軍隊打入墨西哥的中部，打敗了阿芝特克人 (Aztec) 皇帝蒙底朱瑪的部隊，並佔據其國土。二十年之後，另一個具有鐵一般意志的西班牙人蘇杜，在佛羅利達 (已經是數次西班牙人探險的地方) 登陸，打敗了印第安人，留下一支衛戍軍，然後帶着六百人不等地漂蕩過現在的南部各州地方，西達奧克拉荷

馬和台薩斯，漂流了四年之久。其他的西班牙探險家，最著名的是哥倫納杜，用墨西哥爲根據地，然後北上探奇。西班牙人於一五六五年建其第一個殖民地聖奧加斯丁於佛羅利達。在十六世紀結束以前，西班牙軍人和教士，經過血戰在新墨西哥建立基地。同時，一個義大利血統的天主教耶穌會的勇敢教士金諾，已經在下加里福尼亞和阿利桑納拓荒，建築教堂和替漂蕩着的印第安人施洗。但等到了一七六九年，加里福尼亞的本部纔由西班牙兵予以佔領。

在英國殖民者移殖於弗吉尼亞之前，法國人在加拿大還未得到穩固的立足地。的確，不列顛尼（Brittany）一個航海家卡狄爾，於一五三五年帶着法國國旗溯聖羅稜士河而上，直至現在的蒙特里爾，五六年後又想殖民於這片新土地的一部分，但終成泡影。印第安人的仇視和冬季的苦寒，使這些移民不得不於灰心表示中返歸故鄉。直至一六〇三年纔發現了新法蘭西（New France）的創立者——張柏陵（Samuel de Champlain），他那時三十六歲，是一個老軍人和水手，曾很生動地描寫他在西班牙本土探險的經過，由皇帝封贈他爲皇家地理學家。一六〇八年，他奠定了魁北克的基礎，那便是在新法蘭西的第一個歐洲殖民地。翌年他爲開發起見，聯同一批赫隆族（Hurons）和阿貢奎恩族攻擊伊羅華斯族，細勘那個現在以他的名爲名的湖，而在鐵岡特維加附近，與土人大戰。據說這一件事實促成伊羅華斯族後來對法國人的長久仇視，可是這種仇視多數還是產生於地理和皮貨貿易，在此項貿易上，這五族原來是英國人與西部土人間的自然經紀人。新法蘭西公司創立於一六二八年，對於殖民工業有其貢獻。而當法王路易十四於一六五八年完全控制法國的時候，加拿大殖民地獲得王室的慷慨的支持。

西班牙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殖民事業，在其偶然和沒有計劃上是相似的，但在其他方面則相差極遠。西班牙人的征服，包括少數冒險的軍人，商人和探險家——他們的目的在於迅速搜集財富！對於多數勤苦土人的壓服。這其意義就是西班牙將其許多封建制度的特點移到美洲來。不久，數千個精明的強幹的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用殘酷的手段控制着數以百萬計的印第安人。仁慈的教會人士如卡薩斯（Las Casas）力謀減輕這種控制，但終於無效。西班牙人大開其礦，使數以萬計的印第安人因勞致死；他們開闢大牧場，蕃殖牲畜，附以一些熱帶產品——糖，擘呢拉香精，可可和靛青。西班牙人是太上皇；印第安人，黑人，和三個人種的混血後裔則是奴隸。這種制度產生了大量的財富；但錢都落入少數人之手，大眾還是依舊窮苦的，沒有明確的中等階級產生出來。西班牙人喜歡成爲牧場主人，牧師或軍人，但不喜歡成爲商人或工業家。外國人尤其是清教徒受嚴刻的排斥。結果所屆，宗教自由不能發展，代表制度不能存在，一切的法律都是上面給擬定的。

法國人到美洲的只是少數；他的文明主要的是造形於地理和經濟的環境，法國政府的專制和天主教教會。他們所尋求的不是金銀或牲口，而是魚和皮貨。他們滲入了一片寒冷而險惡的土地，這裏的人口是漂泊着的印第安人，許多是懷有敵意的。他們越是深入內地，越可獲得更多的皮貨。他們只能成立少數而脆弱的農業殖民地，把他們的據點漸漸向荒野移入，循着各條主要的水道——聖羅稜士，大湖，威斯康星，伊利諾斯，瓦巴區（Wabash），密士失必，而最後甚至是曼尼杜巴（Manitoba）的水道。當英國殖民者創立自治社區而表現其無窮的個人創造力時，巴黎在殖民地所

設立的政府是暴虐的和世襲的；雖然有勇敢的領袖出現，但人民從未懂得自立和自保。當英國鼓勵信仰各種不同的宗教的人移入美洲的時候，法國只許天主教徒立足於加拿大。當最後鬥爭發生時，殖民地的英國人與法國人的比例是二十對一；英國殖民者是穩固地移殖了，而法國人則尚未能在這一片土地上生根；英國殖民者是勢力廣佈了，而法國人只倚恃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

新法蘭西的歷史，可劃分五個分明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是最初的三十五年，與堅忍的張柏陵的事業同始終。張柏陵於一六〇三年溯聖羅稜士河航行之後，翌年他便協助建立皇家港（Port Royal）即印第安那波利斯（Annapolis）於現今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他努力想把加拿大發展做一個法國殖民地，使皮貨貿易可以獲利。這種努力直至一六三五年他逝世時纔告終止。第二個時代的主要特點便是一批虔誠傳教士的活動。這一批教士具有威武不能屈的英雄事蹟。他們寫下了天主教歷史上最動人的篇章。就商業上言，這殖民地在這個時期是失敗的。到了一六六〇年，整個加拿大的法國人不過寥寥數千人，而且地位並不鞏固。

第三個時代比較有成就。新法蘭西成爲法國的行省，有一個總督，總管和其他的官員，模仿法國各省的制度。路易十四對此地的財富非常注意，他發出慷慨的津貼和種種的命令，送出一船一船的殖民者。一六五九年第一任主教拉伐蒙摩倫西抵達魁北克，他決定加拿大應由教會予以統治，建立一種與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神權政治同樣嚴格的政權。他對魁北克的影響，其痕跡尚遺留至今，因爲他雖與總督發生衝突，但往往都是他獲得勝利。

最後，具有鐵的意志的佛隆特納克伯爵於一六七二年來任總督，開始了第四個時代，至此野心的

教士便碰到勢均力敵的對手了。佛隆特納克伯爵是個能力極強意志堅決的人，他主張教會應由政府控制，他暫時擊潰了伊羅華斯族的武力，在威廉王之戰（一六九〇年）中擊退了麥普斯爵士（Sir William Phipps）所率領的三十四艘軍艦的艦隊。在這個時期中，法國偉大的拓荒者正忙於西部的拓殖事業。佛隆特納克伯爵於本世紀末逝世之前，即開始準備與英國人作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凡有眼光的人早就預料到的。這一鬥爭，經過「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和「奧地利王位繼承之戰」以至於「七年戰爭」，充滿了新法蘭西歷史的第五和結束的時代。

在這持久的衝突中，法國人取得某種優勢。他們獲得了有戰略價值的地位，漸漸地由於堡壘和皮貨貿易站所組成的一條線，形成一個新月形的龐大帝國，由東北的魁北克經過底特律和聖路易以至於南方的新奧爾良。他們企圖佔有這一大片內地並予以開發，把英國人迫至阿巴拉契安山脈以東的窄狹地帶。就軍事上而論，法國民族比英國民族較強，他們能夠派遣一支大軍。新法蘭西的高度集權政府，比較便於指導作戰，而英國各殖民地政府配合不良，組織不密，決非法國人之敵。

可是有三項主要的原因，決定了英國最後的勝利。第一，一七五四年英國殖民地的一百五十萬人民，是一個迅速增加的團體，強韌而富機智；而新法蘭西只有不足十萬散佈着沒有紀律的人民。第二，英國人佔得較優的戰略地位。他們從內線作戰，可以有效地向西向現在的皮次堡推進，西北向尼亞加推進，北向魁北克和蒙特里爾推進。他們又有較優的海軍，增援和補給都較迅速，而且能夠由水路圍攻魁北克。最後，他們有較好的軍官。

七十年的衝突至一七六三年宣告結束。根據一七六三年的和約，英國由法國手中取得加拿大全

部，由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利達（因為西班牙參加了反對英帝國的戰爭）。北美自大西洋至密士失必河，除新奧爾良外都變成英國的了。同時，路易斯安那由法國交給西班牙。

帝國關係

「七年戰爭」的勝利，使美洲殖民地與大不列顛的關係上取得嶄新的地位。它除去了法國人的威脅——這種威脅如同一把鋸齒鏢刀，在西部和北部形成半圓形的包圍圈。它又除去了南方西班牙人的壓力。此次征能，使許多殖民地官員獲得寶貴的作戰經驗，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它對於統一各地工作有相當的助力；有不少關於統一的建議發表出來。

這一次的戰爭，減少了殖民地對於大不列顛的依賴性，同時也減少了它對於大不列顛的尊敬心。殖民地軍隊雖配備惡劣，紀律不良，但在許多地方能夠與英國正規軍同樣作戰——而在荒漠地帶則有時打得比英正規軍還好。他們也發見許多英國長官犯着錯誤，如同英國人發見許多殖民者能力不足一樣。新英格蘭人是根據民主方式選舉他們的官員的，他們認為英國指派指揮官的貴族制度不好。

最後，戰爭的勝利結束與帝國的擴大，引起了殖民地與英國政府間的爭執問題。當地是沒有有計劃的「暴政」的，但帝國的行政必須加強並使其系統化。此外又必須籌備防務以防嫉忌的鄰人，這意思便是指徵稅了。在「航行法案」或「貿易法案」之下的經濟組織，必須修正並予加強。

英國對殖民地均行管理向來是極寬鬆的。在皇帝之下，主要的主管機關是「貿易墾殖委員會」。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rade and Plantation)。大部分工作，都由少數專家和苦幹的官員負責。它保護祖國和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監督殖民地的財政和司法制度，對殖民地企業予以相當指導，並建議新的帝國政策。它有某種稽核權力；它起草對總督的訓令；當殖民地官吏職位空缺時它提出新人遞補；它可要求這些官吏提出報告書。自然，國會對殖民地有相當立法權力。事實上，它是處理英帝國內外商務和其他關係的唯一機關。皇帝也有很大的權力，他不僅指派八個皇家省份的總督（因為到了一七六〇年，只有維特島和康狄涅格是自治特權殖民地，只有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和馬里蘭是獨佔殖民地），而且能夠否認任何由殖民地會議通過的法律。這種否決權平常由樞密院從中調解，而樞密院則向「貿易墾殖委員會」作縝密的諮詢。關於殖民地的訴訟案件，樞密院尚可作為一個上訴法院。

在「七年戰爭」結束以前，英國國會所通過的主要法律便是各種航行法案，應用着不列顛帝國福祉所繫的某種經濟原則。這個帝國被認為是一個單位，一個固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聯邦。在這個單位之內，殖民地能夠以其航運和產物對國家的財富和權力有所貢獻。例如糖，烟草，米穀，航海給養和其他原料等，如非由殖民地供給，英國便須向外國購買了。在另一方面，母國能夠以製造品供給殖民地。這樣英帝國的兩大組成分子便可以有無相濟了。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國會受荷蘭航運發展的刺激，通過一項航行法案，規定一切殖民地對英國的出口貨，必須由英國所有和英國所經營的船隻配運。以後一串法規更把這個制度擴大了。這種法律予英國和殖民地以帝國的運輸專利；規定殖民地運向歐陸的某種出口貨，應在英國港口轉船；並規定歐洲貨品運入殖民地的辦法，使

其有利於英國的廠家。在某些方面，倫敦對殖民地的企業予以限制，但在其他方面，則又予以鼓勵。

最初這種法律沒有徹底實施。但到了一七六三年，英國力求重整其殖民地制度的時候，便再行檢查其重商主義的法律。

帝國內聯邦制度問題

的確，整個帝國制度給提出來重新檢查，而這過程——包括殖民地與母國關係的重檢討——便催促着獨立革命的爆發。給與下一代的錯綜複雜的歷史以統一性和意義的，便是這個帝國的組織問題。怎樣組織一個帝國，使其既可保存集權的利益，同時又可保存地方自主的優點，這便是任何時代政治家所碰到的一個最困難問題。使在威斯敏士特的中央政府控制一切屬於帝國一般性質的事務——宣戰，媾和，外交，西部土地，印第安人，貿易等等——同時使在馬薩諸塞，弗吉尼亞，南加羅林納和他處的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嚴格屬於地方性質的一切事務，可有什麼制度嗎？地方事務和一般事務可有什麼界線嗎？能否技巧地劃出一條界線，使中央政府既擁有充足的權力同時又不至於侵犯人民在地方事務上的自由？

自然，這是一個聯邦制度問題。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帝國，在事實上（並非在理論上或法律上）是一個聯邦帝國。這個帝國的權力，分授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英國國會控制一切屬於一般性的事務達一百五十年之久；地方議會自開頭起即控制着一切屬於地方性的事務。

可是就法律而言，英帝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法律和理論上，國會有一切權力。英國的政治家面對創建一個真實聯邦制度的機會，但他們不能善用這個機會。可是這個問題未於一七七六年獲得解決，也不於殖民地脫離母國時宣告結束。這個問題簡直是移到合衆國來了。自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七年，美國人碰到同樣的問題——在一般事務上保持一個統一的政府而在地方事務上實行自主的問題。美國人的最初努力是失敗的。他們經過慘痛經驗之後再度嘗試，而於一七八七年的聯邦憲法中建立一個持久的聯邦制度。

革命時期的大課題之一，便是帝國組織問題的解決和聯邦制度的出現。那種制度的建立，是基於英帝國一百年的經驗，是基於一七六三年之後在英國和美洲的爭辯和檢討，是基於戰爭和聯邦（Confederation）苦難的考驗。在一七八七年憲法中聯邦制度的最後成功，乃是此時代富建設性的大成就之一。

不滿的一般原因

不容易說革命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但可以確說不在一七七五年。約翰·亞當斯強調着革命本身和革命戰爭的分野，他認為前者的確在後者開始之前結束了。他寫道：「革命是存在人民心裏和殖民地的聯合中，都是在敵對行動開始之前成功的。革命和殖民地的聯合，自一七六〇年至一七七六年間逐漸形成。」亞當斯是一個善於觀察而富進取心的青年律師，他是應該知道的。可是他說革命是在人民心裏，這使我們不得不作另一種區別了。總之，到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只有少數美國殖民者認

爲應該與英帝國脫離。在那個時候，也許有一半美國人還願意避免一種政治的離異。根據亞當斯自己的證明，在整個戰爭時期中，殖民者中整整有三分之一人是反對革命的，而三分之一人則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所以比較正確的說法，便是說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革命是存在於一部分人的心裏；而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的鬥爭，是一種把它加諸其餘人民並使英政府予以承認的鬥爭。

論及革命的經濟原因時，我們必須對不同區域和不同利益作明白的區分。北部的商人與南部的種植家，他們的抱怨是完全不同的，而西部的土地投機家的見解，又與前兩種人大異其趣。

經商法和航行法對於北部殖民地的損害較對於南部者爲甚。北部殖民地沒有直接可運至英國交換製成品的有價值產品。一般的說，他們必須以其辛苦得來的金錢，償付來自英國的入口貨，而這些金錢又必須與西印度羣島貿易纔能獲得。他們運麥，肉和木材到西印度，換回棉花，靛青和糖。他們還得到糖漿，把它製成糖酒售給非洲，在非洲收買黑奴，然後銷於西印度羣島或南部殖民地以牟利。國會於一七三三年通過糖漿法，用寓禁於徵的辦法，把新英格蘭與西印度羣島的貿易，轉限於不列顛諸島。如果此法切實施行，新英格蘭人損失必甚重大。可是糖漿法給整個地規避了。例如羅特島每年入口糖漿一萬四千大桶，其中一萬一千五百大桶來自法屬及西屬西印度羣島。走私是沒有罪的。英國當局佯爲不知，有些甚至坦白指出，說這些非法貿易得來的錢，結果還是入於英國商人和廠家的囊篋。在紐約的里文斯頓家族和在馬薩諸塞的漢哥克家族，都是經營走私貨物發財的。

一七六四年的糖法，事實上是一七三三年糖漿法的重新制定，使其條款可以實施。舊時每加侖六辨士的稅率減爲三辨士，並規定逮捕一切違法的船隻。也許最公道的稅率是二辨士，但國會內的西

印度羣島勢力把它提高了。這其意義便是對新英格蘭經濟利益的嚴重打擊。羅特島提出抗議，謂西印度羣島是該殖民地與英國貿易的全部基礎，而它的一萬四千大桶糖漿，英屬西印度羣島最多只能供給二千五百大桶。

另一種令人不快的事，便是由英國運至殖民地的大陸貨物，其出口稅於一七六四年由百分之二·五增至百分之五。關吏奉令嚴格執行，並採取各種步驟加強實施，例如派軍艦停泊美洲海面搜捕走私，頒發「援助狀」(Writs of Assistance)使皇家官吏可以搜捕可疑的地方。

南部的情形便完全不同。它與西印度羣島貿易極少，或可說完全沒有。它直接運主要產品——烟草，靛青，航海用品，木材，獸皮至英國，而換回英國的製造品。可是這貿易是依據一種有利於母國而不利於殖民地的基礎的。這貿易由英國的商家和代理人操縱。代理人往往以不公道的低價購入烟草和其他商品；他們又以公道的高價售出衣服，傢具，酒類，馬車和其他物品。貪舒服的種植家沉溺於一種惡習，任意由倫敦定購他們喜歡的東西，而以票據償付，結果多致債台高築。許多債務是傳統的，由父傳子。種植家的憎惡其英國債權人，與後來西部農民憎惡東部的抵押品執有人，可謂情形相同。他們都知道，擺脫債務的最易方法，便是乾脆反叛英國的統治，用戰爭來洗刷一切。

在一七五〇以後的二三十年中，有些南部議會通過寬鬆的破產法，並支持有利於負債者的法律。這些到達英國的時候，樞密院往往予以否決，結果便發生一種憤激的情緒，認為英國的富人在使貧窮者受苦。英國國會又企圖阻止殖民地發行紙幣。大部分地方在一七三〇年之後，發行大批紙幣，

有些地方把它作為法定貨幣；可是漸漸遭遇到倫敦的反對。最後，在一七六四年，英國國會乾脆禁止殖民地以紙幣為還債的法定貨幣，這樣一來，全部英屬美洲的負債者又抱怨連天了。

西部的土地投機和墾殖，又是另一種有關的大經濟利益。在西部，財富是用兩種方法得來的：與印第安人作皮貨的貿易和組織地產公司，購買，分派和賣出大片荒地。當年皮貨商人和土地投機者都希望能夠自由行動，正像今日西部的探油礦者和伐木者一樣，都希望能夠為所欲為。除此兩種人外，我們於一七六〇年之後又發見另一種人，那便是「七年戰爭」的殖民老戰士，他們獲得西部土地作為恩餉。尤其是弗吉尼亞，是用這種方式酬報其士兵的。

賓夕法尼亞，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的平民，都是渴望得到土地的。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不久即發見大家向西部湧進。地產公司一個個地組織起來；美洲大陸最偉大的人物——佛蘭克林，華盛頓，約翰孫爵士——對此都很注意；請求略，購買略，測量略，情形極為紛擾。

當大眾把持着西部土地的時候，英國政府即決定一種嚴格控制和巡察西部的新政策。它於一七六三年頒佈命令，一切移民不能越過阿巴拉契安山脈的山脊，以求與印第安人和平相處，以防殖民者散佈過速致越出英國控制範圍之外，並終止土地重疊要求的混亂局面。「公告線」以外的土地，暫時劃出為皇家領域，而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土地，除售與皇家外都不能出售。它的理論是認為稍緩一點並不礙事；騷動的印第安人有時間可以安靜下來，以後土地纔漸漸可開放給殖民者。不久貿易墾殖委員會支持一個西部殖民地叫萬達利亞（Vandalia）的新計劃。但此項公告對皮貨商人，地產公司，領恩餉者，和渴求獲得西部土地之人打擊甚大。美國人不久以前與法國人打仗以強迫其開放

之門，此時似乎又給砰然關閉了。

殖民地在宗教上的怨艾集中於與英國國教的關係上。在特拉華以南的殖民地和紐約的一部分，英國國教是國家支持的宗教。此教會所引起的憤怒，基於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許多殖民者被強迫向教會納稅；第二是他們恐懼教會的政治傾向。在南部每個英國國教的牧師有他的牧師住宅，有他的教堂領地，有他的由稅收撥出的固定薪俸，有他的世襲地產。在全部殖民地上，聖公會顯然是少數派。在弗吉尼亞，低地的大家族——華盛頓，李氏，蘭道夫，卡特，馬遜，加里——幾乎都屬聖公會。但在里士滿以西，不從國教者——教友派，浸信會，馬丁路德教派，長老會——則為數多得多。在北加羅林納，雖當局企圖使人民擁護九個聖公會牧師，但聖公會的會員為數寥寥。在南加羅林納，聖公會比較強盛，但即使在這個區域，還是不從國教者佔着大多數。

另一種衝突的原因在於帝國防務問題。與印第安人的戰爭是必然的，而法國人又渴望復仇，密士失必河以西的西班牙人也難以信任。英國政府不信殖民地能夠自衛。英政府抱怨殖民地，說在最近的戰爭中，殖民地在募集軍事上行動遲滯而吝嗇，而且不能和協一致。唯一的中央機關是在倫敦的帝國政府。故它在格林維爾 (George Grenville) 領導之下，不久便決定在北美建立一支一萬人的軍隊，其維持費的三分之一由殖民地稅收撥付。這便是說殖民地每年須增稅約三十六萬鎊。格林維爾又提出對報紙和法律以及其他文件徵收印花稅 (Stamp Tax) 的議案。國會於一七六五年予以通過。此外還有一種辦法，規定殖民地必須以燃料，燈火，被褥，廚房用具供給軍隊，並協助他們尋得住所。這在英國看起來是一種細事，但在殖民者看起來，印花稅案是納稅而沒有代表權的明顯例

子。

最後，美洲是一片建立共和或準共和主義的沃土。此地的人口，一百五十年來生活於民主和平等的空氣中。經濟的差異在這裏是極少的；經濟的機會平等地對全體人民開放着。貴族階級的存在不過是刺激民主理論的發達而已。有一個小小的海濱階級或集團，擁有大部分財富，而在某些地方如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則擁有政治勢力。反對這個階級的是內地正在勃興的民主主義。這兩種勢力進行着長久的鬥爭。邊區的小農民，移入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城市的勞工和工匠，在不斷的反對着老商家和種植家。他們在革命之前許久便這樣做，他們的毅力令其長官震驚，他們的精神對於後來反對母國的革命頗有貢獻。

我們把反英的革命領袖列成名單時，即發覺他們可以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有教育的人，作家和思想家——如聖牟爾·亞當斯，(Samuel Adams)，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海約翰(John Hay)，奧狄斯(James Otis)，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司各脫(John Marin Scott)，克林頓(George Clinton)，里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迭更生(John Dickinson)，卡羅爾頓的卡羅爾(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李氏(Richard Henry Lee)，馬遜(George Mason)，瓊斯(Willie Jones)，和路特勒區(John Rutledge)。另外一派是受過極少教育或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急進人物，他們都是從工匠和邊陲森林區居民出身的——如麥克道格爾(Alexander McDougall) 薛爾斯(Isaac Sears)，紐約的藍姆(John Lamb)，如賓夕法尼亞的羅伯多(Daniel Roberdeau)

和白里安 (George Bryan) · 如弗吉尼亞的亨利，如北加羅林納的潘森 (Thomas Person) 和布拉特華茲 (Timothy Bloodworth) · 如南加羅林納的葛斯頓 (Christopher Gadsden) 和薩姆特 (Thomas Sumter)。這第二派是激烈而暴躁的，對於政治往往傾向於急進。他們喜歡純粹民主政治的東西。他們受到哲人如傑斐遜和亞當斯的感召，但他們所貢獻於革命運動的則是硬幹的精力。在發動革命時，第一種人比較上重要得多。受過教育的人，懇摯的利用口頭和筆桿，發出大批小冊子，在報紙上發表文字，在公衆集會中傳播他們的政見。

這些殖民地的作家們，宗法着兩派很有力量的英國思想家：一派是贊同清教徒共和國的學說，一派是贊同一六八八年英國民權黨 (Whig) 的革命。那就是說，他們的論據得自悉尼 (Sidney)，哈靈頓 (Harrington)，彌爾頓 (Milton)，而最重要的是洛克 (John Locke)。洛克所著的「兩種政府學說」(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即包含着美國獨立宣言的精華。洛克認爲國家的最高功用在於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而這些都是每個人所應有的。他說，政治的權力只是爲着人民的利益時纔能握有。當人類的自然權利遭遇破壞時，人民有權利和義務廢除或撤換政府。這種學說寫入於「獨立宣言」的弁言中。洛克主張，「沒有權威的武力，其匡正的真正辦法便是不授以武力。」他在他的「論宗教自由」(Letter on Toleration) 中，闡論政教必須分離之理。這一點，他爲革命奠立了另一偉大的基石。他說明教會是一個志願的組織，應由其會衆自由地予以維持，而不應由政府用強力支持。

洛克和與他同道的思想家，極受有政治興趣的全體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所崇拜。事實上在英國人離

棄洛克等的政治哲學的時候，美國人恰恰把這種哲學承受過來。英國的憲法設施，在一六八八年以後發展出一種畸形而不民主的代表制度。一種寡頭政治出現，以腐敗的市邑制度和有組織地剝奪大部分人口的公權爲根據，不讓新的工業城市選派代表。美國也有剝奪公權和腐敗的市邑制度的存在，但程度並不相同。事實上十八世紀中，美國不斷在鬥爭着，以求擴大選區，使新的郡和西部區域能與舊的殖民地同獲公平的代表權。美國有相當真正的代表政府；英國有一個不正確的代表政府的制度。美國人深信一種公道的民主制度所表現的自然權利，而許多英國人則深信絕對的國會主權和曲解的政制。當一七六五年與母國的糾紛開始的時候，美國人發見他們具有一套恰恰適合其需要的政治哲學。

誤會

在革命前之十年間，美國殖民者與英國政府誤會極深。這裏我們必須再次申說，英國早期所採取的步驟，可說沒有一項是有意虐待美國的。他們要解決印第安人問題，要使殖民地能夠自衛，要強化關稅——這種種在倫敦看起來都是公道而合理的。但在美國的羣衆看起來，似乎都是爲壓迫美國而設的。艱難困苦的時日跟在戰爭的後面。失業和貧苦的人希望在阿巴拉契安山脈的那畔建立新的家鄉——但「公告線」禁止了這種舉動。貿易困難，硬幣缺乏，而皇家又於此時嚴格實施新稅則以吸竭此地的金銀。同時在「印花稅法」之下，英政府未得他們同意向殖民地徵稅。這樣抽得的款項，是用以維持一支常駐的軍隊的，而大部分殖民者認爲這支軍隊並無真正的需要；這支衛戍部隊

轉而用以執行關稅和不公道的稅法。在皇家的官吏的心目中，他們要求朝廷頒發「援助狀」是適當的。但在殖民者的心目中，這種「援助狀」不啻以絕對的權力畀予官吏，使他們可以搜劫每一個人的家庭和商店。英國政府曾經通過某種法律，限制或禁止在殖民地設廠。英廷認為這是公道的，因為它相信殖民地集中着原料而不列顛集中着製造品，乃帝國繁榮的最好辦法。可是許多殖民者憎惡這一種干涉。

在實際糾紛的後面，還有理論上的衝突存在。這種理論上的衝突增加了雙方惡感的程度，並造成了一條不能跨越的鴻溝。

大部分英國官吏認為英國國會是一個帝國組織，對殖民地和對本土行使同樣的權力。它能夠替馬薩諸塞制定法律，如同替柏克夏（Berkshire）制定法律一樣。殖民地的確有其它它們自己的政府，但殖民地不過是團體而已，須恪守一切英國法律；英國國會能夠隨便限制，擴充或解散它們政府。但美國的領袖們則認為不然，因為並沒有所謂「帝國的」國會存在。他們認為殖民地僅有的法律關係只是對英王的關係。贊成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是英王，而讓它們組織政府的也是英王。英王是英國的國王，同時也是馬薩諸塞的國王，情形是平等的。馬薩諸塞的議會既不能替英國制定法律，故英國國會也不能替馬薩諸塞制定法律。如果英王希望殖民地給他錢用，他可以要求一筆津貼；但國會無權通過一種「印花稅法」或其他籌款的法律以取得這筆款項。簡言之，一個英國的公民，無論在英國或在美洲，只有他自己的代表機關纔能要求他納稅。

可是有一點是必須認識的，在英國和在美洲，對於主要問題的見解是分歧的；而正在發展中的競

爭，殖民地與母國間的鬥爭，並沒有殖民地內部衝突以及大不列顛內部的衝突來得厲害。英國在國會裏面，重要的民權黨領袖察特姆姆（Chatham）、白克（Burke）、巴萊（Barre'）和福斯（Fox），強烈的傾向於美國的愛國志士一方面；在殖民地裏面，一個忠實的保守黨團體則支持着英國政府。我們又必須認識，雙方的一些極端分子都喜歡利用這種衝突以促進他們自己的見解。彪特爵士（Lord Bute）必定高興在殖民地進行宣傳，藉以削減威爾克斯（Joan Wilkes）和其他在英國人物所揭櫫的民主精神。馬薩諸塞的聖牟爾、亞當斯和弗吉尼亞的亨利，都同樣願意利用此項衝突提倡他們在殖民地政治上的急進觀念，並根據一種善待平民的基礎去改造社會。

暴動

反對英國政府的革命並不是一個大規模而自然的運動。反之，它是經過精幹的人的縝密策劃，並由大陸上一些最活躍的分子用辛苦和機敏的方式去實行。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在幾個殖民地產生了這種反應。各殖民地議會提出抗議，弗吉尼亞更特別通過有力的決議案。但最有效的是暴動的羣衆的行動，他們在馬薩諸塞，紐約，弗吉尼亞，北加羅林納和其他地方毀壞印花和其他產業，強迫印花稅吏辭職或逃跑，甚至威脅到各個皇家總督的生命安全。這一次的暴動最初獲得很普遍的援助，但不久守秩序和有錢的公民便表示對它不滿。同時，稱爲「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的組織也成立起來，反對英國國會的壓迫。

第二步驟便是由商人團體推行一種經濟杯葛，有時還由地方大會予以支持，這是由於一七六七年

的陶森特法案 (Townshend Act) 所促成的。該法案規定，茶，紙，玻璃和繪畫顏色均須納稅。好多社區的商家和主要市民都採用不入口和消費協定，杯葛英國所抽稅的東西。這種辦法，波士頓於一七六八年八月採用，以後蔓延到各殖民地，在兩年時間之內，竟風行於全部殖民地了。在有些地方，英國入口貨減少幾乎一半；在其他殖民地，協定的實行極為惡劣。當英國國會廢除陶森特法案（茶稅除外）的時候，這種運動即於一七七〇年宣告終止。

第三步驟便是建立一種本地和殖民地際通訊委員會制度。馬薩諸塞的亞當斯，一個天生的宣傳家和組織家，他便是此項工作的主要領導者。他在市民大會中是一個最有魄力的人物，而且在馬薩諸塞議會中也居重要的地位。在一七七二年的夏季，市民得知皇家政府擬以永久薪俸給予總督和最高法官，這樣可以不必受民衆的控制。於是市民大會於十一月二日召開，採取一種「包括整個革命」的步驟。它成立了一個通訊委員會以與其他城鎮聯絡。不久，每一處都有一個同樣的委員會，而整個地方的擾攘，便像一個激怒了的蜂巢。自馬薩諸塞灣以至於柏克廈的人民，組成了有良好領導的陣容。一個保守黨作家後來證明這種情形，他說：「這便是叛變的來源。當它種植的時候，我看見一顆小小的種籽，它不過和芥子一樣的大。我看見它長大起來，直至成爲一株大樹。」其他殖民地也成立同樣的委員會；而弗吉尼亞於一七七三年指派殖民地際委員，這種制度很迅速地便在整個大陸上盛行起來。

向暴動邁進的第四步驟便是成立革命議會，當時他們普遍稱爲地方會議。舊日的平常議會因爲兩個原因不能滿足急進派的需要。它們的成員大部分是保守派和附着於現存秩序而行動遲滯的資產階

級；他們一部分是受皇家總督們所控制的，總督們能夠隨便叫他們閉會。第一次的地方會議出現於一七七四年，是「波士頓港口法案」(Boston Port Act)通過的消息發出後的一個結果。他們產生的手段往往是十分簡單的。

例如在弗吉尼亞，波士頓港口法案的消息，於一七七四年五月到達，震動了整個地方。當時議會正在開會。傑斐遜，亨利，李氏和其他四五人立刻舉行會議。他們決定宣布絕食和祈禱一天。這種情形是非常的嚴重，因為自「七年戰爭」以來，即未曾有過同樣的事件。他們照克倫威爾(Cromwell)治下國會的前例，並勸誘議員們指定一七七四年六月一日為絕食和祈禱之日。總督鄧摩爾(Dunmore)立刻解散議會，認為他們犯上。他們八十九條大漢沿着一條長街前進，行到洛里酒店(Raleigh Tavern)，在酒店內的愛普洛室開會，由議長蘭杜夫(Speaker Peyton Randolph)主席。急進分子提議一種新的不入口協定。李氏主張此外尚須採取步驟，但一部分人則不急進。可是他們不能長期忍耐着。五月二十九日，波士頓的騎士馳至，帶到了其他殖民地首邑的書信。他們告訴一種消息說，現在正在建議，停止一切對英國的貿易。蘭杜夫議長得到二十五位議員的協助，決定召集舊議會議員於八月一日集會；這樣一來，殖民地的初次地方會議或革命的議會即告產生。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訴諸武力

各殖民地的憤怒和騷動漸漸增加。英國駐軍於各個城市給急進派的領袖們一個煽動民衆的機會。在紐約，一七七〇年發生不流血的「金丘之役」(Battle of Golden Hill)。正如戈登(Cadwallader Colden)所說，「市民與軍士之間的惡感，給人用人工挑撥起來。」最後，「有些市民武裝起來，而軍隊則從軍營衝出，援助他們的袍澤；」只有軍官和地方官的調解纔能阻止這種衝突。在波士頓，發生了一次比較嚴重的火併。有兩團戍兵於星期日換防，他們的軍笛和軍鼓的喧鬧聲激怒了一些嚴肅的市民，而比較魯莽一點的人則故意向英國陸軍嘲弄。當英軍奉命嚴自抑制的時候，這種嘲弄越來越厲害了。

最後在三月五日那一天，有兩個英兵遭市民攻擊。鐘聲大響，號召市民到街上來。在海關的哨兵一人，被人信口辱罵，並用冰塊和其他東西擲擊。當布萊斯頓上尉和少數兵趕到保護的時候，他們的嘲弄和擲擊更來的厲害。暴民狂叫着：「混蛋！你們有勇氣就開槍！」軍隊的行動極佳，但最後有人把一個兵士擊倒落地，他爬起來後即開槍。以後就是一陣混戰，其他的士兵也不得命令而開槍了。結果立時殞命者三人，重傷者二人。當鼓聲聲召集軍隊全部出動的時候，總督親自出馬，

把秩序恢復過來。一個重傷的人臨死時說，「我也曾看過愛爾蘭的暴動，但未曾看見軍隊能夠這樣忍耐而不開槍。」可是「波士頓的屠殺」在許多人看起來是英國暴政的最好例證。這個日子給莊嚴地紀念着，空前未有地煽動着羣衆。

諾斯爵士 (Lord North) 所領導的英國政府，還不能夠從這正在拾頭的疑忌和敵意中獲得適當的教訓。另一次重要的事變發生於一七七二年。八門砲的小兵艦加斯比號奉命在羅特島海面巡邏查緝走私，在六月靠於接近伯羅維頓斯 (Providence) 的海岸。一羣市民向它進攻，制服了船上的人員，然後把他們所憎惡的兵艦放火焚燬了。陶森特法案所規定的捐稅都取消了，只餘茶稅一項沒有廢止，這是以執行原則的。實際上各殖民地都停止飲茶，使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財政異常困難。英政府爲協切該公司起見，於一七七三年准它運茶至美國，其條件是把價錢降得極廉；但諾斯爵士還是堅持必須保持殖民地每磅三辨士的稅率，他說英王認爲這是權威的一種試驗。這種試驗直接引起了美國的叛變。美國人認爲這不過是遁辭而已，於是發生了劇烈的憤激。東印度公司派出許多船隻，但每個港口的人民都決定予以拒絕。在查斯頓，茶葉給封鎖在地窖裏；自費城以至紐約，茶葉都原船運回。波士頓的激昂空氣特別厲害。在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夜裏，約五十人的一羣僞裝爲印第安人，由亞當斯親自領導，上船擊破茶葉三百四十三箱，全部傾倒水裏。沒有一個城市的官吏敢於阻止此項破壞財產的行動。自緬因以至喬治亞，都讚揚着這種暴行。波士頓此次無異在英王面前挑戰，故英國政府迅速採取對策。

英王喬治三世和國會的大多數，都決定懲罰叛變的波士頓。白克和察特翰姆都請採取調解的路

徑。但政府在國會提出五種激烈的法案，其一是毀滅馬薩諸塞特權最自由特性的一部分，激烈地改變了這種特權。其一是任英國駐美軍事指揮官加區（General Gage）爲馬薩諸塞總督，以四團兵支持他，並授權可在人民家中駐兵。其一規定官吏於執行職務時被控犯大罪者，可以送至英倫受訊。其一爲封鎖波士頓港的一切商務，直至該處賠償被燬茶葉並證明決忠誠納稅爲止。最後，魁北克法案把加拿大的疆界擴大至俄亥俄河以北和阿里芬尼斯山以西的整個土地。這末一項辦法並沒有懲罰的性質；這久已在計劃之中，以許多專門的研究爲根據，謀給西北皮貨商業以一種更好的法規，並把密西根和伊利諾斯法國天主教居民置諸一個適宜的權力之下。可是時間選擇得不好，沿海殖民地人民自然以爲是把西北部關閉起來，不讓他們涉足了。

國會這種苛刻的舉動，引起了憤怒和驚愕。各殖民地際的通訊委員會被激採取行動。他們召集會議，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散佈小冊子。當在洛里酒店集議的弗吉尼亞議員們召集常年大會討論「美國聯合利益」的時候，立刻獲得熱烈的響應。弗吉尼亞的地方會議選舉代表，其他地方也跟着照辦。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開會，每個殖民地除喬治亞外均派有代表參加。它的五十一個代表中包括華盛頓，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其他有本領的人。他們故意忽視英國國會，擬定上英王書和致英美人民書。他們起草一種有關殖民地權利的強硬宣言，在這宣言中，他們主張地方應有「特權」以制定對自身事務的立法，可以受國王的否決，但答應國會對於爲帝國真實利益的對外商業的法案，則將予以同意。

總之，大陸會議採取兩種辦法，準備與英國政府破裂。其一是準備一個協定，規定簽字者須在三

個月內停止一切英國入口貨，在一年內停止運至英國港口（包括西印度羣島）的一切出口貨。這便意味着一種嚴重的犧牲。弗吉尼亞的種植家不能連他們的煙草給英國的消費者；馬薩諸塞的船主再不能經營西印度羣島的有利商業。十一個殖民地（紐約和喬治亞置身事外）批准這種結合，而全體十三個熱心的地方委員會則付諸實施。他們宣誓，發表違約者名單等等。還有一項步驟便是起草一個決議案——事實上是一種哀的美敦書——由於此決議案，會議不僅贊成馬薩諸塞反對英國國會最近的法案，並且宣稱如對該殖民地人民施用武力，「全美應支持他們」予以反抗。

至此火併是難免的了。不是把英國國會的法案作廢，便是必須以武力來實施此項法案，兩者必擇其一，至此雙方都不能退讓了。國會宣布馬薩諸塞叛變，並向英王提供帝國的資源以鎮壓叛變。全境都購買軍火，編練軍隊。在波士頓的加區總督，深信到了一七七五年春季，他的部隊必將受到攻擊。他決定先下手攻佔在康谷特（Concord）的一部分非法軍火庫，於是在四月十八日晚上，派遣八百人的一個縱隊出動。但愛國分子是時刻在守望着的，他們在北教堂的尖塔上掛起一個燈籠，即可傳訊給查斯河那畔的雷維爾（Paul Revere），雷維爾便輕騎到鄉間號召羣衆發動。備戰的農民懷着短槍於破曉時聚集，並像愛麥生後來所寫，發出全世界都聽見的一槍。亞當斯離此不遠，當他聽見槍聲的時候，他驚嘆着說：「這是多光榮的一個早晨啊！」

革命戰爭

在數天之內，一支半武裝而沒有紀律然而很可怕的愛國者軍隊，已經把加區和他在波士頓的部隊

包圍起來；在數週之內，全境的最後皇家政府都給推翻了。第二屆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於五月十日在費城開會，這是一個坦直的叛變團體（雖然它對英王送出最後一次的和解文件），把波士頓周圍的軍隊編組爲「美洲大陸陸軍」，並派華盛頓爲總司令。控制着通加拿大孔道的鐵岡特羅加（Ticonderoga）堡壘，被青山部隊（Green Mountain Boys）的領袖亞倫所率的軍隊所攻陷。當美軍防線漸逼近波士頓的時候，加區認識他的地位，南面可從杜却斯特高地北面可從查斯城後面的小山予以威脅。當愛國軍隊於六月十六至十七日佔領後一陣地的時候，便發生了這次戰爭的初次大戰——邦克山（Bunker Hill）戰役。

邦克山戰役極爲重要，因爲它造成即刻感覺到的後果。美軍約三千五百人在這一夜佈防白里特山和邦克山，並在白里特山建築一個臨時小堡。到了翌晨，他們的行動都顯明了。加區召集作戰會議，此時他雖可能截斷美軍的後方，但他決定向正面進攻。這種決策也許是因爲英國人渴望作陣地戰所致。英國部隊在美軍陣地下方，構成陣線，於酷熱的一天的下午三時發動攻擊。他們穿着整齊的制服，帶着行軍袋，三天的口糧，子彈和短槍，每人的負擔大約有一百二十五磅重，這樣以整齊的陣容緩緩向前推進。當他們距美軍戰壕四十碼時，美軍即行描準射擊，效力極爲可怕；英軍後撤，於重行組織後又再前進，在距美軍戰壕二十碼處又遭可怕的火力所擊退；他們退後又進，直至美軍發射其最後兩顆子彈的時候，他們即衝過戰壕。這種作戰是堂皇壯麗的，但太於殘忍而不必要。用同等的武力在海軍掩護之下佔領查斯城地峽，即足以餓困美軍使其早日投降。此次戰役，英軍共損失一千零五十四人，而美方僅損失四百四十人而已。

這次戰役，使美國人深信他們雖無適當的組織和配備，也足以擊退歐洲的最好正規軍，使他們獲得充分的信心。跟着指揮英軍的是豪胡（Howe），他對於這種屠殺感覺極爲頭痛，這使他永不忘記。當加區在恥辱中被召回英倫的時候，他代替着加區。他表示着沒有強壓美軍的勇氣，結果促成了英國的戰敗。

美軍的弱點

戰爭拖延了六年，每個殖民地都有戰事，發生了十二次重要的對陣戰。愛國軍屢次瀕於完全崩敗。華盛頓要用雜亂而訓練惡劣的部衆組成一支真正的陸軍，實在是極困難的工作，而要保持部屬的團結更感困難。保皇的情緒廣泛地散佈着，而漠不關心的態度更爲普遍。在新英格蘭，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的一部分，人民有強烈的戰志。但紐約保皇派的人數可與愛國分子相埒；在賓夕法尼亞，教友派不願打仗，而大多數日耳曼人也不願離開他們的農場；在北加羅林納，許多高地的移民憎恨低地的人民，願爲英王而戰；而喬治亞的大部分，對皇家的津貼頗爲感激，也不願捲入戰爭漩渦。依照最低的估計，有二萬五千美國人爲英王而武裝；如果保皇軍組織適當，領導有方，戰爭的結果必大大不同。

愛國軍的組織最初是惡劣不堪的。當弗里特烈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位參謀官史杜賓於一七七八年到達，擔負志願職務——不久他升爲總視察——求改進頹勢的時候，他發見各團的兵力，自三連至二十三連不等。軍官的素質極劣，因爲在一些殖民地，任何會說話的人都能夠說服人

在他的部下任隊長，或用酒和金錢即可使自己被舉得更高的職位。新英格蘭和其他地方的民主政治，使人不肯服從長官；農民和村人認為隊長是他的鄰人，不願聽他的命令，故華盛頓謂美國兵認長官如敝帚。許多美國兵都缺少責任心，他們以為服役的時期可以隨便終止。當冬季來臨他們聆悉田裏的五穀已熟而無人收割的時候，或當他們害思家病和頹喪的時候，他們往往從軍營悄悄地逃走了。華盛頓要求大陸會議通過長期服役法，這結果在一七七六年九月通過；但這還不足以補救弱點。華盛頓為整飭紀律起見，要求大陸會議授權軍法裁判所，對違法者施以最多不過百鞭的體罰。

美軍好幾次有完全瓦解的危險。在愛國軍於一七七六年佔領波士頓之後，華盛頓把他的軍隊調到紐約，此時他發見他只有八千人適於作戰任務；英軍的總數則為三萬五千，而豪胡以至少二萬兵力在長島登陸。自然，他要把在弗勒布區的小部分愛國軍解決並不困難。在他面前的只有五千五百人的一支小小的軍隊，他如果行動迅速的話，即足以用優勢的力量俘獲了他們；但他不此之圖，而讓良機失之交臂，使華盛頓在濃霧掩護之下逃到馬哈丹島。以後便是愛國軍在馬哈丹和「白色平原」(White Plains)的敗仗；而當華盛頓退過新澤西的時候，他們的軍隊幾乎化為烏有了。紐約和新英格蘭的民團成羣地開小差。他失去他的大部分糧食，輜重和槍砲。在他到達特拉華河之前，新澤西和馬里蘭的民團也離棄了他。當他冬季紮營時，他約有三千三百人，其中一半人的決心還是不大靠得住的。那個冬季，全靠他的英勇和技巧的領導，輝皇地進攻特林頓(Trenton)和普林斯頓(Princeton)，纔把美國拯救過來。至此他能夠以一萬一千兵發動一七七七年的征戰。他於一七七七年八月廿四日率軍開過費城的時候，只有這個數目。當時一個作家稱他的軍隊為「衣衫襤褸而生

蟲的部隊」。豪胡以二萬有訓練的精兵向費城進逼，結果華盛頓敗於日耳曼城，被驅敗退至福區河谷（Valley Forge）度着可憐的嚴冬。

愛國軍無力維持作戰經費也是他們最可怕的弱點。他們沒有方法發行債券。徵稅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沒有一個大陸機關有權收稅；大陸會議不得不要求十三州納稅；而各州既嫉忌，尖刻和治理不良，故他們的幫助是不充足和吝嗇的。直到一七八四年，爲國家用途而徵求的州稅，總數在硬幣價值上不及六百萬元。借款數目有限——國內借款將近一千二百萬元，國外借款（主要的是法國，而荷蘭和西班牙則是捐贈的）還不到八百萬元。故美國的革命戰爭是靠紙幣打的。

國內紙票滿天飛，結果價值迅速下跌，其票面價值雖約達二萬四千萬元，但國庫實際收回的硬幣不及三千八百萬元。到了一七八一年春，大陸的紙幣幾乎毫無價值，理髮店多用紙票糊壁，好玩的水手回來的時候，帶着大堆毫無價值的紙票，把它們糊成衣服穿，大搖大擺地遊行過市。自然，跌價的紙票便是不公平，不滿和分崩離析的原因。當時一個觀察家韋伯斯特寫道：「紙票沾污了我們法律的公平，把法律變成壓迫人的工具，敗壞了我們公共行政的正義，毀滅了信任它的許多人的財產，削弱了我們國家的貿易和工農業，甚至破壞我們人民的道德。」

各分離的殖民地之不信任大陸會議，以及各殖民地間的互相猜忌，使愛國軍的損失極鉅。成立一個強固的大陸政府是相當不可能的。各殖民地反對中央集權的統制，而深信地方的自治。更有進者，在初期的愛國熱情消失了之後，他們極少具同胞感情。弗吉尼亞人不喜歡美國北方人，認爲他們是粗俗、貪婪而極端民主的策劃者，甚至緘默的華盛頓也嚴刻地寫述着他們的惡劣態度。北方

人以爲南方人有傾向於驕傲和貴族的趨勢。每個殖民地都是各自爲政的，當約翰·亞當斯騎馬參加大陸會議時，他不懂得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主要領袖的名字。大陸會議必須哀求大家支持軍隊和國庫，可是這種呼籲常常是被人忽視的。

這個時候美國實際上也沒有海軍——雖然瓊斯（John Paul Jones）不久即在海上探險，大膽地劫掠英國的領海。到了一七七八年，英國普遍地控制着海洋，自此以後也對海洋予以部分的控制。沿着一條一千五百哩的海岸線，他們能夠任意攻擊任何地方。他們有大量的金錢和給養；他們帶來將近三萬名的日耳曼傭兵；他們的官佐在軍事上又有較佳的訓練，故他們初期，自信可以打勝，自然不是奇特的事了。

美國的優點

但美國人有其弱點也有其優點，而其優點最後把局勢完全轉變了。一個優點是在戰場上。他們是在他們自己人煙稀疏的土地上作戰，這土地大部分還是荒漠，距英國三千哩之遠。一支軍隊也許可在一個地方被打敗，可是另一支軍隊可在數百哩之外崛起。這個廣袤的地區是英國所難於統制的。運輸兵員和給養橫渡大洋是困難而費錢的工作，同時從倫敦對整個英軍作適當的戰略部署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優點在於美軍的良好戰志，這是他們在危急關頭所曾表現過的。這批新來自獵區和耕地的個人主義和古怪的農民軍隊，有時是能夠英勇作戰的。北方部隊曾經毀滅了柏哥恩（Burgoyne）的侵略軍隊，南方部隊曾經在一七八〇至一七八一年之間屢戰屢北者，常常能夠回復攻勢，

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爲止。這證明一個愛國的義勇騎隊能夠成爲不敗的勁旅。在一七七八年之後還有另一種優點，便是與急於向英國復仇的法國締盟——這個同盟帶來了兵員，金錢，鼓勵，和在最後關鍵時於海岸的控制。此外對愛國軍最有利的，還有柏哥恩，豪胡和克靈頓（Clinton）統率英軍的劣政。華爾夫（Wolfe）已經去世，而無威靈吞者出現。

英軍的最大優點在於他們的領袖人才——因爲他們有一個華盛頓。大陸會議推選他時對於他的能力知道得極少，可是他證明是愛國的，遵循會議的指導。在狹義的軍事立場上他可以受到指摘。他從來處理一支大過一個現代師團的軍隊，他採取過許多錯誤的步驟，他屢戰屢敗。可是他於四十三歲受命時，即刻成爲戰爭中的靈魂。這個弗吉尼亞的種植家和邊疆校官，因爲他的堅定的愛國心，他的冷靜的智慧，他的沉着道德的勇氣，成爲戰爭的啓迪精神；他在最困苦的時候從來未喪失他的尊嚴，平衡或決定；他懂得怎樣把冒險和謹慎合而爲一；他的正直，振作和大度從未喪失，他的堅忍從未挫敗。他懂得怎樣等待進擊的時間，所以他的忍耐的警覺力贏得了「古羅馬英雄」的稱號。

如果超過了他所忍受的程度，他是會暴怒起來的，不忠的李查斯（Charles Lee）在蒙茅斯戰役便領教過；但一般的說，他具有鐵一般的自制力，這種自制力是可驚的，例如日後他在總統議會席上得到魏納大敗於印第安人的消息，他毫不動聲色，照樣招待賓客。他對每一件事都是嚴謹的。他治軍極嚴，犯規者必受重罰。但他對於部屬的公正和愛護，贏得了他們的絕對忠心。他在紐堡（Newburgh）向沒有得到糧餉和不滿的軍隊演說，他開頭說：「諸位，請恕我帶起眼鏡來，因爲

我爲國人服務，不僅髮已斑白，即眼睛也幾乎看不見東西了。」聽衆之中，有許多人流下眼淚來。華盛頓除革命的費用外，毫不接受金錢，對於從事革命的費用，他也有很詳細的帳目的。當戰事結束的時候，他像古羅馬英雄辛那塔斯（Cincinnatus）一樣認爲只有回到他那可愛的農場去，他希望把其農場經營成美國最好的一個。他寫道：「農業是我一生最喜愛的娛樂。」可是他結果還是留仕。他沒有共和國其他一些英雄來得動人，但他的偉大的性格，高遠的目標，豐富的智慧和曠達的胸懷，都是超越羣倫的。史米士（Goldwin Smith）很公正地提及革命中三項最好的東西，即「華盛頓的性格，他的軍隊在福區河谷的表現，和保皇派較好階級的熱心。」

獨立

戰爭的開始，是爲着爭取「英國人的權利」和解除人民的痛苦，但經過一年多便變成了爭取獨立的戰爭。這完全是自然的演變。最初，大陸會議溫和地宣布它効忠英王。但流血和破壞所引起的痛苦，喬治三世難以和解的態度所引起的憤怒以及美國人有權決定自己命運的認識，不久便促成美國的完全離異。早在一七七六年，華盛頓的軍隊便揭起一面特殊的美國旗。同時巴恩（Thomas Paine）所寫的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也發生了宏大的影響。巴恩是一個聰明的青年急進分子，後來由英國來到美國。他認爲獨立是獨一無二的救藥，拖延越不易獲勝，只有它纔能使美國的聯合成爲可能。到了六月，會議的許多代表都忍不住了。一位弗吉尼亞的代表李氏（Richard Henry Lee）提出一個宣布獨立的議案，由約翰·亞當斯附議。結果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由傑斐遜執

筆，起草一篇正式的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於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通過這篇宣言，七月四日即予公布。

起草和採用這個創造時代的文件的人們，對於僅僅宣布獨立並不滿足。他們認為必須具有「對於人類意見的一種適當的尊重」，故他們詳盡地提供「迫使他們離異」的原因和為這種舉動辯護的哲學。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美國人在他們國史的開端，便在原則上採取立場，並宣布了一種哲學。

這裏所有的不朽的宣示，包含着什麼政府的原理呢？傑斐遜寫道，「我們認為這種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們具有天賦的某種不可移讓的權利，包括着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為要獲得這種權利，人民間便組織政府，期待被治者的准許而擁有適當的權力——當任何形式的政府摧殘這種宗旨時，人民有權予以變更和廢止，並建立新的政府，以這種原則為基礎，以這種形式組織它的權力，使其最適於獲致安全和快樂。

我們這裏所有的，自然是一種民主政治的哲學，其說明如此簡潔動人，乃是前所未有的。有某種東西是有理性的人所不能置疑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這種真理便是一切人都生而平等——一切人在神的眼裏是平等，一切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以前美國有許多不平等之處：貧富的不平等，男女的不平等，黑白人種的不平等。可是一個社會不能做到這個理想的境地，並不能說這個理想便須作廢。而平等的主義一經宣布，便像酵母一樣在美國思想中發酵了。不久各處的人都問着：如果一切人都生而平等，為什麼我們見到他們不平等呢？他們在這個偉大理想的衝擊力之下，努力從事實

現這個理想的工作。

獨立宣言所揭發的另一大真理，便是人都有「天賦的」不可移讓的「權利——包括着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這些權利並非慈善的政府對人民的施與，而是一切人與生俱來不能喪失的東西。這個原則在美國人的心裏發酵，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心中發酵，到了相當時候，大家都公認，不承認人民這種種大權利的政府是不能生存的。

正如獨立宣言所指出，爲要獲得這種種權利，便首先組織政府。我們這裏所有的是政府的「契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人民爲保護自身起見，組織起來，建立政府，以恰夠保護他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力賦與政府。簡言之，人民組織政府來做好事，不是做壞事；人民組織政府來保護他們，不是來傷害他們。一旦政府不能達成它初組織時所指定的任務，它便不應獲得人民的擁護和效忠了。

人民既能組織政府，他們自然能解散政府，因爲他們有權改變或廢除一個壞政府並建立一個新的。的確，這一點往往被認爲是革命，而必須用暴力和流血來執行。但現在美國人說，這既非革命，也不一定是暴力，而是適當和合法的行爲。

他們不久證明這不僅僅是理論而已。甚至在革命正在進行，戰事緊張紛亂之際，他們開始把理想變成現實。他們召開大會，合法地廢除他們的舊政府並建立新政府；他們把生命，自由和快樂的保證寫入於他們的憲法中。數百年來作爲哲學家財產的理想，從哲學的領域裏給提出來制成法律。

進軍和戰役

戰爭中決定性的大戰役——在軍事意義上是轉捩點——便是沙拉多加(Saratoga)之戰。在一七七七年初，英國在加拿大駐有大軍，在紐約還有豪胡指揮下的一支精銳。如果這軍隊結集於紐約，英政府便能夠以三萬五千配備齊全的正規軍開入戰場。如果有一個有毅力的英國指揮官，挾其部隊向駐於新澤西的華盛頓的少數軍隊作無情的進攻，如同格蘭特(Grant)於一八六四年無情地向弗吉尼亞的李氏(Lee)軍隊進攻一樣，則此次起事，結果必被粉碎。華盛頓最怕的便是對方集中兵力來消滅他。可是倫敦的當局，聽錯了柏哥恩(Burgoyne)的話(柏氏曾告假回國)；把他們的軍隊分開。照這計劃，一支軍隊由柏哥恩指揮，自加拿大南移回阿爾巴尼前進；在紐約的豪胡的軍隊，則溯哈得孫河向北前進，也以阿爾巴尼爲目標。英王贊成這個計劃，詳細的訓令由倫敦送至加拿大當局，着發動此種征伐的北路軍，但沒有確定的訓令送達豪胡處——他的軍隊不向阿爾巴尼而向費城移動。

柏哥恩計劃的一個大缺點便是它阻礙了英軍的統一——英軍如果統一起來，必然是所向無敵的。另一個大缺點便是北路軍一旦進入了美國土地，他們即太遠離根據地了。當柏哥恩進抵紐約北部的愛華德砲台(Fort Edward)時，他已距蒙特里爾一百八十五哩，以後每前進一步，地形上的困難即有所增加，補給上也感不易，他不得不向附近村落掠奪糧食。在現今的伐爾蒙特(Vermont)南部的賓甯頓(Bennington)，存有大批麵包粉和牲口，只有少數民團守衛着。他即派一千三百日耳

曼兵和其他的兵向賓雷頓進攻。他們好像衝進了一個大黃蜂巢。新英格蘭的民兵，在老將斯塔克（John Stark）領導下集結了二千人，比他們還要多。

同時，柏哥恩在哈得孫河上游的主力，碰到了增長極速的美國軍隊。當兩軍於一七七七年九月十日戰於「自由人農場」，美軍人數約九千，英軍人數約六千。其他的戰役完成了柏哥恩的敗北。柏氏不久即陷入荒漠中，疲敵不堪，損失慘重，而美軍則增至二萬人。十月十七日，他的軍隊在四面包圍中解除武裝。至此他纔認識帶兵遠離基地幾及二百哩而進入佈滿敵人的曠野之地，乃是一種極愚蠢的舉動。

柏哥恩的失敗有很廣大的後果。經過一擊之後，英國在美的精銳軍隊，幾乎損失了四分之一。哈得孫永遠入於美國人的控制。愛國軍的精神至此爲之一振。佛蘭克林在巴黎堅毅奮鬥，竭力勸誘法外長維爾箴尼斯（Verennes）援助美國。當消息傳來，說豪胡已入費城，柏哥恩攻取鐵岡特洛加，法國人的熱心立刻冷下來。但沙拉多加之戰的消息到後，佛蘭克林的朋友布瑪賽斯因高興趕緊去報告法王而致把手臂跌脫關節。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國與美國簽訂同盟條約，使戰局爲之一變。英勇的拉法葉特（Lafayette）早已自費至美服務，由國會授以少將銜。法王和西班牙王，也已貸予祕密借款，使美國能夠購買大批軍火。現在，法國準備派遣羅薩姆布（Rochambeau）率六千精兵援助華盛頓；供給大批金錢和供應品；而法國艦隊的行動，又大大增加英國在供應部隊上的困難。

英軍既不能征服北部，於是轉而向南。他們的計劃在佔領極脆弱的喬治亞，然後以破竹之勢北

向，以求到處獲得保皇派的援助。一七七八年杪，他取們得薩凡那（Savannah）。一七七九年，佔領喬治亞的內地和南加羅林納。美軍派遣卞加敏·林肯將軍（General Benjamin Lincoln）應付此種局勢。但他讓自己給封鎖在查斯頓地方，於一七八〇年五月，英軍俘獲他和五千人，連那個南部的的主要海港都落入英軍之手。這是對於革命的最嚴重打擊之一。全部南加羅林納，不久便遭蹂躪。第二個美國指揮官爲加茲（Horatio Gates），是「沙拉多加之戰的英雄」，他到南方來堵塞洪流。他的小小一支三千人的軍隊，一半是新的民團，於一七八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康姆頓被康華利斯爵士（Lord Cornwallis）所擊潰。他們死傷和被俘的二千人，而加茲逃跑了將近二百哩纔敢停歇。

但在金斯山（Kings Mountain）來自西加羅林納的保皇派軍隊一千人，同時遭一支較大的愛國軍所打敗。第三個美軍指揮官格林（Nathanael Greene），比較其上任能幹得多。他於此時到達南部戰場，他也遭擊敗，但在長程和急行軍上他表現了驚人的技巧。的確他在九個月中打敗了四次重要的仗，但他使英軍疲於奔命，而他與居民聯合起來反抗英軍的一種威脅，最後迫使英軍退到查斯頓和薩凡那。格林和華盛頓一樣，在戰鬥上雖然失敗，但在整個戰局上是獲勝了。

當格林在南部進行肅清工作的時候，另一支英國軍隊也將臨末日。康華利斯在暮春時離恐怖角（Cape Fear）的鄉間向北移動，準備與叛徒安諾德（Benedict Arnold）會師於弗吉尼亞。他遭拉法葉特麾下的美軍無效追逐一番之後，退至約克河口的約克城，在此設防據守。在這個時候，華盛頓在紐約附近有六千軍，羅薩姆布在羅特島的新港（Newport）有五千軍。恰當康華利斯退至海岸

的時候，西印度羣島的法國海軍上將戴格拉斯送來消息，謂他可以與美軍合作。華盛頓即刻決定抓住這個機會。他以極大的速度，以一萬六千美法聯軍逼約克城。康華利斯的八千軍被戴格拉斯的艦隊截斷海道退路。他的外緣堡壘被攻佔；他的內部的防禦工事又被美砲隊所轟燬。在十月十九日那天，他送劍至華盛頓處請降，華盛頓即命林肯將軍予以接受，英軍把他們的槍械架起來，樂隊奏着「世界轉變了」一歌。

戰事至此實際結束。在一個時間，英王喬治尚頑強否認失敗。但在一七八二年，英軍放棄了南方全部港口，他們的權力，不能超過紐約一城戍軍號聲所及範圍之外。

和約

在一七八三年結束戰爭的和約中，英國的條件是極慷慨的。英政府如果稍為堅持，邊界便可成爲難於解決的問題。羅尼 (Rodney) 指揮下的英國艦隊剛在西印度羣島，對法軍贏得一個決定的勝利，而紐約的英軍也不能退出。的確，在克拉克 (George Rogers Clark) 指揮下的美國來福槍隊，滲入了俄亥俄河以北的荒野，佔領了現在的印第安那，伊利諾斯和密西根的英軍兵站。與美國全權代表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約翰傑 (John Jay) 接洽的英國大臣奈爾伯恩 (Shelburne) 本來可以利用這種勝利來堅持，但他沒有這樣，而把阿里芬尼斯與密士失必河間的全部土地割讓給這共和國，其北部疆界幾與現界相同；他同時把佛羅利達交給西班牙，並把加拿大沿海的廣大漁權讓給美國。

這種慷慨結了很有價值的果實。如果英國堅持保有西北的大部分土地，它必與合衆國常常發生嚴重的衝突。共和國的天然發展是向西的，其展拓的力量用於一個方向，結果迫使法國移讓路易斯安那，迫使墨西哥移讓格蘭得河（Rio Grande）以北的區域——但在一八一五年以後，英帝國對此並不焦急。是的，加拿大與合衆國並肩向太平洋發展，今日成爲緊密的友邦和同盟國。

民主政治滋長

在對外關係上，美國已經完成了一個重大的革命。但在對內關係上，也有一個同等重大的變遷。美國社會在這個時期的改變，與割斷對英關係同其重要。

自然，與英國分離意味着政治民主上的立即收穫。至此總督不由英王任命而代之以由人民選擇的州長，議會的上院由任命改爲選舉，人民所要求的法律也不致受否決。但同樣重要的是內部的改革，這種改革擴大了投票的範圍，使代表比較平等。一七七五年至一七七六年間，賓夕法尼亞要求採取兩項民主步驟：其一是給與久被忽視的西部各郡以相稱其人口的代表，其二是廢止把投票限於少數特殊階級的財產和歸化的規定。這兩種改革都獲得成功。一七七六年，議會增加了十七位議員，大多數來自西部，同時選舉範圍也擴大，使一切納稅的男子都能夠投票。在有些州份如弗吉尼亞，早期殖民的區域在議會中尚佔着不公道的優勢，在其他州份如馬薩諸塞，財產規定還是投票的必要條件。可是在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北加羅林納，喬治亞和伐爾蒙特（Vermont），投票是自由的，故不久任何納稅的「森林的兩足動物」（一個討厭的保守派所說的）都能夠投票。

保皇派的分散，對於民主政治又是另一大貢獻。許多保守派和有財產的保皇黨表示對於哈特金生所稱爲「污穢的暴徒」的厭惡。他們喜歡舊的秩序，於是在咒罵與悲哀交集中自己流亡了。當豪胡退出波士頓時，幾乎有一千個保皇黨員與他同乘舟離境，另外還有一千人不久也跟着流亡。紐約的重要產業幾乎都是保皇黨的。當英軍退出查斯頓時，有一百艘船載着離境的保皇黨，組成新月形的一支大船隊向海灣駛去——一片悲壯的景象。上加拿大和濱海各地，容納了六千以上的難民，西印度羣島也容納數千人，而英倫容納了沮喪的一大羣。有一人寫道：「當我們大家都歇下來的時候，英倫幾乎沒有一個鄉村沒有一些美國的塵埃。」他們離境之後，樸素勤勞的農民，店家和工匠，便依照自己的心願自由創造一種文明。自此以後，人們不重視莊嚴，閒暇和文化，而重視精力和粗簡的自我主張了。奮發的商人和投機者，在美國社會中佔着比較重要的地位。每個人都受平等看待，每個人都忙碌，而且幾乎每個人都惟利是圖。

向特權階級的三個堡壘的成功的進攻，促進了朝向民主政治的強烈的動力，那便是毀滅了長子繼承和限定繼承的制度，分散了保皇派的大產業，和到處推翻英國國教的產業。弗吉尼亞是一個限定繼承和長子繼承權根深蒂固的地方，結果便是把大家族的產業保持完整。正如傑斐遜在「弗吉尼亞記事」(Notes on Virginia)中所說，「此地有許多貴族的大家庭，形成一種貴族的秩序，其最令人注意者是他們的私邸的壯麗和豪奢。」傑斐遜在弗吉尼亞的議會中，領導攻擊限定繼承的制度，於一七七六年的第一次攻擊中便把它掃除了。自此以後，一切產業都可自由買賣。一七八五年，傑斐遜又勝利地廢除了長子繼承權。當時有人建議，長子至少應得雙份，但傑斐遜反駁說：「不，除非

他喫雙份食物和做雙份工作。」當法國旅行家華維爾不久之後訪問弗吉尼亞時，他已這樣的紀錄着：「階級的分野已開始消滅了。」大的產業，迅速地由子嗣分割，或分開售給新來的人，其子嗣得款後便向西行。其他的南部州份——喬治亞，南加羅林納，馬里蘭——迅速步弗吉尼亞的後塵。同樣的，業主和富有的保皇派的龐大土地的充公，促進了小地主的民主制度。兩個主要的業主是賓夕法尼亞的賓氏家族和馬里蘭的巴爾的摩爵士家族。賓夕法尼亞為紀念它的創造人起見，津貼賓氏家族十三萬鎊，但哈福特（Harford）僅自馬里蘭得到一萬鎊。弗吉尼亞充公了不少產業。北加羅林納充公了格蘭維爾（Granville）的地產數百萬畝。紐約接收皇家的土地，此外還接收了五十九處保皇派的產業。上紐約約翰孫爵士被充公的產業，最後使一萬農民獲得其家庭。馬薩諸塞強奪了一批產業，包括巴伯雷爾爵士在緬因所擴有者在內。巴氏是一個男爵，他可以在其自己土地上騎馬一直跑三十哩。自新漢普夏以至喬治亞，小農民興高彩烈地移入肥沃的土地來——對於這些土地，他們以前最多只有佃戶的資格。

與英國政權有關係的貴族，與土地和政治的貴族同時崩潰。在新英格蘭，與皇室無關的「組合教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的特權尚存在着，馬薩諸塞甚至把它們加強。但在南方，英國國教的特權已經宣告瓦解。

革命把南加羅林納的產業完全破壞，沒有一個講壇還有人在說教。在其他州份，它給政治急進派和不從國教的宗派如浸信會和長老會以一個黃金的机会。北加羅林納於一七七六年採用一種憲法，保證宗教自由，禁止任何大產業。南加羅林納在其一七七八年的憲法中也採取同樣步驟。喬治亞一七

七十七年的憲法亦然。但在弗吉尼亞便發生猛烈的鬥爭。在這裏，大產業根深蒂固，因為大部分貴族家庭都是信奉英國國教。甚至政治煽動家如亨利（Patrick Henry）者，也認為國家對宗教的支持是保持虔誠和道德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但不從國教的宗派，發見英國國教中出了兩個自由主義的大人物——傑斐遜和馬迪遜（James Madison）。

馬迪遜氏在一七七六年的憲法中，曾寫入了一項簡明的宣言：「一切人都可平等地享有宗教的自由。」但大產業繼續存在着，還需十年的時間纔能把它推翻。傑斐遜認為這是最劇烈的鬥爭。自一七七六年開始，他和他的朋友便一年一年地停付傳教稅，而在一七七九年即永遠廢除了什一稅。可是他們的政敵於一七七六年提出議案，聲明一切宗教稅的問題應予保留，而在這個要求的後面，是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存在的。就性質上言，這計劃是建立各種宗派，使它們都平等地成為國教，並以公共財政來支持它們。它的最有力的提倡人便是雄辯的亨利。

危機是在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六年之間。亨利用他的不可抵抗的雄辯，在下院提出了一個議案說：「本共和國人民，應納適度稅款或捐款以支持基督教，或一些基督教會或宗派，或基督徒的社區。」當他想設法把這句話作成法律的時候，反對派集中全力予以抗拒。在亨利和馬迪遜的一次激辯中，馬迪遜獲得了勝利。這個議案便擱起來，使自由派的領袖們能夠發起一種教育運動。一七八六年，這件事最後消逝，而傑斐遜的著名的宗教自由議案獲得通過——他這議案聲明政府不應干涉教會事務或有關良心的事件。這一劃時代的舉動，成為宗教自由的基石，不僅在弗吉尼亞是這樣，在西部各新州份也是如此。

不久，各州採取步驟以求強化教育基礎。這種衝突對私立學校和學院有痛苦的影響。耶魯學校有一個時期是關閉了；英王書院亦然。到了一七九七年，威廉瑪麗學院的校長，還教着一羣赤着足的學生。一八〇〇年哈佛學院的教職員，不過有校長一人，教授三人，教師四人而已。在一七八〇年至一七八四年期間，沒有一家書店曾在波士頓的主要報紙刊登廣告。

但對於要求普遍教育，革命有一種很愉快的影響。我們即刻可以看出，民主的自治政府，要求受過教育的選民。紐約的克林頓州長（Governor George Clinton）於一七八二年說：「一個自由國家的高級職位，是公開給每一階級的公民的，故其政府有設立學校傳播公眾信任所必需的教育的特殊責任。」傑斐遜說：「最緊要的，我希望平民教育受到注意；保存適度自由的必要受到認識。」對於教育最重要的還是一七八五年土地法的規定，以數百萬畝的公地分給公立學校。

缺少一個全國政府

這樣，此年青的共和國的前途是有希望而進步的。但尚有一幅烏雲掛在水平線上。十三州還未建一個真正的全國政府。它們在一七八一年曾採取某種「邦聯條款」，可是這種制度僅是一種「友誼的同盟」，難免脆弱而不够強固。沒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沒有全國性的司法機關。大陸會議只有一院，而每州只有一票，力量既弱，自難求其有效。它不能徵稅，徵兵，或懲罰違反它所通過的法律的人，又不能強迫各州恪守它與他國所締結的條約。最壞的是，它不能籌得充足的政費，又無力償付國債的利息。

簡言之，革命使美國人民在國際上獲得獨立的地位。它給予他們以一個改變了的社會秩序，不重視傳統，財富和特權，而重視人類的平等；文化和儀禮的標準暫時降低下來，但公道的標準却提高了。它給予他們許多回憶，增強他們的愛國思想：華盛頓在劍橋榆樹下拔劍而起，邦克山的染血的山坡，蒙哥馬利在魁北克城下之死，海爾（Nathan Hale）說「我只悔恨我僅有一條生命可爲國犧牲，」哈得孫河上的監獄船，麥諾德在謀賣國時的挫敗，福區河谷的苦寒，南加羅林納的馬里安（Marion）的游擊戰士替他贏得「沼澤狐」的渾號，佛蘭克林說「我們必須全體受刑，不然便是個別受刑了，」愛國財政家摩理斯耐心替革命募集經費，漢密爾頓直搗約克城的要塞，英國艦隊在它的大退却中駛出紐約灣。

但美國人民還得表示他們有建立自治政府的真正能力——使他們的共和國成功的能力。他們還得表示他們有力解決龐大的國家組織問題。他們以前還沒有證明具有這種種能力。他們的「友誼同盟」似乎將變爲「爭論同盟」。他們的大陸會議幾乎變成鄙視的對象。各州間的紛爭越來越厲害，情勢絕對危險。在這種混亂中受害最大的是陸軍，他們不能得到糧食，衣服或餉俸。軍官中有一句流行的祝語：「敬祝桶有箍」——桶如果沒有箍，便會散成一些木板。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劃時代的成就

美國由於共同協議，產生了一種最寬宏最有效的憲法。這種憲法與英國者迥異，是成文的憲法，但具有伸縮性，跟着國家的發展而發展。美國憲法產生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格拉斯頓(Gladstone)說：「正如英國憲法是進步的歷史所產生的最巧妙的組織，美國憲法是人類才智在指定時期內所完成的最偉大的工作。」實際上它大部分也是演變而來的產物。可是它的形成是由於現代一種最非常的契約。

很徼倖，革命將結束時所採用的「邦聯條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是顯明有缺點的。如果他們有一個較好的政府機構，必會把它們補綴起來，而國家必在一個惡劣憲法之下掙扎數十年。因為它們幾乎是全部崩潰的，故被棄置於一旁；因為其崩潰是由於它們的弱點，故新憲法給制定得格外的有力。那也是徼倖的，到了一七八六年，美國的情形達到了失望的頂點，嚴重的商業不景氣籠罩着美國。只有一個顯明的危機，纔能使許多疑慮的美國人接受有力的新中央政府。

邦聯政府的脆弱

在一七八六年，前途看起來頗為暗淡。不僅國家沒有任何真正有力的全國性政府機構，就是十三州的關係也很混亂，有人認為一些州份之間有發生戰爭的可能。他們爲着邊界問題齟齬——在賓夕法尼亞和伐爾蒙特甚至因此而械鬥。他們法庭的判決是互相衝突的。中央政府本應有權制定關稅和管制商業，但它沒有這樣辦。中央政府本應有權力爲全國性經費而徵收捐稅，但它沒有這樣辦。中央政府本應有權控制對外關係，但許多州份自己已經開始與外國談判。對於與印第安人的關係，國家本應有全權予以管制，但有數州自己與土人往來，以求配合其本身的環境，例如喬治亞州與印第安人的戰爭，即由其本州自己開始也由其本州自己結束。

當內部的混亂威脅廣大區域內的財產時，清醒的中等階級便越來越警覺了。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六年間，不景氣極爲嚴重，人民只能維持不致饑餓而已。邊區一帶，銀根甚緊，市場疲弱，五穀腐於地無人過問，人民只有訴諸於以貨易貨之一法。負債的人要求州政府印製紙幣，使他們的五穀能夠售出，以便得款還清債務。他們要求在討債上有一種「付款延期令」，並制定法令，使牲口和穀類成爲法定貨幣。一七八六年一月馬薩諸塞州格林威區域的請求，詳述着削去抵押品取贖權的每日的土地賣出，只當真正價值三分之一，牲口只半價售出，而在以前五年間，捐稅相等於農場的全部租金。政治的鬥爭，採取債權階級與債權階級鬥爭的方式。在許多州內，貧富間的敵意越來越厲害。最典型的一篇宣言便是一羣南加羅林納人所發出的，抨擊州長路特勒區 (Rutledge) 和其他的貴族。

一七八六年，七個州議會是由紙幣力量維持的。他們在維特島通過各種辦法，在這各種辦法之

下，每個人都能夠用毫無價值的貨幣清償他的債務。無用的錢既可作為清償積欠他州人民債務的法定貨幣，康涅狄格和馬薩諸塞便憤而通過報復的辦法。但紙幣力量不能維持控制整個北部新英格蘭的兩個議會，即馬薩諸塞和新漢普夏議會；這裏武裝的紛擾便爆發了。現存的馬薩諸塞憲法是很保守的。它替財產建立了特別防禦，規定選舉人和公務員的資格。這保守的議會以後即徵收高稅以清償革命債務，其債權人多數是投機家。並不奇怪，一個土地的革命便爆發了。議會在二七八六年的閉會，予暴動以一個信號。這次暴動在歷史上稱為「丹尼爾·沙伊斯的叛變」(Daniel Shays's Rebellions) 為首的是邦克戰役的一位老戰士。

此州在鮑恩州長 (Governor Bowdoin) ，林肯將軍和一些有錢人領導之下，幹得頗起勁，他們墊出款項以應付危機，故當沙伊斯謀奪取春田的國家兵工廠並把部隊散開時，他們能夠容易予以堵住。可是這小小的鬥爭，大大地驚醒了全國的保守派。它似乎預示着一種左傾的革命。諾克斯將軍寫信告訴華盛頓，說新英格蘭有一兩萬個亡命之徒，具有現在稱為共產思想的見解。「他們的信條是，合衆國的財產，由全體聯合努力予以保護，不受英國所充公，故應為全體的共同財產。」他們震撼了「新英格蘭的每個有主義和有財產的人。」華盛頓是認為馬薩諸塞當局應該是更為嚴酷的，在顯明的驚愕中寫道：「每一州都充滿着燃料，星星之火即可燎原。」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見解。而合理的推論便是需要一個更強固的全國性政府以澄清各州的混亂局面。馬薩諸塞的希金森 (Stephen Higginson) 寫信給丹恩 (Nathaniel Dane) 說：「我們不能在我們現有制度下長久生存着；除非我們不久用一些方法替聯盟獲得更多的力量，叛亂必會發生，並奪取我們的政權。」

結果我們必陷入於騷亂之中，於流血悲劇之後另行產生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政府。」

有一部分人的生計是全靠一些調和的辦法的，各州政府間的齟齬已經在他們中間產生嚴重的痛苦。商人因為缺乏一種劃一的貨幣而感絕望。他們必須對付十幾個國家所鑄造的奇特的零碎硬幣，有好些是不夠重量的；還有賈造的硬幣和各樣州的和國的紙票，價值迅速地貶跌下來。很明顯的，較次於一種標準國幣的決難令人滿足。全體的出口商都感覺悲哀，因為他們的美國貨物在外國尋覓市場時缺乏保護。脆弱的大陸會議發覺現在已不能與英帝國尤其是西印度羣島重建昔日的商業關係。西班牙已經侮蔑地關閉了密士失必河河口，不讓美國人通商。即使在國內，商人也沒有辦法可以保證收清欠帳。一個紐約人要討帳須乞憐於賓夕法尼亞的法院，而該州法院則自然是袒護其自己的州民的。日漸發展的美國人廠家團體，也很受來自歐洲的削價競爭所打擊。

不過更壞的是對各州間商業來往的阻撓。有一些因為渴望阻止歐洲貨物的傾銷並求獲得收入，便對一切入口貨建立關稅。這個過程中有三個主要階段。在戰爭期間，只是弗吉尼亞一州便對很多貨物徵稅，因為它保持着相當大的商業，運出烟草，輸入各種商品，故能夠這樣做。以後在停戰後的最初三年中，除新澤西州外，各州都徵收入口稅，但其目的。於財政的收入，而不在于保護關稅。最後，到了一七八五年，新英格蘭和大部分中部州份，已經發展了相當有希望的本地工業，因此他們須與歐洲商品競爭，不得不樹立起保護關稅來。

一種州際報復的因素很快的侵入。南部各州和一些北部小州，他們工廠少，需要從外面輸入貨物。特拉華州和新澤西州設自由港吸收歐洲商品，康涅狄格州也通過法律，鼓勵直接運入歐洲貨

物。船舶的行動受到限制，例如新澤西州人如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便不能渡過哈得孫河到紐約州出售他們的蔬菜。因此各州間的感情越鬧越壞。北加羅林納州人抨擊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他們譬喻本州是一個酒桶，讓人家在兩頭取酒。埃爾斯華斯（Oliver Ellsworth）說，他小小的康涅狄格州，像一頭強壯的毛驢，在兩個重擔之間蹲伏下來。

除商人和廠家之外，還有各種債權人痛感需要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以限制過激的立法。這種人包括貸款的人和抵押品的擁有者，他們因為各州法律的障礙和濫發貨幣而感覺頭痛。他們包括擁有英國權利的美國人，因為過激派控制着一部分議會和法院，使積欠英國人的款項無法追討。他們包括許多官員和軍人，這些人已經得到土地證券作為他們從事革命的酬報的一部分。他們包括土地投機者，這些人已經以賤價購得大批地皮，不論是軍人地皮或充公地皮，故亟望重行售出。這些地主們希望有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其力足以保護邊區，使其不至受印第安人的侵害，並在新移民區域裏維持秩序，以及保障他們的權利。

後來，聯邦和州證券執有人的一個重要團體，痛感當時財政紊亂情形和大眾對捐稅的嫌惡。在「邦聯條款」下的最後十四個月中，國家的內債和外債約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國家的收入不過四〇〇、〇〇〇元！華盛頓於一七八五年給華倫（James Warren）寫信，概括敘述這種情形說：「政府的機輪遭遇阻塞。」

「西北法令」

聯邦政府得到一件很大的成功。阿里芬尼斯山以西地區是未經墾殖的（因為各州次第將它們在這裏的權利移交邦聯政府），邦聯政府爲要解決這個問題，擬定一個賢明的計劃，這個計劃對於今日合衆國的形成，實有很大的功績。它決定把這個地方開放，作爲有次序和進步的殖民地；鼓勵居民按步建立自治政府；最後則建立爲新州，其權力與原有的十三州相似。這個計劃包含在「西北法令」（一七八七年）之內，其範圍包括俄亥俄河以北地區，規定最後建立三個至五個新州。奴隸制度不准在這裏採用。擬定了政府的三個固定步驟。國會先設立一個「區域」，任命一個州長和若干法官，使他們制定法律，但國會有否決之權。稍緩，當人口達五千人的時候，人民便可設立一個兩院制的議會，下院由人民直接選舉。最後，當人口達六萬人時，便成爲一個毛羽已豐的州份。這樣合衆國便解決其「殖民地問題」。一個榜樣樹立之後，全國風從，直至擴展到太平洋岸，最後擁有四十八州，都是經過這種程序。

但在其他方面邦聯是失敗的。華盛頓認各州只是一盤散沙，其他的觀察家也說「我們的不滿醞釀成爲內戰。」此時國會人物能幹者極少，而國會威望太低，無力設計一種更好的政府形式。巴因（Thomas Paine）在很久以前就建議「召集大陸會議，藉以擬定大陸憲章。」少數眼光遠大的領袖人物，因爲集會討論商業問題，便促成這件事的實現。

召開憲法會議

憲法會議的籌備是一個大家熟知的故事。當有思想的人痛感國家脆弱和州際爭執的時候，一個特

別的商務問題引起大家的注意。馬里蘭握有整條波多瑪克河的主權。這條河是馬里蘭與南岸的弗吉尼亞的分界。弗吉尼亞深恐馬里蘭會干涉他們在河上的自由通航；故在一七八五年，馬里蘭和弗吉尼亞的代表會於維爾農山，討論波多瑪克河和折撒比克灣（Chesapeake Bay）的航行問題。華盛頓便是當時代表之一。瑪迪遜鑒於商務情況的普遍混亂，認為需要召集一個更大的會議，其目的在各州以立法的權力授與國會。這個會議於一七八六年在安那波利斯召集；但僅有五州代表參加，結果是整個失敗。

幸而代表之中有一人是大膽的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他把局勢捩轉過來。他勸使會議要求各州任命專員，於翌年五月集會於費城，「規定更進一步的條款，使聯邦政府憲法足以應付聯邦之急需。」大陸會議最初對這種大膽步驟表示氣憤，但這愚蠢的抗議因弗吉尼亞已經推選華盛頓為代表而宣告夭折。此後會議意見一致，會期定為一七八七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在秋季和冬季，除頑強的小小的羅特島外，各州一律都選舉代表。

代表是由州議會推選的。有一部議會是受過激派的農民團體所控制，他們都強烈地保衛着州的主權。可是他們大部分都要其代表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們派遣到費城的人，在政治思想上大都是保守的，在見解上是國家主義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沒有現代的政黨觀念，一部分因為着重所建議的新商務條例，故推選商業專家為代表，一部分因為以前宣布過弗吉尼亞已經推選華盛頓，激起了其他的州也推選有力而清醒的人做代表。

在五月初，代表們零零落落地到達費城。華盛頓最準，他是十三日到達的。他穿黑色天鵝絨衣

服，掛着一把佩劍，即刻成爲衆人注目的焦點。佛蘭克林於十六日宴請各代表，然後在城內開了一桶朋友贈他的黑啤酒，和很多陳年好葡萄酒。他的來賓中，有弗吉尼亞州的瑪迪遜，這個人個子雖小，可是他的分析政治的能力却是驚人的大。還有一個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他是執行律務的種植家，會在他自己的豐富的圖書館裏下了不少功夫，故在會議中可算是佛蘭克林之外最有學問的一個人，他在會議中也表現得是個最精勤最有建設頭腦的代表。另一個賓客是六十五歲的威斯（Gore Wythe），曾經以法律教授過傑斐遜，瑪迪遜，馬歇爾和弗吉尼亞法庭的其他有名人物。還有一個是弗吉尼亞州長蘭道夫（Edmund Randolph），他擁有七千英畝土地和二百個奴隸。

在一七八七年的時候，聚集這麼多賢豪於一堂是極爲難得的。自然，舊世界那一派不能夠誇他們有比華盛頓和佛蘭克林更出色的人物。華盛頓是莊重而嚴肅的，佛蘭克林則聰明而慈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革命事業最盡力的一部分人，並不是參加會議的代表。傑斐遜當時在法國·亨利（Patrick Henry）拒絕選舉·三位鼓吹者巴恩（Tom Paine）亞丹斯（Sam Adams）和葛斯頓（Christopher Gadsden）都沒有當選。簡言之，過激派沒有充分的代表參加。

憲法會議的進行

憲法會議那稀有的創造，的確是個縝密的組織。事實上每州都可以儘量派遣代表——因爲州是選舉的單位——這一點是極堪注意的。但爲經濟起見，多數州份都派少數代表赴會。到會的代表，全數只不過五十五人；有些僅來了一個短時期，所以到閉會的時候，人數只有三十九；還有一部分，

包括華盛頓在內，在辯論時經常是緘默寡言的。這些代表，大約有一半是大學畢業生，有一大半是律師，故他們發表意見時很是正確得體。關於他們的辯論，並沒有保存逐字逐句的紀錄，而瑪迪遜和其他人物的日記，自然也是刪去不少冗贅的報告的，但讀過當日辯論的紀要的人，沒有不對他們的雄辯留下深深的印象的。憲法會議嚴格恪守保守機密的法規，故在辯論上得益不少。宣傳會擴大的意見的紛歧，會使各代表在外發表演說或向報界發表談話，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到選民的壓力。費城的持重的市民，並不窺探會議的工作，這一點是值得讚美的。佛蘭克林曾在宴會席上向朋友們提及一個古舊的寓言，說從前有一條雙頭蛇餓死了，因為牠的兩個頭對於從一棵樹的那一邊走，不能獲得一致的主張；他說他能夠舉出憲法會議最近發生的一件事作為說明；可是他的朋友們提醒他注意保守機密的法規，阻止他往下說下去。

在會議開始的時候，各代表都有一種默契，主張不修改「邦聯條款」，而制定一種全新的憲法。在這個決定上，他們是超出他們的權限了。大陸會議之所以召集憲法會議，「唯一和明顯的目的，在於修改邦聯條款。」但正如瑪迪遜以後所記載的，各代表「對於他們的國家，具有一種剛毅的信心，」乾脆丟開「邦聯條款」，制定一種新的政府形式。誠如漢密爾頓所說，這是一種革命的步驟。柏哲斯後來也說，這件事如果是拿破崙幹的，便會被人認為是改變了，但我們必須記得，許多州曾訓令他們的代表創立一個足以應付一切危機的聯合。

在敘述憲法會議工作的時候，我們必須着重當時幾點重要的考慮。代表們認識必須組成一個複雜的機構，認識簡單的政府是不夠的。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必須謹慎地調和兩種不同的權力：一種是

十三年半獨立州所已經實行的地方管制權，一種是新成立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這種工作，只有不列顛帝國的歷史上纔有先例。在一七六三年以前，不列顛帝國有一種聯邦制度，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在這以前，其他聯邦在區域上是狹小的；在聯繫上是鬆弛的；他們很少能夠維持長久。瑪迪遜和另外幾個人曾經詳細研究過政府的理論，特別研究希臘，瑞士和荷蘭的聯邦制度，其餘大多數人則詳讀政治思想的典籍。結果他們採用的原則是，中央政府的「能」和「權」必須審慎地規定，而其餘一切的「能」和「權」則一概屬諸各州。中央的主權是新的，一般的和包括的權力，故必須予以列舉。

最後的工作

在建設全國性機構的工作上，也有一般的原則。大家都默認政府必須分成三個不同的部門，每一部門與其他的部門平等而互相配合着。這三個部門便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配合着，連結着，一方面使它們能夠和協地工作，一方面又能夠互相平衡，使沒有一種勢力足以控制其他部門。這種十八世紀的平權思想，便是一種牛頓派的政治概念。這原則自然是發源於殖民的經驗，並受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著作所強化——洛孟的學說是大多數代表所熟識的。美國人對於一個暴虐政府所下的定義，是一個政府其中單獨一個分子獲得支配的地位。它還假定立法部門，像殖民地議會和英國的國會，應該包含兩院。

組織兩院制國會的決議，使憲法會議中關於大州和小州權力問題的基本糾紛容易解決。各小州主

張像在邦聯之下一樣，他們得與各姊妹大州平等；小州康涅狄格不能受大州紐約所欺侮，小州馬里蘭不能受大州弗吉尼亞所凌虐。各大州則主張，權力應以州的大小，人口和財富為比例。

最後所採納的妥協辦法，是小的州份在參議院中與大的州份有相等的代表，但在下議院中，議席便以州的人口多少為根據。當討論到行政部門的時候，最困難的便是決定選舉的方式。總統應該由國會選舉嗎？那會使他必須依靠着立法部門，這樣便破壞了平權的原則。他應該由人民普選嗎？美國的人民分散在一個廣袤的地區上，交通是那樣的不方便，不易集中在一個或少數幾個的候選人身上；故必有許多許多的人被選，結果必致沒有一個人能夠獲得大多數的選票。所以最後決定，成立各州選舉代表團 (Electoral College)，每州選舉人人數，等於它的參議員和下議員人數之和。這種制度後來的實施情形，完全與創始人的原意不同，因為他們當時沒有料到跟着發生的政黨政治。關於司法部門的聯邦法院，法官由總統得參議院的勸告和核准而委派，在行為良好的情形下得為終身制。

美國憲法起草人的創造力和智慧，實在值得我們讚佩。他們創立了人類所能計劃的最複雜的政府，這個政府同時還是最平衡而最有保障的。政府三部門的每一部門，都是獨立而並列的，但每一部門都受其他部門所牽制。國會制法在未經總統批准以前不能成為法律；同樣的，總統任命許多官員和簽訂一切條約，必須提交參院，這樣國會能夠予以彈劾和撤銷。司法部門有權審理在法律和憲法下所發生的一切案件，故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法令。但法院是由總統任命經參院批准的，所以國會也能夠彈劾法院。參議員既為各州議會選舉而任期六年，總統既為各州代表團所選出，而法官既為

總統所任命，故政府的各部分，除受國會下院的壓力外，不受其他公衆的直接壓力。更有進者，政府官吏的任期自二年至終身不等，故除革命外不能作人事的全部變更。

憲法會議所作的決定，用以確定聯邦政府力足以維持秩序和保護財產者，在其他情況之下，可能是危險的爆炸物。但大多數是在簡短而鎮靜的辯論後採取的。聯邦政府有權抽稅，使它能够清還債務，恢復信用，籌款辦理公共福利事業。聯邦政府能夠借款，規定劃一的稅則，和通過劃一的破產法。它有權造幣，規定度量衡，和授予專利權和版權，成立郵政局和郵路。它有權設立陸海軍。它可以規定州際的商務。它有全權辦理與印第安人關係，國際關係和作戰事務。如果任何州發生「內部暴動」，而其州議會和州長請求援助時，它可實行干涉以恢復該地的秩序。它能夠通過有關歸化外人的法律。它管制着公地，能夠根據新舊絕對平等的基礎，接受新的州份。它可以在一個不逾十方哩大的區設立首都。簡言之，中央政府從開頭起就是強有力的——最高法院對於辦法的解釋，使它更爲有力。這種力量是邦聯羸弱的自然反應。

但各州還是有力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操在它們手裏，而且它們處理人民日常事務的大部分。學校，地方法院，警察，城市的註冊，銀行和股份公司的組織，橋梁，道路和運河的保護——這些和其他許多事務都操在州的手裏。州能夠決定誰該選舉和怎樣選舉。對於自由的保障，州負起主要的責任。許多人民在感覺到他們自己是美國人以前，許久就自認爲喬治亞州人，賓夕法尼亞人或弗吉尼亞州人。

最後憲法會議碰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授予新中央政府的權力應該怎樣實施？老的邦聯在書面上

有很大的權力，雖然它的權力並不充足。但在實際上，它的權力幾乎等於零，為的各州都不重視它。怎樣使新政府不遭遇同樣的障礙和抗拒呢？在開始的時候，大部分代表都只有一個答案——用武力。弗吉尼亞州建議，應授權國會「召集聯盟的武力以對付任何不履行條款義務的州份。」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因為武力乃是國際法上的一種工具。這個建議如果付諸實施，便可成為美國的致命傷，因為它的意義等於內戰。施用武力可以很快地在流血和破壞中折散了聯盟。

這樣怎樣辦好呢？大家正在進行討論的時候，發現了一種新的完滿的權宜辦法，決定不以州為對象，而以州內的人民為對象，那就是施行法律於全國的居民，而不管州的政府。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憲法會議召集最後一次會。到會的代表，只有三人拒絕簽字，其餘大多數的人都十分高興。老年的佛蘭克林宣稱，他雖然不同意這憲法的全部，但他覺得很驚異，這憲法是這樣的接近十全十美。他央求任何不喜歡它的特點的人稍為懷疑自己的判斷，接受這一個文件。年青的漢密爾頓也作同樣的呼籲。他雖然曾經希望組織一個更為集權更為貴族化的政府，但他說，一面是無政府和騷動，一面是秩序和進步，一個真正的愛國分子怎樣可以在這兩者之間躊躇呢？代表十二州的代表上前簽字。許多受當時嚴肅的空氣所壓迫，華盛頓也坐着作深沉的思考。但佛蘭克林用談諧的話打破緊張的氣氛。他指着華盛頓坐椅背後繪着的半個太陽，說匠工往往難於分辨朝陽和落日的區別。「在開會的時候，我常常望着那隻椅背後的太陽，不能斷定它是初昇的還是降落的；但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我很高興知道那是朝陽而不是落日。」

批准

可是各州會批准這新憲法嗎？在許多老百姓看起來，新憲法好像充滿着危險，他們深恐有力的中央政府會壓迫他們，徵收重稅，把他們捲入對外的戰爭。憲法會議已經議決，憲法經十三州中的九州批准後即發生效力。在一七八七年年終之前，特拉華，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三州已經批准，但其餘六州是否批准還是問題，使這新憲法的起草人極爲焦慮。

憲法批准問題的鬥爭，產生了兩個黨派，聯邦派和反聯邦派——前者贊成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後者只希望組織一個州際聯盟。他們在報章，議會和州的集會上鬥爭。雙方互作激昂的辯論，其中最有力的是「聯邦派論文」，是漢密爾頓，瑪迪遜和約翰傑諸人所寫以擁護新憲法的，這些後來成爲政治學不朽之作。鬥爭得最厲害的三州是馬薩諸塞，紐約和弗吉尼亞。在馬薩諸塞，波士頓城的船匠，五金工人和其他技工的強有力的擁護，增強了律師，商人和大部分農民的力量，把憲法爭成功了。在紐約，雄辯的漢密爾頓最後說服了主要的反對派辯論家，擊潰了反對的力量，以相當大多數通過批准憲法。在弗吉尼亞，華盛頓的影響（那是隨處都有力量的）和瑪迪遜的雄辯也戰勝了。到了弗吉尼亞最後通過的時候，即就是說九個州已經批准了，故政府確實是生效的了；但華盛頓的本州的全力擁護是少不得的，其通過受到劇烈的慶祝。

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費城舉行大遊行，慶祝接受新的政府形式。同時準備選舉總統和國會，使新政府可在一七八九年春季成立。對於國家的新元首，大家肚子裏都藏着一個名字，於是華盛頓被

一致推舉爲總統。

這樣，在近年悲愁的時期之後，接着就是佛蘭克林所說光明的初昇太陽。美國初期歷史中，有一段愉快的插曲，那便是華盛頓自其波多瑪克河邊的美麗田莊到紐約就職的一段旅程。他在四月中起程，那時春光已經滿佈弗吉尼亞的山頭。他向北前進的路，有些地方很接近他一七八一年攻陷康華利斯時所採的路線。每個小村每個城市的人民，萬人空巷出來向他熱烈歡呼。在費城有騎兵遊行，他騎着馬經過許多花草樹枝所築成的勝利牌坊。他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到達特林頓。十二年前他曾在此處於風雪黑夜中渡過結冰的特拉華河，完成他在軍事上最聞名的勝利。在這裏，有一羣穿白衣的女郎在他面前擲花，並且合唱一首短詩。在紐約灣的岸上，他被護送登一隻由十三個穿白制服的人駕駛的美麗畫舫，當他靠近城的時候，十三門大砲齊鳴致敬；他登岸以後，發見全城擁滿着高興的人羣，裏面還有許多是革命元老。四月三十日，他對着擁擠的人羣，站在華爾街聯邦會堂的陽台上宣誓就職。當時監誓人是紐約的大法官，他於監視後轉向會衆高呼：「合衆國總統華盛頓萬歲！」跟着下面發出如雷的呼聲。

一七八九年的美國

此時準備開始直奔前程的是一個強壯的共和國。華盛頓就職後一年，曾舉行過一次人口調查，結果是美國人口將近四百萬，其中約三百五十萬是白種人。這四百萬人口，可說幾乎全部是屬於農村的。當時只有五個名副其實的城市：費城人口四萬二千，紐約三萬三千，波士頓一萬八千，查斯頓

一萬六千，巴的摩爾一萬三千。人口的大部分住居於農場和小村。交通惡劣遲滯，道路不良。驛車不舒適，帆船也不一定有。但築路公司開始組織（不久費城與蘭卡斯特間築成一條示範路），不久也開鑿運河。大部分人民過着比較孤立隔絕的生活，他們的學校不良，書籍缺乏，報紙也是鳳毛麟角。歐洲人對美國的印象是在獨立，物質的福利，和無窮的自信力之外，還附有粗糙，不舒適，魯莽的態度，和淺薄的文化。但無論就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言，它的情形是日漸改進的。

這個國家漸漸堅強起來。由舊世界移入的人口是那麼的多，使美國人有時認為半個西歐在向美國流注。好的田地可用很少的代價買得；工人極為需要，所以用高價雇用工人。政府對這種移民採取鼓勵態度，華盛頓特別喜歡由英國移入專家農民教美國人更好的耕種方法。上紐約的摩霍克河和金尼西河流域，上賓夕法尼亞的薩斯基漢那河流域，弗吉尼亞的森納多亞河流域——這一片肥饒土地，不久變成爲產麥的大區域。新英格蘭人和賓夕法尼亞人向俄亥俄遷移，弗吉尼亞人和加羅林納人也搬入肯達基和田納西。

製造業漸漸興起，各州也用津貼的辦法以示鼓勵。但到了這個時期，美國城市中還沒有人以全部時間從事工廠工作。的確，大部分製造業還是家庭工業的性質。農民可在冬季的長夜中製造粗布，皮件，陶器，簡單的鐵器，糖，和木質的器械等等。

航業開始發達。大批船隻製造出來，用作沿岸貿易，捕鯊魚和鯨魚，運麵粉、烟草、木材和其他貨品到歐洲。當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一隻船叫「皇后號」（*Empress*）的駛到廣州，然後帶回東方貿易可能性的消息，這使新英格蘭人大爲衝動，一種新的商業於是勃興起來。很敏捷的，一

七八七年便有五隻船掛着星條旗到中國去。東方人是渴望得到皮貨的，故有些波士頓商家決定派船到西北海岸，向印第安人收購皮貨，輸到中國去，然後由中國運回茶葉和蠶絲。這新計劃後來證明是成功的。

美國人精力展望的動向，主要是向西——常常是向西的。自俄亥俄的橡林開拓地至喬治亞的松林中的空地，邊陲森林人民斧伐之聲，變成西進大軍的鑿鼓。移民者的車輛，爬上阿里芬尼斯山綿長的山坡；穿鹿皮的獵戶和拓荒者，帶着一車車的傢具，種籽，簡單的農具和家畜，穿過康伯蘭峽谷進入肯達基。邊陲的農戶在高低不平的開拓地上，建築他們的木屋，以泥土塗補木頭的罅隙，以橡木薄板做屋頂。一年一年地，俄亥俄河和密士失必河上，有更多的美國人的木筏和平底船，載着穀類，鹹肉和炭酸。浮流到新奧良斯。一年一年地，西部的城市——如俄亥俄河上的辛辛那提，田納西中心的諾克斯維爾，和肯達基的萊辛頓——變得更為重要了。他們必須面對着印第安人的戰爭，瘧病，野獸，邊陲的流寇和其他種種的險阻。辛苦，貧窮和疾病，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可是還有整萬條移民組織的小河流入到荒漠去，邊疆的界線還是向前推進，百家利主教在殖民時期所說的話——「帝國採取西進路線」——還是適合潮流。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華盛頓組織政府

到了一七八九年，紐約繁盛異常，臨時成爲一個首都。它的最好的屋宇，修築得極爲華麗。那個夏天，紐約街道上擁擠着國會議員，有希望做官的人物，運動議員通過議案者和旁聽者。最初華盛頓總統在城郊佛蘭克林廣場找到一間住宅，後來下白老匯的麥克孔大廈，有一個富麗的客廳。副總統亞丹斯在里士滿山佔了一座大房子。國會是設在華爾街和布洛德街的聯邦會堂——那就是說美國政治的首都第一次却設在它後來的經濟首都的所在地。盛大的招待會和跳舞會都應運而生。總統常開筵筵，隆重非常，有時又偕友到約翰街觀劇。他出席國會時，儀仗音樂，俱適其分。他乘的是一輛乳白色轎車，由六匹弗吉尼亞產的白馬拖着，前擁後衛，應有盡有。一般人民不得旁聽國會辯論，但外面却擠滿着人，議論着國家大事。

華盛頓的賢明領導，實在是這新政府不可或缺。在政治上他並不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精明的倡導者；他筆下生硬，口才不好；他對於行政原理也不甚了了。但是他不僅能使大家服從，而且能令人肅然起敬。他發揮團結的觀念，爲任何人所不及。任何黨派的負責人物都對他的公正不阿，胸懷寬大，賢明睿智，都能深信不疑。他的「共和法庭」總是那樣莊嚴不苟。他每次接待賓客，總是穿上

絲絨青緞禮服，扣着鑲有金鋼鑽的裹腿；他的修整的長髮用絲帶觸着，右臂下挾着軍帽，腰間掛着裝入綠鞘的佩劍。他和國會以及行政官員相處，超然於黨派關係之上，凜然以國家爲念——雖然他對聯邦派比較同情。他勤勞過人，每天辦公時間極長，規定嚴格，絲毫不苟。他使政府朝氣蓬勃，全國朝夕警惕。他給全國的名言就是他後來在一七九六年「臨別演說」中所說的：「要團結——要做美國人。」

這一年八月國會休會，決定十二月間再在費城復會——原來費城那時很清潔，恬靜，社交和易，做了此後十年的首都。同時國事紛繁，許多地方還有待奠定常軌。

政府的組織實在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國會在匆匆中創設了一個國務院，一個陸軍部，一個財政部。華盛頓任命傑斐遜主持國務院，此時傑氏剛從駐法公使任所返美；任命諾克斯主持陸軍部，諾氏是一位中庸但頗有人緣的將軍；任命富有理財知識的漢密爾頓主持財政部。國會又設立一個檢察長辦公處，華盛頓便任命蘭道夫主持其事。漢密爾頓和諾克斯當時是以傾向聯邦派聞名的，傑斐遜和蘭道夫則具有反聯邦派主張。同時國會動議創設一種聯邦司法制度，其後不但設立一個最高法院，由一位最高法官和五位助理法官主持之（這個數目後來增加了），而且成立了三個巡迴法庭和十三個地方法院。所有法官都和聯邦行政機關的首長一樣，由總統任命，經參院批准。到了一七九〇年底，這最初三個全國性的機關和全國性的法院，都有了很多的職員，從事艱辛的工作。

政黨政治此時已略露端倪——雖然許多美國人都在夢想着一個不受政爭沾染的共和國！最初的一個表現，是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鬥爭。有幾州當初接受這部國家大法，是保留着許多修改的意見。

急於要提出來。最初國會對於這些建議好像不願怎樣十分注意。後來亨利 (Patrick Henry) 和一些別人大聲疾呼，使它不得不注意，於是國會將他們的建議交付給一個委員會。結果，國會多數派預棄了一切改變政府機構的提議，而送致給各州當局十二個補充條款，在性質等於一個人權法案。這些人權保障中間有十個批准通過了。可是反聯邦派認為不應有所保留，非常氣憤，大肆抗議，要求全部批准。但是到了這時，原來聯邦派和反聯邦派的分野，已經漸漸消滅，因為憲法已成爲永久法典。不久新的爭執繼之而起。聯邦派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爲新興商業資本家所支持，而反聯邦派則擁護各州利益，趨重農本主義。性質業已變更，新的領導漸露頭角了。

革命的美國產生了兩個震驚世界的風雲人物，華盛頓和佛蘭克林；青年的共和國成立之後，又出現了兩個名聞寰宇的英傑——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但是使他們名垂久遠的倒不是這兩個個人傑出的天才，而是他們兩人代表了美國人生活中兩種有力的，不可缺少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敵對的——傾向：漢密爾頓代表的傾向是一個更密切的團結，一個更強大的中央政府；傑斐遜代表的傾向是一種更自由的民主。在一七九〇與一八三〇年間美國史中最有意義的事實，除了那不可抗拒的向西推進之外，便是國家主義和民主的勝利。

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漢密爾頓生於小安提爾羣島的一個產糖的小島納威斯，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胡根諾特人。成年後完全是一個蘇格蘭型的男子——有雄心、慷慨、忠誠、矜持、容易激怒，也容易原恕，智慮銳

敏，精力過人。他的成功都由於他的精明，有自信的雄心，和他的勤勞。他這些才能很青年時就發揮了。他少時家貧，不能升學。忽然一陣可怕的颶風襲擊安提爾羣島，他便寫了一篇文章描寫當時的情景，很引起各方的注意，於是他的姑母便資送他到美國。他入了紐約的英王書院，在那裏他結識了當地許多領導叛變推翻主權的志士。他滿十八歲時，連續寫了兩本小冊子，對於當地貴族首要攻擊甚力。二十歲任砲兵連連長，他帶着藏書在兵營中研讀，深夜不寐。

漢密爾頓除有雄才大略外，還有許多其他特質也是助他成功的要素。他的儀表極其動人。赭褐色頭髮，櫻黃閃爍的一雙眼睛，前額開闊，口和下沫流露着堅毅，真是出色的美男子。他的面孔總是興奮着，談笑風生；工作時嚴肅而深思。他喜歡富有風趣的宴會，只要有美酒佳肴，高朋滿座，他總是興致勃發，談吐不絕。他有隨機應變的才能，善於在適當的時機做出適當的事業。這種才能使他成功為紐約愛國派的領袖，使他獲得華盛頓的賞識，拔擢他為左右手，使他領導着約克城的戲劇化的襲擊，使他出任紐約議長，作了華盛頓政府的主要人物，並使他成爲一個大黨的黨魁。他在行政和組織方面的才幹，非常人所及。他的寫作和談吐有令人驚羨的氣魄。但是，他也有顯著的缺點。他易於衝動，不能遏制自己情感，每受刺激輒失於孟浪。在摩茅斯（Mormouth）一役，李查斯所部後退，華盛頓正在斥責他時，漢密爾頓忽然躍下馬來，拔出刺刀意欲動武，並大聲喊道：「我們已被出賣了！」華盛頓用沉着的命令制止了他：「漢密爾頓先生，騎上你的馬！」直到戰爭快結束時，他都和華盛頓爭吵。關於那一次事件，他寫給他的岳父一封極自負的信，而且當華盛頓提出意見彌縫那次的裂痕時，他竟加以拒絕。他的暴躁性格，他的好鬥，他的唐突，使他與人發生

許多不必要的衝突——和傑斐遜衝突，分裂了華盛頓的行政機構，和亞丹斯衝突，分裂了聯邦派，和阿龍·勃爾（Aaron Burs）衝突，以致後來在決鬥中結果了他自己的生命。

不過，漢密爾頓致力國事的基調，是他愛好效率，秩序和組織，還有那種不可遏止的衝動，給了這青年的國家以他永不可忘的勞績。從一七七五到一七八九年，他眼見周遭充滿缺乏效率和軟弱的現象。他澈底查出後來這些現象所致成的混亂。他任華盛頓祕書時，這位統帥所做的許多事都是由他一手承辦的。我們只要瀏覽一下革命時期華盛頓的手札，就不難看出他因為政府的脆弱而感到如何氣餒。他氣餒，因為各州不肯以充分的兵員接濟他，它們不以充足的軍火、被服、金錢供應他，一部分地方踴躍輸將，其他各地則觀望不前。他爲了軍隊缺乏紀律而氣餒，因為那些來自各地的新兵散漫零亂，劫掠民財；稍有藉口便收拾行李回家去了。所有這些困難，漢密爾頓都與華盛頓分擔。在那黑暗的邦聯時代中，漢密爾頓是和紐約商業團體最接近的人物，他們鑒於商業發生障礙，財產陷於不安狀態，因而發生的焦慮，他是深深諳知的。他所讀的書，使他對於國家正當性質的認識，獲有一種歐洲式而非美洲式的觀念，而且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以為英國式的政府是最可羨慕的。由此可見，他對於政府中的效率和活力——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爲什麼那樣嚮往了。

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論到傑斐遜，便等於從一個行動的人論到一個思想的人。漢密爾頓的才幹在於執行方面，傑斐遜

的才幹在於深思熟慮和哲學方面。漢密爾頓喜歡建立起強有力的機構，看着它有效地運轉；傑斐遜則喜歡人民大眾，看着他們便感到滿足，不管有效與否。他在弗吉尼亞州長任內行政缺乏效率，後人傳說容有言過其實之處，不過他辭去該職時，的確不是載譽而歸，而且他也不算是效能特別高的國務卿。但是作爲一個政治思想家和著作家，在他那一個時代却是舉世無匹的。當別人請他提示將來在他的墓碑上鐫些什麼話時，他主張不要臚列他生前的職務，而只標出他對思想上的三大貢獻。那個碑文是：

這裏埋葬着傑斐遜——

他是美國獨立宣言和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傑斐遜是在那種弗吉尼亞的輕鬆，閒散，放蕩不羈的知識氛圍中教養起來的。青年時代，他縱情歌舞。他喜歡騎馬，玩賞曠野生活，彈奏小提琴。他酷愛小說，尤其是斐爾丁，斯摩萊特，和斯特恩的作品，對於歐希安的更是愛不釋手。他後來的生活，充滿與大自然，書籍和人羣的接觸，愈增加了他淵博的知識。他諳通六種文字，精於學術，測量，機械，音樂，建築，法律和政治。他收集了一個大圖書館，並藏有極多版本。他的著作涉及植物，動物，歷史，政治和教育——而且都具有創見。他在蒙第雪羅的著名居宅和弗吉尼亞大學內許多美麗樓房都是他親自設計的。他喜歡縱談深奧，複雜，多方面的問題，是當時一個最健談的人。這位蒙第雪羅的聖人，常常約集五十個朋友高談闊論，深夜不倦。他對於一個有學識的黑人熱誠有禮，和對一個歐洲的貴冑並無二致。他一生酷愛自由，惆悵，多方接觸。

在政治上，傑斐遜的本能與漢密爾頓的恰恰相反，而他的學養更將他的本能發揮盡致。在很多年中，他完全獻身於故鄉弗吉尼亞，初是該州的議會領袖，後任州長。在這初期，他毫不體會那些煩擾着華盛頓和其他大陸領袖的憂慮。在另一方面，他却明顯地看清各州應付一切要求，是如何困難。他出使法國時，法政府向他催索貸與美國的債款，那時他確意識到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的重要價值，但他在其他許多理由上却不願意見其強大有力。他坦白聲明：「我不是一個很大政府的朋友。」他甚至說過，那脆弱的「邦聯條款」倒是「一個了不得完美的工具。」他怕的是一個強有力政府會桎梏人民。他爲了從英王統治下爭取自由，從教會統治下爭取自由，從地主的貴族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財富的不平等之下爭取自由，而戰鬥不懈。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他不喜歡城市，大工業集團，大銀行和商業——認爲這些東西都促成不平等。雖然晚年他也承認工業化是使美國經濟獨立的必要措置，然而他依然相信，美國如果能夠保持農家國家的本色，那才是最快樂不過的了。

漢密爾頓的偉大目的是給美國一個更有效的組織；傑斐遜的偉大目的却是給每一個人以更廣泛的自由。這兩種影響都是美國所需要的。美國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全國政府，也需要不使普通民衆受到桎梏。倘若美國只有漢密爾頓，或只有傑斐遜，這個國家所受的災難必然很大。美國居然兩人都有的，而且能在適當的時機將他的特殊信條糅雜起來，互相發明，這實在是美國的大幸。

漢密爾頓的財政措施

漢密爾頓做了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後，實施了若干理財方案，以至使他成爲美國史上最偉大的財長。他的方案不但規模浩大，而且富於創造性。原來在獨立戰爭期內國債累積到五千六百萬元。許多人主張這筆國債應該一筆勾銷，或只還一部分。漢密爾頓不顧一切反對，實行一種方案將全部清還。他並且實施一種計劃，使聯邦政府接收了各州爲資助革命應付未付的債款，數值一千八百萬元。他設置了一個合衆國銀行，大體仿照倫敦銀行。他設立了一個國家造幣廠。他著了一本馳名的「實業報告」，主張徵收相當數額的關稅，藉以發展民族工業。國會後來通過了一種關稅，雖然稅率很低，確實幫助了美國實業的發展。最後，漢密爾頓實施法律，開征一種課於所有釀製品的國產稅。

這些措施立即發生作用，其方面有三。它們奠定了全國政府的信用基礎，並予以所需用的收入。它們鼓舞了工商業。而最重要的是，它們使每一州最有力的人士附合於全國政府。國債之清償和州債之承擔，使着那些持有大陸和各州債券的無數人民屬望新政府還錢。藉新關稅以求繁榮的實業家也惟政府的馬首是瞻。國家銀行得到了有錢人的得力支援，因爲它使金融交易更加便利和安全。國產稅不僅供給政府收入，而且因爲它在當地征收之故，乃使一般普通公民親身感到聯邦政府的權威。總而言之，漢密爾頓的政策產生了一種資產階級的強固陣容，抵抗一切削弱它的企圖，並且使聯邦政府在民間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憲法的解釋：「含蓄的權力」

不僅如此，漢密爾頓的措施在憲法上需要一種異常重要的新的解釋。當他提出設立國家銀行的計劃時——代表所有擁護各州權利，反對國家權利的人，並代表那些懼怕大公司和金錢勢力的人們發言——都起而反對。他致函華盛頓力辯其非。他聲明說：憲法中明白列舉了賦與政府的權力，將一切其他權力保留給各州，而其中沒有一條規定聯邦政府可以設立銀行。這個道理似乎很健全。華盛頓幾乎要否決這個案子了。但是漢密爾頓提出另一種更動人的意見。他指出聯邦政府所有的權力不能以具體字句一一列舉，因為那樣便會累贅不堪。有大量的權力是含蓄在一般條款之中的，而其中之一，便是授權國會「制定一切必要和正當的法律，」以便實行授與它的權力。漢密爾頓在宣讀此條款時，強調「正當的」這個字。例如在憲法所授與的戰爭大權下，政府顯然有權征服領土。於是它使正當地獲有「派生的權力」來管轄這塊領土，即使憲法中並無一字提到。憲法中又說政府應該規定商務和航運，於是它就獲有「派生的權力」來建立燈塔。好了，憲法宣布聯邦政府應有權征稅，償債，借款。一個國家銀行對於收稅，放款到遠處付帳，以及借款，都會有極大便利。因此之故，它可以在「含蓄的權力」之下設立國家銀行。華盛頓終於接受這種論旨，簽署了漢密爾頓的提案。

威士忌叛亂；約翰傑條約

傑斐遜認為漢密爾頓在一七九一年制定的國產稅法是「使人憎惡的」，並致函華盛頓說，那也是「不智之舉，因為它使「政府在最易發生反抗而且最難實行強制的地方不得不行使其威權。」他這話

主要指西部賓夕法尼亞州而言。這個地方到處都是頑強的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無法將五穀運過重山，然後東運到市場上去；他們需要金錢；而且他們精於蘇格蘭的威士忌酒釀造術，幾乎在每個農場上設有提煉場，製造這種易於運輸的商品。國產稅對於這種生財之道，似乎最爲不利，而且緝查非常嚴密。皮次堡南邊一區有四個郡不久便由激怒的領袖領導起公開的反抗。華盛頓頒發一道警告的命令，但他們未予理會。一七九四年，當政府要逮捕那些抗拒征收的人員時，暴動便發作了。亂民趕走了一個聯邦政府的視察員，並威嚇皮次堡的少數駐軍。州長本來可以發動民團的，可是恐怕得罪西部的選民，沒有這樣做。

於是華盛頓在漢密爾頓的積極建議之下，決定採取嚴酷手段。這一次「叛亂」原不過一種烏合之衆的示威而已，如有一千軍隊即可救平，但是漢密爾頓很想藉此機會顯示政府的壓倒力量。當局從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賓夕法尼亞調集了一萬五千人。大軍開到叛亂地區後，立刻鎮壓了當地的不滿。漢密爾頓隨軍前往，着將十八個人押到費城受審。不過判罪的只有兩人，而且後來由華盛頓赦免了。

這一次「威士忌叛亂」造成了很大的激動，聯邦派人物稱讚政府的嚴厲措置，反聯邦派人物斥責這些舉動爲專橫黷武。毫無問題，漢密爾頓的政策提高了聯邦政權的聲勢，但是它引起了許多民間的怨恨和疑忌，也是毫無疑問的一種錯誤。不久，傑斐遜派執政，國產稅即完全廢止了。

華盛頓在處理外交的路線上，也同樣不孚衆望。一七九三年法英之間在歐洲啓釁，美國方面反感很強烈。商人階級懼恨參半，因爲那個共和國變革了財產關係；南方的農民和城市的技工則同情法

國人。華盛頓聰明地宣布中立。這件事招致了暴躁的法國駐美公使日納（Genet）猛烈抨擊。他認為他可以不顧這種中立。他向法政府報告，說華盛頓是英國影響下一個昏庸老朽的人，他揚言要訴諸美國公衆。後來美國政府禁止他利用美國口岸爲法國武裝民船截擊英船的根據地，他竟置若罔聞。華盛頓非常憤怒，向法政府質問：「他蔑視美政府法令，是否免罪？」日納乃奉召返國。他知道他若返國，必致死刑，就索性留在美國，娶了紐約州長的女兒爲妻，直到晚年都很受用。他的孟浪行爲，頗使美國的親法派感覺困苦。不過，這一派人在一七九四年間開始要求對英作戰，理由是英國非法拘捕美國開往法屬西印度的船隻，而且公然違反一七八三年的條約，在西北領土霸佔通商據點。那時的情形，美國若再發生戰爭，真是再危險沒有的了。華盛頓爲與英國解決各種複雜的懸案，乃派當時已任最高法官的幹練外交家約翰傑（John Jay）爲全權代表到倫敦交涉。約翰傑相信「一點善良的聰明在政治上常常比許多欺詐的伎倆收穫大得多。」他向英政府一面折衝一面開導，終於締結了一個條約，使美國得到它正當希望的一切。這就是說，他使英國在兩年內放棄西北領土的據點；美國要求賠償被英船劫掠的損失，交付一個委員會辦理。此外英國並允許美國在英國東印度和西印度有重要的商業特權。但是這個條約傳至美國後，羣情鼎沸，極表不滿。憤激的民衆將約翰傑的肖像拿來焚燒；忿怒的演說家和編輯猛烈抨擊華盛頓。但是華盛頓和約翰傑，都很聰明豁達，未受這種暫時的輿情所動搖。參議院後來附上幾條修正通過了這個條約。商人和船主再度以理智和感激的心情支持聯邦政府。

約翰·亞丹斯 (John Adams)

華盛頓卸職後，約翰·亞丹斯繼起執政。亞丹斯的能力和魄力都很大，但爲人嚴峻，固執，充滿主見。他那種任性和不講求手段的作風註定要使他的總統任內杌隉不安。他不大接受漢密爾頓的勸告，在出任總統以前就時常和他爭執。職是之故，爲他後盾的黨發生分裂，他身邊的內閣也發生分裂——因爲各部首長在黨的問題上都取決於漢密爾頓的意見。許多南方人因他是新英格蘭人而不喜歡他，於是黨見愈深。同時，國際風雲也較前更爲險惡。

這一回戰爭的威脅是美法之間的。法蘭西共和國元首對於約翰 條約很怨憤，拒絕亞丹斯派赴法國的公使，甚至以拘捕相威脅。這種污辱的舉動引起美國人強烈的反感。亞丹斯派了三個代表到巴黎，試圖解決糾紛，法政府極盡輕蔑的能事。法國外交部長塔里蘭根本拒絕和他們交涉。有幾個秘密人物，後來被美國代表稱之爲XYZ等人，暗示如果他們肯出二十五萬元的賄賂，也許可以做點事。最後塔里蘭致美方一件措詞粗劣的污辱文牒，責難美國訛詐，簡直使談判決裂。不久關於這番交涉的往來文件（世稱「XYZ 文件」）發表出來，美國輿論憤不可遏。於是徵召陸軍，加強海軍，在一七九八年爆發了一串的海戰，每次戰役美國艦隻都擊敗法國。公開的戰爭一時殆不可免。在千鈞一髮之際，亞丹斯的嚴峻的個性對國家貢獻很大。他完全不顧主戰的漢密爾頓如何進言，突然派一位新的公使到法國。而拿破崙（這時已經執政）竟優禮相待。戰爭的危險立即消逝。所不幸者，在內政方面，亞丹斯這時的作風過於偏狹唐突，美國人民終覺不可寬恕。他本人和聯邦派佔

優勢的國會負責制定四項法律，益發損及政府的威信。第一項規定外僑改入美籍以前必須在美國居住的期間，由五年延長至十四年。第二項授權總統在兩年期間內可以下令驅逐任何危險的外僑出境。第三項規定在戰爭時總統得下令驅逐或拘捕外僑。第四項規定圖謀反對政府任何合法措施或妨礙甚至批評政府官吏者，皆為重大犯罪行為。

這些取締外僑和叛逆的法律，實在專權得可怕，簡直是對人權和民權的嚴重摧殘。這時認為聯邦派已在中央政府舞弄大權的傑斐遜和瑪迪遜，堅決起而反對。他們起草了兩套決議，其中傑斐遜的草案得到肯達基州議會的通過，瑪迪遜的草案得到弗吉尼亞州議會的通過。肯達基與弗吉尼亞的這些決議案所標榜的理論，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各州間共同的結合上，從而宣言任何一州皆可採取步驟否決一種違憲的法律。

一八〇〇年全國到達了變革的前夕。那實在是一個偉大政治變革的年代，在華盛頓與亞丹斯執政下，聯邦派在建立政府並使之強大有功這一點上，盡力甚大。一七八九年還有很多人懷疑這個國家和它的憲法能否生存下去，到一八〇〇年無復有人如此懷疑了。但是聯邦派沒有承認美國政府的意義基本上應該是屬於人民的這種本質。他們採取的政策，將許多控制權和利益給了特殊階級。生來便是一個人民領袖才具的傑斐遜，很切實地得到了小農，技術工人，店員和其他勞動者廣大羣衆為其後盾。他們都指望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民的政府，而不是特殊階級的政府，而且他們奮力求其實現。一八〇〇年大選中，亞丹斯在新英格蘭獲得全勝，但其反對派在南部諸州所向無敵，在中部各州也操得大多數。笨拙的選舉制度，使傑斐遜竟與阿龍·勃爾（一位同黨中風頭很健但缺乏原則的

紐約人）相持不下。可是衆意所歸，顯然欲使傑斐遜爲下屆總統，而且漢密爾頓扞衛大局，竟使衆議院決議贊成了傑斐遜，這也是漢密爾頓生平事業得以成功的優美品質之一。

第七章 全國統一

傑斐遜政府

一八〇一年傑斐遜出任總統時的情景，可以證明民主已經當權。當時華盛頓剛剛定都，他的就職大典是新都的第一次。當時那裏還是波多瑪克河北岸一個森林中的村落，在灌木叢中填平池沼修起的道路，泥濘不堪。村中只有幾座低矮的房子，大都是狹小黯淡的茅屋。傑斐遜就職時，和平時一樣漫不經心，披着外衣，從他下榻的客棧中走到新的國會，後面跟着一些朋友。他走進參議院時，和副總統阿龍·勃爾握了握手。還有一位他所不信任的人佇立在旁邊，是弗吉尼亞人約翰·馬歇爾——不久以前由亞丹斯任命的最高法官。傑斐遜宣誓之後，安詳地發表了一篇以前各總統就職時從未有過的最精采的演說。

傑斐遜演說中一部分是當時迫切需要的化除成見的呼籲。這時的政治環境是如此的險惡，激越，甚至有許多人，特別是在新英格蘭方面，相信傑斐遜是一個無神論者，極端平等論者，以至無政府主義者。他籲請全國人民記住政治壓迫是和宗教壓迫一樣惡劣，凡是美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維護這個聯盟，使代議制政府發揮效能，開發全國的富源。演說中其餘部分則為新政府的大政方針。他說，這個國家應該有一個「一個賢明而清廉的政府，」它應該保持民間的秩序，但「必須讓他們在其他

方面自由發展其勤勞，求取進步，不可從勞動者口中奪取他們辛苦賺來的麵包。「它應該保持各州的權利。它應該與一切國家和睦相處，但「不與任何國家成立糾纏不清的同盟」——這句話成了不朽的名言。傑斐遜許諾發揚聯邦「全部憲法的活力」，保持「民政當局對軍事當局的優勢」，並且支持人民選舉，認為這是除革命以外的唯一仲裁方式。

傑斐遜蟬聯兩任總統，在全國範圍內大大促進了民主的程序。他將華盛頓時代環繞在總統周圍的貴族積習澈底取消。每星期一次的覲見禮廢止了，各種朝廷的繁文褥節都經刪除，像「閣下」之類的稱呼取消了。在傑斐遜看來，最平凡的公民是和最高的官吏同樣值得尊敬。他教誨他的部屬，將自己簡直看成人民的受託者。他鼓勵農業，促進人們購買印第安人的地權實行耕植，並且幫助他們向西移殖。他相信美國應該作為被壓迫者的避難所，因此用一種寬大的國籍法鼓勵外來的移民。他極力與各國保持和平，因為戰爭會致成政府更多活動，更多的捐稅，更少的自由。他任命一位在瑞士生長的有遠見的理財家喀拉丁為財政部長，鼓勵他節縮開支，償清國債；結果，一八〇六年國家收入為一四、五〇〇、〇〇〇元，支出為八、五〇〇、〇〇〇元，餘額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了一八〇七年善於節約的喀拉丁已把國債減少到七百萬元以下了。傑斐遜式的作風瀰漫全國，萬民歡騰。各州相繼取消投票和任職的財產限制，通過許多關於債務人和罪犯的合乎人道的法律。

然而命運支配着傑斐遜和美國走到一個他始料所不及的方向。在兩大步驟之後，這位主張法應有「嚴格結構」的人，將聯邦政府的權力伸張到最大限度；到他卸職時，他所憎惡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

路易斯安那的收購；阿龍·勃爾的陰謀

他的兩大步驟之一使全國土地增大一倍。西班牙在很早以前即佔有密士失必河迤西的地域，連同河口上的新奧良斯商埠在內。傑斐遜上台不久，拿破崙強迫羸弱的西班牙將一大塊名叫路易斯安那的土地割讓於法國。他這樣做時，美國人都戰慄在恐慌和憤怒中。新奧良斯是美國俄亥俄州的密士失必河流域土產出口必經的口岸。拿破崙的計劃是在美國西部緊接着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地帝國以對抗盎格魯撒克遜在北美洲的支配權。這個計劃威脅着所有內地居留民的通商利益和安全。甚至微弱的西班牙都給西南部增加很大的麻煩。那世界上最強的法國，什麼做不出來呢？

傑斐遜的意見是，如果法國擁有路易斯安那，「從那一剎那起，我們就必須與英國的艦隊和它的國家結合，並且歐洲戰爭的第一聲砲響後，英美聯軍即向新奧良斯進兵。」拿破崙的印象是英美必將動手。他知道在那短短的「亞眠和議」終了後，再和英國作一次戰是無可避免的，而戰端一開，路易斯安那一定不保。此外海地的黑人叛亂，他未能救平，也頗使他沮喪。因此他轉而決定充實國庫，不使英人染指路易斯安那，將該地賣給美國以討好於美國人民。這塊廣袤的土地乃於一八〇三年以一千五百萬元轉讓給美國。傑斐遜收買這塊地方時，幾乎「將憲法伸張到使它破裂的地步，」因為憲法沒有一條授權政府收買外國領土，而且他買時未得國會的同意。

美國經過此番交易，一舉獲得一百萬方英里的土地，連同一個寶貴的新奧良斯口岸。那是一個灰牆粉壁的磚砌的城市，建築在密士失必河的新月形河口上，背後是一望無際的柏林。美國得到了一

片肥美的平原，在八十年間它是世界上最大穀倉之一。它得到了大陸中部河流系統的控制權。四年後，福爾頓發明在哈得孫河上行駛汽船成功，使這些內河航行益發便利經濟。不久各種汽船便充滿西部各河道，載運移民前往墾殖，運回皮毛，糧食、鹹肉、和多樣土產雜貨到市場來。

在第一屆滿時，傑斐遜舉滿全國，口碑載道。路易斯安那顯然是大收穫，商業極爲繁盛，總統又能博得各界的歡心。他的再度當選已操左券。一八〇四年大選時，他果然在一七六票中得到一七二票，除康涅狄格外，每州都選舉他，連新英格蘭都不例外。他以強有力的手腕領導他的全黨，一再採取步驟打擊野心勃勃經常圖謀不軌的副總統阿龍·勃爾。這位詭計多端的紐約人，既無權安插私人於聯邦政府機關中，又在黨中遭受排擠，竟密謀於新英格蘭的最毒辣的聯邦派分子。一八〇四年春，他以聯邦派的名義競選紐約市長，但大部分由於漢密爾頓的反對——他很正確地懷疑阿龍·勃爾圖謀分裂——卒遭慘敗。爲報復起見，毫無原則的阿龍·勃爾，居然挑撥漢密爾頓同他決鬥。這一場決鬥在一個七月清晨黎明時分哈得孫河岸上舉行，結果漢密爾頓不敵喪命。這一位英明受人愛戴的領袖這樣死去，使整個社會陷入悲憤的深淵中。阿龍·勃爾只好悄然逃命。至此，他的聲名在東部卽告破產，可是因爲沒有受到懲罰，他又在西部過着亡命之徒式的冒險生活。

像阿龍·勃爾那樣唯我獨尊的野心家，斷斷不是尋常名利所可鑿足的。他的口號是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於是他擬定計劃，要設立一個由他親自統治的國家。至於這個國家設在何處，怎樣設立，還是爭論不決的問題。後來許多學者考查，他大約想在西部招募一枝小小的軍隊，沿密士失必河南下，攫取新奧良斯，囊括路易斯安那，從美國獨立出來。他曾向一些英國和西班牙的軍官誇示這種

意圖，打算從倫敦和馬德里得到金錢的幫助。他告訴英國人說，他將置這個國家於英國保護之下；他又告訴西班牙人說，他要使之成爲美國與墨西哥間的緩衝國。誰都沒有幫助他。但是也有一些人相信阿龍·勃爾的目的是招募一枝軍隊後，打下墨西哥城，統治該國。事實上他曾向憎恨西班牙的田納西州領袖傑克孫說過這個企圖。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奪取路易斯安那，還是墨西哥，說不定兩者都是他夢想的呢？

無論如何，阿龍·勃爾終於是全盤覆敗了。西南部的魯西斐爾領導的護國團探悉他的陰謀後，在一八〇六年將他舉發。他被捕押到弗吉尼吉的里士滿城以叛國受審。約翰·馬歇爾主持這個案子，因爲證據當然不足，竟宣告他無罪——不過此時他已經聲名狼藉，無法挽救了。

美國的中立：禁運案

傑斐遜第二次發揮聯邦政府大權，是在英國與拿破崙大戰中間維持美國的中立。他知道這年青未成熟的共和國，正需要和平；雖然戰爭已在陸上海上全面爆發，他却希望使美國不捲入這連天的烽火。英國作戰的目的是極力阻止任何一國征服全歐大陸。自然，商戰是它最精良武器之一。英國深知其重要，立即封鎖了拿破崙帝國；拿破崙也頒布柏林與米蘭兩法令封鎖英國以爲報復。在這樣的搏鬥中，雙方給了美國貿易以重大的打擊。英國遮斷了美國船隻從法屬西印度載貨外銷的富庶的航路，並使它們完全不能到達全歐海岸。法國則下令捕捉一切任令英國搜查的或靠近港口的美船。換句話說，戰爭已達到了那樣一個尖端，無論任何美船，不冒被英國搜捕的危險，就不能行駛在法國

所統轄的廣大海面；同時，若與英國通商就會遭法國攔奪。在這種情形之下，商務等於停頓。英政府還相當嚴格，法國是有一點藉口便隨便沒收美國船隻。

特別引起美國對英反感的，是徵發問題。英國爲制勝計，被迫擴充海軍到極大限度，戰船達七百艘以上，海員官兵近十五萬衆。這個強大的海軍使英國高枕無憂，商務通暢，與殖民地間的交通維持不輟。這是英國生死所繫的關鍵。不過，艦隊兵士的薪俸太低，飲食惡劣，待遇不好，用自由投軍的辦法不能徵得船員。許多海員中途逃脫，他們特別喜歡逃到美國人的船上，比較快活安全。情況如此，英國軍官便認爲搜查美國船隻帶走英國臣民是他們一種重要權利。他們不許英人加入美籍，美國對這種要求根本反對。使美國船舶靠在英國一艘巡洋艦的大砲下面，由英國一個尉官喝令美船上的水手站成一排，審問他們，這種情景確使美國人感覺羞辱。不但如此，許多英國軍官非常傲慢不講道理，他們強徵了成千成百的美國海員。

爲了不用戰爭而使英法改取比較合理的態度起見，傑斐遜終於促使國會通過禁運案，就是完全禁止對外貿易的一種法律。這是一個可怕的試驗。首先，航業方面就要弄得不可收拾，新英格蘭和紐約的不滿特別強烈。然後農業方面也開始感到嚴重的影響，因爲南部和西部的農民無法向海外運銷他們剩餘的糧食、肉類、和菸草，物價一落千丈。觀察家曾將這一措置，比做外科醫生爲保全一條生命而斷去一條腿。在一年之間，美國的出口貿易跌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是，藉禁運來饑餓英國迫令它改變政策的希望失敗了——英國政府毫不讓步。同時國內怨聲不絕，傑斐遜乃改取一種比較溫和的措施，頒布了「停止往來法」以代替禁運。此法依然禁止與英法及其屬地通商，但允許

於任何一國停止攻擊中立性的貿易時，不適用之。一八一〇年拿破崙表面上宣布放棄攫奪中立船隻的措施，但這是一種謊言——實際上他依舊攫奪。不過美國相信了他，只對英國停止往來。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

這樣與英國的關係便惡化了，英美兩國的戰機一觸即發。各種偶然的事件又加深了彼此的惡感。例如，英軍艦「豹」號曾勒令美軍艦「折撒比克」號交出若干英國逃兵，而其實該艦上只有一名逃兵；英艦見美艦遲遲不交，便連續向它開火達十五分鐘之久，然後登上美艦。甲板赤血橫流，英方拘去了四個人。未幾，總統向國會提出一件詳盡的報告，指出在三年以內英國強徵美國公民事件先後共六〇五七起。其他因素也興風作浪。西北部的移居屢次遭受一位名叫台孔歇的精幹酋長領導下的印第安部落劫掠騷擾，他們相信在加拿大的英國祕密分子暗中鼓勵這些蠻族，西部許多渴望獲得土地的人民很想併吞加拿大領土，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肯達基的議員亨利·克雷（Henry Clay）非常精明雄辯。同時有些南部居民則希望從當時英國的同盟者西班牙手中奪得佛羅里達。結果，一八二二年在瑪迪遜總統任內與英宣戰。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許多方面看來都是美國史上最不幸的事件。就一點而論，它是不必要的。最惹人怨恨的英王勅令，當國會一宣戰便無條件廢除了。其次，美國因這戰爭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南部和西部的人主張戰爭，紐約和新英格蘭人反對戰爭；到了戰爭快結束時，新英格蘭的重要派別幾乎達到了反叛的地步。第三個理由是，就軍事意義言，這次戰爭一點也不光榮。

美國陸軍在傑斐遜節約政策之下，到一八〇七年已減縮到三千人以下，此外便是一羣沒有訓練沒有紀律的民團，都是殘破不堪一擊的隊伍。許多所謂正規軍也不過是些囚徒酒鬼而已。有一個人會描寫當日軍隊的窳敗情形說：老軍官不是怠惰成性，愚昧無知，就是酗酒無度。比較新的軍官大部是爲了政治關係而任命的；有些是好的，但大多數不是「粗暴無知的人，」便是雖然受過教育，却不外些「浮華，浪蕩，頹廢的紳士。」這樣的軍隊如何能夠作戰沙場！

於是敗訊頻傳，一蹶不振。美國入侵加拿大的努力全部失敗。在第一年中，一位英國歷史家說得好：「那些民團和志願兵似乎並未決定他們究竟是要打仗，還是不要。」最激烈的一次戰役是在尼阿加拉附近，打得不分勝負，雙方都揚言勝利（一八一四年七月）。不過美國回加拿大推進的計劃既然暫遭粉碎，英國方面奏凱是比較合理的。

當拿破崙的軍隊在西班牙敗北時，在美洲作戰的英軍得到了惠靈吞部下久經戰陣的軍隊雄厚的增援。一枝勁旅在基督普倫湖上的普拉茨堡衝入紐約州，不過在那水面上的英國艦隊，却被美國一個二十八歲的艦長麥克頓諾打得一敗塗地，英國軍用交通線受到威脅，被迫退却。另外一枝英軍，不過五千人，在華盛頓附近登陸，並且在布拉登斯堡遭遇到比較大些的美軍，其中主要是民團。那些狼狽的防軍死亡十人受傷四十人，便棄甲曳兵，一口氣逃往華盛頓，敗竄之快速，甚至使許多追趕的英軍中晝昏蹶。英兵爲報復美軍破壞約克城（即今大蘭多）起見，燒燬了國會和宮。不過，在巴的摩爾附近英艦用長射程砲夜晚轟擊麥克亨利砲台——沙灘太寬不能作近距離攻擊——却沒有什麼結果，而且一位華盛頓青年辯護士，當時正在英艦上交涉交換俘虜的基氏（Francis Scott Key）。

遙望着美國國旗在晨光曦微中迎風招展，感奮之餘還寫下了那不朽的「星光燦爛之旗」歌。

美軍只在海上打了些勝仗。華盛頓和亞丹斯總統任內慘淡經營的海軍，在對法作戰以及一八〇三——一八〇四年對海盜作戰時都有過輝煌的戰績。他們不像陸軍那樣，最初就得力於一位偉大的組織者，這就是普利布爾（Edward Preble）。他統率地中海艦隊時，管理得非常嚴酷但極有效率，在海軍官兵中間養成一種堅毅、勇邁、和服從的精神，這在後來都成了美國海軍的傳統。在數量上美國海軍是很小的，因為傑斐遜實行的是一種迂腐的政策，只願建設一些海岸防禦的艦隻。一八一〇年稍有作戰力的艦隻不過十二艘而已。但是在許多次「一隻船對一隻船」的戰鬥中，美國船長每每擊敗同樣大小甚至較大的英艦。在五大湖上美國海軍也不示弱。另外一位不到三十歲的軍官——帕里艦長——在厄里湖上建設了一個艦隊，擊潰一個較小的英國艦隊，並且在一場惡戰之後，發出一條簡短的捷報，全國為之驚喜，他只說：「我們遇到敵人，他們變成我們的了。」但是英國海軍畢竟強大得多，終於控制了全部海權，使美國商船避不敢出，並對美國海岸嚴加封鎖。

當戰爭終了時，經由亞丹斯及亨利·克雷等人交涉的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一八一五年），關於這次戰爭的正面原因如強徵海員和中立國權利等，一字未提。整個戰爭中只有一場戰事最使美國人民稱快，這就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印第安人安得魯·傑克孫所率領的一枝慍悍的邊民組成的部隊，在新奧良斯打敗了惠靈吞手下一位勇敢軍官統率的強大英軍。這是和約簽字以後的事，但是美國人先得到這個捷報，正在欣歡鼓舞之際，和約簽訂的消息隨之而來。性情暴躁的傑克孫却因此一戰而成爲不可一世的全國英雄。

全國的團結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次戰爭對於共和國的發展貢獻很大。雖然戰爭開始及其進行期間國內都瀰漫着不滿和喧囂的聲浪，結局却加增了全國的團結和愛國的情緒。這是有幾個原因的。不連貫的成功，特別是海軍的勝利和在新奧良斯擊敗巴根漢的勁旅，都給予美國人引以自傲和自信的新基礎。這些勝利驅散了傑克遜的「屈服政策」所醞釀的不如人之感。其次，各州的人並肩作戰，而且一個弗吉尼亞人（名叫司考特的）成了北方軍隊最幹練的統帥，這些事實，也增加全國團結的意識。西部的人民打勝幾次他們永遠不忘的戰鬥，而且他們比較起原來十三州人民，對他們自己的州反不若對國家那樣忠誠。從這時起，西部在美國人中間起着更大的作用，西部在情緒上總是帶着全國性。不但如此，人民對於少數自私偏狹的人們所表現的不愛國的心情，非常厭惡。例如新英格蘭的怨天尤人分子，在戰爭末期曾派代表到哈特福特舉行的一個會議，專門考慮他們自己的困難，後來「哈特福特會議」竟變成了一般人輕蔑笑罵的口頭禪。

總而言之，這個不幸的戰爭居然促使共和國較前更加成熟，更加獨立，完全把它凝結起來，本質上更堅實了。喀拉丁說得好，在這次戰爭以前，美國人已經變得太自私，太物質主義，太富於地方觀念了。他說，「這次戰爭更新了並且重行確立了獨立革命所賦與的國家情懷和氣質，而這種情懷和氣質當時正在日漸消沉。現在人民有了較多普遍關心的對象，足以誘發他們的自驕和政見。他們是進一步的美國人；他們作爲一個民族而思想，而行動了。我希望這個聯合體的永久性可以藉此

更有保障了。——因為這次戰爭打得如此的平手，勝負難分，所以並未留下什麼惡感。當一百年以後，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戰場上重逢時，他們在作戰上和情感上竟像同志一樣，毫無芥蒂。

事實的發展證明，無論是那一派執政，不管是漢密爾頓的聯邦派，還是傑斐遜的民主派，全國的團結是增長了，而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加強了。這是國家成長的條件所要求的。獲取路易斯安那，和法英進行商戰，攻擊海盜，以及對英作戰——這一切都需要堅強的中央政權。

我們還不能忽略，在這同時，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加強了政府的地位。原來立國初期，法院力量弱，人們不大理會它。剛剛在傑斐遜掌政之前不久，一位富有自信力的弗吉尼亞人約翰·馬歇爾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一直作到他一八三五年死去為止。他將法院改造成為一個強大的凜然不可侵犯的機關，地位與國會和總統同樣重要。馬歇爾在嗜好和舉止上，完全屬於他本州裏那些優閒的種植家社會，不修篇幅，自己到市場買菜提回家裏。他喜歡玩牌，打拳，還有一種熱鬧的「馬蹄遊戲」和投環戲。但是他所代表的觀念，却是紐約和波士頓一類大都市商人和企業界的觀念。他的令人懷念的判案都是思考極深邃的作品，受着兩個主要原則的支配——一個是聯邦政府的主權，一個是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

馬歇爾是一個偉大的法官。他的判決推斷謹嚴，筆法犀利，幾乎每一件都令人折服。那些判決文字很簡練，一望而知是經過博學深思和周詳分析而寫出的。他的習慣是首先把他的主題發揮盡致，然後加以推論，把每一種反對的意見駁斥無遺，鞭辟入裏，最後引經據典，陳述結論。他主持最高法院，使內部非常和諧，對立的觀點和歧異的主張極少。此外馬歇爾除為一代大法官外，還是一個

偉大的憲法政治家。他判決了差不多五十件涉及憲法的案子，都有極成熟的政治哲學根據。這些判決幾乎牽涉及憲法的每一部分。所以當他退休以後，憲法在全國法庭應用範圍內，大體上是根據馬歇爾的解釋的。他可以說根據他自己的清澈見解從新給了憲法一個模型。

我們現在可以列舉馬歇爾的幾件著名的判例以見一斑。一八〇三年關於馬爾布里與瑪迪遜等論案的判決中，他確切規定最高法院有審定國會或州議會的任何法律之權。他寫道：「審定究竟什麼纔是法律，這是司法的權限，不容置疑。」一八二一年在柯亨斯與弗吉尼亞的訟案中，許多人主張關於各州法律的案件，州法院的判決就是最後的定讞。他指出這種意見會造成全國混亂狀態，因為各州對於聯邦憲法下的法律和聯邦條約的效力問題，可能採取不同的觀點。因此他堅主最後定讞應歸最高法院。一八一九年在麥古洛契和馬里蘭的訟案中，他處理憲法下一個老問題，即政府的「含蓄的權力」問題。這裏他竭力擁護漢密爾頓的理論，即憲法將其未曾明言的權力授予政府。在捷邦斯與奧頓的判案（一八四二年）中，他把這個原則擴大了。憲法以規定州際商務的權力授於國會；遇到哈得孫河上汽船權利爭執時，他認為這種全國性法規的權利，應從寬解釋，而不是限於狹義。在達特茅斯學院案件中，馬歇爾應用憲法的契約條款，支持法人特權的有效性，拒絕各州有權力以修正。總而言之，馬歇爾使美國人民的中央政府成爲一個活着和生長着的力量，他的功績可與任何領袖媲美。

國家主義不可抵抗的向前邁進，產生了一種國家主義的文學——一八一七年有柏里安特的「丹那多普西斯」(Thanatopsis) 一八一九年有埃爾維恩的「隨筆」(Sketch Book)。一八一〇年有

古柏許多小說的第一部，一八一五年「北義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創刊，學着英國季刊的作風，但大部分注意於討論美國的問題。哈得孫河繪畫學校雖然尚帶着強烈的歐洲作風，但他們自己認爲他們的美國風景畫很是出色。傑斐遜很技巧地採用義大利和古典的建築術以應付美國的需要，在弗吉尼亞大學的建築物上，表現着一種調和的建築藝術，其優點足與當時海外所有者媲美。一種更好的國家土地制度建立起來，一八二〇年的法律，把官地價格每畝自二元降爲一元二角半。商業把美國人民凝結爲一個民族的單位。一八一六年的關稅繼續保持相當高的戰時稅率，與廠家以一種真正的保護。同年，美國第二家銀行出世(第一家已經停業)，協助政府處理財政業務，並樹立一種健全的紙幣制度。一種全國性的內政改良運動，由亨利·克雷，南加羅林納領袖柯爾豪恩，和其他人物倡揮。一部分人主張應有公路和運河，把東部和西部聯繫起來。當全國統一運動進展的時候，民主也向前進展。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門羅主義

一八一七年，瘦長粗笨的詹士·門羅代瑪迪遜而起。門羅並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他具有高超的大志。他歷任要職——參議員，州長，駐法駐英公使，國務卿——直至最後躍登總統寶座。這雖是一個令人感覺不安的時代，政治黨派却暫時相安，故門羅得於一八二一年連任總統。他得了全部的選票，只有新漢普廈的一位選舉人沒有投他的票，因為他認為沒有人可以與華盛頓享受同樣的榮譽。但門羅是個缺少吸引力的人，他從未受人十分愛戴。門羅的兩種非常的特性，便是他有聰明的常識和堅強的意志。正如約翰·亞丹斯所說，他「於作最後決斷時有健全的頭腦，而其結論是斬釘截鐵的。」

使門羅的聲名不朽的是他宣布所謂「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實際上是一八二三年他在國會常年報告中的一部。它包括兩種主要的理想。其一是主張停止殖民，便是說禁止在西半球再建立任何新的附庸國。其一是不干涉，便是聲明歐洲不得再干涉「新世界」國家的事務以致威脅着它們的獨立。這兩種主張發源於兩種迥然不同的局勢。

第一種局勢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俄國要求阿拉斯加以南的土地，與美英在西北部太平洋的權益發

生衝突。第二種局勢的發生，是因為歐洲革命的「神聖同盟」對拉丁美洲各新解放國家的威脅。同盟各國採取步驟，謀粉碎西班牙和義大利的民主運動。他們於一八二二年在伐隆那（Verona）召開大會，討論派軍渡洋至南美，至少強迫幾個弱小的共和國再度效忠於西班牙。在這種遠征中，法國將居於領導地位，希望自己可以獲得一些土地。

聯盟的英外相喬治·肯甯聞訊之後，深為警惕。他建議美英採取一致步驟，拒絕這種干涉；當時美國政府幾有表示同意之勢。傑斐遜和瑪迪遜向羅門進言，也贊同美英聯合行動。但國務卿約翰·亞丹斯堅持美國必須單獨行動，最後門羅總統聽從了他的意見。他在國會致詞中聲明，第一，美洲大陸「今後不容任何歐洲國家殖民」；第二，任何歐洲人的措施，「其目的在於壓迫」拉丁美洲國家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彼等之命運」者，均將被認為對美國不友好的明證。

密蘇里的妥協

奴隸問題此時雖不大受社會所關心，但迅速變成一個巨大的力量，到了一八一九年這個問題突然引起社會的注意，正如傑斐遜所寫，「像深夜的火警鐘聲一樣。」在共和國成立的初期，當北方各州決定立刻或逐漸解放黑奴的時候，許多領袖們都認為各地的奴隸問題已經不復存在。華盛頓一七八六年致書拉法葉特，就說他誠懇希望一些計劃可以實施，「使奴隸制度緩緩地，確實地，不知不覺地廢除了。」他在遺囑中解放他的奴隸。傑斐遜認為應該用解放和放逐的混合辦法消滅奴隸制度。他說：「當我想到上帝是公道的時候，我替我的國家戰慄。」亨利、瑪迪遜、門羅和許多其他

人物，都有類似的言論。遲至一八〇八年，當奴隸買賣廢止的時候，許許多多南方人都以為奴隸制度不過是一種臨時的罪惡而已。

可是到了下一世代，南部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區域，其大部分堅決擁護奴隸制度。這是怎樣演變而來的呢？南部廢奴者的精神為什麼幾乎消滅了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革命時代哲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漸漸薄弱了。另一個原因便是，清教的新英格蘭與密西西比河之間的敵對已經表面化；他們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關稅和其他重要問題上，意見都是歧異的，而南部對北方所謂放奴的思想漸漸感覺不高興。但最重要的是，某些新的經濟因素，使奴隸制度遠較一七九〇年以前更為有利可圖。

在經濟變遷中，有一個因素是大家所熟知的——南部植棉大實業的興起。這，一部分是因為採取了改良棉種，但大部分是因為惠尼在一七九三年發明了軋棉機。植棉風氣迅速向西移動，自加羅林納和喬治亞傳佈到極南部，傳到密士失必河流域，最後入於台薩斯。另一種因素使奴隸制度具有新的基礎的，便是製糖工業。東部路易斯安那的肥沃而溫暖的三角洲土地，最適於種植甘蔗；而在一七九四——一七九五年間，新奧良斯一位法國人後裔叫波里的，證實了種蔗獲利甚豐。他設置機器製糖，自新奧良斯前來參觀的一羣人，看見液汁第一次結成糖的時候，不禁歡呼起來。「它結成粒狀了！」的歡呼聲揭開了路易西安那的一個新時代。結果是一個很大的繁榮時期。當時這一州供給全國需糖量的一半左右。這種實業是需要奴工的，他們都是從東部海岸成千成萬的販入。

最後，種烟草事業也向西傳佈，跟着來的也是奴隸制度。一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種烟區域的弗吉尼

亞低地，其土壤因不斷的種植而變為貧瘠了，種烟者便帶着黑奴移入肯達基和田納西。自此以後，下南部和西部吸收了南部充斥着的奴隸。這種奴工的分散，使許多觀察家大為放心，因為它可以減少如「唐納叛變」(Nat Turner's Rebellion)一類奴隸叛變的危險，那是一八三一年弗吉尼亞六七十個奴隸的一次叛變，增加南部對於釋奴主義的恐懼。

當北方的自由社會和南方的奴隸社會向西發展的時候，他們之間似乎應該維持一種約略的平等。一八一八年，當伊利諾斯加入聯盟的時候，一共有十個奴隸州份和十一個自由州份。一八一九年，阿拉巴馬和密蘇里請求入盟。這個時候，阿拉巴馬是一個奴隸州份，故其參加正正恢復了奴隸州份和自由州份的平衡。可是許多北方人謂密蘇里除非作為一個自由州份，不能容許它們參加。紐約州衆議員托瑪茲提出一個入盟的修正案，要求密蘇里採取逐漸釋奴的辦法。全國於是發生風潮。有一個時期，釋奴派人物控制着衆院，畜奴派人物控制着參院，形成一個十足的僵局。此時甚至有人恐怕會發生流血慘劇。

以後，在克雷的和平領導之下，成立一種妥協。密蘇里以奴隸州份的資格入盟，但同時緬因則以自由州份的資格入盟；國會發表法令，因購買路易斯安那而獲得在緯線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的土地，即密蘇里的南方邊界，應該永遠肅清奴隸制度。至此天際又是呈現日麗風和了。可是看得遠的觀察家，則認為風潮是會再起的。傑斐遜寫過，夜裏的火災警鐘在他聽起來好像聯盟的喪鐘。「那個時候，真的是千鈞一髮，但這不過是一種緩刑而已，並不是最後的判決。一條地理的界線，符合着道德和政治的明顯的原則一旦形成，並激起了人們的情感。這一條界線是永遠不會消滅的；而且

每一次新的激怒，會令它越來越深。」

兩片小小的雲翳對於南方是即將來臨的風暴。一八二一年，一個教友會派的青年教徒叫倫第的，在俄亥俄創辦一家反對奴隸制度的刊物「普遍解放的天才」。一八二三年，英國改革家威伯福斯創立一個反對奴隸制度的會社，麥考萊（Zachary Macaulay）和其他著名的人物都相率加入。

傑克孫的出現

一八二四年，美國有五個總統候選人。在五人之中，約翰亞丹斯克雷和柯爾豪恩都是能幹的人物，而喬治亞州的克羅福則是一個最狡猾的政客。但沒有疑問的，最得人望的是第五個——安德魯·傑克孫。崇拜這新奧良斯英雄的西部人民，認為他是當代最偉大的軍人。有些人以為凱撒，拿破崙和馬爾波洛和他比較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東部，許多保守的人們則不信任他。他們引起傑克孫在參院和傑斐遜爭辯時的情形，當時他暴怒得喘不過氣來；他們記起他是怎樣躁急的一個軍事指揮官，侵入西屬佛羅利達，怎樣採取粗暴的手段在那裏吊死了兩個英國人。亞丹斯認為他可以做一個理想的副總統，那也許對於他是一個莊嚴的職位；他的名譽可以恢復其光輝；而不致有吊死任何人的危險；

可是選舉表示傑克孫在選民投票上領頭。沒有獲得大多數的選舉人票，結果總統人選由眾議院去決定，眾院最後選舉了有學問，有經驗，有政治家風度，但是最固執的亞丹斯擔任總統。

亞丹斯就職時，他已有兩種聞名全國的成就：其一為門羅主義原來便是他的傑作，其二便是他於

一八一九年力促西班牙政府與美國訂約，以佛羅利達割讓美國。亞丹斯很有才幹，同時又有優良的性恪和爲公的精神，可是他嚴峻冷酷，態度唐突，而且又有強烈的偏見，這倒是他的弱點。作爲一個總統，他的成就極微，因爲敵意的傑克孫派有機會即阻撓他。這一派人說他之所以能夠進入白宮，是因爲向克雷行賄所致。這個時期黨派的敵對情形可說是空前未有的。

在亞丹斯執政時期，新的陣線宣告形成，亞丹斯和克雷的黨人稱爲國家共和黨 (National Republicans)，後來爲自由黨 (Whigs) 所代替，而傑克孫派則爲民主黨。

一八二八年的選舉好像地震一樣，傑克孫派戰勝了亞丹斯和其擁護者。他們間感情極爲惡劣，所以當新選的總統傑克孫抵達華盛頓時，他不照例訪謁現任總統致敬，而亞丹斯也不願與繼任者同車到國會去。

傑克孫的就職典禮給人認爲開美國生活的新紀元。那是全國所未曾見過的一個典禮。華府的目擊者把它與蠻人侵入羅馬相比擬。根據魏伯斯特的記載，當時城裏充滿了投機者，謀職者勝利的政客以及撲實的西部人和南部人。人民從五百哩以外來此，目的在看看他們的英雄就任大總統，他們的談吐好像國家已經從一種危機中得救一樣。他們在街上汹涌的時候，口裏還替傑克孫喝采，有許多人簡直太過喧囂，令君子人不敢和他們接近。

可是最動人的情景是在典禮舉行之後。熱心的民主黨員，組成雜亂的一羣，衝到白宮去。每個人都知道白宮備有茶點，大家都想新總統會招待他們。一桶桶的鮮橙汁擺在那裏，但羣衆的小提桶和玻璃杯簡直令人發怒。他們擁迫着傑克孫退到牆邊，結果他的朋友們只有手攜着手保護他。羣衆穿

着汗泥的皮靴，隨便的站在披着洋緞的傢具上面。法官斯多利記載當時的情形說：「我從未見過這樣怪現象。流氓之王的統治似乎已經得勝了。」

傑克孫的理想

傑克孫是美國少數完全同情平民的總統中的一個。他同情他們，信任他們，一部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原來傑克孫是在赤貧中出世的。他的父親是個蘇格蘭的布商，來到北加羅林納州的森林中開闢一片農場，傑克孫還沒有出世他便死去了，死後家裏連替他買一塊墓碑的能力都沒有。傑克孫的母親以後在小叔的家裏當管家。傑克孫幼年時代，是生活於困苦和艱危之中，衣衫襤褸，有神經衰弱病，似乎屢次遭人凌辱。他後來的暴烈性格，敏感和一生同情於被壓迫者，都是發源於童年時代的「不如人之感」(Sense of inferiority)。傑克孫少年時候參加革命，這件事犧牲了他兩個兄弟的生命。

傑克孫對東部資本主義的組織極不信任，這一部分是他的西部邊區環境所養成，一部分是由於他的不幸的私人經驗所致。他於研究法律之後跑到田納西，在這裏他企圖在世界中奮鬥。他買賣土地、馬匹和奴隸，有一個時期還擁有一家雜貨店。在這個區域，律師往往還兼做生意，因為打官司的人，常常用熊皮，蜂蠟，皮革，棉花和土地，付還律師費。

更有進者，作爲一個邊區的律師，種植家和商人，傑克孫認識東部絕對支配着西部的商業。他必須在新奧良斯順河而下出賣他的棉花，玉蜀黍和豬；他必須替他在費城區維爾的商店買入貨物。在

這兩個城市中，市價是經常波動的。他也許送定單到費城去，但發現那裏的價錢已經漲到很高。也許送產品沿密士失必河到下游去賣，但發覺那裏的市價已跌。在這條路線兩端控制着金融的人們都發財了，可是傑克孫和其鄰近的人則窮窘異常。他以這一件事實爲出發點，開始對銀行發生不信任 and 憎惡——這種不信任是西部的特點。傑克孫認爲銀行家的利息太大了。費城和紐約的舒適銀行家有力傷害田納西的勞苦老百姓，這實在是可怕的現象。

再其次，傑克孫有一種西部的信念，認爲平常人能夠有非常的成就。西部的人民，認爲一個能夠指揮一隊民團，經營一個農場，並會作一篇很好的選舉演說的人，他便適合於擔任幾乎任何官職。他們絕不贊成政治舞台應該保留給富有，身分高和受過數育的人。獵熊者應與哈佛大學畢業生有同等的權利。他們這種見解也有些道理。傑克孫在田納西是印第安人的鬥士，他的妻用一枚玉蜀黍穗軸製的煙筒抽着煙，她說「歐洲」一個名詞還用的土音。傑克孫的環境和訓練令他成爲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他曾經看見過森林裏的土人擊敗了惠靈吞的身經百戰的部隊。他曾經看見過自己奮鬥出來的人物如賓頓和克雷等控制着全國大會。他認識西部的偉大力量。

綜言之，傑克孫的主要信條可以總括爲下列幾句話：信賴平民；信仰政治平等；信仰平等的經濟機會；憎恨專利，特權和資本主義財政的錯綜複雜。

擁護傑克孫的民主黨有兩種特有的主要因素。它的大部分黨員是全國農村選民——開闢邊區者，農民，小種植家和鄉下店家。外阿里芬尼斯山西部人口到一八三〇年佔總人口約三分之一，這個區域具有特殊的性質。它在情感上具有高度的國家主義；這新地方較原來十三州少具州的觀念，而多

傾向於同盟。在西部，人們早就承認政治的平等。每一個白種的成年男子都可以投票選舉和當選爲官吏。在東部，選舉上有很多限制，廢除限制的運動受到保守派激烈的抨擊。這些保守派包括馬薩諸塞州的魏伯斯特，弗吉尼亞州的馬歇爾，和紐約州的肯特。可是阿拉巴馬和密蘇里，印第安那和伊利諾斯，却畀予每一個白人以投票權。

西部又喜歡一種直接的民主政治。傑克孫的黨徒們攻擊由國會的政黨會議推選總統候選人的舊法，而主張直接推選大會的新法——這種辦法至一八三六年便穩固地建立起來。他們贊成由選舉的法官任命法官。最後，西部的農村選民對一套新的政治要求發生興趣。他們不喜歡受東部控制着的銀行制度；他們擁護負債者以反對債權人；他們憎恨自汽船和銀行特權以至專賣權的一切專利的東西。他們希望廉價和條件容易的購得公地的權利。

傑克孫派民主政治的其他主要成分便是東部城市的勞苦羣衆。工廠受禁運，一八一二年戰爭和保護關稅的刺激，開始在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居於重要地位。麥里密克河谷和圍繞伯羅維頓斯的地帶變成繁盛的紡織中心。馬薩諸塞州的羅威爾，在一八三〇年有工廠職工五千人。到了那一年，紐約二十萬人民中，有大部分是工廠和船塢的工人。大部分移入的人民——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發覺民主黨比較自由黨更合他們的胃口。這個新的工人階級迅速把紐約從一個聯邦派的城市改變爲一個民主黨的城市，並把費城和皮次堡造成爲傑克孫派作風的中心。他們在這個傑克孫時代組織許許多多工會，並在像暴烈的勒革特一類的領袖領導之下，激烈攻擊根據舊叛亂法處罰罷工的反動法庭。一八三六年傑克孫在全國船塢創立十小時工作制，他們予以熱烈的讚揚（按當時馬薩諸

塞工廠，工人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每週工資五元）。

傑克孫的措施

傑克孫執政時，立刻把他的主要理想村諸實施。他反對國會把款項撥作地方築路和開濬運河之用，他以他的「梅斯維爾否決案」尖銳地防制這種對於國庫的劫掠——不批准在肯達基州由梅斯維爾築一條路通達萊辛頓。當南加羅林納企圖廢止一八二八年的保護關稅時，他以嚴厲態度對付之。在一八三〇年傑斐遜紀念日的宴會上，傑克孫的眼光正視着南加羅林納的領袖柯爾豪恩，敬他一杯酒說：「爲我們的聯合乾一杯——這種聯合是必須保持的。」當南加羅林納繼續蠻幹時，他便表示這件事極爲嚴重，派遣司考特將軍率領一隊海軍到查斯頓去，發表一篇宣言，在這篇宣言裏面，他宣布「凡以武力從事折散聯盟者即爲賣國。」他當時準備必要時處柯爾豪恩以死刑，後來他悔恨沒有這樣做。魏伯斯特以一篇動人的演說戰勝了南加羅林納州在參院的主要參議員海恩。魏氏的結論是「自由與聯合，現在與永久，統一與團結！」這一句話成爲全國的呼聲。幸而南加羅林納州不能把南部聯合起來，故當愛好和平的克雷想出減低關稅的妥協辦法時，南加羅林納州便放棄廢除保護關稅的主張。

傑克孫曾與第二合衆國銀行苦鬥而戰勝之，推翻了東部財政和專賣權力的衛城。這家銀行的主人是老練的比特，受克雷和自由黨人所支持。一般的說，這家銀行經營得很好，對國家有很有價值的貢獻。但傑克孫嚴厲否決一個再給它以特權的法案。然後，他把政府存在這家銀行的款項提出，改

存於重要的州銀行，這樣可以接收中央機關的職權。無疑的，這銀行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無疑的，它也是一個私人的專利機關，使裏面一小部分的人發財。社會上是擁護傑克孫的，他雖然必須努力苦鬥以求全黨支持他，可是他的主張結果是發生作用了。

在外交方面，傑克孫總統的主張也是斬釘截鐵的。當法國延緩某項借款的清償時，他主張佔有法國的產業令它就範。當台薩斯背叛墨西哥，呼籲美國予以吞併的時候，他很聰明，採取觀望的態度。直至他第二任總統的末期，他還擁有很廣大的人望。

民主黨的其他傾向

在傑克孫時代，民主的潮流比較傑斐遜時代還要高漲。成年男子選舉權意味着增加對於國事的關切。一八二四年總統選舉時投票總數僅三五六，〇〇〇票；一八三六年增到一，五〇〇，〇〇〇票；到了一八四〇年增到二，四〇〇，〇〇〇票——七倍於十六年前的數字。這種票數的增加，一部分是因為人口增加，但大部分是因為投票的開放和人民對於政治注意的加強。至此總統選舉人 (Presidential electors) 不由各議會推出，而由選民普選。在國事上，職位較迅速的輪流成爲一種慣例。傑克孫坦白宣布他贊成這種辦法，免去許多政敵的官職。他免去敵黨官職雖沒有以後的總統來得兇，但他接受了瑪西 (William L. Marcy) 的原則：「戰利品屬於戰勝者。」

禮節越來越民主化，越來越不正式不拘泥。一般人都嗜烟，喫飯來得快，魯莽的好奇心，自負和誇張的流行，北部城市的匆忙——這種種令外國的觀察家不勝驚訝。美國的文化也以輕率和粗暴爲

其特徵。現有的職業比較人命更爲重要，這在一個迅速發展的國度當然不是奇怪的事。輪船火車對於安全很少加以注意。決鬥曾經成爲尋常的事，而在南部和西部，自由使用匕首和手槍的家族械鬥也極爲平常。在法庭和法官不可靠的區域，私刑從而發生。當哈里遜於一八四〇年被自由黨人選舉爲總統時，自由黨必須說他是一個住在木屋裏喝着果汁的粗魯的墾荒者，其實哈里遜是一個受過教育和富裕的斯文人，他在辛辛那提有田二千畝。

生活在許多方面都趨民主化。一種廉價的報紙產生了。一八三三年，卡查敏·台氏模仿倫敦的辨士報，創辦廉價的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一年之後，賓內特創辦黃色的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獲得更可觀的成就。一八三〇年「婦女雜誌」（Godey's Lady's Book）創辦於費城，故這第一種通行的雜誌也是傑克孫時代的產物。三年之後，第一種通行的文藝月刊「紐約人」（Knickerbocker）出世。在教育方面，爲了三個沒有派別，用稅款舉辦的公立學校，曾經發生劇烈的鬥爭。馬薩諸塞州的曼恩是當時的領導者。這次鬥爭的劇烈程度，實際上遠甚於後人所想像的。一方面是民主和人道主義的人物，知識工人，加爾文教派和一神論者；一方面是貴族，貧困的保守派，馬丁路德教派，天主教徒，支持教區學校的教友派，許多種植家和農民，以及私立學校的教師。經過劇烈鬥爭之後，各州先後表示明顯的態度。一個新英格蘭人說：「讀書使頭腦腐蝕」；一個印第安人要求在他自己的墓碑上刻上這一句話：「這裏長眠着一個自由學校的敵人。」可是中部各州跟着制定准許任何郡城抽稅舉辦公立學校的法律，而西部則強迫地方必須這樣做。當邊區向西移動的時候，甚至宗教也變成民主化了。在西部發達着的教派是浸信會，監理會，甘

普貝爾教派和長老會，他們的政府形式是民主的，而且民主的色彩與日俱增。文學方面也表現民主的傾向。白里安特，古柏，和埃爾維恩，都是傑克孫的熱心擁護者。古柏所著有關東部社會的書，和埃爾維恩所著有關於荒漠的西部的書，一樣的都強調着民主的思想，克羅克特的「自傳」（一八三四年）和朗斯特利特的「喬治亞風景線」（一八三五年）啓示着邊區的影響力量。賓克羅夫特的「美國史」第一卷坦白地擁護傑克孫。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移動着的邊疆

自初期始即影響着美國人生活最大的一種力量是邊疆。邊疆人口稀少（每平方哩不過六人），他們主要的工作是開闢土地以便建立家屋。美國人口自大西洋岸橫斷大陸向西移動，這對美國人的性格有極大的影響。美國的邊疆不只是一條線，而是一種社會的進程。它激勵個人的創造力；它為政治和經濟的民主而存在；它把人們的舉動粗野化；它粉碎了保守主義；它孕育着地方自決而同時尊重中央政府的精神。

當我們想及美國邊疆的時候，我們便想及美國西部。可是沿大西洋岸的地帶是最初的邊區；一七九四年至一八〇〇年間自較舊的新英格蘭吸引到四萬個移民的緬因州，在革命之後是一個邊區。第二個邊區是海岸河流水源和阿巴拉契安山脈一帶。到了革命結束時候，紐約州的西部，賓夕法尼亞州的魏俄明河谷，皮次堡一帶，田納西州的東部，和喬治亞高地，都成了邊區。到了一八〇〇年，密士失必河谷和俄亥俄河谷成爲第三個大邊區。「亥俄，去吧，我們浮着俄亥俄河流下去吧，」(Hi-o, away we go, Floating down the river on the O-hi-o) 成爲千千萬萬移民的歌聲。憲法寫成後的那年春天，波特南率領第一批移民西行建立了馬里埃達，這樣便開關了一個約佔地二百萬

英畝的區域，由國會移給俄亥俄公司。同年，另一批土地投機家建立了辛辛那提。同時，人口迅速向肯達基州和田納西州湧進。和平後第一年，一萬個移民進入肯達基。據一七九〇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統計，肯達基和田納西共有人口逾十萬。

西進的洪流，沒有停息地汎濫着整個的西北和西南。到了一七九六年，肯達基和田納西都是羽毛已豐的州份，而俄亥俄沿着賓夕法尼亞邊境和俄亥俄河有一條移民地帶，也幾乎成爲一個成熟的州份。到了一八二〇年，西北的印第安那和伊利諾斯，西南的阿拉巴馬和密士失必都成了州，第一個邊區與歐洲有密切的連繫；第二個邊區關聯着海岸的殖民地；可是密士失必河谷是獨立的，它的人民不是看向東面而是展望着西部。

邊區的移民

自然的，邊區的移民種類極爲複雜，但大多數初期的觀察家把他們分成三大類。走在移民隊前頭的獵戶。英國旅行家福特翰描寫較粗野一類的初期移民常常是未婚的人：

他們是勇敢耐勞的人；住居在簡陋的茅舍裏，當他們和印第安人作戰時，便利用這種房屋設防。他們雖然憎恨印第安人，但服裝和舉止都和印第安人很相像。他們不修篇幅，但極爲客氣，對生人很和藹，同時也忠實可靠。他們種植一些玉蜀黍，南瓜；養一些豬，有時每一家養一兩隻牛和兩三匹馬。可是來福槍是他們最重要的東西。

當他們聽見隣家的槍聲時，那便是移動的時候了，古柏在其所著的「牧場」中，對在納帶班坡墾

荒的獵戶和森林中的生活，描繪出一幅很生動的圖畫。這些人善用斧頭，來福槍，羅網和釣竿；他們開闢小徑，建築第一批的木屋，擊退印第安人，為後來的移民開路。

第二類人福特翰稱為真正的移民，「獵戶和農民的混合物。」他們不用茅舍而造木屋了。這種木屋有玻璃窗，有像樣的煙囪，和隔開的房間，與英國的田舍同樣的舒適。他們不用泉水而自行鑿井了。勤勞的會迅速開墾林木之區，燃燒木材為炭酸鉀，並讓其枝幹腐爛。他自種五穀蔬菜和水果，在森林中獵取鹿肉，野火雞和蜂蜜。在河流中捕魚，並且飼養一些豬或別的牲口——他很少會替其孤獨和粗野的生活發愁。野心大一點的人，則購買大片賤價地皮，到了地價高漲時，他們便把地出賣然後向西移動。這樣他們讓地位給後來的第三類也即最重要的一類移民。

第三類移民所包括的不單是農民，同時還有醫生、律師、店家、編輯、牧師、機工、政客和地皮投機家——構造一個有力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分子。但農民是最重要的一種人。他們打算在他們所開墾之地長久住下去，而且希望子孫也長久住下去。他們建築較前人更大的穀倉，然後又建築更堅固的磚屋或骨架屋。他們築起更好的籬笆，買入改良的牲口，更技巧地耕殖他們的土地，播下更多的種子。有些人創設麵粉廠，鋸木廠和蒸溜廠。他們鋪築良好的公路，興建教堂和學校。當城市繁盛起來的時候，這第三類移民許多成為銀行家，商家或地皮商人，都是有資產的富人了。簡言之，他們代表美國的文化。西部發展得很快，大部分不可思議的改變都在數年內由這第三批人完成了。一八三〇年的芝加哥只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貿易村鎮；可是在它的第一批移民遠健在的時候，它已變成世界上最大和最富城市之一了。

許多不同的民族在這新的西部混合着他們的血統。南部高地的農民很佔重要地位，這一派出了林肯 (Abraham Lincoln) 和達維斯 (Jefferson Davis) 都是同一年在肯達基的木屋裏出世的。頭腦頑固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儉樸的賓夕法尼亞的日耳曼人，富進取心的新英格蘭人，以及其他種族的人民，都參加西部的墾殖事業。這各種人民有兩種共同的特點——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到了一八三〇年，過半數的美國人，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長大起來的，他們沒有或者很少帶着舊世界的傳統和習俗。西部的人是必須自立的。人們對一個人的評價不以門第高低，承受財產的多少或受教育年期長短為標準，而是以他能夠做的工作為準繩。人民能夠用任何儉樸的人所能付的代價取得農田；一八二〇年以後的官地，每英畝可以用一元二角五分錢購得，而在一八六二年之後，則只要你願在那兒住下去，你便可以獲得地皮了。人民在這種地方可以容易獲得工作的工具，他們可以跟着國家長大起來。這種經濟機會的平等，培養出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意識，予天生的領袖們以迅速邁進的機會。這裏還須補充的，便是海洋實際上也是另一個邊區。海洋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很大。當時船隻是小型的，船員的人數也少，同時漁船和捕鯨船都是以合夥的方式組織的。東部的船員，和西部邊區的獵戶與農民一樣，都需要有創造力，勇氣，個人的精力和耐苦的精神。

邊疆的美德和缺點

由於習染和互相仿效，這種民主風氣和個人主義成爲這年青共和國各城市中的顯著特點。柯伯特所讚美的公正的獨立，即刻令到紐約和費城的歐洲旅客震驚。這些觀察家注意到工人們領工資時不

脫帽也不說聲「先生」。司閩者接受僱用時的神氣，好像是施惠與人一樣。柯伯特讚許似地提及美國的僕人不穿着制服，平常與主人同桌用膳，他們不叫傭工而稱爲「幫忙」。他在美國只看見兩個乞丐，而且都是外國人。愛麥生的道地美國論文是論及「自信」。他說當日最典型的美國人是一個往西行的人，輪流幹着農民，店家，地皮商人，律師，國會議員，和法官等等職業。這並不形容過甚。美國內戰時的一個能幹將領余曼，曾經是軍校學生，墨西哥戰爭中的軍人，舊金山的銀行家，里文華斯的律師，肯薩斯邊區農場的經理，路易斯安那一個軍事學校的校長，然後又再度當起軍人來。

邊區有美德也有缺點。一般地說，邊區的人都不受約束，不守紀律，和過度的自信。一八一二年戰爭中許多軍事上的失敗，都是因爲邊區的人不願受訓練和支配。受過邊區訓練的美國人，做起事情來都是匆促而粗淺。他們在匆促中造粗糙骨架房子，而不是耐久的磚石建築物。他們造粗陋的路，造活動的橋。他們對於土壤，與其說是開墾，無甯說是剗掠。紐約的火警鐘聲整夜地響着，因爲它的房屋好像火絨一樣地燃燒着，而一八三六年紐約城的兩家最大商行實際上是倒坍下來的。火車互撞和輪船爆炸是常有的事。自然的，人們很不注意禮貌和文化；邊區沒有閒暇來顧到這些。最壞的是，邊區的犯罪事件極多。社會上的一些壞人湧到西部邊區來。人們養成一種不羈的壞脾氣，喜歡用拳頭和手槍來解決他們間的爭執。這裏的法官，需要有鐵一般腦筋和機警的手段。

與印第安人的戰爭

邊區人民不守紀律的特性，在對印第安人的關係上特別召致悲慘的後果。他們經常地破壞條約，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他們毀壞印第安人衣食所賴的獵獸，有許多人碰到紅種人卽刻予以殺害。當印第安人謀自衛時，戰事於是爆發。當然，未開化者往往是被侵略者，可是白種人無情的西進浪潮的確是許多衝突的主要原因。最激烈的血戰是在南部與克里克族之戰，傑克孫在此打了一個血腥的勝仗；在佛羅利達沼澤和叢林中與西敏諾爾族之戰；和在印第安那與台孔歐黨人之戰。

年青的林肯是黑鷹戰爭中的一個上尉。黑鷹的族人代言人曾向政府割讓約五十萬英畝的土地。這位酋長和該族的大部分人不承認這種割讓有效。黑鷹在武力威脅之前，從他在伊利諾斯種玉蜀黍的土地退到密士失必河的西岸。可是他的族人受饑饉所迫，翌年春天再渡密士失必河以求與在威斯康星州的友好的溫尼巴哥斯族聯合，從事玉蜀黍的種植。他仍很天真地深信其和平的意向可以得人諒解。可是白種人立刻向他們進攻；黑鷹退却求和，但二千民團置之不顧。黑鷹的族人被驅經過威斯康星南部，再度到了密士失必河邊，在這裏當男婦老幼企圖渡河時，給無情地殺個落花流水。一個來福槍手寫道：「目擊小孩和傷者飽受痛苦，實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雖然他們是野蠻的敵人。」

把東部印第安人向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大平原總遷移的計劃，在門羅總統任內便正式採用，傑克遜總統則予以熱烈的執行。國會授權總統以西部土地與印第安人從前所有者交換。這樣便創出一個「印第安國」，最初是從加拿大以達台薩斯。北部的印第安人遷移到這個區域來沒有發生多大困難。可是南部各印第安族較大較強，他們進行頑強的抵抗，結果便演成了悲劇。所謂「五開化種族」——克里克，卓多，齊卡索，赤羅基，西敏諾爾——都留戀着他們的家園。他們中有許多人，尤其

是克里克族和赤羅基族，都是儉樸的農民。他們建築良好的房屋，飼養牲口，設立磨坊，並送子女到教會學校受教育。他們緊纏着他們的土地直至最後，有些只靠武力纔能驅之使去。他們遷徙大部分是用貨車或靠步行，因為遭饑饉疾病和露宿的磨難，所以死者極衆。但到了一八四〇年，密士失必河以東的印第安人，幾乎全數都移到他們的新家。

密士失必河谷是國內最富饒和最優異的地帶，印第安人這次遷徙，使這一帶地方都有人居住。密士失必河以東的最後一個州威斯康星於一八四八年歸入聯邦。在此以前，密河以西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州份，因為在密蘇里於一八二一年加入以後，阿肯色於一八三六年建州，十年後衣阿華也步其後塵，「明尼蘇達地方」則於一八四九年組成。一八三七年的恐慌，大部分是西部過度發展所致，妨礙向西的移動，但並不是很大的妨礙。刈穀機發明人麥柯密克於一八四七年在芝加哥設廠，開始製造刈穀機，使西部草原愈易生滿了五穀。鐵路也開始建築，不久平坦區域就有鐵路網了。一八五四年，每天有七十四列火車開入芝加哥，這個城已經誇耀着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穀市了。那一年，加拿納和芝加哥鐵路每月運三千個移民到衣阿華州，同時還有數千人由公路行進。日耳曼人，斯坎的那維亞人和英國人充滿着上游河谷，並在台薩斯或阿肯色成立家庭。一八五四年一個英國的觀察家來到明尼蘇達的聖保羅城，他看見當地的情形不覺愕然，原來這個城人口七八千，竟有旅館四五家，完善禮拜堂六座，河畔碼頭每年靠泊輪船三百艘，而且有一築有人行道的好街道，高大的磚砌倉庫，大小商店中貨品之多，可以與聯邦中任何地方媲美。「新西部的領袖們，如伊利諾斯州的道格拉斯和林肯，密蘇里州的阿基生，密士失必州的達維斯，和孤星州 (Lonestar State) 的豪斯

頓，都在一八五〇年以前便佔重要的地位。

近西的殖民地

在密士失必河谷的開發中，主要的部分是由幾條運輸的大通道擔負起來。到西部的第一條大動脈是康伯蘭路，一八一一年開始建築，大部分經費由聯邦政府負擔。這條路由康伯蘭起，越山至俄亥俄河沿岸的惠靈和珍斯維爾，最後推進到伊利諾斯州的萬達利亞。工程全部完成時，全線長約達六百哩，寬六十呎，中間二十呎是根據麥克亞當的原理建築的。西部的郵件在這條「國道」上傳遞。沿路相當距離有客棧以便行旅。殖民者的洪流是不停息的，就是夏季也絡繹道上。一個觀察家於一八二四年寫道：「數以百計的家庭很舒適地向西移殖。來自西部的畜商驅着他們的牲口東行求市，景象萬千，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這條大道可以比擬通都大邑的街道——行人有徒步的，有騎馬的，還有坐車的，都在舖平的路面上混雜着。」這條路在惠靈地方與俄亥俄河連接着，此河也成爲擁擠的行旅動脈。最初在河上行駛的是平底船，駁船和方舟，以求適應潮流，運輸穀類，鹿肉，豬肉，皮毛和麵粉到下游的新奧良斯。後來尼古拉斯·羅斯福建造一隻輪船，於一八一一年自皮次堡駛至新奧良斯，然後又駛回頭。不久，便有許多人模仿他的辦法。

但到西部最著名的通路是厄里運河，把大湖（Great Lakes）與哈得孫河和大西洋連起來，這樣便成爲進入大陸心臟的水道。早在十八世紀時候人們便在夢想着這樣一條運河。它可以使移民和商人繞過荒野的阿巴拉契安山脈。但開濬一條將近四百哩長的運河工程非常浩大，許多領袖人物都不敢

着手。最後一個有魄力的紐約人克靈頓推動一項運動，把這個希望實現了。他膺任州長後，於一八一七年開始濬築運河工程，經過多年的慘淡經營，此「克靈頓渠」卒告完成。一八二五年一個狂歡的慶祝會歡迎着第一批船舶的行列，而克靈頓在人羣之前把一小桶厄里湖的水倒入大西洋。這條運河——它令巴法羅成爲繁盛的港口，令沿河的新城市如雨後春筍般的茁長起來——鞏固了紐約在美國商業和財政上的領袖地位。

但此還重要的，便是它對於西部發展的貢獻。新英格蘭人和紐約人組成一不息的川流向西移動。這個移民的洪流使克利夫蘭，底特律和芝加哥變成熙熙攘攘的城市，並使西北的大部分帶着顯著的美國土風。它本身負責美國人口的大播遷，對於拯救聯邦也有很大的助力，因爲在內戰爆發之前，它已經把密士失必河上游河谷和大西洋沿岸的北部諸州緊緊地連繫起來了。在這一方面，賓夕法尼亞州的運河系統也與有功焉。原來賓夕法尼亞州人民受「克靈頓渠」的成功所刺激，花了四千萬元建築運輸系統，把費城與四百哩外的皮次堡聯絡着。他們一方面利用江河和運河，一方面用一組斜面的工程克服阿里芬尼斯山的高度，以蒸汽力拖着船隻，貨物和旅客上去。這是一樁英雄的事業，它雖幾乎令賓夕法尼亞州破產，可是它的功用很大，幫助這一州成爲領袖工業州份之一。

人口移動大約與緯度成平行之勢。移入阿拉巴馬州和密士失必州的多數是南部人；移入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多數是北部人。這兩道人的洪流在俄亥俄，印第安那和伊利諾斯等區域匯合。南流沿俄亥俄注入，北流沿厄里運河和大湖注入，和平地混合起來。這兩種人互相通婚，而且與歐洲人通婚。像哥倫巴斯，印第安那波利斯和春田等城市，都是這兩種人所合力建立的。「民主的流域」

從此形成。

外密士失必西部

當我們轉移視線看看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廣袤區域時，我們發覺這個殖民地是一篇更有聲色的故事。它之所以聞名於國內，是因為一個探險隊到過那邊。這探險隊由兩個富有邊疆經驗的弗吉尼亞人路易士和克拉克領導，由傑斐遜派到太平洋岸去考察。這一椿在地理的發見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的著名工作，只由聯邦政府撥款二千五百元！傑斐遜對於西部的新奇事物很有興趣。他曾經長篇大論地寫着他所羨慕的印第安人，寫着俄亥俄河谷所發見從前巨獸的遺蹟。他派遣路易士和克拉克到蠻荒去，他有兩個目的。在科學的考察之外，他希望探險隊替美國的皮毛商人開發密蘇里河一帶。當時那個區域的印第安人帶皮貨入加拿大去賣給英國人。傑斐遜認為他們把生皮順流而下售給美國人必更為容易。

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路易士和克拉克溯密蘇里河，越過洛磯山脈，然後順哥倫比亞河到太平洋岸，完成史詩的探險工作，這種工作被稱為「世界史上最完滿的成就。」他們沒有碰到真正的險阻。因為他們避開好戰的希奧克斯族。他們在十八個月中行了四千哩，把這個區域小心地測繪和描述。他們又奠定基礎，使美國的商人能夠與多財善賈的英國皮毛商人競爭。他們回來不久，克拉克便協助「密蘇里皮貨公司」的創立，並在沿河一帶設立堡壘網。這種事業繁榮發達起來，不久以後，阿斯特的有力的美國皮貨公司打進了西北區。這公司的大部分貿易是在大湖一帶，但阿斯特下

決心想在哥倫比亞河口樹立一個貿易站。一八一一年，他的一隻船叫「東奎恩號」的繞霍恩角北駛，發見了阿斯特利亞（後來埃爾維恩便是根據它寫了一部輕鬆的書），同時由陸路橫渡大陸的另一探險隊也於翌年到達同一地點。

這是一個好的開頭。西部的開發和其商業，因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三樁有聲有色的事件而加速起來。第一件是沿聖大非小路到極西南部貿易的開始，此項貿易當時操諸墨西哥人手中。一個有雄心的密蘇里州人貝克納爾，聚集了七十個做生意人，把貨物用騾馬馱着，旅行八百哩艱險的路程，到墨西哥的前哨站聖大非求售，獲利頗大。翌年，他採用貨車來跑這條長途了。其他的商人也學他這樣做。至此聖大非小路已經通行。跑這條路的商人，常常碰到許多危險，因為他們經過的地方大部分是半沙漠，必須受熱旱所煎逼；他們必須渡過湍激的河流；他們隨時有遭印第安人襲擊的可能。八十人至一百人的大隊是相當安全的，但十人或二十的一小羣往往會為印第安人所乘。這些邊疆的先驅適時地開闢一條路，這對於替國家爭取西南部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件出色的事是洛磯山皮貨公司成立於一八二二年。它是聖路易一個民團的將領阿須里所倡辦的。阿須里徵求一百個青年湖密蘇里河去探源，並在其上游居留一年至三年的時間。這是不靠與印第安人貿易而靠自己捕獵的第一個皮貨公司。在它的職員中，有一些西部開發史上的名人，包括卡爾遜和司密士。卡爾遜是獵人，對付印第安人的戰士，巡邏者和西部探險的嚮導，他所經歷的險阻使他的生命變成了一部傳奇。司密士則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凌駕的探險家。第三件事是一八二三年湖密蘇里河的軍事遠征，其目的在恐嚇阿里加拉族和其他殘暴的印第安人使其就範。這個「密蘇里軍

團」由政府 and 聖路易皮貨商人混合組成，表明美國決心保護它的皮貨搜尋者。

滲入遠西部的工作，教會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助力。教會對邊疆的工作，久就居於活躍的地方，可是一八三一年發生一件奇怪的事，使他們對邊疆工作的熱心得到新的刺激。哥倫比亞河上游的印第安族，已經從英國商人方面學得一些宗教的基礎，此時希望得到進一步的報導。他們派遣四個領袖人物聖路易找克拉克，求索「天堂」。教會刊物發表這個消息以後，引起大家的深切注意。基督新教會派遣幾個傳教士和支援隊伍到極西北，在威拉密特河谷成立一個教會，在蛇河與哥倫比亞河匯合處的附近又成立另一個教會。這項工作的領導人物是虔誠的惠特曼博士。這些教會做了很多工作，把印第安人基督教化。他們設立模範農場，教導入教的印第安人怎樣建築房舍，開墾田地和種植穀物。他們所寫關於當地景物和氣候的信件，又引起了他們的親友的興趣；不久，移民的常年隊伍渡過平原和山嶺到奧勒岡區。

奧勒岡路

由密蘇里河旅行到哥倫比亞河的第一批探險者模糊地循着一條路線。這條路線一個時候明確地稱為奧勒岡小路，到了四十年代的中葉竟成一條大公路。它長二千哩，隨處都是險阻。它自密蘇里河岸的獨立城開始，經過平原到洛磯山，由其較低的南峽口爬過，繼續伸展，經過不毛和多山的地帶到蛇河上的賀爾堡，從此小路便穿過幾乎不能通過的藍山脈到烏馬底拉河以達哥倫比亞河。還有另一條路線在大鹽湖以西通達加利福尼亞。第一批啓程到太平洋岸去的移民係比特威爾所推動，總

計有男人和婦孺約八十人，他們穿過蠻荒，於一八四一年成功地抵達奧勒岡。這是一個驚人運動的前衛。一八四三年發生了「人民大移出」。當時有二百個家庭共約一千人渡過平原和山嶺，驅着他們的牲口到他們的目的地來。他們的牛隊，每小時跑二哩，天氣好的時候每天可跑二十五哩；天氣壞的時候只能跑五哩或十哩。到了一八四五年，循奧勒岡路線的人的小溪變成了一條人的洪流。那一年到威拉克密特河谷的人約逾三千。

奧勒岡運動是史詩一般的移民運動。「跟上去！跟上去！」的聲音在清晨的空氣中響着；由精選領袖率領着的車隊排成長長的行列開始向前移動了。薄暮時分，他們便停下來宿營，圍成一個大圈，車輛，行李和男人在外面，女人小孩和牲口在裏面。步哨在崗位上謹慎地警衛着。在路上，他們煮食物，洗衣服，同時還繼續戀愛，繼續生小孩。身體羸弱者死於途中，埋葬在沒有標誌的墳墓裏。當困乏的牛和騾不能再拖重載時，寶貴的東西必須棄置路上。當遭受印第安人，灰熊，可怕的虎烈拉或壞天氣襲擊時，這行旅便成爲曠日持久的苦難。但有些人則認爲這是興高彩烈的行動。有一個人寫道：「路上變幻的風景，草原上的牲畜，印第安人，山間的商人和獵戶——那是一次長程的郊外遠足。」這大衆運動使奧勒岡成爲一個美國人的社會，在它歸入合衆國的工作上盡了不少外交的力量。這運動把此邊遠地方有效地殖民，故到了一八四九年這塊地方組成一個區域，不過十年以後又一躍而爲一個羽毛已豐的州份。

摩爾蒙教派的播遷

西部最驚人和最重要的宗教性殖民是猶他州的摩爾蒙教派。美國個人主義，不從國教，和福音派的傳統氣習造成了許多奇異的教派。它們大部分是現有團體的分支。但摩爾蒙教派完全是個嶄新的組織。此教派的創造人是斯米士，其大本營後來遷到伊利諾斯。他們在密士失必河岸建築一個繁榮的諾務城，創辦一間大學，並開始建造一個大寺院。他們又採用一夫多妻制。因為反對這種制度和這種宗派，同時又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嫉忌，結果引起了一次暴動。暴動羣衆把斯米士和他的兄弟從郡監獄中提出來吊死；不久，摩爾蒙教派——此時由能幹的楊格領導——被驅出伊利諾斯州。他們渡過密士失必河，決定到極西部尋覓和平與安全。

結果便是對大家所認為荒漠之區的輝皇的開發。楊格率領他的羣衆橫渡平原，進入大鹽城流域。在這高山圍繞着的地帶，他發見肥沃土地，一種適合健康的氣候和足供灌溉用的水量。他指導羣衆開墾田地，選擇建市的地點，並計劃與東部的交通路線。不久全個區域都有水渠。楊格施用獨裁權力，可是他的聰明和善意令它可以受人容忍。他和他的教會職員組織猶他產品的買賣制度；他們控制着這個殖民地，選擇新城市地址，並派遣適合需要的工匠；他們使鹽湖城有寬闊的街路，有一條條閃爍着的小河，有寺院和尖塔——成爲美國最饒趣味地方之一。這是美國實行計劃經濟的第一次經驗，而且這一次是成功的。一夫多妻制繼續了一些時候，配合一個健全的殖民目的——因爲婦女在信教者中佔多數，而邊區沒有地位可以容未結婚和沒有子女的女人。到了一八五〇年，猶他組成爲一個區域。

台薩斯的歸併

台薩斯的歸併以及從衰弱的墨西哥征服到加利福尼亞和西南部，其結果使美國的幅員遠及西部。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數年之內，美國的領土擴展到美洲大陸最富饒和風景最佳的區域。許多作家認為美國從墨西哥奪得台薩斯是一種不道德的侵略，羅威爾說南部想得台薩斯不過想得其奴隸而已。這不是公允之論。這塊土地之歸入美國是一種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所使然——這過程可以叫做「顯明的命運。」

台薩斯最初是墨西哥共和國的一部。這塊地方大小與德國差不多，而只有少數的牧人和獵戶。最初，它吸引了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奧斯丁於一八二一年在這裏樹立第一個英美殖民地。免費土地是主要的鈎餌。墨西哥政府之沒有效率，腐敗和暴虐，使移入的人民起而叛變，經過幾場戰鬥之後，贏得獨立。一個插曲便是墨西哥人攻陷了聖安東尼奧的一個砲台叫阿拉摩的，在這裏每個防守的美國人都被殺了；「特摩派拉還存有使者一人；阿拉摩則同歸於盡。」台薩斯共和國建立後很是發達，吸引到很多新的美國移民。在某一個時期內，美國拒絕考慮歸併它的任何提議。可是爲了一些原因美國人的主意漸漸變動了。第一，他們認爲有向人煙稀少未經開發的西部發展的義務。第二，他們認爲台薩斯人是同種，其天然地位應該是在美國旗幟之下。第三，他們深恐英國會干涉台薩斯，把它淪爲保護國。第四，祕密的動機正在醞釀着。北部人想在台薩斯出賣農產品和製造品；船商希望他們的船隻可以在到加爾凡爾頓去的航程上獲利；新英格蘭的紡織廠主希望得到台薩斯的

廉價棉花。許多南部人想移居到這裏來，可是又不願離開美國旗。

在一八四四年美國選舉時，大多數選民已經表示他們準備把這個小共和國收入聯邦之內，翌年年初台薩斯便實行歸併入美國。

墨西哥戰爭和加利福尼亞與新墨西哥的取得

同時，許多美國人又想用同樣和平的手段取得加利福尼亞的控制權。因為加利福尼亞的特殊地位，他們認為這個希望可能成爲事實。加利福尼亞只有稀少的一萬一千或一萬二千人口，緊緊地靠着太平洋海岸。他們沒有貨幣，沒有軍隊，也沒有政治經驗。他們身體裏面，西班牙的血統較墨西哥的血統爲多，他們自認在體格上和智力上是優越的，自認只在名義上附屬於墨西哥。的確，如果不是因爲他們的家族猜忌和南部加利福尼亞與北部加利福尼亞間的爭執，他們早就脫離墨西哥了。墨政府沒有在這裏設法院，警察，郵政和學校。加利福尼亞與墨西哥城間的交通是稀少而無定的。墨西哥坦白承認它的主權是有名無實的，故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葉有將加利福尼亞賣給英國的意思。在這裏的美國人一年一年地增多，勢力也一年一年地長大。美國人的船隻在很久以前便在海岸一帶經商，移民想在有好氣候地帶墾殖並從麥和牲口身上獲利的早已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越過山嶺了。到了一八四六年，加利福尼亞有外僑一千二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無怪有些人認爲美國如欲取得加利福尼亞必易如反掌——並不需要施用武力。

如果墨西哥戰爭不發生，這件事也許是可能的。這次衝突的遠因是兩國間猜忌日甚，而近因則是

關於台薩斯邊界的糾紛。美國認爲這是一次短促而輝煌的戰爭。台勒所指揮的一支美國軍隊開入墨西哥北部，陷設防城市蒙特來，在布恩納維斯達的激戰中擊敗了龐大的墨軍。另一支軍隊由一八二二年戰爭英雄司考特統率，在委拉克路斯登陸，西向越過山嶺，於激戰後佔領墨西哥城。司考特在這裏的蒙特朱瑪會堂懸起美國國旗。當和約告成時，美國不僅得了加利福尼亞，而且得了加利福尼亞與台薩斯之間一塊很大的地方叫新墨西哥——包括現在的內華達州和猶他州。在這裏和台薩斯，美國一共獲得了九一八〇〇〇方哩的土地。

美國在這裏還發現一個寶藏。和約批准了以後，人們在加利福尼亞的山間發現金沙。大隊想發財的人卽刻出發，有的由海路，有的由陸路，他們尋覓溪澗和峽谷，這裏他們用槽和盤可以淘出寶貴的金塊來。山間滿佈怒吼的帳篷；舊金山轉瞬變成一個茁壯的小都市，充滿着罪惡，奢侈和精力；而加利福尼亞也不旋踵由一個西班牙和美國牧人的無精打彩和富浪漫情調的社會，變成一個擁擠的著名盎格魯撒克遜區域。這一古舊的日子，黃金的日子，和一八四九年的日子——是美國歷史上最最有聲有色的時候。加利福尼亞的發展是這樣的快，一八五〇年便歸入聯邦成爲一個州。

取得了西部這一大片新土地，使美國對於各種漠不關心的問題不得不加以注意——例如加勒比海問題；太平洋問題；地峽運河問題；最重要的是，有蔓延整個區域之勢的奴隸問題。

第十章 區域鬥爭

奴隸：「特殊的制度」

內戰爆發前六年，一位精明的紐約觀察家歐姆斯退德曾到密士失必參觀一個第一流的植棉場。他見到一座富麗的大廈，附近有大約一千四百英畝地種着棉花，玉蜀黍和其他農產品，還有二隻豬。那裏有一百三十五個奴隸，其中約七十個在場地上工作，三個是機器匠，九個是主人私宅和馬棚的僕役。他們從黎明到天黑，勞作不休，只有星期日，有時星期六，纔得到休息。在夏天，執鋤的奴隸們耕作達十六小時之久，僅僅在吃午飯時有一點閒暇。伙食方面，每一星期有一籬筐玉蜀黍和四磅豬肉，再加上奴隸們自己種的一些菜蔬，雞蛋和鷄鴨。每到聖誕節，主人纔慷慨地分賞他們些糖漿、咖啡、菸草和棉布。黑人們自己可以到小樹叢中取些柴來在他們的小屋中當燃料，每逢星期日他們可以砍些木塊去賣，得點錢需用。一個黑人工頭在那些人當中走來走去，催促他們做事，手裏揮動着一根鞭子，有時把鞭子打在他们們的肩膀上，白人監工就告訴歐姆斯退德說：這裏紀律不壞，雖然他剛剛賣掉了一個，因為他企圖刺死他。他說：他的伙計們不常逃跑，因為他們準知道是會給捉回來的。他一看見有誰不見了，就立刻把獵犬放出去追。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農場的典型。歐氏和許多其他觀察家曾看到對待奴隸更爲苛酷的農場，他也看

到一些對奴隸比較寬厚一點的地方。批評家們反對奴隸，因為勞動時間過長，常常鞭笞，一經出賣則妻離子散，慘不忍睹，整個剝奪了黑人的教育和進步的機會。贊成的人們則稱道這種制度，認為它對失業，疾病和老年的工人是一種保障，認為它使南方不致發生罷工和勞資衝突的事件，認為它把一羣異教徒感化為基督教徒，逐漸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他們還說這種制度使主人變得任俠，使僕役變得忠順。總之，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而言，奴隸制當時是贊否參半的。歐姆斯退德和「當前的危機」一書的著者海爾潑都以為奴隸制是南方貧困的因素，可是許多南方人則把南部的落後解釋為受北部侵略的影響。在社會方面，北方人聲言農奴制對黑人與白人同屬有害。但大多數南方人却以為控制偌大一羣黑人，和保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非有奴隸制度不可。

實在說來，無論北方南方，當時美國人中很少是真正懂得這個特殊制度的。原來關於美洲奴隸制最重要的事實是「黑」奴這一點，它的特點大多是與種族有關的，倒不一定在乎身分方面。整個制度的作用在於確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而非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黑人的法律地位雖自內戰和合衆國憲法第十三條附款通過後即已完全改變，黑白人中間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却無多大變更。

一八五〇年美國的全人口超過了二千三百萬（在其後十年之中較大不列顛人口還多），奴隸的總數是三百二十萬。在南加羅林納和密士失必，他們人類超過了白人。在路易斯安那他們幾和白人相同，在阿拉巴馬他們約為全州人口的七分之三。南方有些很大區域，那裏的黑人往往不到居民的十分之一；在整個阿巴拉契安山脈，從馬里蘭到阿拉巴馬，幾乎沒有黑人蹤跡。但南方有些地方黑人特別衆多。在查爾斯北邊，他們佔當地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喬治亞的海岸也佔到百分之八十，在

阿拉巴馬中部約百分之七十，密士失必河下游有一塊地帶他們佔到居民百分之九十。在氣候炎熱，土地平坦肥沃的地方，奴隸人口最多；貧瘠多山的地方就最少。南方人中有奴隸的佔少數。據一八五〇年人口調查，白人總數約六百萬中間，擁有奴隸的只是三四七二五人。雖然大多數黑人是散佈在許多產業上，可是在南方下游地區種植棉花、甘蔗、稻米的區域，三四千巨室竟擁有當地大多數的奴隸，住在最好的土地上，享受着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三。例如喬治亞州的柯布氏，就擁有一千個奴隸，種有一萬英畝棉田。政治的威權和智識的牛耳也都集中在這些人數較少的貴族手裏。

從一八三〇年左右開始，南北兩地對奴隸制問題的論爭，日趨尖銳，廢除論者，尤其是所謂「自由土壤」(Free-soil)，即堅主奴隸制不得再擴充一寸地區)的呼聲，在北方諸州響徹雲霄。性情暴躁的夏里遜氏於一八三一年在波士頓創辦了一個出版物，稱爲「勇敢者」。和他起了同樣積極作用的，還有福音使徒費尼和煽動家威爾德所領導的俄亥俄州一派有氣魄的人士，和塔潘所領導的一羣紐約人士。所謂「連根帶枝」解放的這個要求，他們提倡最力。保守派對他們施行迫害之後，更像火上加油。一八三七年勒夫喬伊氏在伊利諾斯州的阿爾頓城主辦一家報紙倡導廢除奴隸制，遭受一羣惡徒襲擊，他極力抗拒，卒遭殺害。這事發生後，解放的運動益如風起雲湧，不可遏止。若干民權的事件疊次發生，益發使很多有能力的人相信這中間實在廣泛地涉及到人類自由的問題。雄辯家波士頓的利蒲斯自夏里遜受暴徒襲擊之後便毅然加入解放運動。紐約北部的富豪史密斯因在烏提加參加反奴隸制會議被人攻擊，也加入了這個運動。這類情形，不一而足。「連根帶枝」廢除論者爲民衆熱烈擁護，以這時期爲最盛。「自由土壤」派更是遍地皆是。而在同時，南方的許多領袖們却

聲言奴隸制爲天經地義。多瑪斯·狄由氏著書辯護它；南加羅林納州州長哈蒙在一八三五年揚言奴隸制是「我們共和國殿堂的基石」；柯爾豪恩氏更引證古代的雅典說，奴隸制爲燦爛的文化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

從最初起，明敏的觀察者即已看出，這個地域的爭執危害着聯邦的統一。約翰·昆西·亞丹斯在國會中更屢次對南方警告，它們如果退出聯邦，必將挑起戰爭，而「一旦你們這些擁有奴隸的州變成了戰場，無論是內戰，奴隸的叛亂，抑或對外的戰爭，從那時起，憲法的戰爭大權即將擴張，以至對奴隸制加以干涉。」那個預言終於由林肯證實了。

風起雲湧

關於奴隸制度的爭議，剛好發生在西南部廣大領土因台薩斯問題與墨西哥戰爭而必將歸併於合衆國的時候，故整個局勢，愈益爲之尖銳化。用傑斐遜的話說，就是：火警的警鐘又在深夜敲響了。在一八四四年以前，法律只准奴隸制在業已存在的地方繼續維持，不受干擾。它的地域範圍曾在「密蘇里妥協案」中加以限定，從未逾越。現在擁護奴隸制的人們竟要求擴大範圍，北方人士乃紛紛反對。他們認爲奴隸制如果局限在一定範圍以內，終會毀滅的；他們說華盛頓，傑斐遜，和其他開國元勳都有如此見解。他們並且指出一七八七年公布的法令，禁止奴隸制擴大到西北部。台薩斯本來就有奴隸制，所以它加入聯邦就是一個奴隸州。但加利佛尼亞，新墨西哥，猶他三地是沒有奴隸制的。當合衆國準備接收這三個州時，賓夕法尼亞州出身的民主黨議員威爾莫特就在一件撥款案上

作爲附件提議：凡從墨西哥割讓過來的任何領土上，永遠不許有奴隸制。衆院通過了威爾莫特提案，但參院加以否決。

在南方人看來，一個地區藉他們的血液爭取過來，就應該使他們與北方人有同等的享受權；他們把奴隸財產搬到這新地區中正和旁人把機器財產搬進去一樣，否則是不公平了。但在自由土壤派看來，這些處女地上若也肆意實行那種瀆喪自由企業和他們的道德感的制度，是非常難堪的事。在這個政爭中有一個憲法上的問題。憲法已否允准國會在國家領土上排除或規定奴隸制？國會事實上已屢次通過有關的法律，不過這個機構是空泛的，於是柯爾豪恩氏和南方的其他過激分子就揚言說：奴隸制是隨着國旗一同來到這共同的領域的，斷乎不能取消。一八四八年大選時一個強有力的「自由土壤」黨出而競選。該黨推舉了布倫爲總統候選人，並在它政綱結尾寫上這樣一句話：「我們在我們的旗幟上大書了『自由土壤、自由演說、自由勞工、和自由人民』的字句，並且在這個旗幟之下繼續戰鬥，永遠戰鬥，直到最後勝利可以報償我們的努力爲止。」該黨在那次大選中得到不少票數。民主黨當時所以敗北，大由於該黨活動之功。那一次大選結果，美國自由黨選出了它最後的一任總統——戰爭英雄戴樂爾。

在那次大選期間和大選以後，人們已可看出，最南方諸州甯可脫離聯邦，也不願屈服於上面所說的威爾莫特案。同時，北方反奴隸制的人們對柯爾豪恩所提奴隸制可伸延到所有新得領土的要求，也決不肯讓步。這時非有一種調解案不可。有一派溫和分子就提議，把密蘇里妥協案所規定的北緯三十六度三分的界限延伸到太平洋海岸，這界線以北爲自由州，以南爲奴隸州。還有一個溫

和派，提議把這個問題交由所謂「人民主權」去解決。換句話說，中央政府應該放手不管，它應該讓移民者自由湧入新的國土，由他帶奴隸進去也好！不帶也好，等到那些國土應該編為聯邦的州制時，讓人民自己去決定這個問題。一八四九年國會開會時，南方的議員公開威脅，準備退出聯邦。喬治亞州的議員吐姆斯就是其中之一，當他發言反對一個北方議員的提案時，他大聲疾呼道：「這案如果通過，我主張解散聯邦。」

一八五〇年妥協案

當此劍拔弩張之際，議員亨利·克雷（Henry Clay）第三度用一種殫精竭慮的妥協方案，把一個危險的區域紛爭調解下來。他的方案是：承認加利福尼亞為自由州；新墨西哥和猶他兩地暫不制定任何支持或反對奴隸制的法律；設置一個比較有效的機構，以使逃跑的奴隸歸還其主人；在哥倫比亞區內廢除奴隸的販賣；台薩斯州內割讓一部領土與新墨西哥之故，應予以相當補償。根據這個妥協案，雙方都要作相當的讓步。這些意見大部分本來是另一個議員道格拉斯的，不過克雷氏集其大成，而且非有他的聲望、辭令、誠摯態度、和他那高貴動人的人格感召，這些提議是不會通過的。

一八五〇年妥協案通過時的一場論辯，是美國歷史上最感人最深的一幕。當時參院中有三個年將就林的國會巨擘——克雷、衛布斯特、和柯爾豪恩。同時還有許多才智過人的比較年青的議員，如道格拉斯、台維斯、修華德和柴恩。在這些人中間，柯爾豪恩和台維斯是反對妥協案的，說它對南方

不公平。柯氏辯稱，爲了避免一種悲慘的衝突起見，對於南方人士的怨憤必須有所平抑。他說，南北兩方互相維繫的紐帶已經一個個破裂了。美以美教會和浸禮會業已分成兩部。「如果這種激動繼續不已，與日俱增，那同一的力量就會把最後的一根紐帶打斷，那時各州之間除了武力之外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維繫起來了。」這個演說稿寫成之後，他沒有勇氣宣讀，自己趕到參院會場後，交把一位弗吉尼亞州的議員宣讀出來。另一方面，修華德與柴恩也反對妥協案，說它對北方不公平。但克雷氏受到衛布斯特特的積極支持。是年三月七日，衛氏作了一個強有力的演說，那也是他生平最後一次演說，他「不以一個馬薩諸塞州人，不以一個北方人，而以一個美國人的資格，」爲團結呼籲。他宣布說，和平的分裂是不可能的。他對於這妥協案的支持，很激怒了新英格蘭州的人士，因此是非有高度的勇氣莫辦的；然而他終於這樣做了，那是一個政治家的行爲——是他對於國家最後一次偉大的貢獻。克雷、道格拉斯與衛布斯特特的溫和和精神終於勝利了。國會通過了妥協案，全國人民心中因此消除一大隱憂。

在短短三年中間，這個妥協案似乎把所有糾紛都排解了似的。自由黨和民主黨中的大多數誠懇地擁護它。但是在暗地裏緊張的情勢有增無已。新的「奴隸逃亡法」使許多北方人感到震怒。他們拒絕捉捕逃亡的奴隸；他們甚至幫助逃跑了的奴隸藏躲起來。這時有一種「地下鐵路」辦理得很巧妙。有些奴隸從沿海地區乘船跑掉。有些在夜間憑着紫微星的方向從他們主人的農場跑出，到俄亥俄河，再從那裏靠人照拂到加拿大去。有些沿着阿巴拉契安山跑進了賓夕法尼亞。北部各州到處都挖有地窖跑道，像所謂「地下鐵路」局長列維·柯芬之類的人們，曾經幫助了無數的奴隸逃到安全

地點。在一八五〇年內，大約有兩萬逃跑的奴隸已安居在北方人羣中，依法應該重行被捕的，但只要一捕捉他們就會引起騷亂。

「黑奴顛天錄」(Uncle Tom's Cabin)一書的作者史鐸伊夫人就是受了「奴隸逃亡法」的感動。她這著作在一八五二年出版，其中描寫奴隸生活的慘淡黑暗，栩栩如繪，無論北方南方人，讀了之後都深為感動。史鐸伊夫人住在辛辛那提的一個邊區的城市，曾訪問過肯達基的農場。她對於許多人道和慷慨的奴隸主，筆下是充分留情的；書中有一個暴虐的奴隸王勒格里，却是個來自東北部的「洋客」。但是她顯示出來；在奴隸制下殘酷是必然的，自由的與奴隸的社會在基本上無法調和。她這本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在英帝國內銷售一百餘萬本。後來演為戲劇，觀者無不動容。年青一代的北方選民尤其被它激動起來。

到了一八五四年，各個特別行政區（即尚未變為州的聯邦各地）中的奴隸制存廢問題又舊事重提起來。每當激辯展開之際，雙方都有新的領袖挺身而出。南方激烈派決心要廢止「密蘇里妥協案」，因為該案使密蘇里上部流域完全不得保有奴隸。南方人每一採取什麼步驟來達成這個目的，北方輒勃然奮起，劇烈反對。

原來密蘇里河兩岸擁有現在稱為康薩斯和內布拉斯加兩州的肥沃土地，當時已經吸引不少人移殖到那裏去了。如果能夠建立穩定的政府，這塊地方的發展一定大有可觀。北方的人相信這裏人口增多以後，就可以從芝加哥築一條鐵路通過這裏而達於太平洋岸。這樣把南方原有的一個從新奧良斯建築向西橫貫鐵路的計劃，根本打破。對於北方這條鐵路計劃最感興趣的，莫過於當時參議員道格

拉斯。道氏本人住在芝加哥，他是一個積極的地產投機家，而且成了參議院中「特別區委員會」主席。但是他遭遇到強烈的反對。

依照「密蘇里妥協案」，上述地區是不得實行奴隸制的，而密蘇里又反對把它的西隣康薩斯變為非奴隸區，那樣就會太便於密蘇里的奴隸逃到自由區去了。不但如此，康薩斯變為自由區後，密蘇里的三面都是自由區，在當時反奴隸制奔騰澎湃的運動之下，它本身也許很快變為自由區了。在華府的密蘇里代表，有一個時期在南方人支持之下，極力反對任何開發上述地區的努力。

一八五四年，參議員道格拉斯竟毅然獨排眾議，提出一個法案，使所有「自由土壤」派人物為之震怒。這個提案就是實行道氏素來主張的「人民主權說」，認為一八五〇年的妥協辦法已超越密蘇里妥協案，應讓猶他與新墨西哥兩地自行決定奴隸制的存廢問題。該案並提議將兩個地區——康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編制為特別行政區，特許移居的人民攜帶奴隸入境，而且授權當地居民自行決定將來正式加入聯邦時是否保存奴隸制。毫無疑問，道氏的動機是不單純的。他被人責難，說他故意想討好南方，以冀在一八五六年大選時得操左券。而他的政治野心的確是很強的。他的民主黨的同志們大多是南方人；他娶了一位南方的妻子；他並不憎惡奴隸制，也不反對擴大它的地域。不過他的主要目的是迅速開發那塊地方；在他認為，那裏的氣候反正是不適宜於奴隸制度的。

但是北方人對他這方案却是羣情憤激。他們認為把這些西方的大草原開放給奴隸制，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於是在討論他的提案過程中，發生了劇烈的爭辯。「自由土壤」派的報紙一致斥責他。北方成千動萬的教會人士演說攻擊他。即使以前和南方要好的商人，也都突然轉變了態度。北方各

大都市紛紛舉行羣衆大會攻擊道氏和他的方案。他自己也說過，他若從華盛頓走到芝加哥，一路上都可以踏着準備燒燬他的肖像的火焰。三月間的一個早晨，他的提案終於在南方代表歡欣鼓舞中通過了參議院。後來道氏真地訪問芝加哥演說，想辯護他的立場，停泊在港中的船隻下了半旗，教堂的鐘悲鳴了一小時，一萬個羣衆向他呼喊咒罵。

道格拉斯案實施後的直接結果關係太大了。在奴隸制應否擴張到特別行政區的問題上採取騎牆態度的自由黨，已趨沒落，而另外一個強有力的新團體——共和黨，應運而生。這個新黨富於理想和熱情，吸引着有頭腦有魄力的青年，對東部的商人和西部的農民都具有誘惑力，從一開始就銳不可當。一八五六年該黨推出弗列蒙爲總統候選人，弗氏曾到極西部探險過五次，譽滿全國，他並且走遍北方大部國土。如果該黨在當年十月的選舉中獲得賓夕法尼亞的多數選票，那一次大選他甚至會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布查南氏。同時一些「自由土壤」派領袖如修華德和柴恩等聲勢日隆，和他們一道的，還有一位伊利諾斯州出身的瘦長個子的律師，每一論及新問題時就表現出驚人的邏輯能力的阿伯拉罕·林肯。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林肯在麥歐里亞發表一篇演說，就是揭發「自由土壤」說最精采的聲明。他說，對於奴隸制，既已存在的，他無意加以干涉。「縱令將世間大權給我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對這現存的制度怎麼辦。」他說「密蘇里妥協案」是區域間的一個重大合約，國會無權廢除它，正如國會無權廢除禁止從非洲輸入奴隸的法律一樣。他認爲：所有全國性的立法都應該構築在共和國鼻祖所採行的原則上；奴隸制是應該加以限制，遲早予以廢止的。他並且指斥「人民主權」論之謬

誤，因為西部國土應否採行奴隸制，不只是當地人民，就是全美國人民都要過問的事。「如果三十一個州的人民沒有權利說第三十二個州不得實行奴隸制，試問內布拉斯加一地的三十一個居民有什麼權利說第三十二個居民不得擁有奴隸呢？」

南方奴隸主與北方反奴隸制的人源源移入康薩斯後，衝突乃益尖銳，彼此間常常發生游擊戰的驚險故事。雙方都派移民往前去佔領新土地，北方的「移民救助社」尤其勤奮。他們都有好的武器。不久以後就可以看出，北方人佔了優勢。和這地區比隣的密士失必上游有一大部分居民都是主張「自由土壤」的，而且把奴隸帶到這裏後，他們會容易逃到自由區去。這些都是有利於北方人的因素。不過，實行奴隸制的密蘇里，常有很多「邊區惡霸」渡河來不法投票或恐嚇北方的移殖者，同時擁有奴隸的階級因有布查南為總統，有恃無恐。於是，這衝突牽延不決，全國人心日趨聳動。隨後總統布查南竟至失態，企圖誘引參眾兩院都以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使它承認康薩斯有權實行奴隸制，這一來在北方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連道格拉斯都一怒而與總統決裂了。

同時，有許多北方人，以為一八五〇年的妥協案既已被南方破壞，便拒絕實行作為當時妥協條件之一的「奴隸逃亡法」。各地羣眾紛紛起來，為逃亡的奴隸緩頰。北方許多州通過了「人身自由法」，那是公開抹殺聯邦法令的。有一次，叫做勃恩斯的奴隸到波士頓後被人抓住，該城竟有好些最著名的領袖挺身為他聲援。馬薩諸塞州東部各地無數人士激於義憤趕來參加，羣情沸騰，萬人空巷。後來為了將這一個可憐的黑人重行迫使為奴，竟至動員了全城的警察武力，全州的民團，全國的陸海軍部隊。

這時戰機日緊，舉國騷然。南北人士好像在緊鑼密鼓中。一八五六年，有一位火氣很大，代表南加羅林納州的衆議員布魯克斯，曾經因為聽見一位代表馬薩諸塞的參議員孫那的一段荒謬演說，大爲震怒，竟用木棍在孫氏的參議員座位上將他重捶一頓，以致孫氏多年殘廢不起。一八五七年初，最高法院譚納和最高法院中的多數推事，在判決「司考特案」時，宣布衆院無權將奴隸制度排除於特別行政區以外。這是一個很壞的解釋例。「自由土壤」派的報紙和政客們立即以空前的激忿抨擊最高法院，宣言時機一到，必將這個錯誤的判決推翻。當時詩人主筆布萊因特曾寫道：「如果這個判決成爲法律，那麼自今以後奴隸制度便不是那些擁有奴隸的人們所稱的特殊制度，而是一種聯邦制度了。也就是所有各州的共同羞辱。……無論我們的國旗飛揚在什麼地方，那都是奴隸制的旗幟。既然如此，那旗幟上的星光和紅條就應該一概抹掉，染上黑色，上邊畫起一條皮鞭和一付鐐銬。我們應當毫無問題地接受這些憲法的新解釋嗎？永不！永不！」

一八五八年，林肯和道格拉斯同在伊利諾伊斯競選參院一個席次，他們之間那一串爭辯是很可紀念的。在英語中，沒有任何爭論像他們那樣犀利，明快，富有撒克遜民族的力量。這些爭論使全國上下痛感當時問題的重大。由於林肯的雄辯，道格拉斯不得不強調供認他的信念，即最高法院關於「司考特案」的判決，並不一定推翻在特別行政區內人民主權說的原則。道氏當年雖獲選爲參議員，但翌年林肯就成了一個全國性的人物了。

一八五九年就發生了約翰·布朗突襲哈卜斯渡口的事件。那是一小羣人狂妄地侵入弗吉尼亞，企圖解放並武裝當地奴隸的一個事件。這一個荒唐而為法律所不容的冒險，完全失敗了。南方遭受這個突襲，覺得理直氣壯，非常激怒。但布朗和他的六個同志後來被執行吊死時，許多北方人就歌頌這位廢止奴隸運動的老戰士，和一位自由的烈士般地供奉他。沒有過兩年，士兵們便高唱着「約翰·布朗之身」的歌奔赴戰場了。

這些事件，所以愈演愈烈，究其底蘊，是有一個重大事實存在着的，那就是北方和南方業已變成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迥乎不同的兩個地域了。南方差不多完全是農業的，顯著的城市只有一個新奧良斯。至於北方，廣大地區都已城市化，紐約很快就達到一百萬人口。南方只有很小的製造業，有些企業發展起來也不過像里區芒特的特里得夏鐵工廠之類罷了。南方所有的紡紗廠所用的棉花還不如馬薩諸塞州一個羅維爾鎮所用的那樣多。北方則恰好相反，這時到處都建立起蒸蒸日上工業設備，大量生產着鐵、紡織品、靴鞋、鐘表、農具、和無數其他物品，並且還造船、裝製肉類，磨麵粉，在技術上看着進步。從歐洲轉到美洲來的人口有如潮湧（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的十年中間，數達二、四五二、〇〇〇人），他們都停留在北部和西部。愛爾蘭人住在城市裏，許多日耳曼和斯坎的那維亞人就在農場上，不列顛人到處都是。在這種情形下，北方已發生了嚴重的勞工管理問題，同時也不乏貧民窟。南方本來是可以歡迎這些移民的，不過去的人很少，因為他們並沒有意思和奴隸去競爭。鐵路建設在北方也遠較南方為發達。從東部起有三條幹線越過或圍繞着阿巴拉契安山建造起來了。在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期間所建造的二萬英里鐵路中間，絕大部分都在北方。

在北方人中贊成保護關稅的，一天天增多。而以農業爲主的南方則因想低價購買製成品，非常痛恨這種措施。北方很想快些把公共的土地分配給小農。一種強烈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移民都該有一塊自由的土地，一天天昌揚起來。「投票得一塊自己的土地！」變成了普遍的呼聲。南方希望的是公共的土地保留起來，待高價而沽。西北部的人士要求內政有所改進，南方人士則對此漠不關心。北方要有一種有效的全國性的銀行制度；南方人士因爲積累資本不多，便敵視集中性的銀行制度。在社會方面，北方儘管有許多大城市貧富逐漸趨於極端，却比南方來得民主些；在南方，擁有奴隸羣的少數階級佔有了絕大部分的財產和勢力。

不過這些差別雖然非常重要，如果彼此沒有疑懼和成見相激相盪，南北的畛域也不至劃分得那樣尖銳。南方人士深刻體會到，在奴隸問題之中實存在着一個幾乎不可解決的種族問題。正如傑斐遜所說，他們「抓住了狼的耳朵」，既不能控制牠，又不敢放掉牠。同時北方的批評中間有許多是自私的，破壞性的，挑撥的。在另一方面，甚至林肯之類的富有理智的北方人都深怕激進的南方人會試圖把奴隸制度擴充到全國。他們還害怕最南部的人會重開奴隸的販賣，如若干南方領袖所主張，而且害怕在擴充這種制度的過程中，他們會使全國走入戰爭，以求征服古巴，墨西哥，或中美。一八五四年美國駐在英、法、西班牙的三個民主黨出身的公使曾簽字過一個不負責的宣言，叫做「歐斯登宣言」，主張兼併古巴，益發引起了對南方帝國主義的疑忌。

林肯當選

一八六〇年的大選，共和黨得到勝利，於是促使南方脫離聯邦，而共和黨之能獲勝，却是民主黨內閣所造成。這一次內閣的背後，有着美國政治史上最戲劇化的故事。

好多年來，南方極端派每每要求國會通過法律保障特別行政區裏的奴隸制度，其人數與日俱增。原來當最高法院判決司考特案時，道格拉斯曾經宣言，這個判決雖使奴隸制度可以自由擴充到所有特別行政區，但地方上若有敵視奴隸制的法律，該判決仍屬無效。這個意見發表以後，保障奴隸制的要求，乃加倍強烈了。密士失必州的議員台維斯，阿拉巴馬州議員嚴賽，和喬治亞州議員圖姆斯，——三個棉花王國的代言人，都一致主張如此。一八五九年密士失必州議員布朗，曾在議會大聲疾呼，重申這一要求，並且說，南方所要求的是行動——「積極的，無條件的行動。」其他南方各州議員都羣起響應他。

但是道格拉斯絲毫也不屈服。他宣布說，布朗這般人的要求，是侵犯特別行政區中的民衆權利的。在美國歷史上，國會從來沒有為任何一州通過一種刑法或保護財產的法律。從一七八九年起，國會就將制定這些法律的權力交付給各州議員了，為什麼現在要打破這一健全的原則呢？民主黨許多年來都主張國會對特別行政區採取不干涉主義，為什麼現在要放棄這個健全的主張呢？道氏大聲疾呼說，無論任何民主黨候選人，若主張國會有權強令某一特別行政區實行奴隸制——不管該區人民是否拒絕它——他斷乎不能在北方任何一州獲勝。在另一方面，台維斯則聲言：國會是應該確定美國公民的權利的；倘若特別行政區的立法在保障人民財產方面沒有履行它的正當職務，那麼國會便應該做這件事。道氏反駁他說：那是完全不對的。如果歐列根不通過鼓勵養畜騾子的法律，我決

不能在華盛頓通過一種法律強令歐列根養騾子；如果歐列根不接受奴隸制，我決不強迫該地人民實行奴隸制。

這樣爭訟紛紜，相執不下，終於當一八六〇年民主黨舉行全國大會時，該黨發生破裂。是年該黨代表集會於查斯頓，那正是主張奴隸制最激烈的中心地。兩年來道格拉斯和台維斯在參院中的鬥爭，到這裏達於頂點。當時道氏如果獲勝，民主黨仍會是一個真正全國性的政黨，在北方、西方、南方同為強大無敵。如果台維斯的政綱獲勝，即強令不願有奴隸制的地方也實行奴隸制，那麼民主黨就只能變為一個地方的政黨，僅僅在南方佔優勢而已。

大會辯爭得最劇烈的時候，極端派代表想強把他們的要求列入黨的政綱以內，這時道格拉斯的代表人高呼道：「南方的紳士們！你們在貽誤我們呵，你們在貽誤我們——我們決不幹！」代表中多數堅決反對台維斯的主張。至此，阿拉巴馬州的代表團便首先起立抗議，離開會場。南加羅林納州的代表團繼續退出，其他最南方的代表也紛紛出去。民主黨既已全部分裂，大會乃未決定總統候選人而散。隨後兩派各自召開代表大會，南方極端派推出布萊金瑞治為候選人，反對派則推定道格拉斯。這一次破裂意義之大，許多人在當時都未能看出。不僅民主黨在那一年的大選中註定了失敗的命運，而且北方和南方間的重大連繫又失掉了一個。

與此相反的是，共和黨以整個團結的精神參加大選。該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情緒非常熱烈。會中推定最孚衆望的中西部人物林肯為總統候選人。該黨黨內和林肯一道競選的修華德和柴恩雖告失敗，却忠誠地支持着黨的路線。黨的精神提得很高。一種嚴肅的決心和佈道的熱情激勵着千百萬的

選民，反對現有的奴隸制再向任何地區擴大。該黨得到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強有力支持，比起四年以前在金錢上要富裕得多了。一八五七年一個短時期的嚴重經濟恐慌，刺激了產業界人士要求實行保護關稅，同時也促使商業金融界要求一種更完善的銀行制度。共和黨允諾滿足他們這些要求。不但如此，它還宣言要頒行一項法律，使所有移民都有地可種，這對於渴望有土地的北方人，號召力很大。總之，共和黨在經濟上說，強烈地吸引了美國人民。

在大選那天，林肯得一、八六六、四五二選票，道格拉斯得一、三七五、一五七選票，布萊金瑞治八四七、九五三選票，主張南北兩方應求妥協的田納西州人貝爾得五九〇、六三一選票。林肯所得選票在總票數中雖佔少數，但他所得的「選舉人票」却是決定的多數。從全國投票看來，人民毫無問題是主張團結與和平的。唯一主張脫離聯邦的競選人布萊金瑞治得票不到總數五分之一。

不過在南方，極端派是居於控制地位的。南加羅林納州已然決心脫離聯邦了。爲什麼呢？當時的情形，似乎無論是南方還是奴隸制，都不處於任何真正危險的境地。幾乎在他第一任總統全部任期內（如果南方各州繼續在聯邦以內），林肯會遭遇國會中的多數反對的；最高法院也操縱在南方人手中；他會是完全無能爲力的。因此之故，林肯會極力否認他有意損害已然存在的奴隸制度。除非修改憲法，奴隸制是不會在南方廢除的，而修改憲法在幾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脫離聯邦的舉動居然發生了，而其後果也就不問可知。

採取這一舉動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確切把握證明除了南加羅林納州外可以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團結的情緒在南方原是很強烈的，和平的情緒亦復如此。在一八六〇年的大選中間，十四個實行奴

諷刺的州民投給兩個妥協派候選人道格拉斯和貝爾的票，比投給極端派布萊金瑞治的票多出一二四、〇〇〇張。把最南方幾州的選票加以縝密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當時脫離聯邦案如果交付公正和公開的人民表決，是會被推翻，甚至在脫離聯邦和內戰爆發以後，南方堅決反對分治的勢力還很強大。南方在北加羅林納州實行徵兵就未成功；據說東部田納西州許多縣份，志願參加聯邦軍隊作戰的，在人口比例上，比北方任何縣份都還多。可是革命往往是向最堅決的少數人發動，而一八六〇年脫離聯邦也居然和一七七六年反對喬治三世統治的革命同樣得到廣泛的民衆支持。

南方下半部人士之所以如此，是有許多複雜動機促成的：憎恨北方；競選失敗後惱羞成怒，不願接受關於特別行政區的判決；夢想別樹旗幟會有更好更光明的日子可過。南加羅林納在一八六〇年首先發難，當時宣言說：「北方選舉了一個總統，他的主張和目的是敵視奴隸制的。」密士失必州繼之而起，聲言北方人「已對南方各州採取革命態度。」但它們這時發動的主要理由恐怕是南方極端派認定那是不可再失的機會。任何一個單獨的州脫離聯邦是不可能的。北方比起南方來，日趨強盛。如果這危機拖延下去，不立即設法建立南方獨立的局面，以後便沒有這樣機會了。一個南方的聯邦也許會在世界各國之間佔得一個有力地位，而不久就可以擴張到加勒比海的四週。翌年二月初旬，七個脫離聯邦的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馬的蒙哥馬利城開會，成立了「亞美利亞邦聯」，並選出台維斯爲其臨時總統。

南方上半部另外四個州起初躊躇不決，後來也跟着上述七州一致脫離了聯邦。在最後一頃間還會有人努力斡旋和解。其中最有希望的是返回到密蘇里妥協案，以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爲奴隸區的界

限，但因共和黨拒絕允准奴隸制蔓延到任何特別行政區，致未成議。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黎明時分，南方的大砲便向查斯頓港中的孫姆特砲台開火了。美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便從此爆發。

第十一章 閱牆之戰

兵員和資源

余曼將軍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他的兄弟這樣說：「看見那種死亡和破壞的可怕程度，實足以令整個世界震驚。在過去兩個月中，那種工作每天都有進展，直到雙方或一方的軍隊毀滅了，我沒有看出緩和的跡象。……我開始認爲一兩千人的死傷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的心腸變成這樣的堅硬無情。」他還說：「戰事的最壞階級還沒有開始呢。」這一句話對於喬治亞是確實的，因爲自山脈起以至於海岸止，都在大破壞之中，喬治亞的農場和城鎮將夷爲廢墟。這對於弗吉尼亞也是確實的。這對於格蘭特的軍隊和李將軍的軍隊也都幾乎是確實的，他們的血戰正在進行中。但全國是以輕快的心情來參加這次衝突的。北部人高呼着「向里士滿進發！」南部人矜誇着他們武士的優越性，認爲足以戰勝北方卑鄙的人們。他們雙方都夢想着戰事必然是短促而光榮的。

薩姆特炮台一役的震撼，已經即刻使北部團結起來，同時也使南部團結起來。一種怒火使弗吉尼亞脫離「聯邦」而加入「邦聯」；舊領地成爲南部的首都，因爲達維斯（Jefferson Davis）和他的政府於一八六一年六月抵達里士滿，而它的最能幹的領袖前西點監督李將軍（Robert E. Lee）認爲他的本州的號召力強於國家的號召力。田納西跑入「邦聯」的陣營。在北部，密士失必河的上游

官稱他們不容許有「一條海關線」間隔於他們和海灣之時，強烈地擁護「聯邦」。遙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採取同樣的步驟。邊區的州份馬里蘭，肯達基和密蘇里則在猶豫中，因為它們在情感上極爲分歧。不數日之間，分離論者控制了巴的摩爾，有一個時候幾乎將控制聖路易。但結果基氏，亨利克雷和賓頓的三州固守着它們的舊立場。北部和南部，政黨的界線暫時化爲烏有。當林肯上前發表第一篇就職詞時，道格拉斯象徵地執着新總統的帽；終身是聯邦派的史蒂芬斯成爲「聯邦」的副總統。

每一方面都各有一些優點。在人口、工業資源和財富上，北部比南都強得多。一八六一年的人口統計，表示在星條旗下面的二十三州約有人口二千二百萬，在星棒旗下面的十一州，人口不過九百萬餘。而南部的人口還包括黑人三百五十餘萬在內。北部的鐵路網長約二萬二千哩，而南部的只九千哩而已。北部在工業發展上佔極大的優勢，因爲僅紐約一州，一八六〇年的製造品價值即等於整個「邦聯」的兩倍多，而賓夕法尼亞一州的製造品價值，也幾乎兩倍於整個「邦聯」。在內戰的最後三年中，北部的軍需幾乎是全部自製的，南部必須依賴外國的槍砲，醫藥和外科儀器，而依賴最大的算是外國的彈藥。北部控制着海軍，同時也控制着海洋。它有一種比較富於適應性和多樣性的經濟。它有外來移民所賦與的力量——這種力量下降直至葛蒂斯堡時代，之後便再迅速上漲。南部有其人民的尙武精神，容易佔得許多堡壘和兵工廠，其農業有優越的效率和組織，他們又處於守勢的地位，軍隊可在內線作戰。最主要的，南部要爭取勝利，不必在軍事上打勝仗——不必侵攻或征服北部。它所需要的只是作長期的苦戰，使北部相信南部的本身是不可征服的。它吃得消打敗仗，

吃得消屢戰屢北。「邦聯」如果能夠說服北部，使他們認爲「聯邦」勝利的代價太高，最好還是讓這迷途的姊妹脫離。

許多人認爲南部也有一種大便宜，便是它控制着世界棉花的主要來源——英國需要它的棉花供給織造廠，可能因支持南部而進行干涉。可是不久證明這種估計是錯誤的，英國需要北部的小麥，並不亞於南部的棉。一種無上的侮蔑激刺着南部，可是這也由北部的決心予以抵消。南部的將領們一般地都比較北部的靈敏而能幹；但林肯總統證明比較達維斯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政治家——達維斯有高度的智力，尊嚴和誠意，可是他欠缺豁達的胸襟，有時意氣用事，讓個人的偏見扭歪他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北部容易是比較強盛的一方；而南部的大希望則寄託在其地廣民衆難於被人征服。

認爲戰爭短期可以結束的北部人在布期一役使受到教訓。一枝三萬人的軍隊在華盛頓組成，出發進攻一枝在北弗吉尼亞的布朗後面深溝高壘人數相當多的「邦聯」部隊。聯邦派的軍隊於七月十六日楔入邦聯派軍隊的正面，結果遭遇邦聯派軍隊右翼毀滅性的攻擊。正規軍在驚慌中向華盛頓回竄，路上擠滿了人員、槍砲、拋棄的輜重，以及本來想來參觀打仗的國會議員。北部的其他挫折跟着在密蘇里發生。在波多瑪克河的波爾峭壁一役，日後做最高法院法官的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受傷。至此雙方都準備惡戰。

戰事拖延了四個年頭，最後因爲南部精疲力竭纔告結束。這一次戰事所耗費的金錢和產業生命的犧牲是令人震驚的。據估計北部一共徵募了二百萬兵，而當末了一顆子彈射出的時候，已經有一百萬人在戰場上。南方的徵募數目，據計在七十萬與一百萬之間。在「聯邦」方面，戰死或病死的

約有三十六萬人；在「邦聯」方面，死亡約爲二十五萬八千人。南部的大部分化爲廢墟。森納多亞河谷自頭到尾都被蹂躪；余曼在喬治亞所毀的建築物，價值五千萬元，所毀的私人產業價值更須以億計；城市如哥倫比亞，里士滿和愛蘭達城 (Atlanta) 都遭火劫；鐵路和工廠被毀。南部的固有勞工制度既已破壞，物質上的產業又已破碎，故在經濟上卽呈疲憊不堪。那一帶當時戰爭的痕跡，今日還歷歷可考。當戰事結束的時候，北部雖享受着一種大繁榮，但它也損失很大，其程度是它始料所不及的。

戰役

作戰的主要戰線或戰場可以分爲四個：海上，密士失必河谷，弗吉尼亞和東部沿海各州，以及外交戰線。第一條戰線可以簡略放過。在戰事初期，事實上那擁有四十艘船艦的海軍全部操在聯邦派手裏，但是分散而腐敗的。在華盛頓的能幹主管威爾斯將其改組，加強它的力量。林肯宣布封鎖南部海岸，這種行動最初力量雖弱，但到了一八六三年便變成極有效的了。這種封鎖既足以阻止南部運棉至歐洲，又足以切斷南部從歐洲運入它所急需的彈藥，服裝和醫藥。同時，一個特出的海軍指揮官法拉加特 (David G. Farragut) 出來領導兩次優美的戰役。在一次作戰中，他率領聯邦派的單桅木船艦隊進入密士失必河口，經過兩個堅強的砲台，強迫邦聯派最大和最富的城市新奧良斯投降。在另一次作戰中，他用強力經過摩比爾灣的設防入口處，俘獲一艘邦聯派的鐵甲艦，並且封鎖了這個港口。海軍幫助北部封鎖南部，佔領重要的沿海據點，擊沉或俘獲南部的商船。

北部聯邦派的軍隊，在密士失必河谷打得一連串幾乎未間斷的勝仗。格蘭特率領着強大的西方部隊。格氏是伊利諾斯人，性情堅持固執，沒有想像力，但能夠清楚地把握着戰略的主要原則。他攻佔了亨利砲台和頓納爾遜砲台，開始在田納西突破邦聯派的一條綿長的陣地，這樣便能夠佔領這一州的西部。邦聯派不得不放棄重要城市那區維爾，聯邦派軍隊於是進展到田納西的南部邊界——那就是距邦聯的心臟不過二百哩。南軍在約翰斯敦和布利加特領導之下集結在這裏。一八六二年四月，他們發動攻勢，這一來幾乎解決了格蘭特。他們的迅速進攻，使格氏的部隊在田納西河的皮次堡碼頭猝不及防，同時格氏部隊背面是水，正面又沒有設防。這一次的突襲，幾乎戰勝了聯邦派的軍隊。可是格蘭特及時獲得增援，同時邦聯派損失了他們能幹的約翰斯敦將軍。結果南軍退到密士失必的科林斯。雙方在西洛一役損失都重——聯邦派的六萬三千人損失了一萬三千；可是林肯說及格蘭特時說，「我不能缺少此人——他是能征慣戰的。」

一八六三年春天，格蘭特被擊敗的部隊緩緩向南推進。他們的大目標在奪得密士失必河的完全控制權。自法拉加特攻佔新奧良斯之後，該河下游已沒有南軍的蹤跡。有一個時候；格蘭特被阻於維克茲堡，「邦聯」派軍隊在削壁上堅強設防，因為地位過高，「聯邦」派的海軍無法攻擊。可是他採取大膽的行動，把維克茲堡包圍起來，經過六個星期的圍攻，結果於七月四日佔領該城，解決了西方邦聯派的大軍。「邦聯」給切成兩部分，幾乎完全不能從台薩斯和阿肯色運到供應品。

可是同時聯邦派軍隊在弗吉尼亞再次打敗。華盛頓與邦聯派首都里士滿之間距離原僅一百哩，但這一片地方被無數的河流所隔斷，成爲很堅強的防守陣地。更有進者，邦聯派擁有兩個很能幹的將

領，李將軍和哲克遜 (Thomas J. Jackson)，較聯邦派初期的將領都強。聯邦派的軍隊屢次企圖攻佔里士滿並消滅邦聯派的武力，經過多次的血戰，但都給打退了。那種惡戰的詳情，簡直無法描寫。早在一八六二年，麥克利蘭由海道率領精練的十萬大軍到約克河與詹姆士河之間的半島，進攻比他弱得多的李將軍部隊，在里士滿前面進行猛烈的「七日之戰」。有一個時候，他的軍隊已經聽見這邦聯派首都各尖塔上的鐘聲，可是結果還受重創而退。錯失的波勃在布朗的第二次戰役時敗北，被逐向華盛頓退却，這個時候，北部已經在替自身的安全擔憂了。另一個聯邦派的指揮官企圖進攻弗里特烈克斯堡後面的高地，結果被擊退，死傷極衆。還有一個北軍的指揮官在張色勒斯維爾的血戰中慘敗；但邦聯派喪失了李將軍的左右手哲克遜。直到一八六三年夏季，邦聯派在東部都佔着上風。

雖然，邦聯派的勝利沒有一次是有決定性的；聯邦政府又集結軍隊另行嘗試。如果聯邦派的軍隊不能佔里士滿，邦聯派最好的戰略便是採取攻勢了。一八六二年八月，李將軍認為向北進攻的時機成熟，可是麥克利蘭在馬里蘭西部的安狄丹迎擊他，把他堵住了。這一次是打個平手——可是李將軍撤兵。林肯是渴望一個勝利的，認為這次勝利已足夠宣布「解放宣言」了。(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下一個夏天，李將軍於聯邦派軍隊在張色勒斯維爾大敗之後，又向北進擊，侵入賓夕法尼亞。他的部隊幾乎抵達州的首府，巴的摩爾和費城大為震動；但一枝強大的聯邦派軍隊在葛蒂斯堡截擊他。這裏在三天的戰爭中，邦聯派企圖突破聯邦的陣線。當聯邦派部隊正在集中之際，邦聯派如果迅予攻擊，他們也許便會戰勝。可是結果他們必須與一枝據有更好地位的更強大軍

隊作戰。比克特在最後一天冒着可怕火力的猛攻，是戰史上最英勇的行動，可是他失敗了，而翌日當李將軍麾下他經戰陣的部隊悲慘地退到波多瑪克河的時候，形勢已經很清楚，「蒂葛斯堡的高潮」便是邦聯派全部希望的高潮。

格蘭特的軍隊此時佔據着維克茲堡。對南部海岸的封鎖已經是鐵桶似的緊密，沒有船隻能夠衝過封鎖線。邦聯的工廠因此缺乏機器和原料，鐵路毀壞，資源幾乎完全枯竭。在另一方面，北部各州則空前繁榮，工廠充分開工，農產品大量向歐洲出口，人力因為人口的移入而恢復原狀了。

在田納西的東南部，密士失必河谷戰役的最後階段也對邦聯派有決定性的不利。這個區域一個繁忙的鐵路聯絡點叫查丹奴加（Chatanooga），其對於邦聯派的重要性僅次於里士滿和維克茲堡。它控制着向西南、東南和正東行的鐵路，其位置足以阻擋聯邦派軍隊在大烟山向東南開的路徑，故是到南方的大門之一。在羅斯克蘭斯指揮下的一枝聯邦派軍隊於一八六三年九月開抵查丹奴加，發覺自己面對着一枝在第二流將領勃拉格指揮下的強大邦聯派軍隊。在捷加摩加一場惡戰中，勃拉格幾乎打勝，但最後因為湯瑪斯將軍的關係，演成一個犧牲重大的僵局。湯瑪斯是一個弗吉尼亞人，他擁護聯邦派。力不勝任的羅斯克蘭斯讓自己被封鎖於查丹奴加，故格蘭特不得不派趕往解救。十一月，格蘭特得余曼和湯瑪斯的支援，在查丹奴加一役打得勝仗，他的一部分軍隊以猛烈的攻勢把邦聯派軍隊驅離教士山脊。這樣，聯邦派軍隊便得到了一種地位可以開始進入喬治亞，由余曼完成勝利的結束。一枝邦聯派的軍隊於胡特指揮下在田納西與聯邦派軍隊苦戰，雖然勝負未分，但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在納區維爾地方，實際上被湯瑪斯殲滅了。

南部當時如果承認即將失敗，而謀與寬宏大量的林肯談判條件，其結果必比較好得多。可是當時的敵意不容許這種談判。邦聯派繼續作戰，直至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抵抗為止，他們希望法國和英國出面干涉，但到一八六三年這最後希望已經消失。聯邦派政府在外交戰線上有很大的便宜。它很技巧地利用這個優點，而在葛蒂斯堡之後，是沒有一個歐洲的使節願意在失敗那一方面下賭注的。更有進者，林肯於一八六二年發表他的「解放宣言」，把根除奴隸制度作為作戰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便提醒了英國人民大眾的道德觀念，使人們也擁護聯邦派了。蘭開廈的工人，本來是因為聯邦派的封鎖而得不到南部的棉花的，也堅定地同情聯邦派，這證明他們是如何為主義而犧牲。

一八六四年頭，格蘭特東調，任聯邦軍總司令。他一次次無情地打擊李將軍，漸漸摧殘了邦聯派的主要部隊。同時，余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五月發動他壓服喬治亞的戰役。他於九月初佔領愛蘭達，然後向海移動，有計劃地毀滅一條六十哩戰線的商店，鐵路和其他產業。十二月他在薩凡那出現，把那座城作為送給全國的聖誕禮物。之後，他轉而北進，佔領了哥倫比亞，強迫查斯頓投降。那年秋季，急進的騎兵司令余利丹把森納多亞河谷毀壞得那樣的澈底，使「一隻飛過境的老鴉必須帶着牠自己的糧食。」最後李將軍不得不放棄里士滿，並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馬多斯(At-pomatox)率軍投降。

內部衝突

在這一個人鬥爭的年頭，無論北部或南部都有許多內部的衝突。雙方的政府都沒有高的效率。軍隊

都充滿着粗糙，錯誤和不公平的制度。徵兵法是迴過了，但抽調的辦法並不公平民主；北部容許購買代身的兵，結果促成了暴動。由史蒂文斯、沙姆納和魏特所領導的共和黨「急進派」，抨擊林肯在作戰上太於懦弱，太緩採用釋奴爲作戰目標，建議路易斯安那和其他征服州份的辦法太過溫和。在南部，州長如喬治亞的白朗和北加羅林納的樊斯，都歸咎里士滿當局不該頑固堅持着州的權益。雙方，特別在北部，政治干與到軍職的任命。他們提陞能力不足的人物如巴特勒和邦賽特，但英勇而有效率的領袖如湯瑪斯則被他們忽略了。雙方軍隊逃亡者極衆，結果使邦聯派的部隊受嚴重的影響。

北部攻擊南部監獄的腐敗；但北部的監獄也是夠惡劣的。徇私，欺騙和貪污的風氣雙方都盛行。華盛頓充斥着不忠實的包工，投機家，和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人；而南部一些奸狡之徒，則犧牲他們的主張以求自肥。南部紙幣貶值，使物價狂漲，結果勞苦的人民大眾都破產了。在北部，通貨膨脹鼓勵着瘋狂的賭博和冒險的投機，製造出一大批粗魯的百萬富翁。綜言之，這次戰爭雖有它的壞的方面，但也有許許多多英雄的故事，許許多多博愛的努力和愛國犧牲的事蹟。

李將軍和林肯

在南部，戰爭產生一個不滅的英雄，便是指揮官中最武勇的李將軍。他領導有方，工作努力，在戰爭的整個時期中尊重人道，而又寬宏大量的接受失敗，呼籲南部人民變成他們過去敵人的忠誠伙伴——這種種都時時令人欽敬。他唯一的錯失便是他美德上的弱點，因爲太客氣太多考慮，不能使

頑固的僚屬適當地遷就他的意見。他作爲一個戰略家比作爲一個戰術家更爲適當。他能夠銳敏地剖析敵人的計劃，利用軍事情報具有分析性的才智，對於估計軍事單位和陣地力量又有正確的斷判。因爲他有組織能力，有縝密的注意力，對部屬愛護，遇事勇敢，態度和藹，故能令人信任，得部屬的愛戴。他和華盛頓一樣是一個很能自制的人。這個信奉基督教的君子人，無論勝利或失敗，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他都是偉大的。經過五年的戰爭後，他專心致志於求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恢復南部的元氣。

在北部，戰爭產生一個更偉大的英雄林肯。在初期，沒有人認識這個形容粗陋的西部律師的真相，因爲他平庸，醜陋，而且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第二個陸軍部長史丹頓有一時期叫他做大猩猩——雖然他後來宣稱他爲人類最偉大的領袖；敵對的報章罵他做獸字。緩緩地，全國認識他基於縝密研究和周詳思考的深遠的智慧；他對於真理的熱愛，無窮的耐性，以及度量的寬宏。有時他也猶豫和徬徨，可是時間常常證明他懂得怎樣爲國家的利益而期待着，懂得怎樣把力量和機智混合起來。他懂得美國的人民，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讓羣衆的情緒結晶，什麼時候應該勇敢向前邁進。他是一個最誠實的領袖，雖然是個很技巧的政客，可是從來不採用不公道的手段。他常常訴諸有知識的選民，而不訴諸無知的選民。他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是很寬大爲懷的。在作戰的敵對期間，他從未向南部人說過一句報仇的話。他亟望把全國統一起來，不用武力而以德勝；甚至當聯邦派軍隊正在打最後勝仗的時候，他還建議以相當慷慨的款項付償南部的奴隸。他的外交政策顯示出莊嚴，正直和堅決。他雖使用空前的權力，但他熱心地信仰民主的自治政府，並且知道怎樣鼓勵他的

人民對他効忠，故結果他雖使用帝皇一樣的大權，但仍能獲得人民大眾的信賴。他的口才因為實際的需要而日見雄辯——他的葛蒂斯傑演說，第二次就職演說，和一些信件，是英文散文中的瑰寶。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他的遇刺，對全國簡直是晴天霹靂：對於戰勝者和戰敗者，都是一種悲劇性的不幸。

這次戰爭的後果

在一個不誠實和條件不夠的新領袖約翰生（Andrew Johnson）領導之下，全國必須而對着重新調整和重新建設的困難問題。林肯遇刺之後，要求報復的事情即刻廣泛地蔓延，故問題更感棘手。這些問題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私企圖更迅速地複雜起來——共和黨想利用時機使它的權力永久存在，而自私的商業集團則想利用時機謀自身的利益。希望有高關稅的廠家，希望利息用金償付的債券持有人，希望得到土地的鐵路建築者，都羣集在共和黨的陣營裏。

這次戰爭給國家留下好和壞的後果的混合傳統。它拯救了聯邦，並給聯邦以一種「不可毀滅的」特質，但由這暴烈的釜裏出來的聯邦並不是開國先哲所希望的聯邦。它已經永久廢除了奴隸制度，可是用的是暴烈手段，並沒有替脫離奴籍的人們打算。它已經打倒了南部的貴族寡頭政治，可是沒有其他的階級準備，負起政府的責任，而南部被剝奪去自然領袖者達一代之久。林肯曾經揭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是沒有一個公平的觀察家能夠說這次戰爭促進了民主政治。

這次戰爭在南北之間留了數十年的憎恨——這種憎恨是林肯所希望消滅的。它使許多人更加偏

執，特別在政治方面。共和黨的煽動家訴諸人民的偏見，使人反對南部的民主黨人。在另一方面，反對派便變成了「團結鞏固的南部」，跑在民主黨的旗幟下面。這種激烈的黨爭是最不幸的。直至戰事結束二十年後，纔有一個民主黨員進入白宮；直至將近五十年後纔有一個南部生長的國民威爾遜當選爲大總統。

南部的重新建設

南部失敗，必須予以「重新建設」；這個過程便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自一八六五到一八七七年。如果林肯不死的話，必定堅持以溫和條件對待南部人，很可能使國會多數人贊同他的意見。可是約翰生是一個魯莽，笨拙而且脾氣壞的人，他完全不能把握這個局面。的確，他幾乎丟了他的官。國會制定法律，禁止他未得國會准許而撤某些官員的職。但他撤去了奸詐的陸軍部長史丹頓，打算在法庭上試驗這一條法律。急進派因此於一八六八年八月彈劾他犯大小各罪，在參議院審問他，差一票便把他逐出白宮。同時，急進派在一八六六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勝，負起建設的責任，強迫南部服從一個既羞辱又而不聰明的計劃。

這個重新建設的計劃有三個特點。第一，南部實行軍事管理，因爲有五個將軍而成立五個區，由軍隊予以有力的支持。第二，南部的白色人民不獨被迫接受第十四條的修正（保證黑人在日常事務上有平等的權利），同時又接受了第十五條的修正，予有色人種（實際上是全部的文盲）以投票權。最近的奴隸——他們的祖父們也許是非洲的野蠻人——都有權選舉官吏和制定法律。最後，有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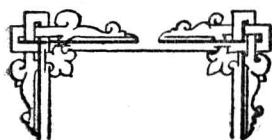
的利用這種有色投票人，白色窮人和來自北部的逐利者以建立南部各州的政府。

這些黑人和逐利者的政府，是英語世界上最壞的政府。黑人有一個時期控制着州的議會，選人爲國會議員，佔據州的次要官職。逐利者則擇肥而噬。這些負起重新建設責任的政府，在修橋造路和制定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法律上，的確也有其貢獻。可是就大體而言，他們是不稱職的，浪費的和受賄的。他們縱情揮霍，征收苛捐雜稅，使貧苦的白人絕對無力負擔。有一個時期南部是令人失望的。

但這個時期並不長。這個區中自愛的白人漸漸獲得自治的權利。他們一部分是用暴力和恫嚇纔得到這種成就。他們成立三K黨(Ku Klux Klan)，強迫許多逐利者返回北部，並脅迫黑人離開投票地方。但他們大部分是和平從事，利用舊的政治機構。許多黑人已經不耐煩再作來自北部的狡猾政客們的工具，悄悄地放棄投票權利；有一些甚至再跟從他們從前的白人領袖。民主黨一個州一個州的予以征服，到了一八七六年，只有路易斯安那，佛羅利達，加羅林納三州尙在「黑色和褐色」的共和黨人手中。即使在這三州，只有用聯邦的成軍支持纔能保持黑人和逐利者的政權。一八七六年的選舉是美國歷史上紀錄最接近和秩序最紊亂的一次，至此大家都明白在軍隊撤退以前南部是沒有和平可言的，所以翌年海斯總統便實行了。這樣一來，共和黨的領袖們便承認他們「急進」建設政策的失敗。他們採取這政策有兩種理由：第一是因爲黨中的理想派想保護黑人，第二是因爲實際派想在南部得票數，官職和權力。結果所屈，便是阻礙和削弱黑人，並使整個南部傾向民主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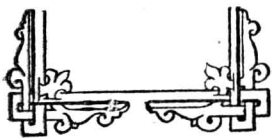
當我們回顧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這一段內亂時期，這幾乎是一幕單純的悲劇。如果像林肯久就希望的一樣，廢除奴隸制度採取漸進的辦法，並予畜奴者以適當的賠償，國家的處境必會比較安樂。這樣便有時間可以教育黑人，使他們在社會中獲得新的地位。這樣國家便可以保存六十萬青年的生命。這樣南部不至遭受迄今尚未恢復元氣的破壞。這樣雙方可以不至有粗糲化的後果——這種後果在戰後謀利和粗鄙的「虛飾時代」表現得最清楚。

可是這一次的風暴却把全國統一起來。就社會和經濟上言，現在南部與北部比較接近。這次戰爭使美國的民族性更深入，更成熟；文學和教育在各方面都更爲成長。而且這次戰爭予全國一套深刻而富戲劇性的回憶，令人永憶蘇醒。在數百年之內，這種回憶都可以使人驚心動魄。這是一個史詩的故事，將不斷地被人傳說着。



美
國
通
史

部 下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內戰的衝擊力

內戰在美國的社會和經濟上促成一種革命，這在北部和南部情形都是一樣。現代美國的根，雖生於內戰以前的時代，但現代美國的出現，可以說是內戰時期。這次戰爭大大地刺激了實業，加速自然資源的開發，大規模製造業的發展，投資銀行業的興起，國外商業的擴展，並促成了「實業大亨」和「資本巨頭」的一個新世紀。這次戰爭大大地加速了鐵路網和電話網的建設，並迎入一個鐵路時代。它導引着發明和勞力節約計劃，並證明這些可以大規模應用於農業和工業。它開放了廣大的新地區爲農牧之用，爲農產品開闢新市場，並着手進行農業革命，解決農場問題。它創造適於城市發展的環境，並以工作供給迅速湧進新世界的千千萬萬的移入人民。南部因爲戰敗的緣故，殖民者階段大部分消滅了，黑奴解放了，農業經濟改革了，使一個新的中等階級抬起頭來，並爲下一代即將興起的南部奠定基礎。在北部，戰爭給投資和投機事業開闢新園地，產生了大批在內戰時發財的百萬富翁，加速大都市中心資源。實業和財政集中統制的過程，南部和西部受東北部的支配，產生新的階級分野以代替舊的階級分野。

阿波馬多斯事件（按卽李將軍部隊作光榮的投降）以後的那個時代，美國現代社會和經濟的型

式漸漸形成。發榮滋長便是一種最令人注意的事實——在面積，數量，財富，權力，社會複雜性和經濟成熟多方面。這個共和國的政治分野到達了最後的形式，十幾個新州參加聯邦，美利堅帝國於以建立。在四十年時間之內，人口由三千一百萬增至七千六百萬。一千五百萬移民——其中由歐洲南部和東部移入的人數與日俱增——湧進這片樂土，而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皮次堡，克利夫蘭和底特律迅速發展起來。印第安人給從高地平原和山嶺河谷驅逐至特為他們保留的地區。鑛冶和畜牧的王國興亡隆替。西部移殖着人民並從事耕種。到了這個世紀的末葉，邊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大規模發見鑛，銅和油礦，便產生了數十種大工業。小商業變成大商業，公司成爲新經濟的有效工具，托拉斯和地產公司成爲特殊的組織。大銀行像摩根銀行等悄悄地在全國的經濟上獲得發號司令的地位。鐵路網已經完成，哩數自三十哩增至二十萬哩，使美國的鐵路系統成爲世界上的最龐大者。勞工組織在戰前是稀少而脆弱的，戰後會員也漸漸增加，在經濟秩序上建立他們穩固的地位。以前小規模和零碎的工業衝突，變成有組織和有威脅性的了。這一小共和國成爲一個世界強國，擴展入於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同時它的渴望市場的工業和渴望投資的銀行家，發展出經濟帝國主義的新技術。美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世代變得這樣快和富於革命性，由林肯和李將軍的農村共和國一變而爲麥金萊和羅斯福的都市工業帝國。美國人民面對着一串錯綜複雜而令人困惑的新問題，他們太缺乏經驗以了解其性質，又無暇予以周詳的思考。這些問題中最急逼的便是財富的分配，大量積聚的財富的統制，在一種不民主的經濟的衝擊力之下保持政治上的民主，大規模的失業和勞工糾紛，都市的擁擠和國外生長人民的同化，農田收入的減少和農田租佃的增加，天然資源因輕率的開發而迅速

耗竭，海外統治和世界政治的責任，政治制度爲一個小農村共和國的需要而產生，以應付一個大工業國的挑釁性的要求。

南部的變形

戰爭和南部戰敗的衝擊力是即刻的和劇變的。在納區維爾戰役和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當灰髮的老戰士疲憊地跋涉回家時，他們觸目都是美國史無前例的破壞。弗吉尼亞和田納西的大部分，受敵對的雙方軍隊所蹂躪；余曼在喬治亞和南加羅林納的中心打開一條五十哩的路徑；漢特和余利丹曾經掃蕩弗吉尼亞的肥沃河谷；北阿拉巴馬，密士失必和阿肯色夷爲廢墟。驕傲的城市如里士滿，查斯頓；哥倫比亞和愛蘭達被炮火所摧殘。橋梁斷折，道路失修，數百哩的鐵路軌道翻覆，車輛毀壞，碼頭船塢荒廢。正常的經濟生活幾乎麻痺了。「邦聯」的錢幣毫無價值，而那些被囤積的和聯邦派軍隊帶入佔領區的竟成爲唯一的錢幣。銀行關門，保險公司破產，工商業破壞，而大部儲積於貨倉的棉花付諸一炬，或被軍事當局所充公。

民政府不見了，沒有有效的當局可以收稅，辦學校，主持路政或執行防治盜匪的法律。教堂都已被燬，會衆散失了；學校的基金和財產喪失了，圖書館和實驗室已經毀壞；阿拉巴馬大學的圖書館長只在火焰中搶救了一本書；那便是一本可蘭經。大部分的公立學校關閉，教育宣告停頓。

就是農業也呈現一種無望的狀態——數以千計的農場廢置了，籬笆倒了，水溝長滿了雜草，堤壩和碼頭毀壞了，牛馬被盜或死亡，犁具在田地上生銹，勞工制度澈底的解體。加羅林納的米工業永

久破壞了。鹹水汎濫着農田；路易西安那的糖工業毀損了。一八七〇年，弗吉尼亞的煙草比較一八六〇年減少了二百萬英畝；直到一八七九年南部才能種植和十一州脫離聯邦那一年（按即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間）同樣多的棉花。一八六五年的冬季，南部大部分都鬧饑荒，白種人和黑種人都受聯邦軍隊或新組成的脫離奴籍者事務局的支助。正如南部詩人蘭尼爾所寫，「全部生活，多數只求不死。」

重新建設所帶來的新悲愁和新負擔，其沉重的程度，幾乎與戰爭的悲愁和負擔相等。南部必須分擔國債和全國性政府的經費，此外南部棉花還須付國產重稅。但打敗的南部以驚人的精力轉而從事物質的重建，農業經濟的善後，和文明社會制度的恢復。一個喬治亞的編輯格拉底後來追述着說：『破壞是空前的澈底，而復原亦空前的迅速。』里士滿，查斯頓和哥倫比亞從廢墟中復興起來，戰事結束後六個月，一個到愛蘭達的旅客報告說：

『一個新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生長起來。狹窄而不規則的街道，有兩輪車和馬車，有手車和貨車，有拉車隊和叫喊着的人們，有一載載的木材，磚和沙，有大量的傢具和數以百計的包裝好的箱子，有灰泥製造者和運桶伙，有木匠和泥水匠，有清潔伙和建築工人，有熙熙攘攘而緊張興奮的人羣，都是從事建築，經商和想發財的人——這個新城市自早晨到夜晚都是熱鬧而活躍的。』

鐵路的鐵軌重行鋪上，新路推進到西南部，橋梁重新建築，堤壩和碼頭恢復了；船隻再度駛入諾爾福克，查斯頓和摩比爾各港口；商店，銀行和保險公司開門了。

舊的工廠再度開門，但資本被吸收到新的工業上去。大量的白松和黃松成爲繁榮的木材工業的基

礎。曾經經過賓漢姆和北加羅林納而得到華盛頓公爵所製的煙草的聯邦士兵，寫信回來要求再要，北加羅林納大煙草工業的基礎於是建立；到了一八八八年，賓漢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煙草工廠，每年運出煙草一千萬磅。麵粉廠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供給當地的需要；對種棉極為重要的肥田料工業重新建立起來。田納西和阿拉巴馬北部發見煤鐵富藏。一八七〇年伯明翰只是一片棉田，在二十年之間便變成一個五萬人口的城市，是繁榮的鐵工業的中心；有六條鐵路供它使用。到了一八九〇年，南部出產全國生鐵塊的五分之一。其他城市如查丹奴加，賓漢姆，溫斯頓賽林姆和丹維爾，都成爲繁盛的工業城市。

自葛利格於一八四六年在南加羅林納的格林乃特維爾開設棉織廠之後，南部海岸的紡織工業便很發達，但紡織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戰爭的影響全部解體。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十年間，這種工業利用當地的賤價勞工，接近水力，和容易得到原料，再度向前緩緩發展。數十家小工廠，幾乎完全由當地的資本所支持，沿加羅林納和喬治亞的內地建立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南加羅林納有五十萬紡錘，而全部南部則可誇稱四倍其數；新英格蘭的工業家至此對這一方面的競爭已經發生憂慮了。同時到了一八九〇年，南部開始發生勞工問題。

南部的紡織工業保留着地方的色彩，同時具有一種奇異的封建特性。附近的農家，受高工資和工作安定的吸引，全家遷到工廠村落來。與他們俱來的是在農場所養成的工作習慣和態度。他們都假定工作是長時間的，而且他們全家——男人，婦人和小孩子——都參加工作。這些工廠村落，散佈在一些城鎮的附近，由建廠的人所擁有和管制。工人就住在公司的房屋裏，參加公司的禮拜堂，入

公司的學校，從公司所設的商店購買食物和衣服，嬰孩由公司的醫生接生，死者由公司的牧師埋葬。在公司的墳場。它是一種新的封建主義，初期施行雖當相順利，但給未來帶來了很多麻煩。

南部雖有鐵，木材，煙草和紡織工業的興起，但大部分還是農村，和農業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除新奧良斯外，南部沒有一個城市擁有十萬人口。即令它的工業與農業保持密切的聯繫，煙草和紡織品的出產極大，但由製造業所實際增加的價值，比較上是微小的。南部人的大部分住居在他們的農場上，種植主要穀類，但農業在戰爭時期也解體了。

大的種植家都因為戰爭和重新建設而弄窮了。他們在奴隸身上所投的資本輪清了，他們的勞工分散了，捐稅和成本增加，故大部分人被迫把他們的田地劃分，或拿出來賦稅還債。結果所屆，促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土地革命。良好的土地每畝售三四元，數以千計的小農便擴大他們的產業，數以萬計的貧窮白人，脫離奴籍的人，沒有田地的工匠和店員等，都能夠滿足他們的土地饑饉而一躍處於地主的地位。一八六〇年，南加羅林納有三萬三千處農場；二十年之後，此數飛躍為九萬四千。一八六〇年，密士失必在十畝以下的農場不上六百處；在十年之內，此數增至一萬一千以上。在整個南部，農場在千畝或千畝以上者減少了一半之多，並在二十年時間之內，農場的平均面積由三三五畝減為一五三畝。同時，肥饒的新土地在阿肯色和台薩斯開闢了，不久奧克拉荷馬開放為殖民地。曾經一度從他的王座顛覆下來的棉花大王，也把他的帝國重建並予擴展。

奴隸制度廢除之後，便不得不一種可以代替的勞工制度。種植家沒有錢可付工資；黑人沒有錢可租出地。為着需要便產生了第三種方法：無數的自傳和引述把這方法的起源告訴我們。戰爭結束

之後，種植家召集從前的奴隸，告訴他們從今解放了，要求他們在舊地方留下來，依舊工作。付工資是沒有問題的了，而且當收穫的時候，種植家必須和他的工人分產物。這就是分穀制度的起源。這種制度有一個時候成爲有組織的和有規則的。種植家以一間草屋、田地、農具、肥田料和一頭騾供給佃戶，並答應在收成之前維持他們。分穀的佃戶付出勞力之後，可以得三分之一之產物的酬報。這種制度的施行似乎頗爲順利，不久由黑人佃農推廣到白人佃農。

實際上這種分穀制幾乎純粹是一種罪惡。完全依靠主要穀物的小農民，往往債台高築而變成奴隸，抵押於維持他們的種植家或商人。因爲他們沒有產業可作爲他們所收到的供給品的抵押品，他們只得以他們正在種植中的穀物作爲抵押物，這樣一來，便演變而成爲腐化的「穀物留置權」制度。這種制度把佃農在穀物上的任何真正利益都剝奪淨盡了，鼓勵不整潔和不合科學的農業，使利益入於種植家或債權人的商家手裏，令佃農生活困苦。因爲棉花看起來好像是最安全的投資路線，債權人便堅持要他們的佃農不得種別的東西，只可種植棉花，這樣便阻礙了農產品的多樣性，並使南部只有實行害人的單一農產的經濟。在一個世代之內，土地的廣泛分配和堅強的小地主興起的希望消逝了；在南部的地方，農民百分之七八十是佃農，平均每處農田有一種留置權。一九〇〇年的南部，比較一八六〇年的南部，更缺乏自給自足的力量，而在許多部分，這些年份中農田的財富實際上低落了好些。不久「煙草路」便代替「黑人顛天錄」成爲南部生活的代表作。

黑人也發覺他們地位的改變，與其說是在實際方面，無甯說是在法律方面。立法解放他們的國會，對於保障他們的經濟安全絲毫沒有作爲；國會只浪費時間作保證他們政治平等的工作。黑人有

一二年時間好像戰區的難民一樣。數以千計的黑人在路上漂泊，無目的地一郡蕩過一郡；我們可以說，釋奴第一年所折散的家庭，比較實行奴隸制度的任何一年所折散的爲多。千千萬萬黑人因爲疾病飢餓或受虐待而死亡。最後由於比較負責的南部人的努力和聯邦當局的合作，秩序恢復了；當黑人發覺他們不能得到「四十畝田和一頭騾」的時候，他們回復到他們所懂得的一件事——耕田。

有些比較有進取心的便跑到北部去，或跑到南部正在興起的工業城市，但大部分的人成爲分數物的農工，這樣他們覺得生活和戰前大同小異。他們耕田，在白種人的農場上割棉；他們依舊住在傾斜的草屋裏，依舊吃着玉蜀黍飯和鹹豬肉，依舊穿着襤褸的襯衫和褪色的藍斜紋布衣服。他們不想投票選舉，不想把子女送入白人的學校讀書，也不想社交上求地位的提高。

戰後那一個世代南部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便是一個堅決而獨立的中等階級的出現，這個階級包括小農民，店員，商人，銀行家，工業家和專業者。這個時候他們是從奴隸制度的夢魘解放出來，同時他們把自己從失敗的心理的夢魘解放出來。他們願意忘記有月光和花園的南部不以痛苦而以驕矜的回憶去緬懷原野和葛蒂斯堡。他們熱心地把南部歸入全國性的經濟，並把他們破碎的社會制度重建起來。學校重開了，李將軍就任弗吉尼亞一個小小的華盛頓學院的院長，以爲整個南部示範。各州把它們的教育制度民主化，至少在書面上規定公共教育的初級普遍免費。教堂重建了，黑人參加教會者增加了，故教會的人數比戰前爲多。在社會立法、救濟貧弱和走向勞工立法的微小的姿態也有顯著的進步。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南部再度參加全國性的機構。

北部的革命

當南部痛苦地重建其經濟和把本身調整以適應新工農制度的時候，北部收穫了勝利的果實。共和黨自它的開始便主張高關稅，國內改良，授與鐵路土地和免費農田。在薩姆特炮台一役之前，它不能把這政綱的任何主要部分制成法律。可是在南部各州脫離之後，國會的議場上已經再沒有任何有力的反對派，而戰事促使其全部政綱可以迅速制成法律。一八六一年的摩里爾關稅案，突然與久已存在的低關稅的趨勢相反，訂立了顯然是保護性的稅率；後來的法案把關稅提得更高，到了內戰結束的時候平均稅率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至四十七。至此北部的廠家的地位幾乎是不可動搖的；直到一九一三年才有一個政府能夠實行減低關稅。國會爲要鼓勵商業起見，不久取消所得稅，並廢除戰時對煤、鐵和公司所得的稅。國會在一套鐵路法之下，用六千萬元的借款和一萬萬畝以上的公地爲津貼，建造橫過大陸的鐵路。

因爲有這種種贊助和受戰爭需要以及激增的人口的需要所刺激，工商業空前繁榮。工業適應着武裝部隊無窮的需求，同時也適應一個戰爭經濟的更大需求。在十年之內，敷設鐵軌二萬哩，大部分是在西部。橫通大陸的鐵路以令人暈眩的速度向平原和山區推進。電話線由一個城架過一個城，不久便橫過大陸；海底電綫橫過大西洋，而且在十年之內，電話亦成爲閃電交通的一種新工具。

戰爭的結束並不使工業活動終止。在阿波馬多斯事件後的五年，幾乎每一種工業的紀錄都給打破。這五年比以前歷史上的任何五年成績都好。更多的煤、鐵、銀和銅鑛開採出來，更多的鋼鍊出

來，敷設更多的鐵軌，鋸更多的木材，建築更多的房屋，紡織更多的棉布，磨出更多的麵粉，煉出更多的煤。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的十年內，廠家的總數增加百分之八十，製造品的價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工業革命已經是一種既成的事實了。

銀行家和投資者與工業家同受其益。國會由於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的國家銀行法案，把傑克孫派的民主黨人所珍視的獨立銀行制度取消，而代之以有利於私人銀行家的一種制度。爲要使國家銀行的鈔票通行無阻，於是把州立銀行的鈔票課稅，使其無法生存。在戰爭時期，政府發行紙幣數億元，因爲只由政府信用作擔保，故價值還迅速貶抑下來。國會決定不再發行這種「綠背紙幣」（按即背面花紋以綠色印刷的紙幣，一八六二年開始發行），使其餘的紙幣價值到達水準，故採用一種大有利於債權人和投資者而不利於農工階級的通貨緊縮政策。

對綠背紙幣和政府債券的投機，使許多人大發其財。在戰爭的最黑暗時期，綠背紙幣每元只能賣四角錢，但用以購買政府債券它還有十足價值。當國會保證用黃金付還這種債券本息的時候，很明顯的，投資在這方面的聰明人所得之利是十分可觀了——據約翰孫總統的估計，得利可在百分之三百至四百之多！政府的財政政策強化了階級界線，因爲這樣一來，士兵們所得的是綠背紙幣，每元僅值五六角錢，債券持有人則以十足價值的錢償付，農民借入的是每元只值五六角錢，但必須以十足價值的錢還債。這一件事的意義，便是全國須以當原來一倍的款項償還債款。

但發財最多的是投資於鐵路，鑛業、木材、肉食包裝行，鐵、鋼、油和與戰爭以及開發西部有密切關係的事業。不久鐵路建築家如萬特比爾特、史丹福和威拉特，肉食包裝商如阿摩和銳夫特，木

材大王如魏耶霍塞，鋼鐵巨頭如卡內基和希威特，煤油大王如羅基斐勒，都是家喻戶曉的名家，其名字比國內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還要響亮。這次戰爭以浪費和不謹慎的手法重分配國家的財富。金錢左右了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錢可通神，使社會都崇拜有錢的人，不久高特比爾特和高爾斯的家族，和舊日的紐約世家同樣受人尊重；金錢建築了高樓大廈，形成了紐約的第五街和芝加哥的密西根街；金錢開辦了學院和大學，支助禮拜堂和教會，主辦樂隊和美術館。財富的集中，顯明是沿着地理的界線，同時亦沿着階級的界線：紐約、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三個州，付了一八六四年所得稅的百分之六十。

農民所得雖不如他們想像之多，但亦從戰爭和戰後繁榮獲得一些利益。共和黨用「投票爲你們自己爭得一個農場」的口號予以援助，而當它執政的時候，即重制宅地法——這是一個民主黨總統從前所否決的。由於這法案的規定，任何人同意耕種五年即可得公地一百六十畝。這一個開明的立法使數十萬農民能夠移居於西部的處女地，因此促進了經濟的民主。但同時更大的區域則授與鐵路和其他公司，或售予地產公司和投機者。這些區域的大部分，結果還是歸給農民——然而是用錢買的。國會同時通過另一法案，以數百萬畝的公地授與農業學院和工業學院。

可是戰時和戰後的農業擴展，並非依靠政府的津貼或鼓勵。軍隊的需要，城市激增人口的需要，海外千百萬饑民的需要，在在足以刺激穀麥種植者，畜牧者和牛奶場的主人。鐵路迅速敷設，橫過平原；經過未敗壞的土地，因此剛剛上市的收割機、犁、刈草機、捲束器、使從前兩人才能做的工，一個人——或一個小孩子——便能夠做了。在林肯當選後的二十年間，玉蜀黍、大麥、小麥、

雀麥的產量倍增，牛、羊和豬的數目也同樣的增加。當新英格蘭和南部的農業實際衰落的時候，這種進展大部分是發現於舊西北部和外密士失必西部。在戰爭期間，密蘇里的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以幾乎二百萬人的州份作爲參加聯邦的第五個州。內布拉斯加於一八六七州參加聯邦，一八八〇年的人口幾達五十萬。達科他於十五年後有五十萬以上的農民人口。羊毛產品已經由伐爾蒙特移到俄亥俄，不久西部的山區各州便領頭了；衣阿華、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明尼蘇達，開始成爲出產玉蜀黍最多的地區。農業區域不可抗拒地向西移動。

但農民受繁榮時期之惠，少於除工人外的任何其他階級，而且農民最先感受到艱苦時期的衝擊。過度的擴展促成了過度的生產；購買較大的農場和昂貴的農具便意味着債台高築，在這種情形之下產品只有售出高價才能夠維持下去。舊日移殖在東部的農民，敏銳地感覺到西部新土地的競爭；受惠於肥沃土地的西部農民，則遠離市場，故必須乞憐於鐵路。農民和從前一樣，在烈日之下做長時間的勞作，而結果還是勞而無功。

工人離開了大多數的集團而孤立，不能從這次戰爭得到物資的酬報。他們每天工作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或在煤坑裏，或在煉鋼爐邊，或辛勞於紡織機和製鞋機旁，或造船敷軌，對於聯邦的勝利會有偉大的貢獻，他們中也有大部分人曾實際作過戰。因爲戰爭的衝擊力和物價飛漲，受一八五七年恐慌影響而瓦解的勞工組織再度聯合起來。勞工是需要組織的。工資是增漲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物價比工資漲得更高。據保守的估計，一八六五年工人的狀況比較一八六〇年還壞。因爲有百萬以上的軍人回復平民生活，國、移入人民的增加，職業的競爭變成十分劇烈，技術工人迅速組織

起來以求保護他們的技術。但大多數的工人還是置身於這種組織之外，慘遭經濟機構迅速改變之苦，不久便發生恐慌和不景氣了。政府對勞工階級並沒有什麼協助。一八六八年，政府建立公共工程八小時工作制，可是這個令人羨慕的榜樣並沒有廣泛受人遵守。把訂約勞工的入口變成合法的一八六四年的法案雖不久廢止，可是這行為繼續二十年之久。

政治

戰後時期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便是它們的不重要。其他政府——如皮爾斯政府和布根納政府——都是暗淡而無能的；格蘭特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乃是保留下來的。在國的建設時期，最急需的是政治家的風度，可是代之而起的乃是政客的跳梁，而政客與政黨，特權階級和腐化行為是朋比為奸的。

重新建設的政治的基本原則在於共和黨的執政。那一個黨是一個比較新的黨，而且幾乎完全是一個區域性的黨。在戰爭的時期內，它自行其素，固保門戶。但戰事結束之後，有些南部州份回歸聯邦陣營，故共和黨操縱政治各部門的希望便渺茫了。當戰爭尤其是重新建設使南部成為這民主國的堅固部分的時候，民主黨保持着多數和力量的優勢。如果北部和南部的民主黨人對候選人和政策意見相同的話，很可能把共和黨的政府打倒而恢復民主黨的政權。

岌岌可危的不只是黨的優勢，黨的政策維持情形亦然。新的關稅壁壘，國家銀行的制度，鐵路津貼計劃，而尤要者是貨幣緊縮政策和以黃金付償官債等都是問題。當然，這些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如黑人地位——和情緒問題——如獎懲忠背等等，都是糾纏不清的。

這個時候共和黨人必須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夠明白的了。爲要維持和促進既經開始施行的經濟政策，共和黨必須繼續執政，直至政策已經徹底建立起來不能改變時爲止。他們曾採取步驟，如拒絕大部分聯邦派領袖投票選舉和撤官，把比較反抗的南部州份逐出衆院的大門。但顯然的，這種事不可長久幹下去。一種遠較有希望和比較有永久性的政策便是在南部建立一個共和黨。這個組織的基礎是那些早在南部反對統治階級的白人——貧窮和失去利益的人，當然歡迎一個使他們聲音被別人聽見的機會。但這些人並不衆多，不能保證成功。欲保證衆多的力量，只有把選舉權授給黑人——並注意他們投票投得對。這最初是由重新建設法案，後來憲法修正案予以安排的。

這計劃是夠簡潔的，可是行不通。軍事的重新建設使南部的反對更加頑強；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榨取黑人的企圖。共和黨的主義因此與種族平等的概念符合——這個時候這概念是大多數南部人所不能容忍的。這些短視和錯失的政策，非但不能加強共和黨在南部的力量，而且反予以削弱。故當聯邦軍事當局撤退以後，共和黨機關即刻瓦解，而南部的民主黨人迅速設法禁止黑人投票。從此南部的民主黨即我行我素。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八年，沒有一個聯邦派的州份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選人的票。

不過如果共和黨的經濟計劃不受軍事重新建設或黑人選舉權的憲法要求所永久保證，它是受新寫憲法的另一條款所保護。重新建設的最初階段，當急進派還在與約翰生總統齟齬的時候，國會的混合委員會擬定修正案，規定公民資格，保護脫離奴籍者的公民權利，剝奪聯邦派領袖的公權，保證聯邦的債務而宣佈聯邦債務無效。這便是著名的第十四修正案，其第一款規定：

「無論任何州份，不能制定或施行任何足以縮小美國公民權益之法律；無論任何州份，未經適當法律手續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無論任何州份，不得拒絕任何人獲得平等之法律保障。」

這些可紀念的語句是在共和黨不能實行時作的：他們對產業和大商業利益予以憲法上的准許。同時法院把它們解釋為無論任何州份不得立法剝奪公司的產業或此產業的公道利得。這種解釋未久一八九一—一九〇〇這十年還未充分發揮——這時恰恰足以應付和阻抗美國平民黨主義的高潮。

格蘭特政府所注意的是維持重新建設政策，使南部服從北部，使民主黨服從共和黨。在這一方面他大部分是成功的。這個政府的後面，有戰勝的聲威和格蘭特本人的威望，而其權力的保有，因為對與奴隸制度和脫離聯邦舉動有關係的任何政黨的不信任而延長，同時因為商業利益的，樂於擁護而加強。不過這些利益是被放棄了。格蘭特是一個偉大的軍人，但他是一個可憐的元首，除外交之外，他的政治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失敗。青年的亨利·亞丹斯批評自華盛頓到格蘭特這一段美國歷史時，說格蘭特把演變弄得極為滑稽。但令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失望的，不是他的力不勝任，而是他對他政府中營私舞弊的默許，和對貪污所採取的友好態度。格蘭特上言的時候，他的聲譽比傑克遜以降的任何總統更大，共和黨也獲得一七八九年以降任何政黨所無的最大建設機會。在四年時間內，共和黨分裂了，一個自由共和黨出現，宗旨在於改革和言歸於好。民主黨雖與自由共和黨聯合，力量還不足以打倒格蘭特，但二年之後，民主黨便控制了下議院，而一八七六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比共和黨的候選人多得二十五萬票。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工業帝國的始基

傑斐遜所夢想的是一個充滿自立的自由民的農業大共和國，一個不受大都市所惡化，不受工廠或煤礦奴隸制度所惡化的自由國家，因為他在英，法，義等國所見的太令人恐怖了。他說：『當我們有土地可耕耘的時候，讓我們永遠不必看見人民在工廠裏工作。』他相信他已經創立了一種農業的民主政治，而因為買入了路易斯安那，又使農業更有發展的餘地，他說這兒有足夠第一千代人使用的土地。他在選舉中打敗了漢密爾頓，並把漢密爾頓派想把美國變成當時的英國的計劃打消了。這個國家當時是向西發展的，越過山嶺草原和平野，而不是向東渡過大洋；它將成爲農民的樂園，而不是商人銀行家或工業家的獵場。在傑斐遜的繼任者遷入白宮和他的擁護者控制國會的時候，他的夢想似乎很有實現的可能。當美國的疆界向西推進到太平洋向南推進到格蘭得河的時候，農業領域的擴展，遠較工業機器的擴展爲速。甚至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全國的大部分還是農村的，而許多觀察家評論南北戰爭，謂不是抬頭的工業主義和擴展中的農業之間的衝突，而是棉花大王和小麥大王的鬥爭。

可是最後打勝的還是漢密爾頓，至少在經濟戰線上。他對銀行的意見被施用了，他的重商主義給

採納了，他的「製造品報告書」成爲美國的福音。漢密爾頓在威霍根決鬥場被擊倒之後一百年，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它比較地球上任何國家發見更多煤鐵礦，鍊出更多的鋼，提煉更多的油，敷設更多的鐵軌，建築更多的工廠，在一百年之間，製造品的價值比較農產品多五倍，財政界和工業巨人在華盛頓操縱着政策，而農民看起來有成爲貧農的危險。

美國經濟這種迅速變形，雖然是由政府政策協助所致，但究其實也是完全自然的趨勢。美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有六：（一）原料之豐富和種類之繁多，除俄國人外，沒有其他民族有美國人這樣得天獨厚；（二）發明和技術把原料變成製造品；（三）充分足以供應擴展中的經濟要求的水道和鐵路運輸系統；（四）一個國內市場，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國外市場的發展而迅速擴展；（五）勞工的供給經常因外人的移入而有新的改變；（六）州或區域之間沒有討厭的關稅壁壘，沒有抵抗外國競爭的保護關稅，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政府津貼。除這幾種基本因素之外，也許還須加上企業的精神和樂觀主義的空氣，因爲這是自始就令這個國家與人不同的因素。

工業革命是以煤，油，鐵和電力爲基礎。在賓夕法尼亞和弗吉尼亞西部的山間，在伊利諾斯的草原下面，沿着大煙山的斜坡，在堪薩斯，可勒拉多，台薩斯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下面，都是用之不竭的有煙煤和無煙煤；單是新墨西哥一處便誇稱有充足之煤足供美國工廠一百年的消耗。到了一九一〇年，美國每年採煤五億噸，但此數還不及蘊藏量百分之一。油是美國力量的另一種基本大來源，其蘊藏量與煤同樣豐富。自一九〇〇年以降，美國的油產量沒有一年少於其餘世界的產油總量，而台薩斯，奧克拉荷馬，堪薩斯，伊利諾斯和加利福尼亞等處油田的開採，又使從前認爲此重要資源

有枯竭可能的恐慌消逝了。鐵鑛也極豐富——在蘇必利爾湖濱一帶，南有田納西的煤和鐵，西有可勒拉多的鐵和燃料，都漸漸佔着重要的地位。據開發五十年後的細心估計，認為這些資源至少還可供二百年之消耗。美國的天然水力，也比較任何其他國家爲大，足以供給三億餘人口的工業需要。

美國天然資源的歷史上有一種驚人的事實，便是許多天然資源到了一八五〇年以後才有大規模予以利用的可能。鐵鑛在早期殖民時代便開採了，可是使美國在鋼鐵上執牛耳乃是開發北密西根和蘇必利爾湖以後的事。特拉克上校於一八五九年在賓夕法尼亞西部採油。在五年之內，每年產量增加在二百萬桶以上，數以千計的鑽孔器和數以億計的金元投資在這方面，大家奔向「油區」的潮流，可以與十年前奔向加州的尋金熱媲美。密西根開闢之初即開採銅鑛，可是直至九十年代才開發蒙達那和阿利桑納的富饒鐵脈；安那康達鑛於一八八二年開採之後不久，整個的蒙達那即成爲「銅鑛巨頭們戰爭」的戰場，他們的爭鬥不單爲着爭取工業上的專利，同時也爲着爭取政治上的操縱權。一八五九年在可勒拉多，七十年代在內華達和蒙達那的開採銀鑛富藏，大大的影響着國家的經濟機構和財政政策。密蘇里和伊利諾斯的加侖納區的鉛鑛在內戰以前便著名；但到了八十年代鉛產大增的時候，才使唧筒和印刷方面能夠大規模使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波特蘭的士敏土問世；一八八七年，電解方法使鋁在商業上大爲通行，到了一九〇〇年，產量超過七百萬磅。一八九三年，亨利·亞丹斯參觀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的時候，他看見發電機，他的結論是這種發明是近代史的最重要事件。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美國的工程師們便把發電機應用在水壩上面，準備以電氣代替水蒸氣了。

美國人的發明，可能比較任何其他民族爲多。在一八六〇年與一九〇〇年之間，得美國商標局特許專利的發明，不下六十七萬六千種之多；那個時期以後，這種數目幾乎達到天文學的數字。重要的發明，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末葉或十九世紀的初葉——惠尼的軋棉機，福爾頓的汽船，豪胡的縫衣機，固特里區的和硫橡皮，麥柯密克和哈賽幾乎同時發明的收割機，都在這個時期發明。但新用具的大量生產，則須候鋼工業的發展和電氣應用到工業上的時候。

把最動人的新發明做一個簡單的列舉，便足以看出這些發明在締造現代美國上的任務。在墨西哥戰爭之前，摩斯發明了電報的原理，並勸說國會在華盛頓與巴的摩爾之間架設電報綫；一八五六年，西方聯合公司組成，以冀利用這種發明，不久它和其他公司在大陸上遍設電報柱和電線。在六十年代的中間幾年，曾經有人努力想敷設一條大西洋海底電綫，但不能成功，到了一八六六年，大東公司從紐芬蘭架設一條海線至愛爾蘭，永久的海底電綫才大功告成；美聯社即刻用幾乎六千元的代價，以普魯士的威廉對議會的演詞拍發過來，這樣美國人便能夠了解應用科學的利益了！一八七六年，一個蘇格蘭的移民貝爾，以一種電話機公開展覽，在數年之內，幾乎每一個商業辦公室都有一架電話機，而大城市的街道，都被頭上的電綫所遮黑。二十五年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組織成功，擁有資本二億五千萬元。

運輸也隨着國家的擴展而大加改良。自動信號，空氣制動機，車輛聯繫器，以及一九〇〇年後鋼車的使用，使鐵路旅行更加安全；普爾門睡車的發明，又使鐵路旅行更加舒適。在九十年代的初期，美國人實驗着電車，在那年代結束之前，已經有二十個城市——包括巴的摩爾，波士頓和里士

滿——有架空電車的設備。汽車的發明是在二十世紀的第十年代。亨利·福特的工程技巧和商業天才，使汽車成爲一種普遍的需要品。福特回憶最初使用汽車時的情形說：

『那個時候汽車初問世，聲音很是喧鬧，又時時驚嚇着路上的馬匹，被認爲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它又有阻礙交通之害。如果我在城裏任何地方停下我的汽車，必有一大羣人把它團團圍住。如果我暫時離車他去，必有一些好研究的人上車打算開動。結果，我不得不帶同一條鐵鍊，當我必須離車的時候，便把車鎖在街燈柱上。』

在這同一年代裏面，蘭格利也在大胆地試驗着「飛行機器」，這種機器，在嘲笑它的人們還在世的時候，已經足以轉變世界各國的命運。

發明加速了商業的節拍，使大量的婦女和「白領工人」進入辦公室，又擴大了交通的重要性。電話迅速成爲每一個辦公室和商店的重要設備。蕭爾斯和格利頓合作發明的打字機，於一八七三年在市場上發售，翌年馬克·吐溫使用打字機打出一封信說：『一個人可以靠在他的椅上來打字了。它可以把很多字擺在一張紙上。它使案頭的東西不必弄得亂七八糟。』不久，隨處都有打字機，每個商業辦公室都有年輕的女打字員。算數機和現款計算機可以保證會計上的正確；姓名住址印寫機可以廣告和宣傳品向公衆進攻；卡片目錄對美國圖書館最有幫助，是世界上最方便的一種工具。電氣排字機，何氏捲筒印刷機，和電氣印刷方法，在書報的印刷上促成一種革命。

對工業，運輸和交通極關重要的電氣，密切地影響到全國的社會生活。一八七八年，俄亥俄州一個青年工程師布拉區，得到一種弧形燈的專利權，即刻被幾個前進的城市採用爲街燈。更實用的

是愛迪生的電燈。這個時候電燈在商業上的可能性已經很大。一八八二年，愛迪生在紐約建立一個發電和配電站，數年之內，聰明的商人便取得特權在城市開設電廠。在二十世紀第十年代裏，愛迪生試驗着一個電影機；十年之後，電影的商業歷史於以開始，這種有力的工具發動着征服的作用，帶着美國的言論和行動到地球上的天涯和海角。在社會意義上有同等重要性的無線電廣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有效的應用；二十年之後，每個家庭置有自己的收音機了。綜言之，電話、電燈、電影、和無線電打破了孤立，而把社會習慣標準化了。因為這些需要大量的投資和大規模的組織，故大大地加速了大商業的成長。

第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線完成四十年後，鐵路網大略完成，每年運貨十億噸；商船也從長期的不景氣中恢復過來，足以使美國旗再度飄揚於七大海洋上；五億噸的鑛苗和穀類駛過了，蘇聖馬利運河而巴拿馬運河也將近把大西太平洋兩洋結合起來。歐洲的紡織機，亟需美國的棉花，亟需美國的麥和豬肉；在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的五十年間，美國貿易的累積出超額逾二十二億元，到了一九一〇年，常年出口已超過二十億元的標準。

勞工繼續供應着需要，而大部分勞工是賤價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湧進美國的工業中心。他們或來自國內農村，或來自婦孺階級，或來自義大利，奧地利和波蘭人口稠密的城市。一八七〇年後的三十年間，工資階級的總數自一千二百萬人增至二千九百萬人，但參加製造業的還不夠三百萬至七百萬人。但更動人的一件事，是婦女在工業上的人數自八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一，同時十歲至十五歲的童工的人數，增加到一百七十五萬人。來到美國的移民空前增多，他們是南歐和東歐的較為貧

窮和技術較差的人民；新世紀最初的一個年代，美國從奧匈帝國吸收到二百萬不愉快的人民，還有二百萬人則來自義大利，一百五十萬人來自俄國。他們大部份願為他們所能得到的工資而工作；他們一九〇九年在製造業的每年平均工資只稍高於五百元一點而已！

這興起中的工業主義有一個因素是值得考慮的，那便是政府的任務。在內戰後的那一世代，商業的利益不獨負責全國的立法，同時也負責州的立法。內戰時期建立起來作為緊急措施的保護關稅制度，給繼續採用，而鐵、銅、銅、大理石、羊毛、紡織和磁器等工業則是特別受惠的。國會對鐵路的津貼辦法，受各州和地方社會所仿效，直至全部鐵路擁有價值七億五千萬元的土地，證券、免稅和其他的賜予。對於土地的攫取，木材的採伐，和在公地上經營畜牧事業，政府當局是採取一種滿意的態度；許許多多財富是從榨取國家的產業得來的。國會不表示打算限制私人企業，而法院對各州送來的限制性立法也以特別待遇處理。這種『倔強的個人主義』哲學：直到換了世紀之後才開始受到有效的挑戰。

鐵和鋼

我們可以追溯這種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到美國工業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章——鐵和鋼的故事。美國早在殖民時代的初期便開採鐵鑛。一六一九年，約翰柏加利在弗吉尼亞的福林河設一熔鐵爐；一百年之後，柏特上校在他的「進展到鑛山」裏，對在西部的發展有一番生動的記述。海灣殖民地有一家富冒險精神的公司，獲得免費土地，免稅和設立熔鐵爐的專利權。「青山部隊」的領袖亞倫，在

康涅狄格的列區菲爾特山設一鼓風爐；賓夕法尼亞東部的熔鐵爐，替華盛頓慘遭壓迫的部隊製造砲彈；西點附近的斯特林熔鐵爐製造最大的鐵練，繫過哈得孫河以阻英國的艦隊。早期最重要的鐵工業在澤西的北部。後來古柏在這地方建立一個大工業，希威特開始採用新的煉鋼方法。一八〇〇年之後，發達的鑄工廠在防里芬尼斯山脈以西如雨後春筍地興起，在皮次堡地方，有鑛苗，煤、石灰和木材；這裏熔鐵爐及時建立起來，替潘萊海軍副少將和傑克遜將軍製造砲彈。

但這些早期的熔爐都是小規模的。遲至一八五〇年，全國的鐵塊產量每年不過五十萬噸，而鋼的製煉更是微不可言。因為鐵的供應不足，煉鋼的本錢極高，故增產的希望極微。之後，便發生工業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革命。一八四四年，測量隊在威斯康星與密西根北部門的邊界上，發見他們的羅盤針向兩旁急劇擺動。他們報告有黑鑛苗大批露出。許多世代以來，這裏的印第安人即流傳着有一個傳奇性的鐵山；一八四五年，一個捷彪華酋長馬捷基捷，引導一個銅鑛探尋者去到面臨蘇必利爾湖的馬基山脈，不久數以百計的狂熱的獵富者向荒漠湧進，為銅鐵而作孤注之一擲。用火車運輸沉重的鑛苗既困難而又浪費；故一條水道是極端重要的。密西根州建議在聖馬里斯河的急流處濬一運河，聯接休倫湖和蘇必利爾湖，但這一個意見，就是美國制度之父的亨利·克雷也予以嘲笑。他說：『這一種工作，如果不是在月球上，也是在美國最邊遠的殖民地之外。』但結果私人企業和年輕的哈飛的邁進精力把這條運河濬成。它於一八五五年開放給船隻行駛，不久其航運的頻繁比較世界上任何其他的運河為甚。碼頭在馬基，阿須蘭和艾斯肯那巴修築起來，及至門諾敏尼山脈和哥基比克山脈開發以後，強大的「紅肚子」商船隊運載着數以百萬噸計的鑛苗到遙遠的工廠去。

不久，半島北部的蘊藏量，與蘇必利爾湖以西地區的蘊藏量相較，已有小巫見大巫之感；的確，這個大湖的全部，都是由鐵礦圍繞着。一八九〇年又發現了密沙比山脈的鐵礦，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富藏。兩年之後，一條輕便鐵路穿過森林，叢莽和沼澤，運出了一百萬噸的鐵苗。在十年時間之內，密沙比曾經把四千萬噸的鐵苗運至皮次堡和芝加哥的龐大工廠。

明尼蘇達北部這些鐵礦苗的富藏，具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無的優點，使美國在鋼鐵生產上佔着執牛耳的地位。這些鐵礦苗不是深藏於山巖的地下，而是僅僅在地皮的下面。這些鐵苗非常的純淨；可以用大汽割取出；而且接近大湖，容易用低廉的代價，運輸到工業區和煤區去。

但怎樣把紅鐵苗變成白鋼呢？在內戰以前，肯達基一個小城艾地維爾有一個鐵匠叫威廉·凱利，曾經有過一個幻想；以爲他把冷氣吹鐵，便可把鐵製成鋼，結果他證明這完全不是幻想。稍後一些時候，英國工程師亨利·比森麥爾也有同樣的意見。他不但證明這種意見是正確的，而且成功地應用起來，結果當凱利一無所得，只有爲其發明而發生麻煩的時候，比森麥爾大發其財，而且獲得「助爵」的榮銜和震動寰宇的聲譽。凱利——比森麥爾煉鋼法的本身是十分簡單的。

鐵苗、煤和科學使煉鋼工業成爲可能的；保證其成功所需要的只是企業、技術和資本，此時重心在於工業史上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安特盧·卡尼基於十二歲時就從蘇格蘭來到美國，他的父親是一個精練的織工，因爲工廠制度的興起而破產。他們在皮次堡有親戚。這家庭遷到這繁榮城市來後運氣即不極泰來。卡尼基最初是一個捲絲管的童工，漸漸升爲管理汽鍋工人，入電報局，最後在賓夕法尼亞鐵路上工作。他忠實，聰明，勤快，警覺，而其經常保有的良好態度，贏得了年紀較老的人

的信任和友誼。他在三十歲以前，從對油、鐵、快車和臥車公司的機警的投資每年收入可達四五萬元。一八六五年他就決定放棄其他事業，集中力量經營鐵業。這一點已足可見其眼光遠大和胆力過人了。數年之內，他組成各種製造鐵橋，鐵軌和機車的公司。三十歲的時候，他搬到紐約，開始替他的許多公司作賣貨手，同時爲許多鐵路公司和製鐵公司作經紀人。後來他說，他曾經把價值三千萬元的美國證券賣給倫敦。這樣，他在開始經營鋼業以前，即已參加數種事業，這各種事業如電報、鐵路、油、普爾門車、快車公司和鐵，都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卡尼基在採用品森麥爾方法上雖然遲緩，當他看到這一點時，他的改變已經完成；一八七五年他在布拉多克戰場蒙諾加希拉河岸所設立的工廠，是美國的最大工廠。這個工廠在一年時間之內所製造的比森麥爾鋼，比美國其他工廠的總產量還多。卡尼基隨時注意每一種新的改良，並能夠乘人之危收買或打倒競爭者。卡尼基在鋼工業上寢假而躍登領袖的地位。他的帝國一年一年地擴大——新工廠，煤焦產業，來自蘇必利爾湖的鐵苗，一支大湖的汽船隊。厄里湖上的一個港口城市，和一條聯絡鐵路。事實上他所擁有的是一種縱的托辣斯。他的鋼鐵工業與其他十多種工業有密切的聯繫，能夠從鐵路和輪船公司獲得很有利的條件，而且資本充足，有擴充的餘地，同時又擁有最好的工作人員和最聰明的經理人才。雖然羅基斐勒帝國力量是與它匹敵，但它這種組織總是美國史無前例的。一八七八年它的資本是一百二十五萬元，不久每年便得利二百萬，其後又增至五百萬。一九〇〇年當它再重新集資三億二千萬元的時候，它每年出鋼三百萬噸，每年獲利四千萬元。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勞工。鐵工業和卡尼基公司的經驗是典型的。早期的鐵礦工人，

大部份是從康華爾和威爾士招募而來；之後是來自瑞典和芬蘭，再後便是斯拉夫人和馬札兒人洪流的湧進。這些工人是耐苦的。他們每天必須工作二十小時，每星期必須工作七天，而且是在酷熱和喧鬧的地獄裏工作。因為不熟練的工人汗牛充棟，故工會很少有進展，而當它們有進展的時候，也會給殘暴地壓制下來。卡尼基的勞工政策是徹頭徹尾的惡劣。

但無論如何美國的鋼鐵工業是向前邁進的。到了一八九〇年，產量已超過英國；到了一九〇〇年，美國所煉的鋼，比英德兩國的總和還要多。到了一九二〇年，美國工廠可出產鐵塊二千七百萬噸，鋼四千二百萬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看出必要的時候產量還可增加至八千五百萬噸。

卡尼基公司的歷史，足以表示美國大商業的興起。這一個富企業野心的蘇格蘭人，雖稱霸於鋼鐵業者極久，但他不能壟斷天然資源，運輸和包括煉鋼的工業計劃。羅基斐勒擁有密沙比鐵山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和一支大湖的汽船隊；田納西煤鐵公司在南部管有龐大的產業；新公司的興起對卡尼基公司的權力也有威脅的力量。卡尼基受競爭所刺激，聲稱要收買新鐵礦，建築大規模貨船隊，並開始製造真空管、鐵絲網、鉛版和一百種其他物品。當鋼業界人物失望地移轉思想進行合併的時候，卡尼基寧願用自己所定的價錢將他的工廠出賣。他是一個老年人，早就想退休，把金錢用出。他願意聆聽一種建議，就是把他的所有合併入一個包括國內大多數重要鋼鐵業的新組織。一九〇一年美國製鋼公司出世，資本十四億元——這個數目比較百年前全國的總財富還要大。

托辣斯和專利獨占

美國製鋼公司的組織，說明了進行已三十年而繼續不斷直至今日的一種方法。這便是把各種獨立的工業企業合併而成爲聯合或集權的帝國。卡尼基公司在極盛之時，亦不過是六百家鋼鐵廠之一；美國製鋼公司則企圖吸收或消滅這些工廠的大部分，並製造全國鋼產的三分之二。在另一世代的時間內，一百家大公司幹着全國聯合商業的一半業務，而其裡三十萬家小公司則幹着另外一半的業務。

林肯時代的美國，是一個小企業的國家。當時完全不知專利獨占爲何物；自殖民時代的無力的皇家專利公司以來，要算古老的阿斯多皮貨公司和新組成的西方聯合公司最接近這個意思。許多社區，尤其是北部的社區，都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他們的傢具來自當地製造木櫃的工匠，肉來自小屠戶，馬車來自馬車廠。製造業和鑛業很平均的分散着；數逾二千家的工廠製造着犁具，耕耘器和刈割機；單是賓夕法尼亞一地便有煉油廠在二百家以上，康姆斯多克鑛脈的財富由一百個物主分配着。可是四十年之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國際收割機公司幾乎製造全部的農具；美孚油公司實際獨占了煉油業；二三家東部公司擁有和開採康姆斯多克鑛脈。

這種改變在內戰時期內便開始，而於八十年代之後以革命的速度繼續下去。聰明的商人認識，如果能夠把競爭的商號歸併爲一個單獨的組織，他們便能夠減少成本，而更重要的還是能夠控制價格。達到這些目的的初步工具便是公司，然後是聯營，再後是托辣斯。公司是虛構一個人格的計劃，這個人能夠享受一切合法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規避一個人的大部分道德責任。它享受一種永久的生命，有權募股募債，限制債務的責任，受特權所約束，有權在全國任何地方經商。托辣斯則實際上是各個公司的合併體，各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把股票交與託事會全盤處理。有時「托辣斯」這個

名詞是指任何大商業的合併體。托辣斯的優點也是很顯明的。它們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合併，集中管制，消滅缺少效率的單位，合併各種專利品，而由於它們力量的雄厚，能夠有力擴充，有力與外國公司競爭，與勞工作錙銖計較的論價，從鐵路得到有利的條件，在州和全國政治上發生強有力的作用。

企業的合併是一種普遍全世界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美國最為明顯，除德國外，恐怕沒有其他國家比較美國更風行着這種潮流了。有一部分理由是廣大的資源正在等候開發。但還有其他的理由存在。鐵路系統的完成保證製造品可獲得全國性的市場。專利法對於專利獨占的事業極為重要。慷慨的土地讓與和對土地法的寬大解釋，都落入大公司之手，這些公司力足以大規模開採木材和銅鑛、煤鑛。聯邦制度使一個公司可能在法律寬大的州裏組織起來，同時在其他州份經營商業，而保護關稅的制度，又使他們不至受外國競爭所影響。

在前面領頭的是美孚油公司。當賓夕法尼亞西部經營油業的人正在作劇烈的競爭時，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地方一個沉默樸質的青年商人悄悄地收買本地的煉油廠，把它們歸併為一個單一的公司。他的兒子日後說：『美國美麗的玫瑰花，只有犧牲生長在它周圍的早期舊蓄才能求其燦爛芬芳。』一八七二年，羅基斐勒利用短命的「南部改進公司」，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與厄里鐵路公司的減價待遇，取得克利夫蘭地方煉油業的完全操縱權。這一看成功之後，他便開始行動，以求控制紐約，費城和皮次堡的煉油業。一種卓越有效率的交易制度於以建立。之後，羅基斐勒控制着輸油管，而在十年時間之內，對於石油的運輸和提煉業務，實際上取得專利獨占的地位。一八八二年，美孚油公

司以第一個大托辣斯的姿態出現；它被俄亥俄州的法院所解散，但即刻以一個股份公司的資格在新澤西州比較寬大的法律下重新組織起來，而且進行非常順利。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羅基斐勒即把紛擾的煉油工業整理到秩序井然，消滅了他的大部分競爭者，積聚了大批財產，在國內建立一個最大的專利獨占企業。

其他托辣斯和專利獨占事業也迅速接踵而起；例如一八八四年的棉子油托辣斯，一八八五年的亞麻子油托辣斯，一八八七年的鉛，威士忌酒和糖的托辣斯，一八八九年的火柴托辣斯，一八九〇年的煙草托辣斯，和一八九二年的橡皮托辣斯都是。富野心的商人，跟着羅基斐勒和卡尼基的脚步，開始爲他們自己劃定廣大的領域。四家大罐頭商組織一個「牛肉托辣斯」。加肯漢姆公司控制着阿利桑納和蒙達那的彪特銅鑛，這些銅鑛在三十年時間內的出產，約值二千兆元，號稱「世界上最富饒的鑛山」。麥柯密克公司在經營刈割機的事業上成績卓著，而當它的地位遭受威脅的時候，它即刻合併成一個「國際收割機公司」，其目標完全在於獨占這一方面的商業。杜克家族建立一個煙草大托辣斯。其他如銀、鎳、鋅、橡皮、皮革、玻璃、糖、鹽、餅乾、雪茄煙、威士忌酒、糖菓、油、煤汽、電力，其變成托辣斯的故事都是大同小異的。根據一九〇四年的考察，可以看出三百一十九家工業托辣斯（資本在七十億元以上）吞併了五千三百家從前是獨立的商號，而一百二十七種公用企業（包括鐵路）有資本逾一百三十億元，吸收了二千四百家小企業。

一個普通人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大大地受到這種變遷所影響。幾乎每一件他所食所穿的東西，他屋子裏的傢私用具，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托辣斯所製造，或受托辣斯所操縱。他坐下

來喫早餐的時候，他所喫的鹹肉是牛肉托辣斯所製，喫雞蛋所用的精鹽是密西根鹽業托辣斯所製，喝咖啡所用的糖是美國糖業托辣斯所提煉，燃美國煙草公司的雪茄煙，是用的鑽石火柴公司的火柴。喫完早餐之後，他騎自行車或搭電車上班，這架自行車是自行車托辣斯所製，這輛電車是由一家專利的公司所管理，電車所行駛的鋼軌是美國製鋼公司所鑄造。這樣一來，他的食物和交通或許比較一世代以前更有效率些。但普通人所最注意的是托辣斯對他的社區的商業所發生的影響。當地的工業凋落了，工廠例閉或被歸併吸收，他們的抵押品歸入東部銀行或保險公司，鄰人們不爲自己工作，而是爲着遙遠的公司工作，他們受政策的改變所影響，但這政策是他們所控制不到的。

實行合併的不僅限於製造業和鑛業，在運輸和交通方面這種趨勢更爲可觀。繼大托辣斯的老前輩西部聯合公司而起的是貝爾電話公司和規模宏大的美國電報公司。粗暴的老海軍提督萬特比爾特早就認識有效率鐵路需要路線的統一，故在七十年代的時候便把十三四條分離的鐵路合併成爲一條連接紐約城和巴法羅的鐵路；其後的十年間，他獲得通達芝加哥和底特律的鐵路線，而紐約的中央鐵路網亦告成立。其他的合併運動也已經在進行中。不久全國大多數鐵路組織成幹線和「系統」，由萬特比爾特、高爾特，哈里曼，希爾和銀行家摩根與比爾蒙特予以控制。

摩根事業的崛起，說明了企業合併過程中的最後和或許最重要的發展——所謂「貨幣托辣斯」的產生。久從事於把美國證券與英國投資者的 T·S·摩根於一八六四年把其公司的美國分行交其子 J·P·摩根負責經營。數年之後，小摩根參加在費城的特萊色爾的老銀行爲股東，一八七三年，特萊色爾摩根公司已經羽毛豐盛。在九十年代裏，摩根投資和改組鐵路，把他的力量擴展到這

重要的領域。一八九三年的恐慌，使全國鐵路的一半落入破產管理人之手，到處經營鐵路的人轉向「古羅馬之天神」摩根求救。一部分是因為這種生意是有利可圖，一部分是因為它對於保持他已售於國外的證券的健全方面極關重要，故摩根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當恐慌的雲霧最後消散時，摩根的經濟勢力支配着十餘條主要的鐵路線——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南部鐵路公司，折撒比克與俄亥俄鐵路公司，聖大非鐵路公司，洛克島鐵路公司，和許多其他的鐵路線。

同時，摩根的勢力向其他方面發展，直至這世紀的最初十年，幾乎沒有一種主要的商業沒有摩根的決定力量參與其中。摩根曾投資經營聯邦鋼業公司，結果便產生美國製鋼公司。他把農具製造商組織起來，結果產生了國際收割機公司。他曾組織國際商船公司，投資於通用電力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紐約快速運送公司，和其他十幾種大規模的公用事業。一九一二年國會一個委員會發見摩根所支配的銀行，和羅基斐勒的利益，壟斷着三百四十一種企業，例如鐵路，船務，公用事業，銀行，快車公司，煤，銅，鐵，鋼和保險等等，其累積的資源價值二百二十億元。威爾遜總統曾經說過：『本國的大獨占事業便是貨幣的獨占。』

企業合併和托辣斯潮流的盛行有什麼重要性呢？它產生史無前例的一種缺席業主制——煤，銅，鐵，木材，鐵路的龐大產業，由紐約的公司擁有和指導。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它把全國經濟的控制權集中在東北部一個小區域裏，產生一種新的區域主義以代替舊的區域主義。它把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開，數以萬計的股票持有人根本就很少有責任感，也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公司的財政和勞工政策。它產生了資本的新積聚，其力量足以左右州的和全國的立法，並影響着外

變和內政政策。無疑的，它消滅了許許多多劇烈的商業競爭，得到更大的效率，撥金錢作必要改良和研究之用，並使大量生產和低價出品成爲可能的——可是這種種都是用犧牲社會的極大代價換來的。

政府的干預

卡尼基稱這種種做「勝利的民主」；其他的人都準備隨時承認它是勝利的，但並不敢完全確定它是民主的，的確，他們四周一看，發見大部分的天然資源，工業，鐵路，和其他公共事業，都不是爲社會的福利而是爲幾個人的福利而受管制。這個時候他們開始對民主政治能夠持久一點表示懷疑了。鐵路的過度索價，歧視，和大規模的攫奪土地，羅基斐勒和卡尼基排斥競爭者所採取的惡劣手段，許多大公司彈壓勞工的殘酷權力，托辣斯科學和發明的儲蓄的囊括，公司代表們運動立法機關通過有利於他們法律的可惡行動，在在引起人們普遍的警覺和痛心。

專利獨占在普通法律上早就就是非法的行爲，許多州的憲法有條款規定，禁止專利獨占。可是這種憲法上的禁例是幾乎完全不發生效力的。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許多州在法典上制定比較嚴格的法律，有些甚至規定解散托辣斯。但在這一州被解散的托辣斯，可以到法律比較寬緩或執法比較鬆懈的州份去重整旗鼓，並以同樣的立場繼續經營。很清楚的，這是聯邦的問題，非州的法規所能解決。

專利獨占所引起的各種憤激，其第一個實際的結果便是對於鐵路的限制。早在一八七〇年便有憤

激的農民大聲疾呼，反對鐵路的專利獨占，說它運費太高，服務不良，並爲着投機的目的使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得不到市場。因農業團體的要求，中西部各州在法典上加入法律，限制鐵路的運費，並規定減價，對某種船公司的特價，在同路上短程索價高於遠程，以及免費乘車等等則爲爲不合法。

限制鐵路的工作比限制托辣斯的工作簡單得多。它的基本困難處也許不在於商業的龐大和錯綜複雜，而在於美國人頭腦的混亂。美國人是懼怕大商業的，但他們同時又羨慕大商業，他們一方面自己得到保護，不至受專利獨占所危害，一方面又希望享受大規模生產的利益。他們信賴政府限制商業的法規，同時也信賴私人企業和個人主義的好處。

當各州無法解決托辣斯問題時，國會不得有所行動。一八九〇年的余曼反托辣斯法案，把一切合同，合併企業和專利獨占等都列爲非法。但當政府牛刀小試以企打倒某幾種專利獨占企業的時候，法院又支持它們，因此它們依舊逍遙前進。余曼法案十年之後，我們看見一些最龐大和最著名的托辣斯成立起來。

因爲美國製鋼公司的成立，美國大衆反對托辣斯怒潮洶湧了。報章和演說對此大加抨擊。書籍各塔貝爾的「美孚油公司歷史」，羅素的「世界最大的托辣斯」（牛肉托辣斯），和洛遜的「瘋狂的財政」（銅托辣斯）銷數都以萬計。而新的流行雜誌如麥克魯雜誌，人人雜誌，和柯里爾雜誌，都充滿着揭發大商業罪惡的文字，同時這種文字也發現在有地位的老雜誌上。這種抨擊是多麼普遍和多麼猛烈，故有人稱這一世紀的最初十年爲「耙糞者時代」。

更有效執行反托辣斯法的要求是不可抵抗的，提奧多·羅斯福總統予以熱心的響應：他說『我們一定要執行反托辣斯法，而當訴訟發生的時候，除政府勝利外毫無妥協可言。』令華爾街驚愕不置的，是老羅斯福總統命令他的檢察長解散三個鐵路巨頭（摩根，哈里曼、希爾）所主持的一個鐵路合併企業——而在北部證券公司一案他是勝利了。接着是對肉類托辣斯，煙草托辣斯和美孚油公司的檢舉，都是政府獲得勝利。

可是這種種行動雖動人於一時，但不是實質的勝利。大托辣斯解散後，其組成分子又尋出別的辦法保持一個利益的領域。而老羅斯福總統除設立一個公司局後，沒有做出什麼事加強反托辣斯法的力量。縱然他在法院內成功，又公開斥責「大財富的兇徒」，但當他退職的時候，托辣斯的聲勢比較他登台時還要浩大。羅基斐勒說：『合併的企業必在這裏存在。個人主義已成過去，永不會回頭了。』他說這話的時候，顯然他是說得正確的。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工人和工資

美國豐富資源的開發，工業的機械化，專利壟占事業的興起，把財富的洪流不斷湧進少數大商人和較多數狡猾的投資者手裏。但幹全部苦工的工人則少受其惠。勞工是大商業發達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在分利的時候，勞工被人遺棄了。在分配社會酬報時候，勞工也被遺棄：工人很少被人看得起，人家不邀請他們參加俱樂部，他們的領袖受學院和大學所忽視，榮譽學位只有大資本家才有福享受。財富有了新來源，在理應該意味着更廣大的分配，但這離實現還遠；應用節省勞力的機器，在理應該意味着更短的工作時間，但這也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科學本來應該保證工人有更安全和快樂的工作情況，但事實上他們繼續處於酷熱噪鬧和空氣不流通的工廠裏；或時時受礦坑裏的危險所威脅，工業的失事和疾病一年的增加，情形極爲可怖。國內的工人，擁擠在大城市的小街陋巷，受不景氣和失業所打擊，又須與來自國外或南部的不熟練的大量工人競爭，故他們的命運很是悲慘。欲改良這種情況也大不容易。組織和罷工受人懷疑，在州議會和國會理，勞工代表很少。

的確，對工業美國的成长最有貢獻的一些發展，實際上對勞工是絕對不利的。有兩點可以簡單的

予以注意：工業的機械化和公司的興起。機械化就全盤看起來，是傾向於降低勞工的標準。工人們千辛萬苦學來的技術，至此失去了昔日的價值，因為一個熟練技工所做的，機器能夠做的更好，更快和更便宜。工匠的創造本能大部分被破壞，工人變成機械製造過程的一部分而已。自動機每天每一分鐘都在幹着單調而令人耳聾的工作。機器還有一種傾向，就是篡奪工人在工業經濟上的地位。機器代表着大量的投資，能夠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並決定工作的情況；熔鐵爐必須不斷燃燒的事實，對於鋼鐵工業保持二十四小時工作制度五十年之久是一種決定的因素。最後，對於許許多多的失業，機器也應負一部分的責任。結果機器所創造的職業比較它所消滅的為多，這也許是真實的，但得到新職業的，往往不就是那批失業的人，而在較老的人覺得新工作之前，常常有一個匱乏的痛苦時期。故大規模的失業乃是機器時代的一種產物。

作為僱主的大公司的成長，往往也是對勞工不利的。小規模的工業，與它的工人和社區有密切的關係。在討論工價上，與本地僱主交涉比較與遙遠和沒有人性的組織交涉容易成功。

在美國，也有其他數種持有的因素左右着勞工的福利。第一種因素是內戰結束一世代之後，賤價的好土地已不復存在。如果說西部是勞工不滿的「安全門」或許許許多多工人的避難所，乃未免說的太於誇大。很顯然的，經過二三代之後，這一大片廣漠的土地曾經吸收盡鄉村甚至城市的過剩人口和外國移入的人民。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移入美國的五百萬人民，如果不分佈在全國各處，而集中在東部的工業城市，勞工的地位必會更加惡化。因為耕種成本的增加和賤價好土地的消失，剩餘的人口曾經逗留在工業區域。耕種已經不復是工廠以外的一條實際退路。勞工已經不復能

規避工業化社會的各種問題，而不得不起而謀面對問題了。

第二種因素是美國特有的因素，那便是繼續和沒有限制的外人移入。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四十年間，湧入美國的人民數在二千萬以上。即使不把婦女和孩童（許多是作工的）算在內；這種移民就意味着每年有數十萬個人加入勞工階級，急於在工廠和鑛山裏獲得工作，無論多少工資或什麼工作情況他們都願意。這還不是北部勞工的唯一競爭者。在世紀改變之後，數以萬計的壯健黑人來自南部，隨時準備與波蘭人，義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並肩工作。不是每一個來自國外或南部的新人都奪去一個工人的地位；在繁榮的時際，有工作可容全部的工人。而新來的人只有使當地勞工提高其地位至成爲第一流工人。但外人大規模流入的普遍趨勢，是減少工資，降低標準和使工會瓦解。

第三種美國特有的因素，便是國家經濟與聯邦政制比肩存在着。在採煤工業，紡織廠，和鋼鐵工廠裏，這些勞工問題是全國一律的，但直至近年爲止，對付這些問題的權力，只有在各州單獨使用。競爭的規模是全國的，而規定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權力則是州的。在新英格蘭的紡織工業或紐約的服裝店，工人可能爭得重要的讓步，但這樣一來，其唯一結果是這些工業遷移到法律不大嚴格的州份，使讓步完全成爲泡影。在「新政」實施之後，這一切是改變了。聯邦政府設法對勞工關係的整個範圍建立全國性的統制。

直至近年，大多數美國人認爲商業的合併是好的，但對勞工的合併則採取不同意的態度；他們假定商業可以參加政治，但如果勞工也參加政治便違反了美國的慣例；他們贊成政府扶助工業，但認爲政府扶助勞工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或對壓力集團的投降；他們認爲投資者有天然權利要求投資獲

得滿意的利息，但假定一個工人無權利要求他的勞力獲得任何利息，而失業不過是上帝的意思。當全國在現代工業主義上受到教育的時候，這種態度便改變了，但他們留戀於阻礙工會工作的時期夠長了。

不過我們對於工業時代的勞工狀況，亦不能描繪一張太過陰暗的圖畫。一般的說，對於願意工作的人，是有足夠的工作的，而工資雖然不豐富，但也足夠維持一個家庭的衣食住。在美國時時有機會可以改變職業，由一種收入集團改變為另一種收入集團，但在美國沒有和許多歐洲國家的意義一樣的「勞工階級」。就是在二十世紀，一個到美國的旅客，也不能在美國發見顯明的階級界線。免費的公共教育，使工人的子弟能夠在商業或其他自由職業上青雲直上，而一舉制度又是工人強迫立法機關通過友好法律的有力武器。來到美國的旅客，當他們與旅美外僑談話時，很少發見他們不喜歡這新世界，也很少渴望回歸老家。數以百萬計的窮人，繼續的向美國湧進。

工會的力量

商業組織的道德在勞工方面也沒有喪失。這個共和國自初期開始，即有一種工會存在，但這種工會大部分是地方性質的和無力的。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有一些強有力的技工聯合會成立起來——印刷工會是最老和最重要的一個——但這僅包含勞工階級的很小一個成數而已。

在戰後時期，有三類勞工組織出現。第一類是工業聯合會，其最好的代表是「勞工武士會」。第二類是技工聯合會。第三類是急進或革命的勞工集團，他們在人數上並不居重要地位，但態度極為堅

持。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以前，這些組織都不能包括大多數的美國工人。大批的勞工人口——農場工人，漂泊工人，家庭工人，「白領工人」——還是在組織範圍之外。

最重要和或許是最有趣味的早期勞工組織，是勞工武士會。武士會的最動人特性是它的民主和它的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前途。它歡迎一切的工人——農夫、廠工、礦工或工匠，無論熟練的和不熟練的它都收納；只有賭徒，酒館經理人，銀行家，律師，和證券經紀人不能做它的會員！它的宗旨在於「使勞力者在他們所產生的財富中能得到其應得的一份；更多本來屬於他們的暇晷；更多社會使利……工人們有了這種種權益，然後對於好的政府才能夠享受，欣賞，保衛，並使其永續下去。」這些富有希望的目標，並不是用罷工和暴烈手段而是用政治示威，教育和工人合作以求其實現。武士會的政綱是急進的，但相當分散：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廢除童工，為共事業收歸官辦，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實行土地改革。以理想和勸誘的混合物來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不能收效，但一八八五年之後，武士會訴諸罷工了，而他們有一些地方也獲得成效，會員人數大增，在一年時間之內，他們誇稱擁有會員七十萬人。因為受勝利所鼓舞，他們為着八小時工作制而支持一個計劃很惡劣的總罷工。罷工鼓勵了芝加哥秣市廣場的大會，有不明姓氏的無政府主義者投了一枚炸彈，炸死了許多警察。這一次暴動雖不由武士會負責，但輿論都認武士會與炸彈案有關。因為這個案件和其他多次罷工的失敗，武士會便每况愈下了；一八九二年當他們與平民黨聯合的時候，他們便由沒落變成死滅了。

同時，有一個新的組織崛起為強：美國勞工聯合會。一八六三年有一個荷蘭籍猶太人貢波士決心

放棄倫敦的雪茄製造廠，到美國碰碰運氣。他帶同他的十三歲兒子聖牟。貢波士，這位小貢波士，即刻參加捲烟枝的工作。翌年，這個小孩子參加雪茄工會；從此聖牟·貢波士與工會有不可分的關係，而美國工會的歷史也就離不了他。他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但雪茄製造廠給他在勞工史和經濟學上以透澈的訓練。貢波士熟讀英國改革家和德俄兩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他還受過實際的教育；由於罷工，窘逼時期和現有工會不足的痛苦教訓，貢波士認識需要一種現實而頑強的勞工政策。他認為工人必須一致守紀律，必須儲存大量基金，以備罷工和不景氣時之用，並且必須避免與政客，急進派或教條主義者往來。一八八一年，他召集各工會代表，組成一個「美國加拿大工會聯合會」。五年之後，這個組織變成「美國勞工聯合會」。

美國勞工聯合會比較美國勞工武士會更接近英國的勞工組織。它和武士會不同，它是一個技工總會，把會員資格限於上層的勞工，並組成一串自治的工會，其聯合起來的方式，很像美國各州的組成聯邦。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政策上是傾向於實際主義和機會主義，這一點也與勞工武士會不同。它的一個發言人曾經說過：「我們沒有最終的目的。我們只爲着最近的目標而奮鬥。」他們的目標大部分是限於更高的工資和更短的工作時間，但也不忽略有關的事務如童工，衛生保健法律，禁止訂約勞工和罪犯勞工，以及拒絕中國人移入等等。不過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綿長而成功的歷史上，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保守的，機會主義的，同時還有些獨占排斥他人的性質。它規避政治，可能時與資本家合作，以基金支持必要的罷工，保持嚴格的紀律，並用清醒樸實的政策爭取民衆的信任——由於以上措施，它克服了敵意的攻擊，渡過了種種難關，戰勝了競爭者；而當貢波士於一九二四年末

次擔任它的主席時，這個組織的會員已經將近三百萬人。

第三類勞工組織是沒有力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有長久的背境，但他們的早期表現多半是如布魯克農場一類的烏托邦的實驗；最接近社會主義制度的是猶他州的摩爾門政體，不過勞工沒有參加重要的部分。八十年代間，有一個祕密團體叫摩利·馬凱斯的在賓夕法尼亞的無烟煤礦場施行恐怖政策，後來被武力所救平。八十年代又有一批德國的知識份子企圖建立美國社會主義。他們對馬克斯和拉薩爾學說的熟識，更有甚於對美國勞工的認識。摩斯特於一八八二年來到美國，又增加美國勞工左翼的革命傾向。摩斯特不容於德國和英國，他逃到美國來，謀使美國工人採取暴烈政策。他認為欲澈底解決勞工問題，必須「用積極的，無情的，革命的和國際的行動，毀滅現存的階級統治。」他為「黑色國際」創立了一個美國分部。黑色國際除幹零星的暴烈行動外，絲毫沒有成就，惟有玷辱整個的勞工運動而已。

急進的勞工團體，及時把自己從外國的糾葛中解放出來；一九〇五年正式成立的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它雖借用些福利爾的工團主義，但它是徹頭徹尾的土產。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在西部的木材工廠和鑛場，以及東部的紡織中心雖有一些成就，但它從來得不到實際人數上的力量，而它的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使它幾乎一蹶不振。

勞工衝突

美國勞工的故事，充滿着罷工和暴動。美國勞工開始就須為他們之所得而苦鬥；為着組織，罷

工，糾察的權利，爲着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工資，爲着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失事賠償金，爲着廢止童工和禁例，爲着限制外人移入等等。這些鬥爭大部分在工業範圍發生，有時也在政治的領域內舉行。在這長期的苦戰中，勞工大都是孤軍苦鬥，沒有外援，而商業則得到輿論，警察和法庭的支援。因爲遭逢到這樣頑強的反對力量，故勞工在罷工上所得到的勝利較少於其失敗或妥協，但它的勝利的次數已足夠令他們繼續用罷工爲一種武器。不過有一點不可忘記的便是，在勞工關係上訴諸武力與在國際關係上訴諸武力，同樣是理智失敗的一種紀念碑。

在美國建國的初期，罷工並非不尋常的事，後來使用以與它鬥爭的武器也不是不熟識的。一八三四年羅威爾紡織廠女工罷工的時候，一家報紙這樣報導：『她們已經做了女性不該做的事，如在街路上遊行，揮動她們的手帕和圍巾，而且其中有一兩個作公開演說。』輿論受這些不適當的舉動所震驚，結果罷工瓦解了。在六十年代時，紡織、煤礦、製鐵、和其他工人之間，掀起了罷工的浪潮，可是他們大部分結果都是失敗的。暴烈舉動的真正時期，開始於一八七七年的一「大罷工」，與勞工武士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和托辣斯專利獨占事業的興起同時。自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發生罷工不下三萬七千次，有些是地方性質和短促的，有些則是曠日持久和全國性的。

這個時期最動人的罷工是一八七七年的一鐵路工潮，這是美國大規模工業暴動的第一次；一八八六年麥柯密克收割機工廠的罷工，結果促成秣市暴動的慘劇；一八九二年荷姆斯台特罷工，曾在蒙農加希拉河兩岸發生對陣戰；一八九四年的普爾門罷工，曾使全國一半的鐵路都停頓了；可勒拉多煤礦場的罷工，發生了克利普河的惡戰；一九〇二年無烟煤工人的罷工，幾乎使全國工業都發生麻

慮，最後由老羅斯福總統的干涉才告解決。要詳細回溯這些歷史上的事蹟，既不可能也毫無益處，但我們可以擇一八九四年普爾門罷工潮來說，因為它在許多方面都可作美國工潮的代表。

這一次工潮由伊利諾斯州的「模範」城普爾門開始。這裏的工人住着舒適的公司房屋（房租較他處高四分之一），買公司的煤氣和水，並從公司內的商店購其他物品——這於喬治普爾門和其他股東都是有利的。及至二十世紀第十年代的初期，工人工資削減，以求維持紅利。當工人代表向普爾門呼籲把這問題交付仲裁的時候，普爾門置之不顧。於是工人們立刻停工。在青年戴伯斯領導下的新組成的美國鐵路工會，把普爾門工廠工人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訓令它的會員不要用普爾門的車輛。這樣一來，鐵路與工人間的戰事於以開始——而且影響到全國的一半地區。在數星期時間內，北部和西部的運輸都麻痺了，一家大都市日報預料到打破罷工所採用的方法，宣佈這是『反對政府和反對社會的戰爭。』僱主機關「總經理協會」深恐罷工成功，決定在鐵路工會尙未能再進一步搗亂之前將其擊潰，於是要求聯邦政府實行干涉，以保持鐵路交通不至中斷。

總經理協會這次要求勝利了。克利夫蘭總統的檢察長奧尼是一個從前的鐵路律師，他對於僱主的觀點完全同情。他接得要求之後，即發表命令，禁止一切罷工行動。伊利諾斯州的州長奧特蓋爾特本來就準備用州的民團來維持秩序，但他沒有行動的機會，克利夫蘭總統已經命令聯邦軍隊開入芝加哥。禁令打破了罷工，而軍部幾乎打破了勞工運動。戴伯斯拒絕服從禁令，結果以侮辱法院罪入獄。奧特蓋爾特提出抗議，謂聯邦軍隊如此開入州境，已經違反憲法和破壞州的主權。他這次抗議被克利夫蘭和法院駁回。這樣一來，鐵路僱主方面似乎全部勝利。

可是後來國會委員會和研究者的調查考察，幾乎支持罷工者和奧特蓋爾州長的每一點理由。他們斥責普爾門的工業封建主義；認為罷工者不必負擔擾亂治安的責任；總經理協會是傲慢和無法無天的；奧尼的政策不適當，使用禁令在法律上頗成疑問；調動聯邦軍隊為不必要和不適當的舉動。這不愉快的插曲，使這時期許多左右勞工地位的力量為人所注意：一個大公司的傲慢，同情罷工的任務，反托辣斯法的使用，約束勞工的禁令的使用，法院的敵意，和政府同情資方而不同情勞方的趨勢。它使勞工問題成為即將來臨的競選運動中的主要問題，並使勞工不信任克利夫蘭總統。它增強了社會黨的地位，並造成一個勞工的偉大領袖戴伯斯，奧爾蓋特的聲譽也因此提高。

到了一九〇〇年，勞工贏得了它的基本權利的大部分——集會結社的權利，罷工的權利，集體議價的權利——而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運動也獲得進步。但很顯然的，這些收穫僅限於勞工人口的小部份，至於整個工人安全和社會的大問題還談不到。情勢漸漸明白，勞工問題並非離其他社會經濟問題而獨立的，而工人的福利和安全對社會是有害關係的。在工業不能付適當工資的地方，社會必須設法予以補助。在工業不能給予充分職業的地方，社會必須設法解決失業問題。在工業把工人弄得殘廢老弱的地方，社會必須支持他們。女工童工不僅是他們與僱主之間的問題，而是有關種族前途的大事。社會能夠忍受工業戰爭多久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因為無論那一方面獲勝，社會往往是受損失的。

很顯然的，這些都是需要政治行動的問題。除非競爭者都願採取同樣行動，沒有一個僱主能夠幹這樣大規模的改革計劃如失業賠償金和養老金等等。當大多數的工人尚散漫無組織的時候，集體議

價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的禁止童工，規定女工工作條件，要求失業賠償金，援助失業業者，老年者和工業廢棄者，視察工廠，改善建築物，並做其他許多事以避免毫無約束的現代工業主義的罪惡後果。英、德、丹、奧、澳等國對此早已採取適當的行動。但在美國，因為有邊區的傳統，有許多的工作機會和頑固的個人主義，故社會立法的制定，曠日持久沒有實現。當問題變成緊急的時候，美國便表現她能夠迅速處理，在老羅斯福總統和威爾遜總統任內，已經有相當可觀的開始，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美國在勞工和社會立法上已經趕上工業國家的老前輩了。

督新教徒，學者和知識勞工在社會工作者，基督新教徒，學者和知識階級之間獲得有力的同盟雷伊斯，芝加哥赫爾館的何門爭史上，新聞記者雷伊斯，芝加哥赫爾館的亞丹士，一神論教士格拉書特書。他們不斷努力，蒙斯等的名字，必須大書特書。他們不斷努力，使社會大眾明瞭童工的社採取行動。這些改革家在，鼓舞懶惰的立法機關採取行動。這些改革家在一些州份——馬薩諸塞。不過問題是很困難的。——獲得顯著的成功，不過問題是很困難的。

界大戰的時候，大多數州的進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大多數州份已經禁止小童勞作；有賠償制度，嚴格視察工廠八小時工作，建立失事賠償制度，嚴格視察工廠和礦場，禁止訂立不合法這一種成就可用童工法的私人偵探和私人警察。這一種成就可用童工法的歷史予以說明。

五萬個十歲至十五歲間的社會的恥辱。一百七十五萬個十歲至十五歲間的兒童被雇用。許多在工廠和紅莓苔子田地工作。一甜菜農場公司，甜菜農場和紅莓苔子田地工作。一個視察員發見八家紗廠裏員發見有六七歲的兒童於一個視察里；另一個視察員發見有六七歲的兒童於早晨二時開始以蔬菜裝入

容易被人規避。南加羅「規避」的慘哭」一書，是這一世紀賓夕法尼亞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煤礦實情的作別論！當馬里蘭規定「當馬」運動了。

但往往不夠嚴格，種罪惡的罪惡的，但往往不夠嚴格，容易被人規避。南加羅林納後來規定工廠工庭不能負擔時則另，但這種限制令家庭不能負擔時則另作別論！當馬里蘭規定年在十六歲以下而需求的人數較上次人准方許工作時，請求的人數較上次人口調查時十六歲以下人口總數多了一倍！立，擦鞋小孩，漿果生效，而兒童信差，擦鞋小孩，漿果園和罐頭公司的工人都不算是工廠工人，故到了一九〇九年，都不能受到保護。到了一九〇九年，美國才有一個州——特拉華州——規定「兒有酬報的職業。」者不得僱用以擔任有酬報的職業。」

結果停動的必要。足，結果使國會採取行動的必要。一九一六年，國會制定法律，禁止童工產表面算這境。這個問題表面算是解決了——但法院宣布國會無權制定這一法律，於是不能生效。三次把「會再度嘗試，此次把「童工產品」字眼刪去。法院又予以否決：國會不能用間接方法做它直後最高傲的事。二十年後最高法院雖承認這完全錯誤，可是事情已經做了。在繁榮的三十年代全部時期，童工繼續存在，據一九三〇年人口調查，十八歲以下的男女童工數在二百萬以上。之後，「新政」實施，克服了憲法上的困難，實際上把這種恥辱結束了。

勞工由於這兩種方法——集體議價和立法——大大地改進了他們的地位。商業也開始對勞工問題採取比較開明的看法，並把自己陣營的秩序弄好。從此商人不至於再說：「勞工是一種商品，到底還須受供求法則所管制。」「供求法則」曾經爲着廠家，銀行家和農民而修改過；現在它也爲着

勞工而修改了。

鎔鍋

大多數美國人從未了解移民在他們歷史上所發生的影響。他們把移民認做一個「問題」，並且認做是過去五十年才發生的事。而當他們想到移民的時候，腦際便浮現一幅圖畫：膚色紫綠的義大利人，或滿面鬍鬚的猶太人，或帶着顏色鮮豔的披肩的波蘭農婦，從船的跳板上走愛麗斯島。他們沒有想到漂泊的神父們，十六世紀法國的新教徒或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甚至沒有想到窮苦的黑人在中部通路的地獄裏受苦。

但全部美國人除印第安人外，都是外國移入的人民或移民的後裔。移民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環境裏從地球上不同的部分移入美國。可是他們都有同樣的經驗，老家蕩然無存，移到美國來重整旗鼓。他們的全部，即使是無知識和下賤的人，都帶回他們的精力，文化和信仰到美國來。他們都是這龐大的美國大鎔鍋的組成分子。

我們已經略知組成美國人口的各种流派。在共和國建立的初期，人民繼續從舊世界移到新世界來，他們大部分是自願的。自一八二〇年初次有紀錄起至內戰開始止，約有五百萬人從愛爾蘭，英格蘭和德國移到美國來碰運氣。就是內戰也都沒有嚴重阻滯人口移入的潮流，而在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這潮流簡直便成急湍了。一八七〇年的美國人口是極為複雜的。那一年，一千個美國人中，四百三十五人是土生父母的土生白人，二百九十二人是外國或父母不同國籍的土生白人，一百四十

四人是外國出生的白人，一百二十七人是黑人；此外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和一個中國人，湊成了一千的整數。在一八七〇年與一九二〇年之間，幾乎有二千萬個外國人移殖美國。但外國出生和土生人口的比例沒有什麼大變動。最驚人的變動恐怕是黑人人口的相對減少和墨西哥人的增加。

可是在美國人口改變的特質上有一重要事實可使每一個觀察家震驚。那便是東歐和南歐移入人口的急劇增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部分移入人民繼續來自英國，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國家。但就是在這個時期，已經有「新的」移民小潮流了。富進取心的輪船公司與那不勒斯，但澤，米美爾，阜姆和雅典建立直接的聯繫，並在義大利，波蘭和奧匈帝國設有數以千計的代理以吸收統艙乘客。富進取心的公司，設法在愛麗斯島迎接移入人民，帶領他們到礦區或工廠城市。及至英，德和斯坎的納維亞的人口壓力漸漸鬆弛的時候，這一帶播遷到新世界人民的洪流便和緩了。可是「新的」移民反而激增。例如新世紀的最初十年間，來自愛爾蘭的移民不過三四〇・〇〇〇人，此外另有三四〇・〇〇〇人來自德國，但來自義大利的竟達二百萬以上，來自奧匈帝國的也達二百萬。在最後禁令發布以前，義大利移來的人口逾四百五十萬，奧匈帝國四百萬，俄國和波蘭三百二十五萬。

對於這一批批移入的新人——對於逃避宗教的迫害而尋求信仰自由的人，對於逃避兵役和逃避參加戰爭的人，對於渴望有一個更民主的社會的人，對於希望解脫窮苦而想染指新世界的非凡財富的人——美國實在是一片樂土。他們都參加偉大的探險；他們都夢想着更好的生活，而他們大多數都為着自身和其子孫建立這樣一種生活。威爾遜總統曾經否決二件企圖限制外人移入的法律案，他

說：

「每一隻向西駛來的船，不是載着他們祖國被壓迫人們的希望麼？當他們望見美國海岸的時候，他們的心是怎樣的跳躍！他們早就渴慕着這邊的居民，沒有帝王，沒有特權階級，沒有令人壓抑絕援的一切束縛，這裏忠實的可以獲得充分的果實，是一個如手如足的大團體，不想互相欺詐，而企求造成一種普遍的良善！」

自由神像的巨影初次出現在地平線上，的確是現代史上最動人和最富戲劇性的經驗。自由神的手握着希望的火焰，它的基石刻着這些字句：

都交給我吧，

你們疲憊窮苦的人民，尋求自由的過度擁擠的大衆，

最卑賤，最悲慘，最困苦的人：

把這些人都交給我吧，

這裏我握着明燈，

照耀着自由和機會的金門。

「舊的」移民在北部和西部很勻稱地散佈着，其參加農業和工業的人數也大約相等。但因為要創辦一個農婦需要錢，因為最好的土地已經沒有，因為城市有工可作，而且是自己人的殖民地，又有天主教會，故「新的」移民聚集在東部和中西部的工業中心。一九〇〇年，外國出生的人民有三分之一居住城市，到了一九二〇年，這個數目已增加到四分之三。紐約城有數以千計的義大利人，波蘭

人，俄國人和猶太人；恬靜的波士頓有大量的義大利人和法籍加拿大；教友派的費城有俄國人；克利夫蘭有俄國人和波蘭人；聖保羅和明尼阿波利斯有斯坎的納維亞人；而芝加哥則是什麼種族都有，甚至比大城市還高。這種事實的意義是新來自東歐和南歐的人，都想在礦場和工廠裏找工作。例如早在一九一〇年，賓夕法尼亞的煤礦工有四分之三是國外出生的，而其大多數是義大利人，波蘭人和斯洛伐克人。一九二〇年，國外出生的人民，佔人口總數八分之一，但他們三分之一受雇於工廠，一半以上則作工於礦場。

移入人民有什麼貢獻呢？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精力，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信心。他們對美國有很多的貢獻，美國對他們也施了很多的恩惠，他們幹着辛苦的工作，使美國的資源能夠迅速開發。他們開墾草原；他們敷設通過大陸的鐵軌；他們發掘鑛鑽、煤鑛和銅鑛；他們砍伐西北部的森林。但他們的貢獻，不僅限於不熟練的勞動。他們使美國生活豐富而色彩，而在某些地方大大增加了美國文化的傳統。在音樂和美術方面！他們供給創造力的大部分。一九三〇年，美國主要樂隊的領袖，沒有一個名字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名字。在繪畫方面，許多名畫家都是外國人。在商業、政治、科學和教育上，外國出生的人和他們的子孫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但移民也有它的問題。勞工界感覺到他們是職業的競爭者；正如一個勞工領袖所說：『我們的生括是由移民來衡量；我們的工資以移民為基礎；我們家庭的狀況受移民所左右』。城市政府在房屋，衛生和治安方面都發生新的問題。學校發生應付文盲和社會調整問題，但外國出生人民的同化

並不困難。平均的移入人民都渴望成爲美國人。瑪麗·安玳在她的「樂土」書所述的經驗，可說就是千千萬萬人的經驗：

「一個日麗風和的九月早晨，當我進入公立學校的時候，我的公民的自尊心和私心的滿足達到了頂點。我一定永遠記住這一天。入學的第一天，在大多數人看起來是一個紀念日。在我看起來則有一百倍的重要性，因爲我期待這一天太多了，路途太遙遠了，我的期望太大了……：父親親自帶我們到學校去。他不會把這工作讓給美國總統做的。他等候這一天的來臨，其焦急的情形和我相同。他在路上催促我們時所看見的事象，令我夢寐難忘……：最後我們四人圍站在女教師的桌前；父親用他那令人聽不懂的英語，說出心裏已經無法埋藏的對於我們的希望，把我們付託給女教師。」

引起同化和社會調整的問題的，於其說是移入人民的本身，無寧說是他們的兒女。好些是從根拔起和德性敗壞。在家庭裏，他們是處於一個世界，在家庭以外，他們是處於另一個世界。經由他們的父母和教會，他們還是與舊世界保持聯繫，可是這種聯繫，不是根本的而是不真實的。因爲他們容貌和語音之不同，故不完全爲他們的美國伴侶所接受。他們往往在未獲得新的傳統之前即向舊的傳統背叛。公立學校本來是很好的溶和劑，但有時不會消滅歧異反而增加了歧異。第二代的美國人比第一代發生更多的社會紊亂，暴動和犯罪的問題。

一九〇〇年左右發生了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爲已經到了必須限制外國人移入的時候了。勞工憎恨移民的競爭；「舊血統」的美國人深恐他們的血統受新來的北歐人和地中海人所混淆；一般的普通

人則認為美國人口和問題夠多了，不必招入更多的人口和問題。早在一八八二年，國會已經決定停止中國人移入，同年又禁止他們認為「不良份子」的移入——即患病者，神經不健全者，道德敗壞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等。這在實質方面可以發生一些效力，但在量方面則否；所需要的便是兼顧質與量的一種限制辦法。結果提出來的辦法是識字試驗。英國、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既幾乎沒有文盲，而義大利、波蘭、俄國和南歐東歐各國則文盲甚多，這辦法便具有一種長處，即一方面可以削減「新的」移民的總數，一方面又不至嚴重影響到「舊的」移民。

三位總統——克利夫蘭、塔虎脫、和威爾遜——都否決過以識字程度為移居美國條件的法律案，他們的理由是這僅是機會的試驗而非能力的試驗。但一九一七年國會終於勝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洲戰區人民大規模移入美國的可能性極大，故問題似乎已經不僅在於限制，而是進步成為排斥或拒絕了。國會於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制定一套法律，對於將由國外來美的人作量的限制——結果是限定十五萬人。

這樣一來，到了一九三〇年美國歷史的一個時代便告結束。美國雖仍是一個鎔鍋，但已經不再是世界各國窮人和被壓迫者的「樂土」了。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開發最後西部

當南部正從戰爭的痛苦和重新建設的紊亂中恢復過來的時候，當北部正把它的經濟適應工廠和機器的時候，密蘇里以西的西部，其改變更為可觀。一八六〇年，這一片約等於美國一半面積的區域，大部分還是荒野。新的州加利福尼亞自誇人口四十萬；在威拉密特河谷有五萬個奧勒岡的拓荒者；羣集在大鹽湖周圍的摩爾蒙教徒，人數也約四十萬；格蘭得河上游兩岸集結着漂泊着的布勃羅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冒險的白人，人數又約九萬。其餘的地方便是印第安人的區域了——希奧克斯族，布拉克佛特族，克羅族，優特族，基阿華族，康蠻區族和阿巴區族。這些印第安人，騎着成羣結隊的馬，養着大羣的水牛，漫遊在平原，羣山和沙漠之間，除受獅子和狼以及相互的騷擾外，可說是自由自在，不受外力的壓迫。

可是三十年之後，這一切都變了。印第安人受文明的過程所擊敗和征服。咆吼的水牛羣已被肅清。開礦的人住居於整個的山區，在內華達，蒙達那，可勒拉多，甚至在達科他的黑山間，都建立了小小的社區。鐵路大胆地衝過了草原，在峯巒之間尋出了路徑，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聯繫起來。養牛的人，利用免費的青草，鐵路和新市場，領有了自台薩斯州潘漢特以至密蘇里河上遊的一大片草

地，而牧羊的人則在河谷和山坡間與他們競爭。之後，農民蠶擁入平原和山谷，把東部與西部間的罅隙填補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邊疆已經消逝，五六百萬男女橫過大陸，在羚羊和草原狗所遊戲的地區從事耕種。

對於這廣大地區的征服爲什麼拖延得這樣久呢；而當進行征服的時候爲什麼又這樣快呢？美國人用兩百年時間從大西洋岸逐漸向西推進。一八五〇年，人口的邊疆已約進達經線第九十五度——在這裏，人口便停止前進，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他們並不逐漸向前推進，而是跳過平原和落磯山脈，到太平洋的水邊去創業。這件事的解釋在於地理和氣候上。歐洲人是來自滿佈林木和河流的國度，他們認爲新世界也有林木，河流和充分的雨量足供耕種之用。現在大平原橫在他們的面前，這於他們無疑的是新的事物了。這裏是缺水之地，雨量極少，有長期的旱災；河流極淺，而且不大可靠；林木也少，建屋和築籬缺乏材料。故無怪早期的拓荒者繞過這些地區而到灌溉便利木材充足的太平洋岸。

在農民獲得適應新環境的工具之前，他們是無法征服這些大平原的。幸而適應環境的工具如期獲得。鐵路便利運輸；人工挖鑿的水井和風車供給用水；旱地耕耘和灌溉部分解決了雨量不足地區的農業問題。拓荒者有了這些新工具便能夠生活，種植穀物，在平原上樹立永久的社區。由於這經驗而產生的，不僅是農業的新方法，而且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制度。

密蘇里以西的廣大西部，雖大部分是未經墾殖的，但並非大家不聞名的地方。勇敢的尋路人像路易士，克拉克和佛萊蒙特都曾經試探過；替西北皮貨公司或阿斯特皮貨公司或替自己工作的捕獸者

和皮貨商人，對這個大地區是很熟識的；沿着聖大非小路的商賈曾開闢通達西班牙屬西南部的路線；新教和天主教的傳教士在印第安人間勞苦工作；沿着奧勒岡小路的墾荒者，摩爾蒙小路上的教徒，加利福尼亞小路上的獵富者，都對建造通過大平原的公路有偉大的貢獻；軍隊曾經建築堡壘以保護移民和商賈；測量隊在此為鐵路線作測量工作；甚至當新時代揭開的時候，林肯總統還簽署一項法律案，規定建築第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

五十年代以降，幻想者即夢想着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但這在人口湧進加利福尼亞以前還未成為迫切問題。在此以後，對路線問題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辯。南部人主張築一條鐵路把加利福尼亞南部，台薩斯和新奧良斯或孟斐斯聯繫起來；北部人則主張築一條鐵路由聖路易或芝加哥通西北部。測量工作是做了，可是紛爭未已，直至邦聯派各州退出使北部人士可以放手做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算解決。一八六二年的太平洋鐵路法律案把兩條鐵路合併起來——「聯合太平洋」鐵路和「中央太平洋」鐵路。聯合太平洋鐵路是由衣阿華州開始向西築造，中央太平洋鐵路是從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向東建築，以求最後兩條路連接起來。聯邦政府為要促成這偉大工程的完成，曾把二千四百萬畝公地劃歸這兩條鐵路，並貸款約六千五百萬元。

兩路的主持人，受這種種賜予和州的立法的優遇所策勵，精動的執行他們的計劃。他們面對一個極艱巨的工作。一千七百哩的鐵軌必須敷設過草原，山巔和荒漠，這一帶所住居的都是含敵意的印第安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工程問題尤其難以解決，這裏沒有工人，最後只有從遙遠的中國運入一萬名芒力。每一磅鐵軌，每一輛車身，每一輛機車，每一種機器，都必須繞過合恩角或運過巴拿馬

地峽：有一個時期，公司租用了五十隻船專做這種工作。經過希拉山脈是沒有路徑的，數以千噸計的器材，包括笨重的機車在內，必須用大雪橇拖過雪堆。食糧，火藥和其他種種供應品，都須經由這條艱難的路線。要敷設鐵路，必須把山岩炸裂，在山峽間架設鐵橋，在六十哩路程之內，經過希拉山脈須鑿十五個隧道。當大雪使工程無法進行的時候，聰明的工程師們又建造三十七哩長的雪柵，使工程可以進行無阻。

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工程艱難比較少——這也許單單一部分是正確的，因為道奇將軍是一個最偉大的工程師。他的工人是由愛爾蘭人和聯邦派與邦聯派的老兵組成。在他的精明強幹的領導下，鐵軌敷設工程每天達二哩，三哩甚至四哩之長。道奇自己也用自傲的態度描寫這一次的成功：

「有一次我們用了最少一萬頭牲口，而大部分時間是用八千至一萬個工人。造橋組往往在鐵軌前面五哩至二十哩地方工作，很少有鐵軌敷設好而沒有橋梁的事發生。要運物資和給養來敷設一哩鐵軌，需要四十輛車，因在平原上，一切都必須從密蘇里河轉運來。因此每當我們向西推進一百哩路的時候，運輸上的負擔便大大的加重。但我們的工程有系統地計劃着和進行着，我從未聽到在全部建築時期內發生過耽擱一個星期或缺乏材料情事。印第安人的麻煩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直至鐵軌在勃羅蒙多利聯接起來時方告結束。我們建築克尼炮台至苦溪那一段的時候，喪失了大部分人員和物資。在那個時候，每一哩路都須在軍事保護之下工作。我們給每一工程隊的命令是被襲擊時勿逃跑……而據我所知，這命令還沒有人違反過，印第安人未能把工程隊永遠驅離他們的工作地點。」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日，兩條路在猶他州的勃羅蒙多利聯接起來，全國熱烈慶祝。這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一篇堅韌，技巧和勇敢的史詩。但它帶來這種豪傲的成就，同時也帶來了恥辱。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四巨頭」組織自己的建築公司，從中漁利；他們每人逝世的時候，都存下四千萬元。聯合太平洋鐵路的董事們亦然，得利之大，數以百萬元計。

同時橫過大陸的其他鐵路也經設計，而且有四條宣告完成。北太平洋鐵路是葛克所創始而由比林斯和維拉特兩人予以完成的。這鐵路由國會撥公地四十萬畝予以協助，於一八八三年把蘇必利爾湖和布加特海峽連接起來。另有兩條橫過大陸的鐵路也受惠於公地的賜予——聖大非鐵路和南太平洋鐵路，前者沿古時的小道，自堪薩斯至新墨西哥，然後橫過沙漠以達南加利福尼亞州，後者由新奧良斯至洛山磯和舊金山。這些鐵路不僅受聯邦政府的協助，同時也受州政府和郡政府的協助。唯一未受政府協助的鐵路是「大北鐵路」。這條路是加拿大生長的希爾所創辦，自聖保羅至西雅圖一段與西太平洋鐵路平行在經濟方面，它算是最穩固的，它的經濟社會政策也最有益人羣。

礦牧王國

建立「遙遠西部」第一個前哨站的是開礦的人。加州的發見黃金，把這一片新西班牙的畜牧地區變成一個美國的繁盛州份，並促成種種新的經濟活動——農業、船務、鐵路和製造業。這種經驗在礦業王國的歷史上是屢次重演的。開礦者到了一個地方，便建立政治社區，並為更永久的殖民地奠定基礎。當金和銀已經挖盡，或入於東部公司手裏，而開礦的熱狂減退了的時候，殖民者便轉向農

業和畜牧，或求職於鐵路上。有些社區還是幾乎完全從事開礦的，但蒙達那、哥勒拉多、懷俄明和愛達荷的真實財富，和加州一樣都在於青草和沃土上。就是在鑛產富藏方面，以前吸引冒險家的寶貴礦產，不久也被多麼豐富的銅煤和油所凌駕了。

礦業王國的衰落，與其興起時同樣的迅速，但它在美國人的腦海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開礦的帳篷是十分動人的。一次新的發見會使數以千計的獵富者盪擺到荒漠的前哨站。在數天時間之內，溪流兩岸或藏富的山嶺的山坡間，即林立了帳篷和簡陋的草屋。有一些房子成爲酒肆或跳舞廳，一次買醉需要五角錢，又有女招待給予開礦者以盡情的歡娛。在這裏無法無天的事情，雖沒有寫小說者所想像的那麼厲害，但的確很少有文化的享受，而帳篷的生活則是野蠻的。不過等到家庭、學校、教堂、和法律遷來以後，礦業社區也便秩序井然了。

這礦業王國的成就，不僅在於宣傳西部的農業，吸引殖民者，並以材料供給後來的小說家和電影製片者。它促成了印第安人問題，把鐵路推進到西部，使財富的洪流湧進東部投資者的銀庫，爲國家財富增加了二十億元的貴重金屬品，這樣一來，綠背紙幣便可以回籠，「貨幣問題」成爲美國政治的一部分。

當開礦者在內華達和蒙達那山間正在挖掘的時候，西部歷史已經在寫着新的和更重要的一章。這一章便是畜牧王國的興起。這個王國的物質基礎，在於西部的草地，由格蘭得河伸展到北部邊界，由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伸展到落磯山。這裏從前有數以百萬計的水牛自由吼叫，但在二十年時間之內，水牛幾乎完全絕跡了，代替它的是更多的台薩斯的長角動物和懷俄明及蒙達那的牡犢。

西班牙的紳士們和傳教士，有一百年時期在墨西哥北部沿格蘭得河一帶和加州南部的山谷間牧養牲畜，但價值僅限於本地的消耗和利用其脂肪及皮而已。後來有了鐵路，聖路易、堪薩斯、俄馬哈和芝加哥都有罐頭公司，此外還有冰箱車的設備，故改良牲畜品種，並把牲畜北驅至市場是有利可圖的生意。內戰結束之後，長途驅趕牲畜的事成爲常年的事業。數以萬計的牲畜蹄痕佈滿路上，牲畜城市像阿比林和曬延都在新路的終點如雨後春筍的建立起來。同時經營畜牧的人，發見他們的牲畜可以在北部的草地上度過冬天，而這畜牧王國的領域，便擴展到哥勒拉多，懷俄明和蒙達那。台薩斯的牲口最多，但最典型的畜牧地區還算是懷俄明。在這裏，許多年沒有其他事業可與畜牧事業競爭，一切都受懷俄明畜牧協會所控制。

在開始的時候，幾乎什麼人都能夠選幾頭母牛和小牛，讓牠們在公地上喫草，這樣便可開始他的畜牧事業。但在短時期後，畜牧大亨和大畜牧公司——許多是在東部或蘇格蘭組織的——把這種企業統制了。他們的辦法是先從印第安土人取得公地，把土地圍起來。有一家畜牧公司在哥勒拉多圍起公地一百萬畝；另一家幾乎把台薩斯州整個的瓊斯郡圍起來；在曬延地方，有一家畜牧公司租到土地四百萬畝；印第安區的開化部落，曾以六百萬畝土地授予一個公司。畜牧的大亨們對付小競爭者的手段是無情的，他們向牧羊人挑起殘酷的戰爭，因爲牧羊人的羊羣破壞了草地。

畜牧王國和礦業王國相似，有它的浪漫的一面，這在美國人的記憶上是時時存在的。平原上的孤寂生活，遠程的趕畜，畜羣的驚奔，技巧的騎術，和五光十色的牧人衣服，這種種都在美國的民謠和歌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在高地平原養殖牛羊是很自然的事，許多牧人認爲農民在這裏成家立業是錯誤的觀念。在這個世紀的初期，派克曾經報告說：「在堪薩斯河、布拉特河、阿肯色河和它們的支流上，在我自己看起來，似乎只能移殖有限的人口……居民最有利的事業似乎只是養牛、馬和羊，」而在五十年後美國一個反對堪薩斯參加聯邦的參議員也聲稱：「我們渡過密蘇里河之後，除幾條溪河的流域外，沒有一塊地方合適移民住居。」這種看法結果雖證明是錯誤的，但後來的事實，顯示乾燥的西部的大部分地方，從事農業是無利可獲的。經營畜牧者認爲西部的草地是大自然賜予他們的。他們用種種手段破壞土地法，圍起廣大的地區，壟斷水道，企圖阻撓農民向西推進。

但他們的戰爭失敗了。經營畜牧者雖可以嚇退孤單的農人，可是不能永久蔑視聯邦政府，而當阿瑟總統和克利夫蘭總統下令撤去鐵絲網把草地公開之後，畜牧者的獨占即告結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這個時期，鐵路貫通平原，進行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北太平洋鐵路擁地四千萬畝，在歐洲大登廣告，描寫西部土地的富饒，而維拉特一個時期在海外派有八百多個代表，爲土地買賣作宣傳。聖大非鐵路運入了數以千計的俄國門諾宗派教徒；南太平洋鐵路吸引了德國人和斯坎的納維亞人；希爾建設其帝國的方法是以金錢貸與貧窮的農民，津貼科學的耕種方法，建設禮拜堂和學校。印第安人的抵抗破壞了，戰敗的土人殘部不是被逐出便是馴服了。工廠在平原的邊緣林立，數以千計的風車和鑽洞機使乾燥的土可以耕種。有八百萬移民湧進這個地區，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萬；當地市場對於農產的需要增加的時候，對於較早殖民地區的壓力也增加了。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人民大批向平原地區湧進的時期。加蘭特回憶他到達科他去時的情景說：

「擁滿了自世界各國移來的人的火車爬向平原去。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蘇格蘭人，英國人和俄國人，都混雜在尋覓土地者的洪流裏面，湧向落日的平原，這裏是一片土壤肥饒的河谷，是由好心的山姆叔叔劃出來讓每個人都受益的……街上擁擠着做買賣的人羣。一切的談話都是有關地皮的事情。這樣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過去，直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探尋財富者旅行未被人佔有的區域回到旅館，他們飢餓疲倦，可是喜氣洋洋。」

平原上處處的景象，都是大同小異的。在二十年時間之內，明尼蘇達人口增加三倍，堪薩斯增加四倍，內布拉斯加增加八倍，達科他由一萬四千人一躍而有五十萬人，台薩斯人口二十五萬，代馬薩諸塞而成為第六個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二十年時間之內，這些農業州份——明尼蘇達、堪薩斯、內布拉斯加、達科他、可勒拉多、蒙達那——人口總數自一百萬增到五百萬左右，較全國人口增加速率大了八倍。法國旅行家戴士格維爾在五十年前便說過：『歐洲種族向落機山脈這種漸次而廢續的推進，是具有天命的嚴肅性的。它好像是人類的洪水汎濫，從不低落地向上高漲，天天由上帝的手推着前進。』

到了九十年代結束的時候，向平原移民的風氣已成強弩之末，有些地方發見退潮的現象。艱難困苦的日子和旱災，把許多有野心的農民從堪薩斯西部，內布拉斯加和達科他驅回到東部來。人口的增加減緩了：例如內布拉斯加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人口僅增加了四千，堪薩斯僅增加了四萬。

但西部開發史最有聲有色的一章還沒有寫成呢。西部墾荒者對於台薩斯與堪薩斯之間的沃土，虎

視眈眈者達五十年之久，而這片地方則是劃給印第安人五十個開化種族作爲永久安居區域的。到了九十年代的中葉，要求土地的壓力極大，政府已不能夠予以抵抗。從此印第安人權利被人收買，而在一八八九年四月，這塊土地門戶洞開，供人移殖。湧進這新地區的情形是瘋狂的。一位目擊的新聞記者寫道：

「當向北部界線進發的消息發出的時候，大家用各種不同的速度前進。想在這地區北端的路旁經營的人，都發見這些地點早爲他人所先佔。有一些人煞性跑回去了，有一些則繼續向前進入內地……當火車停下來的時候，情形是怪好看的。小孩子，中年人和老年人，都爭先恐後跳下月台，開始他們的競跑。他們互相追逐擁擠，有些帶着東西，有些於慌亂中把東西丟光了……似乎條條路都是通土地局的，在這裏已經排着一百多碼長的人的行列。他們靜止了一些時候，然後又騷動，爭着找空地……在另一列火車到達之前，中間是隔着相當時間的，但第三列和第四列是緊接着開到的，每一列車都卸下它所載的人，增加了可驚的擁擠情形。在三點鐘之前，一共開來了十列火車，故在這片地區正式宣布可供移殖的三小時後，至少有六千人已在加斯里地方了。」

數年之後，當奧克拉荷馬北部赤洛基地方開放時，又發生了一次的湧進。到了一九〇〇年，這片新地區的人口幾達八十萬。

礦業王國和畜牧王國已經消逝；現在也沒有邊區的存在了。的確，西部還存有礦場，可是已經是限制得極好的事業，由東部的公司擁有和經營。自台薩斯和新墨西哥以至於蒙達那和達科他的草原

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牲口在上面養殖，但公共的畜牧區域已經沒有，畜牧已成爲一種經濟的利益了。西部也還有土地，可是大部分都是山地或在乾燥區域，只有興辦水利才能使農業有利可獲。這樣，西部在它的經濟機構上，漸漸與美國的其他地方同化了。

在政治方面，同化工作的進行也很快。內華達早在一八六四年即被承認爲聯邦的一州——主要的因爲林肯認爲也許需要這一州的選票。內布拉斯加於一八六七年取得州的資格，而哥勒拉多則於一八七六年成爲百年紀念州。以後便是一個長久的拖延時期，此時最後的西部填補起來，而政黨則競爭着控制新的地區。最後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障礙除去，六個西部州份參加聯邦——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懷俄明州，蒙達那州，愛達荷州和華盛頓州。數年之後，猶他也成爲一州。奧克拉荷馬是一九〇七年被承認爲州的，而兩個西南部州份亞利桑納和新墨西哥則在一九一二年。這樣，美國的政治邊界已經作永久性的劃定，而一七八七年「西北法令」所開始的工作於以完成。

在政治組織上，西部和東部相似。到處都採用着大家都熟識的政制——三權分立，兩院制度，地方行政的城郡制。但在某些方面，新州的憲法與舊州的憲法確有不同之處。新州的憲法比較周詳縝密，就全部看起來又比較帶自由主義的色彩。它們大多數授予婦女以選舉權，禁止托辣斯和專利獨占事業，限制鐵路，建立進步的勞工標準。可是它們的哲學和精力根本上與鼓舞整個美國前進者相同。

最後邊疆的生活

邊疆的生活往往是艱危的，最後邊疆的生活當然不能例外。離開東部城市和森林農場的男女，他們想在地平原碰運氣，邊疆的生活自然是艱難困苦，而且常常令他們發生苦痛的失望。這裏的工作比較俄亥俄或密士失必河谷農場更辛苦，這裏所得的酬報比較俄亥俄或密士失必河谷農場更微薄。這無垠的草原，巨浪一樣的雲霧，光輝燦爛的日落情景，在一些人看起來有它們本身的美麗處，但在大部分人看起來，這一片平原是灰黃的和單調的。在夏季，炙人的太陽曬着耕種的農人，乾燥和熱的風從南方吹來，使夏夜更令人難以忍受。冬天又很快的降臨，可怕的寒氣使氣溫降至零下三十度；大風雪有時一颯達幾天之久，結果常常是牲口屍體滿佈草原，人也往往有所死傷。

男人有他們的工作和野心；感覺最苦的便是婦女。她們在東部本來生活舒適，可是到了西部後便須住於地窟和草泥小屋裏，光線不足，空氣不流通，門窗須用氈或牛皮掩閉，一下雨地板便變成泥水沼，以後的房屋雖較舒適，但其醜陋則無二致。這些房屋都是在無樹木的草原上匆促建起來的，狹小，刷深灰色，夏季既感酷熱，冬天又覺苦寒，幾乎全年沒有令人高興的時候。在東部，甚至最貧瘠的農場上都有樹木，但在這裏便沒有。這裏覓水不易，故園藝不能發展，甚至家裏洗滌，都成爲問題。在發生旱災的時候，五穀枯槁，葡萄乾死，水井涸竭，南風吹來殘酷的塵土，氣溫日夜都在九十度以上，至此最熱心勇敢的人亦失望了。司徒華·亨利於回憶堪薩斯一八七四年旱災時這樣描寫：

「婦女們垂頭喪氣在火紅的爐邊準備菲薄的三餐。精力是必須保持的，人的骨架上是必須有飢餓的。就是最有虛榮心的主婦們也不事修飾了。她們讓髮髮乾枯蓬亂，很少人注意着她們的刷子和梳子。婦女們眼睛深陷，精疲力竭，她們至此也不管容貌怎樣，不管身上穿的姪壞了……男人們則在咒咀，不再玩撲克了。做父親的怕見他的兒女，因為小孩的衣衫越來越襤褸不堪。水少，孩子們的污穢不潔也無法洗滌。做丈夫的怕回家喫飯，爲的是回家難應付妻子，妻子往往要求他把家遷回後方的。」

比較熱氣，塵土和勞役更惡劣的是孤獨。因為沒有社交的娛樂，沒有教堂的慰藉，沒有醫生的照顧，許多邊疆的主婦們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嬰孩出生僅由好心的鄰家予以協助，或常常連絲毫協助都沒有；嬰兒死亡率極高；因為醫護困難，疾病流行。蚊子帶來的瘧病是隨處皆是的；污水促成了傷寒；霍亂，肺炎和麻疹是尋常的事，因意外而死的數量也大。被困惱的鄉下醫生，施行英勇的手術，他們往往是沒有止痛藥的，所用的是最粗糙的外科儀器。狄克說過有一個青年醫生沒有止痛藥即施行第一次割盲腸外科手術，而且是在火油燈光下面。

城鎮裏面的生活便比較有多樣性和社交性，但還是灰色的孤立。這個時期的城鎮是小的和臨時的，它的居民都在夢想着輝煌的將來，準備隨時播遷到更適當的地點。我們可以想像，一條泥濘的狹窄街道，有木頭的人行道達草原的邊緣，兩旁排列着東傾西倒的房屋，灰色的粉刷被太陽曬得起泡。最重要的建築是酒店，雜貨店，馬廐，旅館和火車站。火車站是很重要的地方，每天城裏人們麇集在這裏等候火車。火車帶來的報紙雜誌，郵購物品名冊，東部親友的信件，有時還帶來旅行

商，債券代理人 and 買穀者。街的一端常常是一座禮拜堂——監理會派或長老會派。再過去是一間小學校，只是兩間房，學生用的是長板凳，教師才有桌子和椅。當教師的是師範學校出來的青年或需要職業的未婚女人或寡婦，幾個比較進步的城裏人曾經種植樹木，偶爾發見有一列向日葵，蜀葵或牽牛花之類，表示有些家庭主婦會作勇敢的嘗試，想在這裏創造美的環境。穿白洋布或斜紋布衣服的孩子們在後庭遊戲，或聚精會神看鐵匠的工作；隨處有長鬍子的人遊蕩於雜貨店和馬廄間，他們所談的是五穀的前途，玉蜀黍的價錢或政治上的故事。

這裏犯罪和不規矩的事情極少，但酗酒的事則極多——星期六晚當農民於一週辛苦後入城的時候，便會發生許多爭吵的事件。在七月四日或農莊野餐的時節，偶爾有大規模的集會，城內的人和遠道農民把馬和車都擊好，到最近的河岸作長時間的慶祝。狄克曾描述內布拉斯加藍泉地方一次七月四日慶祝會的情形：

『爲着捕鮎魚，組織了一個三人委員會……到了四日那天，這些人已經在附近一條溪流的出口處圍攔着一千磅的大鮎魚……另一個三人委員會搭好一個天幕，並在一家鋸木廠獲得木板，做成一隻四十隻脚的大餐桌和一個跳舞的木台。一大堆木材可作爲燃材。他們在四十哩外的白朗維爾村運來一隻重二百五十磅的豬，故有充足的豬油可以煎魚。一架碾玉蜀黍機是臨時用鐵片製成的。餐食雖然不精，但好的玉蜀黍麵包則很多很多。鮎魚一道菜很是富麗堂皇，此外還有些白麵包，是買來當餐後甜點的。那天下午，第三批人開始到達。翌日，已經有一百五十人。他們有的步行，有的騎馬，有的乘牛車，無論如何他們是有方法走到的。婦女們戴的是遮日帽，穿的是常服。在

羣衆之中，只有一人穿着絲的衣服；有些男人則是赤足的。國旗升在七十呎高的旗杆上；宣讀了獨立宣言；大家用餐之後，在八十哩區域內搜覓來的四弦提琴開始響了，大家也開始跳起舞來。這節目持續到五日，然後殖民者才回歸他們的孤零的家，想念着這次的輝皇事件，淒涼邊疆生活的沙漠中的綠洲。」

這種小城鎮有些繁榮起來，街道和人行道鋪好了，磚和石代替了木材，一間新的旅館，一座歌劇院，銀行和商店，一間中學校，都表示着這裏的繁榮和驕傲。其他的都凋謝了；單就堪薩斯而言，有二千個地理名詞已經從地圖上消逝。邊疆城鎮之成敗，大部份是受鐵路和政治所決定；爭奪郡治地點的鬥爭是極劇烈的。

這最後的邊疆和早期的邊疆相同，都是十分民主的。大多數新社區採用婦女選舉的一些形式——早在一八六九年，懷俄明已是這種運動的倡始者。有些新的憲法規定制權和公共問題的國民表決權，而大部分官吏——甚至法官——都由普選產生。但民主風氣在社交上所表現者，較在政治關係上所表現者更爲顯明。任何人如果穿得比鄰人漂亮或表示矜誇者，即被人用懷疑的態度看待。銀行家，商店老闆，律師，農民和馬伕，同坐在廣場上，連袂坐在禮拜堂裏的長板凳上，全體兒童都進公立學校，更有進取心的青年男女則進附近各教派學院，或八師範學校和州立大學。許多種族在邊疆的社區裏混和起來——英國人，德國人，挪威人，波希米亞人和少數的猶太人，與來自鄰州的美國土人共同生活；這裏容納各種不同的種族，語言和教條。這最後的邊疆，在美國的一切邊疆中，許多方面都可說是最民主和最富美國風味的區域。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農業革命

工業革命就被公認爲是現代歷史的基本事實。但農業革命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製鐵者，鐵路建築者，工程師，工業和財政巨子的勝利，鼓勵了兩代美國人的幻想，但農民和「反抗饑饉的鬥士」的功績並無遜色。當然，這兩種革命——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是相生相成的。沒有機器和鐵路農業革命不可能發生；沒有大量的穀類流入大城市的倉庫，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人們經過幾百年的奮鬥，以生產足夠維持生命的食糧，而人口進展的本身，則受食糧數量所控制。數百年來饑荒是人們熟知的幽靈，使人類死亡者數以百萬計。十九世紀把人類從糧食不足的恐怖中解放出來，而對這種解放，美國農場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自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四十年間，美國農業畝數增加了一倍，而實際上在開墾中的土地的畝數則增加兩倍。換言之，這一個世紀所開墾的土地，比以前二百年所開墾的土地大一倍，生產方面不只是配合着農業畝數的增加。一八六〇年的二百萬個農場，生產約二億蒲式耳的小麥，十億蒲式耳的玉蜀黍，和幾乎四百萬捆棉花；一九〇〇年年六百個農場，生產六億五千五百萬蒲式耳的小麥，二十五億蒲式耳的玉蜀黍，和幾乎一千萬捆的棉花。在這同一個時期，全國人口增加到一倍以

上——增加的大部分在於城市——但美國農民生產充足的穀物和棉花，養了充足的豬牛，剪了充足的羊毛，不僅足以供應美國的工人，而且把增長增高的剩餘運到歐洲去，作歐洲人的衣食。

有兩種基本的因素可以解釋這個非常的成就。第一種因素是農業領域擴展至於西部；第二種因素是把機器和科學應用在農業上。關於第一種我們已經相當耳熟能詳。新的西部平原和山岳河谷是農業的區域，在神奇的短時期內，這區域的農產竟躍登全國的領導地位。小麥地帶從沿俄亥俄河的各州西移以至於密蘇里河谷。一八六〇年，伊利諾斯，印第安那，威斯康星，俄亥俄，弗吉尼亞和賓夕法尼亞各州是領頭的產小麥州份；到了一九〇〇年，只有俄亥俄還留戀着這種資格，改種玉蜀黍的運動並不動人，可是在這裏，這種運動也是自俄亥俄到密士失必河谷。棉花的故事也是同樣的：在世紀變換時，台薩斯還不是領頭的州，約半數的棉花出產於密士失必河以西。在這同個時期內，牛羊羣不可抵抗地移入平原和山岳的牧區。

農業西移的運動。對東部和濱海區南部的農民自然是很大的打擊。他們不能與西部肥沃的處友地競爭，同時捐稅又增高，故在這區域從事農業已是走下坡路了。弗吉尼亞的潮水區已成為格拉斯哥在其小說中所描寫的「荒地」；賓夕法尼亞和紐約的大片土地變成荒漠或度假期的遊戲場所。新英格蘭的許多地方都荒蕪了，成為叢莽和森林；在內戰後的五十年間，這區域在開墾中的田地幾乎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一個經過新英格蘭的旅客這樣寫道：

『威廉城（馬薩諸塞）和柏拉托波羅（伐爾蒙特）的中途，我看一個山頭似乎有一座大天主堂，後面襯着薄暮的天空。驅車抵達時，是舊式兩層樓的龐大禮拜堂，一個大規模的中學校，一個有

一百五十呎寬的大街的鄉村。驅車前進，發見禮拜堂已是廢棄的，中學校一切設備都拆卸了，鄉村裏沒有人煙。擁有村北農場的那一個農民住在大街的一邊，擁有村南農場的另一個農民則住在大街的另一邊。他們兩人是這裏僅有的居民。其他的人都離去了，或跑到工業村莊去，或跑到大城市去，或遷移到西部去了。這兒有的是工業，教育，宗教，舒適和滿足，而那邊則僅有被捨棄的家鄉之可怕的淒涼。」

單單土地的展拓不能說明農產激增的理由。農產激增與墾地或從事農業人數的增加不成比例。解釋還是在於耕種效率的增加。農業的機械化遠在工業機械化之後，這是一樁奇怪的事實。一八〇〇年工廠工人和礦山工人所用的工具是他們父輩和祖父輩所不知道的，但一八〇〇年農民犁田的方法，與一千年前遠祖的方法大同小異。他的犁是木製或鐵製的粗糙東西，由單牛和單馬拉著；他播麥種或植玉蜀黍蕃薯都是用手；他用鋤頭除去雜草，用鐮刀收割穀物，在穀倉的地上打禾，用手剝去玉蜀黍的皮。當婦人孺子都參加幫忙時，一個家庭最多也只能耕種八畝或十畝田地。

第一種美國的重要發明是惠尼的軋棉機。這發明大大地影響着農業，使南部的整個經濟發生一次革命。但與軋棉機有關係的不是種棉的方法，而是製棉的手續。實際上，除犁，墾和噴霧外，棉花沒有受機械所影響。其他的農產比較幸運，但大部分在應用機械方面都是長時間拖延的。然而試驗是不斷在進行。犁的故事是典型的。第一種登記專賣的犁是在一七九七年，自那時起，約有一萬二千種犁問世。最初的問題在於找出一種犁，一方面可以把泥土整齊地翻起，一方面又不與土地糾纏或碰到樹根和石頭便告折斷。傑克遜曾經試驗過，把犁土板所遭遇的抵抗力減少到最低限度，獲得

巴黎皇家農學會的金牌獎章。一八三七年，狄爾在伊利諾斯草原上將木犁包以鋼皮，使其力足以翻起處女地的草根泥，不久這種犁便被廣泛採用。七十年代後期上市的奧利佛式犁，把光滑的鋼面和堅韌的鐵底聯合起來，似乎滿足了草原農民的要求。

收割機的故事更是重要。一八〇〇年的農民如果他夠力作的話，用一把手提鎌刀每天能夠割半畝麥；三十年後，他用着一種刈禾器，每天可以割兩畝。但他用這種原始的工具，不能大規模種植穀物，不能侵入西部平原。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有兩個農民試驗着一種機械化的收割機，他們便是哈西和麥柯密克；到了一八四〇年，他們兩人都表現奇蹟，用他們奇異的工具每天可割五六畝。哈西跑到巴的摩爾製造並銷售他的收割機；麥柯密克眼光比較遠，他西向走到年青的草原城市芝加哥。一八四七年，他在這裏創設他的收割機製造廠，開始以新的產品應市。到內戰爆發時，麥柯密克的工廠共售出收割機二十五萬具。因為農民採用了這種工具，便有許多人力可抽出來從軍，這位移居的弗吉尼亞人對聯邦勝利的貢獻，實在不次於任何指揮軍隊作戰的將領。

收割機每年都有一些改良。把穀物收集和捆束起來的勞苦工作，因為移動台的發明而減輕了許多。之後，一八七二年發明自動繩捆法，數年後又有盤曲捆法。同時打禾機已經完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間，這龐然巨物在中部邊區的農場活躍。九十年代便發現了富革命性的收割打禾器（或名聯合機），一切收割，打禾，清除和裝穀入袋的工作，都可在一次的繼續動作中完成。它由二十或四十匹馬拉着一——後來用蒸汽和汽油曳引機——每天能夠收割七八十畝。

在農業的每一部門，除揀棉工作不算外，機械對農民都有幫助。玉蜀黍種植機，玉蜀黍刈割機，

剝皮機，去殼機，戴拉伐爾式乳酪分化機，施肥機，番薯種植機，草秣乾燥機，孵卵機，肥田料，和其他一百種的新發明，大大地減輕農民的勞力而同時增加他的效率。用了聯合機，以前三百人才能做的工作，現在四個人便可做了，而且做的更好。玉蜀黍剝皮機使一個人可做八個人的事，而玉蜀黍去殼機則使一個人可做五十個人的事；收割一噸的草秣的時間，至此減少了五分之四。二十世紀應用蒸汽，汽油和電氣於農業，把以前專用爲牧場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解放出來，同時還削減人力而增加農業效率。

吸收新收割機，去殼機和曳引機最多和最快的是中西部和遠西部。工廠製造了多少他們便吸收了多少。在東部，農場太小，農業種類太多，投資於昂貴的機器不上算；在南部，勞工價廉，而煙草和棉花又不必靠機械化的種植。一八六〇年農業機械的價值爲二億五千萬美元，到了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三十五億元，但大部分的增加是得自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區域。一九二〇年，單單衣阿華一州農民對機械的投資，即大於新英格蘭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農民投資的總數；一個南達科他農場機械的平均價值爲一千五百元；產棉地帶每個農場機械的平均價值爲二百十五元。

農業的機械化使農民能夠養活數目激增的城市居民，並可把過剩的產物運銷海外，結果又幫助工業和鐵路的擴展。這對於農民的本身，並不是一種不複雜的好處。他們許多人必須用去比較他們所能負擔者更多的費用，強迫他們擴展業務，替那些投資辯護，並集中在主要產物上面。它給與大戶農民以顯然的優勢，使小農民無法和他們競爭，並即刻加速發展用精良機械的大農場和租佃制度。六十年代能夠自給自足的小農場，到了二十世紀便遭規模龐大的棉麥業王所壓倒。這些小農場就是

食糧還要仰給於雜貨店。

科學的重要性並不次於機械。美國的農業，其發展的趨勢自開始即着重於向外擴展，而不注意於原地的精密經營，因為取得新土地比較保持舊土地似乎還容易些。但南部潮水地帶土壤的迅速消耗使種植家震驚，故許多南部人企圖應付這種危機，用新種，採循環種植制，改良牲口品種等等，華盛頓和傑斐遜不過是他們中最重要的人而已。傑斐遜曾經說過：「對國家的最大貢獻，莫若在他的文化上增添一種有用的植物。」但這早期的改革大部分失望，因為阿巴拉契安山脈以西廣大土地的開發和軋棉機的發明，使農民向前移動到饒沃土地去，比較在原來土地上孜孜經營以求恢復土壤的肥美更爲有利可圖。故新土地的開發，在邊疆是不斷的進行着。

聯邦政府於一八三九年初次撥特款鼓勵農業；但政府對農業表示關心，實際上是始於一八六二年的摩利爾土地讓予學院法案。這法案規定以公地授與農業和工業學院；每一州派國會議員一人至華盛頓即可得公地三萬畝。在這法案之下，一州繼一州地獨立創辦農業學院，或與州立大學聯合，結果促進了農業科學的研究。一八八七年的赫區法案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法案撥大批款項在全國各處舉辦農業實驗站。同時給農業部作研究工作的直接撥款數以百萬之計。到了一九三〇年，有七八千個科學家替政府機關作研究工作，他們在實驗農場和實驗室裏的貢獻是十分重要的。

這批「反抗饑饉的鬥士」中最典型的一個是卡勒頓，帶古班加和卡科夫的小麥到美洲西部的便是他。卡勒頓在堪薩斯經營農業和授課，在這裏一年年地看見旱災和黑銹菌怎樣殺害平原農民所能種植的結實小麥。可是他看見由聖大非鐵路移殖來此的俄國門諾宗派教徒所種的麥則收成較佳，因

此他便發見他們的麥是種籽長大起來的，而這些種籽則是由他們的祖國帶來的。卡勒頓因此深信在烏克蘭或歐亞草原上，必可找到抵抗旱災和黑銹菌的麥種。

一八九八年卡勒頓得農業部之助，起程往這一片樂土了。最後，他在烏拉河西面的土爾階大草原上——那裏氣候和地形極像堪薩斯的西部——找到他所要找的東西：古班加小麥。他在平原上種植這種小麥，好像是奇蹟一樣，不怕黑銹菌了。古班加小麥種植最成功的區域，是自明尼蘇達以至於薩斯加楚宛；但奇怪得很，在南部平原便不成功。所以卡勒頓再度赴俄，在烏克蘭卡科夫附近即四十年後德蘇惡戰的地方，找到了卡科夫小麥。到了一九一四年，全國冬季的小麥，有一半是古班加種或卡科夫種。

其他「反抗饑饉的鬥士」的貢獻也是重要的。杜色特征服了可怕的豬霍亂症，摩特征服了在牲畜中造成恐怖的神祕蹄嘴病。華德金斯從北非洲帶回卡佛玉蜀黍，韓森從土耳其斯坦運入黃花苜蓿。柏班克在他的加州實驗室裏產生數十種新的水菓和蔬菜。柯克在他的南加羅林納實驗農場證明山脚和高地可以種長纖維棉花。巴谷克在威斯康星大學發明試驗牛乳的方法，用這方法可以知道牛乳裏面包含多少奶油。在塔斯基基學院工作的黑人科學家卡伏爾，發見普通農產物的數百種新用途，如花生，甜番薯和大豆都有了新的用途。那浦由東方介紹入稻的新品種，並創辦示範農場，改良南部的農業方法，這樣他挽救了戰後米業的危機。

農場的艱危時期

美國農民每年都表現更高的效率，收穫更多的產物。他是勤勞的，聰明的，同時又得益於肥沃的土地，技巧的機械和現成的市場，他應該是發達的，愉快的。但事實上他的命運是苦的，而且越來越苦。在歷史上農業擴展最驚人的世紀的末期，農民不是如傑斐遜所說的「上帝的選民」，而已經成爲一個主要的經濟問題了。這個矛盾的解釋是怎樣呢？

農場問題是錯綜複雜的。對於南部種植家，種穀者，玉蜀黍和豬的經營者，畜牧者，牛奶場經營者和菓園主人，它的外貌是十分不同的。它有時是一個鐵路問題，有時是一個貨幣問題，有時又變成一個土地政策問題；它牽動到區域利益，政黨政綱和國際關係。不過農場問題每一方面都有相當不變的因素。主要的是土壤的耗竭，自然的空想，主要農產的過度生產，自給自足情況的降低，和缺乏充分立法的保護與協助。

南部的土壤因爲種植煙草和棉花，以及使用無知的工人早就耗竭了。那一區域的較老部分，有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變成荒蕪地帶，而水從沒有堤壩的溝壑流下，每年沖去肥沃的表面泥土數百萬噸之多。南部購用美國全國所賣肥田料百分之七十，南加羅林納所耗費於肥田料的，即佔他們棉產價值四分之一。這一點事實足以看出南部土壤的積累的貧瘠。在西部，地質的沖壞和暴風把土地弄荒廢了。高地平原中，有許多地方不適於耕種，甚至不適於畜牧。

循環的旱災也是平原農民的災害。在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十六個月的時期內，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的農民得不到一次豪雨去拯救他們。破產的拓荒者本來是抱着極大的希望來此的，至此不得不受東部的救濟。這種事在平原上是十分平常的，有時旱災繼續了數年之久。

昆蟲疫癘和植物疾病的威脅也是同樣嚴重的。在昆蟲方面，最壞的無疑是象鼻虫。一八九二年，這種災害自台薩斯渡過格蘭得河，其蔓延速度是每年約五十哩，結果把整個棉花王國都染上了。安特柏萊斯（在阿拉巴馬州）的農民，曾建立一紀念碑以紀念他們採用農產變化方法的成功，但在最壞的年頭，廣大區域的棉產曾削減百分之五十以上。消滅象鼻虫的種種努力未能收效，種棉農民預防的唯一方法只有提早種植和過度施用毒藥。

昆蟲疫癘的災害是嚴重的，但爲害最大的要算是蚱蜢了。平原農民於一八七四年初次碰到蚱蜢的災害，從以這種災害迭次發生。臭虫，玉蜀黍鑽孔虫和苜蓿象鼻虫都幾乎有同等的破壞力量。

農民是把他的產品向一個世界市場銷售的——與俄國、阿根廷、加拿大和澳洲的農民競爭——而購入的用品則是來自一個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他的小麥，棉花或牛肉的價錢，是由利物浦決定；他們爲收割機、肥田料、鐵絲網、鞋、衣服、木材和傢具所付出的價錢，則由躲在保護關稅後面的托辣斯所決定。他的成本無情地高漲——他在農場所用的，運費，借款的利息，付給政府的捐稅，沒有不增加的。新的土地和機械雖然使他每年能夠生產更多的東西，但他的收入並沒有增加許多。在農業大擴展的時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美國農產的價值僅增加五億元；在同一時期內，製造品的價值則增六十億元。農產價格是不規則地向下跌。八十年代小麥每蒲式耳值一元，到了這一世紀最末十年跌爲五角錢。一八七三年棉花每磅一角七分錢，二十年後即跌爲九分錢，後來又跌至六分錢。玉蜀黍，雀麥，大麥，煙草和其他農產品的情形也大同小異；在八十年初期代，十種主要農產每畝平均價值十四元，到了這世紀最末十年的初期，則跌爲九元。

農民所受最厲害的經濟打擊是貨幣價值的提高。他向當地銀行家或做抵押生意者借款，須付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如果我們不考慮到農產品的價值而考慮到貨幣的價值，我們便可更快地了解這一點。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這農民能夠用一蒲式耳小麥，兩蒲式耳玉蜀黍，或十磅棉花，換到了一塊錢。到了一八九〇年，他要換到一塊錢，便需要一蒲式耳小麥，四蒲式耳玉蜀黍，或十五磅棉花了。一八七〇年這農民借款一千元，可用一千蒲式耳的小麥去還清債務；可是如果他在二八九〇年借這筆款，便需要二千蒲式耳的小麥才能還清。

在這種逆境之下，美國農民之債台高築乃是自然的結果。一八九〇年，伊利諾斯典押農場有九萬家，內布拉斯加有十萬，堪薩斯的數目則更多。這些典押品大部分落在東部手裏；新漢普夏的居民擁有西部典押品二千五百萬元。租地也是上漲的，全國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八，但在南部和西部，所佔的成數比較大。

這些便是農場問題的主要原素。農民不能利用政府作為保障他的工具，實在是他的毛病的因和果。農民雖然居全國人口之半，但他們在國會和州議會裏很少有代表。在這世紀末一年代的初期，雖有參議員裴斐和衆議員辛浦森到華府去，可是都被人作古董看待。制定法律的人，都比較熱心於祖護廠家，銀行家和經營鐵路者的利益，很少顧到農民的福利，這樣立法也便反映他們的這種熱心了。保護關稅也許可以協助商業，但它令農民於購買每一件東西時都須付出更多的代價。列入法典的銀行貨幣法對銀行家和投資者是一種恩典，對農民則成爲一種可怕的負擔。限制托辣斯和鐵路法律，被人如此寫成和如此解釋，使它對於托辣斯和鐵路經營者沒有什麼不便之處，當農業州份打

算制定更嚴格法律的時候，法院又予以駁斥。甚至本來想協助農民的立法，例如宅地法案，結果只有宣告失望。

阿波馬多斯事件三十年後，美國農民才把其領域擴張到整個大陸，有新式機械和科學之助，增加生產到可把剩餘供給歐洲的地步。

農民組織起來

商業，銀行和勞工都正在組織之中；此時正是農民仿效他們的良機。但組織農民是最困難的工作。農業利益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單位，每個單位都分別行動，每個單位都有競爭心；農民天生是個個人主義者，不願受外來的管制；就是土壤和氣候也都是不能受限制的。結果，在聯邦政府負起責任以前，沒有實行過農產的統制辦法。同時，農民如果想避免受鐵路，托辣斯，抵押公司和中人所剝削，他們就必需有所行動。

第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是農會（Grange），或農業促進會。一八六六年有一個政府的書記叫凱萊的，在被戰火所蹂躪的南部作長途旅行，他所目睹的令他深信，欲求貧窮落後而孤立的農民能夠改革前進，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的行動。他和幾個朋友組織農業促進會，其社會的和教育的目的，在於「在我們自己之間發展更高和更好的男女人格。增加我們家庭的快樂和吸引力，並強化我們對事業的忠誠，……使我們的農場能夠自給自足。」有幾個農會在紐約和賓夕法尼亞成立起來，但權力既操諸東部之手，結果毫無進展。一八六九年，農會總部遷到中西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艱危時

期，它像野火一樣的蔓延了。到了一八七三年，幾乎每州都有農會，會員人數達七十三萬。農會在中西部力量最大，但它在南部和沿太平洋岸也很發達。

凱萊的意思是，農會應該是一個社交的組織。婦女和男人一樣都可入會；一種隆重的儀式有一部分是仿效共濟會的；舉行有教育意義的月會，愛國慶典和其他節期同樂會。最大的目的在於打破農民的孤立狀態，把聲色和趣味打進他的生活，促進意見的相互交換，建立休戚相關的一種關係。在這種方面，農會都是極成功的。農會報紙銷路甚廣，農會圖書館發行農業刊物，農會演講員在鄉間學校的集會上演講，農會的野餐成爲一種既定的制度。加爾特回憶到一次農會的野餐時說：

「那是莊嚴的氣象，那是鼓勵人的景色——長行列的車輛，從小路蜿蜒下來，在叉路上碰頭，直至最後郡北全部農會聯成一個偉大的縱隊向野餐場地進發。會場上演講員以沉靜的莊嚴和高度的決心在等候我們。在美國的農村生活上，沒有一件事比這更動人，更快樂和更有益身心的了。」

農民在這種集會上談起政治，自然是不能免的事。談話的結果往往促成行動，不久許多州農會成立合作交易組織，商店，借款代理處，甚至設立工廠。他們往往經營得不大好，而且自開始即碰到商家的強烈反對。但他們畢竟替會員節省不少錢：例如衣阿華農會運穀五百萬蒲式耳到芝加哥，可以節省百分之十至四十，而用合作購買的方法，他們所購的每具收割機可以替會員省一百元。爲要應付這種競爭，並供應農會的需要，蒙哥馬利區的郵購店於以成立。

農會會員還是參加政治的。在一些中西部州份，他們選舉他們會員爲州議員，努力從事制定限制鐵路和倉庫的所謂「農會會員法」。但農會會員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未曾組成一個政黨，也未曾組成

像日後國會中的「農業集團」一類的東西。

跟着他們許多商業的失敗，他們立法努力的挫折，以及八十年代後期相對繁榮的回頭，農會衰頹了。後來它是恢復起來的，但純粹是一種社交和教育的組織。同時不滿的農民流入綠背鈔票黨——一個湊合得很壞的農民，工人和教條主義改革家的集團——這個黨於一八八〇年推選農會老領袖威佛為總統候選人。

農會的真正繼承者是「農民同盟」，那是美國歷史上最饒興趣的一種組織。農民同盟起源於九十年代的末期。這個時期是空前堅苦的。平原上發生連年的旱災；收成攤分制和收成留置權制令南部苦不堪言；小麥跌至每蒲式耳五角錢，棉花每磅六角錢；把玉蜀黍當燃料燒比運至市場還要上算。在華盛頓，半瞎了眼睛的國會議員只顧到大商業的要求，於一八九〇年用空前未有的麥金萊關稅把全國都束縛死，維持一種殘酷的銀行信用制度，打消了鉅額的恩給金等等。因為受政府措施不公所刺激，農民同盟運動好像流行病一樣的蔓延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各同盟的會員人數已離二百萬不遠。

西北部和南部的同盟，在許多方面都像早期的農會。他們實施縝密的教育計劃，發行書籍——如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和愛華德·貝拉米的「回顧」——出版同盟報紙——單單堪薩斯即有一百家以上——派演講員作農民顧問，以科學農業的最新發展告訴他們，並鼓動制定補救的法律，成立農民學會和讀書會。他們還實施廣泛的經濟計劃。台薩斯同盟主持購買，交易和倉庫的合作辦法；達科他的同盟舉辦收成保險；伊利諾斯的同盟則舉辦農民交易所。這種事業有此是成功的，

替農民節省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因為他們如此不必受商人和中人的剝削；其他的事業，則因碰到銀行和鐵路的敵對而宣告失敗。

不久同盟產生了一個政黨。他們開頭就揭發一種政治改革計劃：鐵路國有，貨幣貶值，廢除國家銀行，禁止外國人購置土地，減低關稅，擬定「低級財政部」計劃，使農民借款容易。這最後一點特別有意思。它主張由聯邦政府在每一個農業的郡建築倉庫，以便農民收藏產物。這計劃又以最低利率貸款給農民，使他能夠控制產物以待好價時售出，使通貨膨脹——這樣便增加了農產品的價值。最初提倡的時候，它被斥為輕率和社會主義的計劃；但在一世代之內，它的主要部份已經被聯邦政府完全採用了。

在一八九〇年與一八九二年之間，農民同盟變形而成爲平民黨——美國政黨中最有聲有色的一個黨。這個黨的成員是南部和西部的農民，但也包括許多其他的少數派集團——勞工武士會，綠背鈔票黨和聯邦勞工黨的殘餘，婦女選舉權的提倡者，社會主義者，單一稅制的主張者，白銀派，以及職業改革家。它的力量集中在中部邊區，它的領袖們也來自中部邊區。這一世紀末期平民黨革命捲過草原和植棉區域，這是美國政治上所從未有過的現象。一個目擊者記載着說：『它是一種宗教的復興，一支十字軍，一個政治的聖靈降臨節，捲在裏面的人，每個人都有如簧之舌，好像有神靈使他們口若懸河一樣』；另一個人回憶着說：『它像十字軍一樣是一種狂熱主義。』農民在農場裏辛苦一天之後，挈妻兒緩步上農會或學校，傾聽領袖們的激動演說。最偉大的女宗教家瑪麗·索斯發表演說道：『這已經不再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始，

華爾街所享的政府了。我們的法律是一種制度的產物，而這種制度則使流氓們衣冠楚楚，使忠誠者襤褸不堪。」暴亂的農民們投票主張發表新的獨立宣言。其中一篇這樣說：「過去二十八年的美國歷史，是傷害，暴虐和霸佔的歷史！世界上沒有一段可與倫比，而一切法律的制作都有一個乾脆的目的，即在自由美國的廢墟上建立一種金融貴族政治。」

一八九〇年的選舉令這個新黨在十多個南部和西部州份獲勝，派出不少土製的參議員和下議員到國會去。這個黨受勝利所鼓舞，打算獲致更大的成就。一八九二年獨立紀念日，一千個熱心的代表流着汗集會於奧馬哈，推選一個總統候選人，通過董納利所草擬的下列話語，作為一個大胆進步的政綱的序言：

「我們當國家臨近道德，政治和物質崩潰的邊緣時召集會議。貪污左右了投票權，州議會和國會，甚至污蔑了法院的尊嚴……報紙大部份是受人津貼或被人封閉了嘴；我們的家典拜度日；勞工窮困；土地集中在資本家手裏……平民大眾勞力的果實被人大胆盜去建築少數人的龐大財富……獲得這大批財富的人則不顧大眾利益，反而對自由有所危害。由於政府不公道的同一個多產的子宮，孕育了兩大階級——窮人和百萬富翁。」

平民黨得了一百萬以上的票數。但遷入白宮的不是威佛（James B. Weaver）而是克利夫蘭。南部棉田和西部的草原雖颳起革命的暴風，但舊的政黨如常走着他們的路。只有一次地震才能夠搖撼他們。這次地震不久便發生了。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二年情形已經很壞，之後又逐漸惡化。在儀表極佳的克利夫蘭第二任宣誓就職禮不久以後，國內發生一種嚴重的恐慌。商店倒閉，銀行關門，鐵路出賣，工廠破產，貿易衰微，債主們削去抵押品取贖權。在城市裏，失業者如雲；在鄉村裏，流民越來越多。這種情形較一八七三年的恐慌更壞，在影響上更為廣佈和更具破壞性。

在這種禍災之下，政府對經濟的紊亂採取不干涉的傳統政策。克利夫蘭是一個能幹的領袖，他忠實，勇敢，善意，在打擊貪污和特殊利益上，他是孟却斯特自由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他在第一任總統期內（一八八五年——一八八九年）有很好成績。但他與放任主義的哲學結下不解之緣。他的施政方針還是減低關稅和改革行政，而拒絕救濟經濟的立法的大部分建議。他深信風暴會自己停息的；不景氣可用自動的力量予以消滅。這樣情勢逐漸惡化者達兩年之久。一八九四年發生了普爾門的大罷工，柯克西的失業羣在華盛頓的遊行，以及農產價格的再往下跌，種植棉花，玉蜀黍和小麥的地區發生暴動。民主黨的南部派和西部派以反對舊黨為威脅。一八九四年，克利夫蘭阻撓膨脹政策，密蘇里的老戰馬柏蘭特便宣布「我們已到了分道揚鑠的時候了。」那年秋天，一批心懷不滿的民主黨人與平民黨人攜手，平民黨因此可以得到一百五十萬票。

當衰老的自由黨組織已經瓦解，年青而精力充沛的共和黨代之而起的時候，許多人預料一八五四年——一八五六年的危機會再度發生。但西部民主黨的聰明領袖們還不準備讓步，南部民主黨又滿

憐白人優越感，不讓第三黨有一個機會。南部和西部的民主黨急進派領袖，並不倒向平民黨去，反而積極控制黨的組織。農業的民主黨員投票選舉，以求在貨幣問題上進行鬥爭。這一著常被認爲錯誤，但是其他問題能否吸引這樣多的投票人，則是一個疑問。那個時候的貨幣問題是複雜的，但建議把它變成一個通貨膨脹對通貨緊縮的問題，必不至太於令人迷惑不解。當人口增多和商業發達的時代，政府多年來即採取一種通貨收縮政策。在一八七三那一年，正當西部銀鑛的出產有令貨幣貶值之勢以前，國會用純粹平常的辦法，把白銀剝奪去通貨的資格——那就是說，拒絕再購入白銀或再鑄造銀幣。之後，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九〇年，政府被迫大量購買白銀，使美國的金本位受到嚴重的危害。一連串的總統，由國內全部保守力量予以支持，決定保持這種本位。克利夫蘭總統特別打了一次大勝仗。許許多多農民都深信，這貨幣政策應負價格低落的大部分責任。恢復白銀，鑛裏開出的都作鑄造之用，把造幣廠開放接收世界上一切寶貴的金屬，這樣貨幣的價值便會回復正常狀態，物價便可飛漲，而繁榮也即可以恢復。這都是白銀派提出來的理由。

保守的硬幣派人士還認爲這種政策在財政上有害。通貨膨脹一經開始便不能遏止，政府本身便將被迫走上破產之路。只有金本位才可以保證平衡。不獨如此，他們還認爲金本位不僅是健全的財政，而且是健全的道德。他們不公平地斥銀幣爲「不忠實」的貨幣。這是一個舊的糾紛，也可說是一個新的問題。

在戰略的理由上，自由白銀問題的鬥爭有許多話可說。銀鑛主人面臨着破產的危機，自然願意出錢支持這個運動。在五六個人口稀少的西部州份，白銀派是佔絕對優勢的——這裏平常是共和黨的

範圍，在選舉代表團裏控制着不平均的票數。這些票如果倒到民主黨方面去，便可使選舉形勢整個改觀。易得的貨幣對全國的債務階級是動聽的，對一些工人和農民也是同樣容易入耳。最後白銀具有易被利用的感動人的性質。黃金是富人的貨幣；白銀是窮人的良友。黃金是華爾街和倫巴特街的貨幣；白銀是草原和小城鎮的貨幣。

但它還不夠發動一個鬥爭；白銀派還需要一個總統候選人呢。紐約世界日報說：『白銀派所需要的只是一位摩西。他們有原則，有勇氣，有銅樂隊，有旗幟，有宣傳，有選票，和有所謂領袖的人物。但他們在荒漠漂蕩，正像一羣迷途的羔羊，因為他們之中無人有勇氣，胆量，號召力和智慧足以做一個真正的領袖。』

他們結果找到他們的摩西，那便是內布拉加州的布利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利安是參加一八九六喧囂的芝加哥大會的代表，報名對貨幣問題發表演說。那是六月八日溽暑之夜，他走上講台之際，即是他不朽事業的開端：

『我們不是以侵略者的姿態而來。我們的戰爭不是一個征服的戰爭；我們是為保衛家園和後代子孫而戰。我們曾經呼籲，但我們的呼籲無效；我們曾經請求，但我們的請求被人忽視；我們曾經哀懇，但我們的哀懇遭人嘲笑。我們的災難來臨了。我們不再呼籲了；我們不再請求了；我們不再哀懇了。我們決向他們挑戰！』

這是布利波所說的話。他的每一句都博得雷動的掌聲。當他發表他的著名的結論時，會場喧噪震動，有如尼亞加拉瀑布，這是美國集會從未有過的情形：

「如果他們有勇氣出來在開闢的戰場上爲金本位辯護，我們決予以澈底的痛擊。我們後面有全國和全世界的生產羣衆，有工人的利益，以及處處的勞動界，我們決以這句話來答覆他們保持金本位的要求：你們不應以這荆棘之冠壓戴在勞工的額上，你們不應把人類釘死在一個黃金的十字架上。」

布利安在大會之前已經作過計劃縝密的運動，故即令他不發表這篇演說，他也是可以被推選爲總統候選人的。他發表演說之後，其被選爲候選人可說已成定論。民主黨的白銀派的勝利至此已經完成。他們草擬政綱，推定候選人，強迫平民黨人跑過他們的陣營來。

因爲這次運動，布里安踏上了全國的政治舞台，在政治上活躍者達二十年之久。在某些方面上，他是亨利·克雷以後最特出的政治領袖。他的儀表極佳，頭髮是黑的，一雙黑眼炯炯有光，聲音具有流暢的美，思想敏捷，智慧充足，而又有大無畏的精神——這種種都使他爲平民大眾所擁戴。他們認爲他便是他們中間的一人，稱他爲「偉大的平民。」按布里安出身於農家，入一個農村的學院，後來遷至平原鄉間，執行律務並參加政治；他是一個虔誠的長老會派教徒，他的政治演說充滿着從聖經引出來的話；他是個樸實的民主黨員，未受成功所敗壞，誠心致力於公衆的利益，並深信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他是受有許多限制的，因爲他沒有多讀書，又不是一個富創造性或深奧的思想家，不過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

一八九六年的競選運動，其劇烈的程度是傑克孫時代以後所未有的。布利安的工作是困難的。他的黨分裂得厲害，黨的名無實的領袖克利夫蘭處於反對地位，而黨的大部分東部領袖們則羣趨入

共和黨陣營。民主黨也受不公平的譴責，謂須負三年不景氣的責任。反對布利安的幾乎都是有勢力的集團：商業，大學校，報界和金融界。共和黨的老闆漢納籌措選舉運動費用，據估計是三百萬至七百萬元之鉅；在另一方面，民主黨的選舉運動費不足五十萬元。民主黨只有一點是佔了顯然的優勢——那便是在布利安一個人身上。他從新英格蘭橫過大陸到西部，搭乘酷熱而多灰塵的白天馬車，每天演說八九次，向工人和農民說話，向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份子呼籲。他的競選運動是美國史上最壯觀的一次。

布利安的競選是莊嚴的，但結果還是麥金萊多五十萬以上的票數取得勝利。使傑斐遜執政和支持傑克孫與道格拉斯的西部南部大聯合，至此宣告失敗。按此次是麥金萊在中西部和遠西部州份戰勝，因以決定全局。但布利安的競選，畢竟成爲傳奇性的史實——而平民黨人和農民的民主黨人的理想，最後還是制成法律。他們是左右美國歷史的力量。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向民主挑戰

當布利安於後來撰寫一八九六年運動的歷史時，他稱之為第一次戰鬥。書名的本身就是一種啓示。因爲那一次戰鬥雖然結果是農業的民主力量遭受失敗，而却是一套進步的戰鬥的起點。在這次戰鬥結束之前，由農人與工人組成的大軍自這一州到那一州；一個勝利接着另一個勝利，把反動的力量全都摧毀，最後把勝利之旗高插在白宮之上，全美國又恢復了它傳統的民主基礎。

因爲這乃是進步的時代——在布利安的第一次戰鬥與烏得魯·威爾遜的第二次戰鬥之間的二十年。在這一階段裏，幾乎在美國人民生活的每一方面裏都發生了改革與變動。舊的政治領袖被擠出去，而新的政治領袖被擁進來；政治機構都大事調整而且現代化了；政治活動受着嚴格的批評，凡是不能自合於民主標準的都被排斥了。經濟組織及手段——私有財產，大公司，托辣斯及大資產——都被召到理智的法庭上來證明它本身的理由，不然就得改變其作風。社會關係也被重加改訂——城市的擁擠，移民，資財分配的不均，階級觀念的滋長，都受到嚴格的注意。這一時期裏的幾乎每一位人物，不論在政治，抑在哲學，學術或文學各方面，其聲名都多少來自於他與改革運動的關係：政治舞台上的威佛，布利安，拉福萊特，老羅斯福及威爾遜，哲學上的威廉詹姆士，洛埃士，同約

翰杜威；學術研究方面的凡勃連，艾利凡吞納；文學上的荷爾斯，諾利斯，加蘭，德萊塞，那時的人民崇拜的英雄全是改革家。他們勇敢而強硬的守着民主的壁壘，甚至還結隊出征。自四十年代以來要以這一次的知識活動最熱鬧；而也以這一次的改革的意志最堅決。

但是這究竟是爲了些什麼事，這種改革的狂熱？究竟是什麼在如此擾亂着美國人民的生活？我們已經看見了一些農人與工人的問題。但是那些雖然已足以令人傷心，却仍然是現象，而非原因。那些問題並不祇限於經濟方面，而其範圍也不祇限於農工兩部門。它影響着美國社會各方面。事實的真象乃是美國人民生命的願望未曾兌現。本來在這新世界上應該創造一個人人自由與平等的社會的，還應該有一個在各處保障人民自由的政府的。這個自然原是一種夢想，然而却不是完全虛幻的夢，創造美國共和國的人們也並不都是幻想家，祇用欺人的希望來實行自我麻醉的。自有史以來上天從來沒給過人類這樣一個好機會，也從未有過一次令人們可以合理的期望其自身在地上創造出一個樂園來。在最初時期裏，美國人民真如特古特所說的，乃是「人類的希望」。

這個希望並未實現。美國人民固然比較當時的別國人民充裕些，可是却未達到他們所當有的境界，國內的物質成就固足動人，而社會及文化的成就却令人極爲失望。正如威爾遜總統在就職時所說：

「罪惡侵害了善良，很精美的黃金上都弄得烏黑了。與財富俱來的是不可原諒的浪費。許多可
做正當利用的，我們都糟蹋了，我們也沒有費一點心思來珍惜天上的殊恩……：看不起謹慎，一面
能力驚人又一面奢侈得可恥。我們一向得意我們工業上的成就，可是我們却迄今從未仔細的想過人

的損失是多麼巨大，有多少生命的火被熄了，有多少精力被使用過度而摧拆了，在這許多年的無情之重壓下，有多少男女與幼童在身體與精神上蒙受着可怕的損失……在這偉大的政府裏藏匿着許多深奧的祕密，我們始終就沒有用精密而無畏的眼光仔細觀察過；我們所愛敬的政府已經被人利用做圖私利與滿私慾的工具過久了，而利用它的人們簡直忘記了一般人民」。

這並不是因為有惡人做了惡事；也不是因為有了有力量的人物出來排斥民主，蓄意將它摧毀；也不是因為有暴政與獨裁來取代了自由的位置。都不是的，其原因遠比這些更爲微妙。其基本困難乃是西半球各國所共有的，科學與機械佔了社會科學與政治機構的上風，來自十八世紀農業社會的制度與方法已不能應付二十世紀城市國家的需要。在政治方面是如此的，舊日對於政府的畏懼心理到這唯有通過政府才能控制機械，對於社會所產生的壞影響的時代還存在着。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舊日的個人負責的觀念，現在已因無個性的公司組織的興起而被推翻。在社會方面也是如此，自給的農業社會中的生活習慣至此已不再能適應高度複雜的城市生活。

祇是增長的自身就已經產生了無數的問題：耕地範圍已經超出了自然所指定的界限；移民數目之激增遠超過土地所能容納的限度；城市也在激長，致它們既無充足房屋又無充分方法以管理其熙攘居民；工廠的產品也超過了實際消費的需要；商業的組織也變得異常龐大。既無人能夠瞭解又無人能夠管理；有幾個人變成不可思議的巨富，他們簡直不知如何處理他們的財產——而社會方面也不知如何減輕他們的負擔。

這些乃是基本的難題，但是很少人能有明瞭它們的智力。改革家們所見到的乃是貧窮，不公，與

貪污；他們所見的乃是土地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金錢問題，所以他們便提起精神來做廢除貧民窟運動，他們清除政治的弊端；他們與托辣斯鬥爭，與「巨富的壞蛋」鬥爭；他們向「魔鬼的酒」宣戰，向童工僱用宣戰，向虐待勞工的人們宣戰；他們爲了印第安人，爲了黑人，爲了新殖民島嶼上的「棕色小兄弟」打抱不平；他們爲了政府設計新機構——主動的，諮詢的，解放婦女的，初級選舉的，制止貪污的法案及計功制度；他們搶救森林與水源，還強化了城市。爲了人民謀福利的千百團體都出現了且發展其範圍，大量的書籍都出版了，一方面揭露現行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提出較好制度的方案。雜誌的編輯們大量的發表文章揭露各種各地的黑幕。小說家們也放棄了愛情及地方性的題材來討論社會問題與鼓吹道德信條。詩人也忘了他們的風花雪月，而發現了「操犁耕地」的人民；學者們也走出了象牙之塔來研究社會問題，宣教士也重新發現了社會福音，令他們可敬的教區人民不耐的聽着新約聖經裏的章句。

這一切都是澈頭澈尾的美國作風。當年到新英格蘭來的拓荒者及清教徒就是爲了反抗舊英格蘭的生活環境；殖民地的領袖們，如威廉士，培根及萊恩勒等人都曾依次的反抗過暴政與不可忍的統治者；美國本身便是革命的產物，而它的領袖，如傑斐遜，佛蘭克林；亞當斯，巴恩等都是些叛徒，不祇反抗祖國，而且是反抗當地的統治階級，在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裏的新英格蘭地方的偉大作家，宣教士及哲學家，愛默生與懷提葉，加利遜與派克便都曾參加爲自由與平等而作戰的陣營。在美國人民的天性中便有那種探索，挑戰，抗議，證明一切，堅持一切善的精神。

在哲學上及在方法上，這些新的進步的反抗都與那些較早的改革運動並無分別。這種哲學要求對

於民主政治的完全信仰：一切不健全的社會中的病症都被指為係缺少民主之故，而一切的救治之道也都包含在民主政治裏。所以關於解放婦女，諮詢及主動者機構，及民選參議員諸辦法都是產生自這種信念。方法大都是屬於政治的，利用政黨予以推動，而不主張成立新黨：因為各大黨那時的墮性及保守性，這種事乃變成了運動中的堅決策動力。

在這些年裏有兩項主要的改革潮流出現。一項來自農業的西部，以經濟問題為中心，偶爾呈現真正急進主義的火花。這種西方抗議的哲學家是「進步與貧窮」的作者亨利·喬治，與「向後看」那本富有烏托邦經濟意味的作者拜拉梅；它的政治發言人是阿特基得，道納利，布利安向拉福萊特。另一項是屬於東部的，甚至於都有英國的來源，以關稅，計功制度，及反帝主義等問題為其基礎。它的知識份子代表為有力的紐約民族周刊的主編人高得金，寇蒂斯，及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它的政治代表是蘇爾茲，赫維特，克利夫蘭及威爾遜。

為了社會正義的進軍

在一八九〇年一個原籍丹麥的移民萊斯，在他為紐約太陽報做訪員時，發表了一本書，名為「那一半人民如何生活」。這是關於紐約的貧民窟的一本毫無遮掩的實際報告，它忠實的描寫着落在民主前進步伐之後的那「一半人民」，在生活上的過度擁擠，骯髒，疾病，犯罪，惡行及悲慘的全貌。不久，別的城市裏的報紙上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這時全國人民才突然驚覺於城市中的問題，原來也同農村裏的問題一般嚴重。

布萊斯勳爵在他那本「美國共和社會」裏說道，城市問題乃是美國民主政治上的一個最顯著的失敗。在那裏貧富懸殊，貧民窟緊挨着富有之家的大理石建築的華宮，乞丐匍匐在華貴的旅館的門口，在那裏，貪污公行，「私黨」藉公款而自肥，公開出售原屬於大眾的利益，鼓勵犯罪與惡行。在那裏罪惡之窟及惡棍之家都受有政府的保護，而且還受有政客及各因之獲利的集團的鼓勵，而似紐約的惠羅斯及克利夫蘭城的湖濱集團那種萬惡之藪全不受警察的任何拘束。在那裏工廠裏的女工同牛馬一樣，童工的情形也慘無人道。在那裏，公共衛生，房屋，教育及政府諸問題也異常嚴重。

第一件引起改革家們注意的事乃是房屋問題，因為這一件事與貧民窟裏的居民有關，與全城的居民都有關係。在南北戰爭以後的數十年間，城市居民人數的增加遠超過了房屋的增加數目，其結果便產生了一種臨時住屋——搖擺不定的木料建築，高達五六層，空氣惡濁，骯髒不堪，產生疾疫並促成犯罪。祇是紐約的一處，在一八九〇年時，差不多就有五十萬人口住在這種貧民窟裏——其中人民的死亡率較其它好區域高出四倍之多。在下東區的一個典型區域裏有二千七百八十一個居民——而沒有一個洗澡盆。在其一千五百八十八間房屋裏，有三分之一沒有燈光設備與空氣流通設備，而另三分之一則唯有依賴「昏光空氣簾」的裝置。令萊斯來描寫下曼哈丹一帶這種貧民窟的情形吧。

「譬如我們來看櫻桃街某號。當心點，請你！門裏是黑不見底的，當心不要踩到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不是怕你們碰傷他們；挨打挨踢乃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沒有什麼別的特遇。這裏在門洞裏

轉灣到極端黑暗的地方有一步台階，然後又一步。又一步，一個樓梯。如果你看不見，你可以摸着走，悶得很？是的。你打算怎樣？這裏所有的新鮮空氣都是從門口那裏來的，而那扇門永遠開個個不停，還有那間漆黑的寢室裏的幾扇窗子，可是它們却不能打開，那裏的空氣都要靠着這扇門——這邊有一個女人正在你剛才上去的水栓那裏打去。陰溝的水槽就在屋子裏面，若不是這樣就不公平了——全房子裏的人都在夏天被那種臭氣悶得發昏。聽見唧水筒在叫嗎？那乃是這裏嬰兒的催眠曲。在夏天的時候，在一千以上的人們的喉管都乾焦似火時，這裏却抽不出水來的。……這裏是一扇門。聽！那種短促的，乾啞的咳嗽聲，那種微弱無力的哭聲——是什麼意思？它們表示說你在樓下門前的那一道白還有一個故事要告訴你……在黑夜尚未降臨的時候。那孩子正害着麻疹要死了。他也許還有一半救護的希望，可是他絕沒有。那個漆黑的臥室足可以致他的死命。」

「剷除貧民窟」的運動真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在多方面進行，用了防火與防疫種種理由，似基爾德那種改革家總算說動了不情願的立法人物把最壞的貧民窟建築物指定為違法的，而要求在其它一部中裝置了合理的流通空氣及衛生設備。無畏的社會工作者如亞當斯及華爾德等人，受着倫敦方面的啓示，便在各大城市的貧民窟的中心建築了標準的住宅大廈。其中一部，如芝加哥的赫爾大廈及紐約的亨利街大廈都舉世聞名了；在不到十年期間，差不多已有一百所這種建築出現，它們開始了一個多方面救濟，教育及公共衛生的社會工作。爲了使兒童們離開街頭巷尾，不受流氓惡霸的壞影響。並使他們得有較好的健康與禮貌的機會，隨在城區裏最擁擠的地帶開闢了許多兒童公園，同時「新鮮空氣基金」補助他們到鄉間去渡過假期，「牛乳基金」使那些無力購買的人們得到免費牛

乳，日間看護爲工作的母親照顧嬰兒，訪問看護協會免費服侍病人並提供醫藥及衛生意見；同時似青年會及童子軍一類組織也到貧民窟來使少年男女可使其精力做正當及健康發展。

最引起改革家的密切注意的乃是犯罪問題，尤其是激增的兒童犯罪問題：八十年代的十年裏，美國各監獄中的囚犯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兒童佔了五分之一。美國本來一向注意犯罪法律及監獄改革，可是雖然有李文斯頓，狄克斯及魏恩斯這幾位開明的批評家的努力，許多州的犯罪法律還是極爲野蠻，而某幾州的監獄情形是極爲逼似「加爾各答的黑窟窿」。以懲治犯罪人爲生而不注意改善其行爲的老觀念好不容易才消滅，警吏的橫暴及對於富而有勢的與貧而無力的人們施行兩種法律的辦法，也是如此。伊利諾斯州的阿特基得曾饒恕過海瑪克鎮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現在又力稱倘有犯罪的行爲發生，該負責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他還英勇的奮鬥企圖改善該州的犯罪法律，他的一個信徒，多萊杜的「金政」市長瓊斯也同他一樣見解——終得到機會把它戲劇化了。惠特洛克寫道：

「他時常走到市區的監獄裏或工廠裏去，同那些可憐的人們攀談，全不分彼此。……他既然一直在設法把他們釋放出來，他就同我約定了一項默契，他替他們付訴訟費……而我代他們辯護……譬如若有一個窮人被捕，我們就爲她佈置開審，邀請陪審官，給她一切法律上的保護，令她享受有錢人的待遇，這樣警吏們在發現不能判她們什麼罪之後，就會漸漸的尊重人民的身體自由了；他們對於人權及生命也就會多些敬意了。」

但是這些辦法祇是補救辦法而並非根本上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在新舊世紀交替時關於查看制度

的緩刑決定。受了奧斯蓬的影響，許多處最壞的監獄都廢除了，同時鐵鏈罪犯的苦工隊及在南方極流行的僱用囚犯勞力的辦法都受到猛烈的抨擊。同時爲了犯罪兒童也設立了特別法庭。哥勒拉多州鄧佛城的童犯法庭的法官林賽在二十五年的主持期間把犯罪兒童的人數減至最低的成績，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敬慕，林賽寫他自己的經驗道：

「我從事之初有一種同情兒童的心理及一種信念，我認爲我們懲戒罪行的法律對於兒童與對於白癡一樣的不合實用。後來我發現不但我們的法律，甚至我們的全套審判罪行的程序都是完全錯誤的。它的基礎乃是怕，而對於兒童，怕却正是製造欺騙的有利因素……我知道了我們應該用同情來代替我們的心理，但是絕不可以有誘騙，虛僞與過份的重感情。我們一定要先使那孩子相信我們是他的朋友，而却是他的壞行爲的死敵；我們打算幫助他們做好事，而如果他堅持要做壞事，我們可就無能爲他盡力了」。

當時人們爲犯罪與貧窮的最顯然的一個原因乃是酒館，於是便有許多人不斷的攻擊「魔鬼的酒」，其結果乃產生了全國性的禁酒。戒酒運動的起原遠在建國的初年，在南北戰爭以前已經有成千的人們簽署了完全戒飲的誓言，在新英格蘭方面，有幾州已經實驗過禁酒法。然而在戰後期間啤酒及強性酒的消耗量大爲增加，在城市裏，酒館的數目急驟上升；在一九〇〇時，似紐約，巴法羅，及舊金山那種城市已經自承在居民每二百人中便有酒館一家。其中一部僅是「窮人的俱樂部」，而大部份却完全無節制的狂飲，甚至狂到狎褻的地步。星期日停頓的法令也無人理睬了，高價的酒照稅也被設法逃付，販酒及售酒商人處處與政治中的最惡劣份子聯合起來，肆行穢爲。

爲了對付這種情形，禁酒黨人乃於一八六九年出現，可是並無效果。比較有效的乃是基督教婦女禁酒同盟，反酒館聯盟，及教會的各種組織，它們不自滿於政治方面的活動，在報紙上，教室裏及學校裏都進行着不斷的宣傳。在許多年中禁酒運動的最有力的領袖乃是威拉得，她率領着主張禁酒的婦女衝到酒館裏去，高唱禁酒的讚美詩，有時甚至跪下來祈禱。

在十九世紀末年，這些辦法已經促成了七州的酒禁，而且在許多別的州裏，都促成了地方性的戒酒辦法。在本世紀初年，禁酒運動更大獲開展，在世界大戰爆發時，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民已經生活在酒的地方。祇有城市還未被包括在內。是否和平時期的運動能夠衝破這些壁壘，實屬疑問，好在不久戰爭就來援手。在參戰之後，國會方面立即根據經濟，效力及道德種種理由，宣佈禁止釀造。及出售一切強烈的酒類，在這禁令尚未滿期之時，聯邦法令已經明文規定禁酒之令了。這樣，這高尚的試驗乃維持了十幾年之久。到一九三三年酒令重開，以後這個問題又專屬於各州的範圍了。

各州引路

所有這許多改革運動的歷史都指着一項事實：如果不經由立法的道路，個人及私人組織都不能有什麼重要的成就。紐約的慈善事業協會的創始人及許多善事的主持人洛爾威在失望於私人慈善事業的成就之後，決定退出一切慈善組織，她解釋說：

『我想對於工作人民還有一件遠爲重要的事情待做。在這個城裏的五十萬薪水階級中。有二十萬婦女，而其中七萬五千人却在怕人環境中工作，所得的薪資都無法果腹。這件事實對於二萬五千個

賴她們爲生的人實在極爲重要：『如果一切工作人民都能得到他們所應得的報酬，我們自然就不會再有乞丐與罪犯，所以最好還是在他們尙未沉溺之前就解救它們，而不必用你的一生精力在把他們從一半溺死的情況中拉出來，在事後爲他們設法。』

慈善事業顯然祇是一種補救性的治標方法，即使那些不信任政治工作的人道主義者也還是在最後出現在立法的機構裏，恭敬的請求援助。剷除貧民窟，監獄改革，拯救兒童，禁酒——都需要立法的行爲，如果打算取得任何較基本的辦法，都得通過政府的機構。

改革運動中的幾次最大的鬥爭都是各州裏發生的，即使在一部份問題已經提出到全國性的辯論壇上，各州仍然是這些鬥爭的場地。根據美國的憲法，我們都知道，一切屬於社會性的法案之立法權都由各州所有。勞工的工作時數及工資，工廠裏的工作環境，婦孺的福利，監獄，改革行爲的學校，慈善組織，教育，婦女參政，地方市政等都是各州的工作而不是聯邦的工作。是的，「新法」把這些都澈底改變了，可是那乃是全國發生大危機以後的結果，而且還需一個大胆政府及領袖人物，同時還在最高法院堅決反對之後才獲實施的。

所以，各州乃是改革的試驗室。後來有許多全國性的改革事業都先在這裏試驗過，原則是否正確及實施時是否有漏洞也都先在各州裏試驗了。同時各州也是那些後來改革全國的改革領袖的預備學校，老羅斯福便是先在紐約城及阿爾巴尼州進了學校，而後才到華盛頓的；拉福萊特先在威斯康星學習了鐵路經濟及托辣斯章程而後才將它們施於全國；威爾遜也在任新澤西市長時取得了自由主義份子的聲譽，而後才足以擔任美國總統的職務。寇明斯，諾里斯及羅斯福，也都先在其本州學習

過。

在這幾州裏所實現的改革究竟是什麼性質呢？其中許多是屬於政治機構之民主化的：如關於主動及諮詢的，祕密投票的，直接基層選舉的，直接選舉參議員的，制止貪污的，市政自治的規定的及婦女參政的諸法案。其它則以經濟改革爲目的：如關於鐵路及托辣斯管理的，公共事業委員會的，捐稅改革的，勞動時數及環境之規章的，工人賠償的，禁止童工的。還有一部則有着廣泛的社會改革意義：和教育改革，公共健康計劃，天然資源之保養等。

最迫切的問題乃是先取得政府的治理權。那時的州政府與市政府，究竟那一個更腐敗些實在很難於分別。到處都有着貪污的活動與機會，贓款的數目簡直無限。各州的立法機構及各市鎮的參議都有權出售極有價值的公共事業的特許權，決定鐵路運貨及公共事業的價目權，控制保險事業權，徵收捐稅權，油水極多的公路建築的允許權，以及保護或關閉售酒事業的種種權柄。利益方面動則幾百萬美元，而各種事業的經營者爲了優先，豁免或保護種種特權，都準備大規模的行賄。其實納賄的方式並不限於改進送金錢這一種；他們也許還可以使用保證升官，在競選時投資，或是重酬奔走的律師那一類方法。不管方法如何，他們向來都是成功的，都是令改革家們不禁爲了之焦灼不置的。

在兩世紀交替期間，調查密蘇里州情形的一個陪審人民委員會的結論說：「二十年來……在本州立法機構裏貪污乃是極普通而被人認爲是當然的事，而且一切貪污的行爲絕未受什麼干涉與阻撓。這種判決詞，對於當時的各國各州幾乎都可以在某一時期裏適用的。從新漢普夏州到加利福

尼亞州，從新墨西哥州到蒙達那州，立法人物都在等着出最高價的買主。到處都有爲大事業奔走之徒，不顧廉恥的準備行賄，如果失敗了，他們就採用要挾的手段。在北部的新漢普夏州，似邱吉爾在他的小說「康尼斯敦」及「克羅先生的事業」裏所描寫的，鐵路事業掌握着最大權力，諾利斯的「章魚」那本小說裏所寫的加州是南部太平洋海岸一帶的普遍情形。「銅王」們把蒙達那弄得腐敗不堪；鐵路事業及保險事業把紐約的代表人民大會都買在手裏；美孚公司被人指控爲把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切都精煉了，就是沒有精煉它的立法機構，即使任一個小小的邊境上的新州郡裏如新墨西哥，兩三個鐵路事業的不神聖的同盟協定，煤礦與銅鑛公司，木材及地產公司，還有幾個大牧場的主人，都完全控制了全境。採煤公司強佔了幾百萬英畝的最有價值的礦區，木材公司掠奪了全國森林，牧場主人把成千上萬的牛羊放牧在公共的牧地上，鐵路公司及礦業主持人否決了勞工法律，而且它們全都逃了稅。爲了完成這種厚利的目的，這些事業便利用着政治舞台上從來沒有見過的一批最壞的黨徒。

如果把每一州的反貪污戰爭或是政治上的改革程序都細加述說却未免過於重複而混亂了。祇舉一州的經過——雖然未免易於樂觀——已足以說明當時全國到處發生的情形。在一八八〇年時的威斯康星州乃是一個很繁榮與開明的一州，然而它的政府却在三個大亨的控制之下——木材業百萬富翁開伊斯·蕭耶同鐵路律師斯普諾——他們利用選舉委員會及代表大會來壟斷該州的政治。星據荷威的報告，他說：

「這一州乃是由鐵路，木材與魚稅事業做封建主的地方，它們利用着聯邦方面代表的職權，提名

與選舉州長，參議院議員及國會議員，而他們在當選之後也就輪流的爲他們的後台老闆謀利。聯邦方面及本州的官吏也被他們爲了相同的目的予以利用。兩年一度的立法會議也祇是爲了少數人謀利的節期。政治交成了特權商業，野心家們祇有得這種機構允許之後才能進內。很少有人相信還有什麼別的方法，也沒有人敢於向這種寡頭政治挑戰，他們不但分配選舉職務，而且還分配委任職務，以期維持其政治及工業勢力。全沒有過有組織的抗議。報紙不是由他們操縱便是漠不關心，這一州裏的大財富都是取自公家土地上的木材，或是來自鐵路事業與免稅事業，或是與他們有關的建築合同。

受了八十年代裏各草原州郡的改革運動的影響，年輕的拉福萊特雖然才離開大學，却決定要過問這些事。他沒有得到那種機構的支持，可是他却不停的奮鬥，終於成了國會的議員，從他四次連任的紀錄上看見：可見他是足能不負人民的期望。於一八九〇年失敗於民主黨的巨崩之後，他便以全力來注意他本州的政治。人民都擁護他，可是那些機構却不要他，於是在三屆選舉中，由大亨們控制一切的選舉大會都把他壓下去，選舉出比較妥協的人物。由於這種經驗，拉福萊特才知道廢除政黨選舉委員會及選舉大會等組織的必要，而代以直接人民投票的辦法。

最後，這位鬥士終於在一九〇〇年設法強使一屆選舉大會提出他的名字，而且大獲全勝，當選了州長。在其後二十五年間——當中還有一個短短的戰爭期間——他同他的信徒們控制着全州的政事，把它變成了全國最民主，最進步與最開明的一州。拉福萊特在這世紀的最初十年或十二年中所設計與實行的「威斯康星理想」並非空洞的原則，而是一個實際而完整的施政綱領。他利用直接基

層投票，動議及諮詢方法，除司法官之外均可罷免，禁止違法的選舉方式，公開與限制競選經費，市政自治，人民服役改革，以創設行政專家顧問組織種種方法，把民主的活動大為擴展。爲了保障平民不受工商大組織的榨取，拉福萊特還成立了一些委員會來管理鐵路及其它公共事業，強制鐵路及木材公司繳付它們所當付的稅額，並且逼迫吐出了它們在過去所逃付的稅款，同時制定全州性的所得稅制及儲蓄銀行的州保險制。爲了保障勞工，他又制定了勞工賠償法，禁用童工法，限制女工工作時間法，爲了鼓勵農業增產，他更設法使鐵路運費減低，廣泛施行儲水及水力工程，極力支持農業實驗站及與大學有關的示範站。

最有趣味的一件事還是拉福萊特把大學變成全州的精神樞紐之舉，大學校長凡海斯乃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他在這學府裏所邀請的一批教授學者們乃是全世界上較高學術機關裏最傑出的一批，同時更重要的乃是他一個選成一種觀念，認爲大學的作用乃在於爲全州人民服務。它的經濟學者隨參加了鐵路及捐稅委員會；它的歷史學家們研究着當地歷史；它的工程專家設計了造路程序，它的農學院幫助農民改善牲畜飼養的工作，用了多種調查，令該州農民——全國農民——省下來不可數計的金錢，而且把威斯康星變成了新世界上的丹麥，也全是它的功勞。

這裏的實際進步主義的試驗，令全國各地都大爲興奮。拉福萊特證明了改革原不必拘束成規，而學者及科學家們對於實際政治也可以大有貢獻。他還證明出來州政府方面如何可以管理各種公用事業而不要採行社會主義，同時這些管理如何可令事業本身及人民都受惠不淺。他指出來一州的政治試驗，對於其它各州及全國都可以有指示途徑的作用。

提奧杜·羅斯福及公正法案

威斯康星州的成就雖然可羨，而改革家們所求解決的問題，還是大部無法在聯邦制度之下的各獨立的州界裏予以解決。祇有在全國性的努力之下才有生效的可能，也祇有全國的最高政府才能確保它的成功。國會方面雖然已經通過了一批略有進步意味的法案，如一八八三年的潘特頓人民服役法案，一八八七年的州際商業法案，一八九〇年的反托辣斯法案，一八九六年的以仲裁鐵路勞資糾紛為目的的埃特曼法案；而這些法案却因為兩種原因而大部不能生效：其一為改進的程度不夠，其二為執行不力。換一句話說，它們祇是一些姿態，由一個無誠意的國會表示出來想取得人民的歡心的。

在足有三十年間美國聯邦政府都被掌握在共和黨的領袖手裏，他們習慣於當時的隨便哲學，對於大部較新的社會及經濟需求都沒有興趣。他們無例外的同情大商業，對於南北戰爭的退伍軍人則主張厚給年俸。特殊階級及勢力對於它們具有不斷的控制力量，那些連接的共和黨總統們——格蘭脫，海斯，賈非爾特，阿塞，哈利遜，麥金萊——雖然都是可敬的人物，但是却沒有眼光與創造力。當時僅有的一位民主黨總統是克利夫蘭，他有比較強的個性，與比較清楚的計劃。他改革了各聯邦局，從大商業手裏收回了許多國有土地，極力抨擊俸金及其它特別法案上的弊端，鼓勵了人民服役工作，甚至強使國會通過了一項附有所得稅法律的關稅減徵法案——這一個立即被最高法院宣佈無效。但是克利夫蘭的權力是斷續而不順利的。在那幾個工業州郡裏，甚至在華盛頓的某方面，真正

有權的人物乃是紐約的普拉特，賓夕法尼亞的奎氏，俄亥俄的哈那，他們本人正無作官的心思，同時也沒有別的心思，祇是打算爲他們的老闆盡力與獎勵他們黨裏的大亨們。大部份的國會議員都是些下駟之材；國會公報裏印滿了他們的演講詞，可是任何一個美國人也想不起他們曾通過什麼有價值的法案。

先在威佛繼在布利安領導之下的農民力量，令兩黨人物都爲之驚異不置，在許多州裏叛變的爆發都迫在目前，改革已不能再事遲延了，這時發生了美西戰爭，改革的事乃被暫時擱在一旁。一九〇〇年的大選似是帝國主義與反帝之爭，麥金萊在兩面都有一手兒，於是就被選聯任，那位「偉大的平民」又被摒諸門外了。這事正是意外的繁榮，看起來全國又將長留在那種無聲無臭的情形之下了。

可是在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麥金萊總統突然被一個無政府黨人槍殺，因了他的死，在一星期之後，整個美國政治的外貌全都變了。因爲在這位意外獲得總統職務的年輕的提奧杜羅斯福身上，全國得到了一位見識與精力超羣的領袖，而進步運動也得到了一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物。羅斯福（以下簡稱老羅斯福，以別於最近逝世的羅斯福總統——譯者）出身於東部的豪富之家，畢業於哈佛大學。但是他却是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熱情的贊助改革。同時，他還是一位政治上的實際主義者，熱烈的國家主義者與忠實的共和黨信徒。他乃是傑斐遜以後的一位最多才多藝的美國總統，雖然他却完全沒有傑斐遜的知識上的深度與密奧，也一樣沒有他那種哲學的理想氣氛及眼光，他曾經經營過牧場，大規模狩獵，寫過許多本書，參加過紐約州的立法機構，主持過紐約市的警察局，助理過聯邦的人民服役工作，指揮過海軍，在古巴作戰，而且還是個最優秀的州長。他大量的耽於讀書，對任何事

都有興趣，對任何事都有意見。他有一種好發明警語的習慣，而他的誠懇天性也令他成爲一位主持人民公道的有力發言人。同傑克孫一樣，他有一種博取平民歡心的天才，而且把他所有的鬥爭都戲劇化了。同傑克孫一樣他也相信總統應當比國會更爲接近人民，而行政首長對於執行工作當負更大的責任，可是不似傑克孫，他不懷疑文官系統裏的專家意見。在不到一年期間，他已經表示出來他很瞭解那些席捲全美的大改革運動的真意，而且決定以政治家的風度處理這些問題。他不是個急進份子，祇是個開明的保守份子，他打算實行現行經濟制度中的革命，祇是打算削減其中的弊端以拯救它的存在，他決心證明政府乃是工商事業之上的最高組織，還打算令平民多得些公平待遇。

在這些工作上，老羅斯福利用着由人民運動所引起的羣衆情緒，由於自各州各市內湧的進步潮流，以及由於一大批勇敢的「黑暗揭發者」，他們的著作及雜誌文章毫不留情的揭穿着營私舞弊的情形，工商業裏的罪惡，社會上的邪行，壓迫少數及有色人種的歧遇，以及毒害美國人民生活的許多其它壞事。這些黑暗揭發者不但其本身即爲改革的工具，從他們的廣受歡迎的情形上看來，一般人民都已經準備了接受他們的言論。

老羅斯福說：「工業主義的重大發展，其意義自然指明政府方面當加強其管轄該項事業的權力」在其推行反托辣斯法案的時候，老羅斯福很早便提供了「加強管轄」的事例，而那些托辣斯也並非是挨到他的「巨棒」的僅有事業。由政府方面在監督鐵路事業也是老羅斯福當政期間的一項偉大成就。他本人就曾宣稱管理鐵路乃是「一件最大的事，同時在他不斷的努力之下才通過了兩件重要的管理法。一九〇三年的愛爾金法案把公佈的運費認做是合法的，水上運輸及鐵路運輸的費用一樣的

要經受核減，於是在這項法案在規定之下，政府方面便順利的制裁了芝加哥的巨大裝包業及美孚油行。更重要的乃是一九〇六年的赫朋法案，它使聯邦貿易局獲得控制運費的實權，是使該貿易局有權管理貨倉及路線終點上的各種設備，臥車，快車，及油管，並且強制各條鐵路放棄它們在輪船航線上及煤礦裏的交結利益，在老羅斯福任期將滿時，運費問題幾已全部消滅，鐵路問題已經失却其嚴重性了。

在勞工方面，老羅斯福的使用其「巨棒」雖不重要却是極有戲劇性的。在這位總統用力慫恿之下國會方面通過了一項對政府僱用人員的勞工賠償法案，一項對哥倫比亞區的童工法，以及鐵路安全設備法。同時總統不避訕笑的親自注視政府裏八小時工作時期制的推行。更可觀的乃是在老羅斯福在一九〇二年干涉煤礦大罷工之舉。在長期鬥爭之後，美國礦工協會在年輕的米契爾領導之下，才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讓步；在鑛主們拒絕實行時，他們便宣佈總罷工。鑛主方面的領袖人物是科爾，他說：「勞工們的權益及福利當然可以得到保護與注意，可是保護與注意他們的人並非是勞工裏的煽惑者，而是那些由上帝在其無限的智慧中所賜予產業與土地的基督徒人士。」在他們拒絕調停之後，看情形全國在冬天都將沒有煤了。恰在這種關頭，老羅斯福插身進來，威脅着說，如果鑛主們不肯就範，他就要沒收礦產，交給軍隊去管理。這一種恫嚇立刻生效，鑛工們不但又得增加工資，而且還獲得了較短的工作時間。

對於一般美國人民更有永久價值的乃是一九〇六年通過的純潔食物法及藥劑法。許多年來，一般屠宰商，及食物與藥劑製造商都在售賣着摻有劣質的食物及危險斯人的藥品。在農業部的化學專家

威萊醫生連續着揭穿了幾件事實真象之後，又加上辛克萊的小說「屠場」，暴露了芝加哥屠宰公司裏駭人聽聞的故事之後，羣衆的憤怒一時達到了頂點，於是國會立即通過了肉類檢查法，純潔食品法案及藥劑法案，其結果還不止除弊而已。

但是老羅斯福在內政方面最大的成就還是自然資源之保養，全國人民一向有一種幻覺，認爲美國森林及土壤的富力實屬無限；到十九世紀結束時，他們才突然驚覺全國森林的四分之三已經伐盡，許多礦業富源完全浪費，水力祇被用爲私人牟利的工具，而土壤也被洪水沖洗，被風力捲走。老羅斯福個人對於自然的愛好；及其對於西部瞭解情形使他對於水土保養感到極大的興趣。在他第一次向國會致詞中，他說「森林及水利問題也許是美國最大的內部問題」，於是他們推薦了一個極廣泛的土壤保養及潛水計劃。利用着一八九一年的森林保護法案，劃出了一億五千萬英畝的土地做爲森林保養場，同時在公地項下的阿拉斯拉區及西北區抽出了八千五百萬英畝，準備研究其森林及礦產富源。此外他還把森林保養工作交給了那位有強大精力與開明知識的皮卓特去管理。一九〇二年的潛水法案指定聯邦政府利用其自身經費去經營大規模的灌溉事業；在這個法案的規定之下，阿利桑納州的羅斯福水閘，愛達荷州的阿羅洛克水閘，及格蘭得河上的布特水閘都於不久開工。這一切自然都祇是開端，但是沒有這種開端，却很難有後來第二位羅斯福總統的更複雜與更廣泛的工作。

到一九〇八年老羅斯福的兩屆總統期滿，一屆是承繼麥金萊的，另一屆是他自己的，他這時的聲譽正如日升中天，如果他肯連選三任，一定可以當選，可是他不想破壞兩任的習慣，自己選定了一位繼任人以實現「我的政策」。他選中了有學問有能力的塔虎脫，這位候選人很順利的便先通過了

共和黨大會，然後在與布利安經過了不甚精采的競選運動之後，也獲得了全國的推選。

塔虎脫曾經担任過巡迴法庭的審判官，菲律賓的總督與陸軍部長，在這些工作上他都無懈可擊，可是也沒有表現過什麼政治才能與自由主義的傾向。他真的是急於追隨老羅斯福的施政計劃，而他的成就也並不算小。他繼續壓迫托辣斯；加強聯邦貿易局；創設了一種郵政儲蓄銀行與郵政小包制度；擴大了人民服役的計功法；而且還極力支持過聯邦憲法裏的兩項附加條文——一條規定參議員的直接選舉制，另一項規定了所得稅。可是在這些較進步的成就之外却有着許多反動的政策與姿態。其中最壞的一項乃是他所採行的保護關稅制，其保護的程度令自由主義份子簡直無法忍耐；還有他把森林保養局的主持人皮卓特解職，反對阿利桑納加入聯邦，因為它的州憲章的自由主義色彩太濃，最後他還一切聽從共和黨內極保守派的所有主張。

到一九一〇年，塔虎脫已經把共和黨分裂為二，其結果民主黨乃捲土重來控制了國會。老羅斯福爲了表示使他的繼任人一切放手做去，這時已到非洲獵獅去了；當時有一個流行的小曲就是表示他的信徒的希望：

老羅啊，趕快回家來吹喇叭，

羊羣已在草場，牛已到山崗，

而你留下來看守牛羊的人呢，

却正在稻草堆下睡個不醒。

老羅斯福真的回來了，在歐洲的旅行也酣暢之至。這時共和黨的自由份子如拉福萊特及皮卓特都急於報告給他那種種令人不滿的事實。老羅斯福本人還沒有打算行動，可是拉福萊特却不肯善罷甘休，於是在一九一一年他就領導人們運動取得黨裏的提名。他的活動極爲成功，老羅斯福乃決定予以贊助；在一九一二年初，他宣稱已經加入戰場了。於是老羅斯福與塔虎脫便開始了場惡鬥，其結果前者得到選民的擁護，而後者却得了代表的選舉。在芝加哥全黨代表大會時，老羅斯福的羣衆毫無力量，結果塔虎脫當選爲下屆總統候選人。老羅斯福氣壞了，他說他們的行爲簡直是「作賊」，他決定獨立參加競選。幾星期後，他的兩萬信徒聚會於芝加哥，唱着：

跟隨！跟隨！

我們決心跟隨羅斯福

不管那裏，隨便那裏，

我們決心跟他去……

同時組織了進步黨，舉老羅斯福爲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民主黨方面看着這個自是高興已極。在許多年來，他們都是陪着布利安在政治的荒原上流浪；現在他們望見樂土的曙光了。總統候選人在提名競選時極爲緊張。保守份子擁護一個老戰士，密蘇里州的克拉克，國會的議長；而自由份子却喊着推舉一位陌生的人物，新澤西州的州長，烏得魯·威

爾遜，結果雙方堅持不下時，祇有由布利安來決定；可憐的布利安始終沒有當選過總統，現在却在
他一生中最有戲劇性的時候，指定了威爾遜爲下屆美國大總統。

第十八章 躍為世界強國

新的力量與環境

在我們考察南北戰爭以後的三四十年中的美國政治史，我們可以看見一大串的戲劇性的事件，重建工作，農會運動，賄賂制度之廢除，關稅戰爭；人民派的蹶起，及進步主義的抬頭，當我們觀察工業史，這一個時期裏也是一樣的擠滿了這類事件；帝國鐵路系統的興建，托辣斯的增多，大工業的出現，大人物如羅基斐勒，卡尼基，摩根及希爾等人的成功。然而在外交關係上這一個時期却比較的清閑。自法國於一八六七年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放棄了墨西哥時起，至一八九八年緬因號在哈瓦那外海面被擊沉時至，祇有兩三件驚人的事。在這一時期裏據說有一位心胸較隘的國會議員說：「我們同外國又有什麼關係？」大部人民均注意國內事件，對於外國事，祇偶爾發生一些興趣而已。

然而這一個時期在實質上却比在表面上重要得多，因為沒問題的，有許多與美國人民直接有關的事都在逐一出現了。美國已在變成真正的世界強國，對於日增其互賴性的國際家庭中的和平，秩序與繁榮的興趣，亦愈來愈多了。它與英國的特殊關係也愈形顯著。爲了門羅主義，商業擴展，及一八九九年後美國在東方所標榜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由愛好自由的國家控制海洋，還爲了資源與市場

的不可分性，還爲了一般人對於推進民主政治的興趣，美國與大英帝國的關係就愈發接近了。同時，美國在拉丁美洲也採取了更嚴格的保護態度。美國的工業產品及原料都需要出路，所以它對於開發海外市場也就倍加注意。一部是由於商業及戰略理由，一部是出於理想的策動，另一部是出於強力的誇耀，美國便踏進了多樣的向海外擴展的時期裏。

遠在美西戰爭以前，美國就已經自覺其真正的世界強國的地位。在阿塞及克利夫蘭兩位總統任內，美國開始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海軍。在一八九〇年時，「白色艦隊」已是全國最得意的一件事。一八八〇年時美國的出口總額已經超出八億三千五百萬美元，二十年後的增爲十四億美元。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那許多貨物載運到外國去，而不對國際問題發生興趣的。在南北戰爭之後的某一個時期裏，似乎所有的擴展熱情都消沉了。在一八六七年買進了阿拉斯加之後，一般人民都認爲美國的領土已經夠大了，格蘭特總統打算歸併聖多杜明哥的計劃在參議院了遭受了慘敗。可是漸漸的擴展的情緒又來了。在德國伸出它的貪婪的手，想取得薩摩亞羣島時，美國與英國堅定的立在一起要求它的權利。於是成立了三強保護制度，在十九世紀末年劃分該地島嶼時，除了兩個最大的島嶼外，其餘的小島都分在美國名下，還有那渴望已久的巴哥巴哥港。在夏威夷方面，美國本來已經獲得了製糖業的特權，又於一八八七年取得了價值無上的珍珠港作爲軍港。六年以後合併夏威夷之舉已經即將實現，但因克利夫蘭的重任總統而告停止——因爲他正確的判斷那合併的手段乃是不正當的行爲。但是此後夏威夷羣島却繼續在美國居留人民的管理之下，到一八九八年才正式宣佈爲美國的土地。同時在一八八九年，美國邀請了近二十個中南美國家的代表到華盛頓來參加第一次汎美會

議。美國的勢力愈來愈向外面展開了。

在南北戰爭以後三十年間美國的國際衝突的對象乃是在西半球上唯一有力量國家，英國。有些衝突是相當的嚴重。但是其全部却均用了仲裁或調整的方式予以解決；美英關係反因之改善。

那一串的友好的決定是很動人的。在南北戰爭時，美國北部人民裏本有着強烈的反英情緒。其中大部是沒有理由的；英國政府承認南方政府的作戰國家地位並無錯誤，英國海軍所採行的政策從全局上觀察可說是利於北方，即使在蘭開夏郡的貧困不堪的紡棉區裏的英國人民都是同情林肯的。但是英國保守黨人的敵意及南方在英國定製的或由英國武裝的巡洋船艦的剽劫行爲却被美國人民深深不滿的記憶着。在某些時間裏，似沙姆納那種狂大的領袖堅持向英國索取過鉅的賠款數字時，衝突似已不可避免。可幸的是當時的美國務卿海彌爾登·費許氏乃是一位最有容見的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北方在阿拉巴馬號及其它巡洋艦的攻擊下所受到的損失終於提交仲裁。現代所有的一次最大的國際審判會於日內瓦開幕，其結果美國得到了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的賠款，而英國立即交付了這一筆小款。同時美國與加拿大爲了西北海岸的幾個小島的邊境糾紛也提交仲裁；幾年之後，北大西洋上的漁權問題也由一個聯合委員會予以調整。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後幾年裏，對於加拿大人民是否也可以參加白令海上捕獺事業的問題，也發生了爭持。國務院方面立即聲明這些海面乃是在法律上絕對爲美國所有的海面。這個糾紛又提交國際仲裁委員會，其決議則有利於英國。

最值得稱述的還是委內瑞拉邊境糾紛的和平解決，那一件富有戲劇性與危險性的事件使一八九五年底極感不安。這件事的出現極爲突兀。在該年十二月十六日美英兩國裏是很少有人夢想到嚴重衝

突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十七日克利夫蘭總統却向國會致送了一紙咨文明白指出對英作戰已經迫在眉睫，這一個消息令兩國人民全都呆住了。這個咨文是怎樣來的呢？

在英屬幾亞納與委內瑞拉之間多年來就有一項邊界糾紛未曾解決，美國方面曾屢次表示願使雙方早獲決定。但是委國方面的要求却誇大到了荒謬的程度；而英國方面拒絕考慮任何在半世紀以前勘定的松堡線以東的界線。許多美國人都懷疑英國打算欺侮一個弱國，乘機掠劫土地。最後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國務院向英國送了一紙通知書，據克利夫蘭氏的形容，可稱為「二十吋口徑的通知書」，指控英國侵害門羅主義，要求對於仲裁提議做一明確答覆。這文件裏說「在今日美國已是這一洲上的實際主權國」。英國拖延了很久才答覆，在覆文裏它說這項邊界糾紛與門羅主義並無關係，並指出美國通知書裏的幾項歷史上的錯誤，同時依然拒絕仲裁。克利夫蘭全身都氣瘋了。他立刻向國會發出一紙咨文，宣稱美國當立刻派遣一個勘察團到委內瑞拉去勘定真正的國界，在那項工作完成之後，美國當盡其全部力量「抵抗任何侵害委國領土的行爲。」

在某一時間內，許多人都想到戰爭必將爆發；美國的好戰份子立刻舉行了一次示威。可是這件事的最後結局却極為完滿。英國的人民及政府都表示了極大忍耐，而德皇拍給波爾人的領袖克魯格的電文也於一八九六年公佈於世，英國的注意力全轉到南非去了。美國的有力量報紙，以紐約的世界日報為首，都一致抨擊克利夫蘭的魯莽舉動，商業及宗教團體也羣起反對。知識份子都呈不快與憎厭之情。大西洋兩岸的人民都說戰爭乃是不可思議的行爲。友好及信任的函電往來交馳，足有一千三百位英國作家要求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足有三百五十多位英國國會議員提議把一切糾紛付諸仲

裁。最後，英國及委內瑞拉，利用了美國的媒介，乃一致同意除非已由該國統治五十年以上的土地，全部都提交仲裁。這一件事令英美猜忌爲之一掃而清，還因此增進了兩國的互尊之意，同時還表明了存在於政治表面之下的潛勢力是多麼強大。

這樣結果自是最好。美國的外交政策逐漸增強的落在這種強大的新勢力的手裏，這個合衆國正將
在世界上一佔一頁重要的地位，英美敵對之局必需由英美友好來取而代之了。

美西戰爭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裏，大部強國的帝國主義情緒都極爲高漲。非洲的瓜分已經完成；中國的瓜分似正在開始，這種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原因是經濟的，因爲激增的人口與擴展的工業制度都要求新市場。另一部是政治的，因爲敵對的國家都企圖在海外殖民地增強自身的力量。另一部是海軍的，馬漢的著作已經一再力說海軍基地連續不斷的價值。也有些是宗教的與倫理的，因爲教會裏人物覺得在黑暗的地區裏散佈光明乃是基督徒的責任之一，而白種改革家也在高談改善落後人民生活的白種人的使命。還有一部份純是屬於情感的；好事的報紙正在鼓勵人民到外國去冒險的興趣。在美國方面，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危機及反帝的克利夫蘭之重任總統頗曾遏制衝動的擴充主義者們。而到一八九七年時，經濟不景氣已成過去，克利夫蘭的信用已趨破產之後，那種精神却又復活了，等到古巴的流血暴動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它的機會就出現了。

古巴的西班牙政府早就以腐敗，暴虐與殘酷著稱。年復一年的，它至少榨取了這個島上的五分之

二的收入，減少它的生產力與陷其人民於貧困之地。這些西班牙人在實際上完全壟斷着政府，自己拿着肥大無比的薪金，維持着一種不斷剝削的制度。工商業的稅制重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收稅制度也重壓着農業與礦業，而關稅制度對於西班牙的製造商及販賣商也優待得同專制一樣，令本地商人簡直無法生存。生命與財產全沒有保障。任何一個古巴人都可以隨便遭受逮捕而且還可以「被槍殺，如果圖逃的話」。法庭純是西班牙統治者的工具，而司法制度即是掠奪的別名。報紙全沒有自由，教會也在這些西班牙人手裏，一樣的腐敗，無能與欺壓良民。反動的獨裁政府對於教育也是一點不肯放鬆，文盲的情形普遍全島，而巨額的軍隊却需由人民負擔其全部經費，叛亂的情緒無時不瀰存在表面之下，於是在美國加徵糖稅造成嚴重的恐慌之後，被壓迫的人民終於不能再事忍受了。古巴志士約西馬提於一八九五年揭竿而起，立刻的全境都繼之而起。

雖然克利夫蘭與麥金萊的兩政府都曾努力維持中立，而事態却很顯然，如果戰事延續下去，美國勢非干涉不可。對於美國的經濟影響太大了；美國資本在古巴的共有五千萬美元，在美古之間的貿易在叛亂以前，每年約為一億美元。美西的外交也愈形惱人。當古巴革命黨利用美國土地為遠征軍事基地時，西班牙政府乃開始指責。但是應付當時局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西班牙的封鎖無力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古巴的美國人民的財產，自由，甚至於生命都蒙受損失，而華盛頓方面乃對於此事表示極大的不滿。最重要的乃是美國人民對於雙方作戰的野蠻方式都深表憎恨，尤其是不滿西班牙的殘忍政策。在西班牙派遣了能幹而橫暴的魏勒去壓平革命時，那鬥爭變成了歷史上最可怖的一種。雙方都盡量的破壞一切，大規模屠殺俘虜。對於完全無告的非戰鬥人民也肆行殺戮，

在一八九六年秋天，魏勒把一部份城鎮變成了集中營，把一切婦孺及老弱都趕到那些營房裏去，令他們似蒼蠅一般死去。在一八九七年底，在哈瓦那省的集中營裏的十萬零一千人民已經死了一半。據美國總領事的報告，在古巴全部，已有四十萬無告的婦孺變成了乞丐與野獸一般的生靈——每日死於饑餓與疾疫的數以千百計。

西班牙的軍隊不斷的湧入古巴，在一八九八年初島上的西軍已有二十萬人之衆，西國外交部方面打算組織一個歐洲列強的聯盟來禁阻美國的干涉；雖然俄國表示沒有興趣，英國表示反對，而德國，奧匈及法國却予以鼓勵。但是到一八九八年時機却似到了。國會方面大聲喊着堅強的行動。人民的情緒一部份由於赫斯特的紐約日報的煽惑，但大部份由於坦白事實的激動，已經準備作戰了。麥金萊總統及其顧問那些大資本家的參議員們還想設法避免戰爭的發生；但是政治條件及人民情緒却限制了麥金萊的志願。當時的西班牙駐美大使正是那愚蠢無比的洛姆，在二月裏赫斯特的報紙宣佈了他的一封信，在那裏他稱麥金萊總統爲「自作聰明的政客」，「取媚人民的人物」，還說他失信於西班牙政府。這情形自然更糟了。一星期之後，美船緬因號在哈瓦那港裏被炸沉，死了二百六十餘人。這件事情的負責者也許是西班牙人，也許是古巴人的挑撥之技，但不論怎樣，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了。西班牙政府立即表示最後的讓步。如果能善爲利用，也許即可促成古巴的解放，但是麥金萊認爲不能再事延擱，於是在四月十一日他便致文國會宣佈開戰。這一個舉動無疑的是得有全國一致的擁護。

在美國史上沒有一次戰爭似美西戰爭這樣迅速就收到光榮的結果。戰爭開始於一八九八年五月一

日，在十個星期之內，便全部結束了。美國一次挫敗沒有受到。在五月一日那天黎明杜威率領着美國艦隊駛進了沒有佈雷的馬尼刺灣，他向着西班牙艦隊駛去——用着包抄的陣式——一直到了令他滿意的距離，他才說，「如果你們準備已畢，就可以開砲了」，他不折一兵一卒就令敵艦失去了作戰的能力。這一驚人的舉動事後有一位堪薩斯詩人寫道：

啊，多霧的清晨，

在那五月一日，

杜威是海軍大將，

降臨在馬尼刺灣上。

西班牙人的眼睛濕了，

他們已是又青又紫了，

我們還感到失望嗎？

我想我們是不會了！

約有一個軍團的兵力在古巴島的聖地牙哥附近登陸，接連打了幾個勝仗，便把那港口籠罩在炬火之下。西班牙方面的西凡拉海軍大將率領了四隻裝甲的巡洋艦駛出了聖地牙哥灣，在幾小時之後，它們全變成了海灘上的殘破船骸，美國方面祇死了一個水手，邁爾斯將軍的部隊在波多黎各登陸，

從那城市裏穿過竟似在紀念日裏的檢閱式一樣。杜利描寫這一件征服之舉竟稱之爲：「邁爾斯將軍在波多黎各的盛大野宴及月下遊行」。

美國人民對於這次戰爭的心情可視爲輕鬆的愛國心之表現，每一個樂隊都奏着蘇沙的名曲「永遠的花旗」，每一架鋼琴也都奏着，「今天晚上在老城裏真熱鬧」那一個進行曲。當布利昂到內布拉斯加團裏去充當大佐時，黨派的意見也拋到了九霄雲外。美國南部與北部之間的隔閡至此已全部消滅於全國性的狂熱之中；南方的著名騎兵隊長佐惠勸曾率兵在聖地牙哥城郊作戰，他說爲了美國國旗作戰一次足抵生命十五年，在那炎熱的七月天氣裏，當消息傳來說，聖地牙哥已被攻陷時，從波士頓到舊金山都是汽笛亂鳴，國旗飄舞。報紙派了許多記者跑到古巴同菲律賓賓去看熱鬧，這些記者們捧出來一些英雄。有一位衣阿華州的伊文思，把西凡拉在擊敗後拘在船上；台薩斯州的菲利普隊長，他在一艘西船下沉的時候說：「不要歡呼，孩子們；那些可憐的傢伙正在死呢」，還有布洛中尉鑽到古巴森林裏去探聽西軍的情報，同霍布生船長，他擊沉了煤船梅立美號，打算堵住聖地牙哥的港口。最出風頭的還是杜威，美國人民在華盛頓送了他一所房子，同莽騎軍的領袖老羅斯福，他後來竟因了這次戰功變成白宮的主人。這次戰後從各方面看都是理想的。傷亡人數極少，戰費也不大，美國在海外的地位大爲增高，而戰利的收穫却使美國人的口袋漲滿了。

然而做較精密的觀察之後，却未必盡可如此樂觀。美國之所以致勝並非由於本身的力量而全由於對方的無力，因爲西軍的抵抗力實在可憐。西班牙的海軍又是武裝得那樣壞，作戰意志又那樣低，以致美國砲手的本領雖然荒謬透頂，它還是不能損傷美艦分毫。陸軍也是一樣的統率無方，雖然該

時島上的西軍共有二十萬，可是由於交通組織惡劣，在美軍進抵聖地牙哥時，祇有一萬二千人能夠出而應戰。美軍的勝利固然有一部由於勇敢，而大部份還是由於敵人的無能。而在這勝利的背後還有一大串的官僚貪污與竊敗的事實，早就已經失去了較明白的人們的信任。美國的陸軍部的政事也極為無方，以致其部長不久就被迫退出麥金萊的內閣，其繼任人却是一位能力極強的領袖，艾立胡陸特，他令美國陸軍煥然一新。因疾疫而死亡的兵士成了嚴重的問題，它不但影響了軍中的醫藥部門，還影響了美國一般的衛生及健康行政。海軍的發炮技術方面也亟需以進，華盛頓方面政治上對於軍事的壞影響也現露出來了。老羅斯福稱這次戰爭為「未準備完畢的美國之戰」，乃是最恰當的形容。不久常備軍的人數便增為十萬名，永久性的參謀本部也宣告成立，海軍也急驟的擴充了，各方面的職業軍人的人數都增加了。記住了這次戰爭的教訓，美國才得以充分準備參加一九一七——一八年的那一次大戰。

美西和會很快的便在巴黎舉行了，祇有兩點爭持發生，西班牙代表打算堅持西國，因擔保島上收入所負的債額應由古巴負責；同時他們還說西班牙當保有菲律賓之一部或全部。但是對於這兩點美國代表團都不肯讓步。於是古巴終於再生為一個不負任何債務的共和國。菲律賓羣島全部劃歸美國，還有波多黎各。美國在合併了這項海外殖民地，統治了言語，文化及政治傳統完全不同的人民之後，它似乎已經又走上了一條新路。國內的反帝份子，由布利安，蘇爾茲，高特金，馬克吐溫及參議員賀爾諸人領導，曾大聲疾呼的反對此舉。但是一般人民却都擁護這種政策，在一九〇〇年大選時麥金萊重行當選，投他票的人數更增加了，時間於事後證明美國在海外的這種責任祇是暫時

的，人們在心裏還是非帝國主義的。在其後諸年間，美國的趨勢乃是減少海外殖民地，而不是增加它們。

然而美西戰爭却的確是美國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美國終於承認了其為世界強國的事實；它的孤立及自願的情緒愈來愈少了，在廣義的國際問題上，美國的領導地位愈來愈增強了。它自覺的變成了落後人民的一個導師。在伍德將軍為總督之下，大規模的重建，改革，及發展工作都在菲律賓，古巴，波多黎各及後來的巴拿馬逐步實施。對於伊格羅特及摩洛斯那種民族，美國的工作正如吉百齡所說的，是訓練「新發現的，無告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提」。瑞德醫生及其它軍醫人員在古巴的實驗成就終於克服了黃熱病這一件事實已足以抵償全部戰爭損失的勝利。在幾年來，黃熱病就在熱帶地方殺人無數，而且時時威脅美國南部的港口。在美西戰爭以前，美國本一直倚賴着英國海軍來替它維持門羅主義的政策；自茲以後它才不需它人的助力了，這一次戰爭；尤其是那隻主力艦奧勒岡號用了六十八天的時光從太平洋上繞道南美洲的南端趕到古巴海面，更令人切感巴拿馬運河的需要，最後這一次戰爭更促進了英美友誼而疏遠了美德關係；在戰爭勝利之日，英國人民的歡騰與美國人竟無分軒輊，而德國的一支艦隊却在馬尼刺眈目相視，使杜威不勝焦灼與憤懣之至。

門戶開放：老羅斯福的外交

美西戰後，美國對於世界問題的第一次新態度之表現便是門戶開放政策，中國於一八九四——

九五年敗於日本之後，變成了歐洲列強的劫奪對象！它們在中國不是要求經濟特權，便是要求租借地。帝俄政府實際上已佔據了北滿，德國租借了膠州灣，在山東全省取得了經濟控制權；法國也佔了許多利益。美國與英國都對着這種掠奪，吃驚不置。它們重視對華貿易，擔心經濟壁壘的樹立。在美西戰爭開始以前，英國提議由美英兩國採取行動共保中國的貿易自由，但是國務院無意接受。在一八九九年華盛頓的情形變了。美國的工商界人物一再要求政府在遠東採行更堅定的政策，同時還重提國際貿易局的舊話，說中國乃是「美國向海外市場上侵略的最有希望的地點」。教會人士也來支持他們。正在這時查爾斯勳爵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瓜分中國」，很引起了人們的激動。在幕後也有許多人鼓勵；最後是在年九月國務卿海約翰要求與中國有關各國提供諾言，在其勢力範圍內不徵收特別關稅，港口稅及鐵路稅。雖然大部覆文都有附帶條件，而在一九〇〇年初，海氏却宣佈各國均有「確切與堅定」的諾言了。

老羅斯福於一九〇一年就任總統之後，他的國務卿先為海氏，繼為陸特氏；他的外交政策也分為兩部。其一部的中心為新佔的一些島嶼及巴拿馬孔道的問題，大部還是由於美西戰爭的結果令美國自覺其大西洋及太平洋上的地位尚未十分鞏固。其另一部則為老羅斯福個人在世界政治上的一些冒險行為，表明了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這些冒險行為以其參預調停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及其在一九〇六年參加阿爾及拉斯會議為主，但是並不值得過分重視。這兩件事都很大動人，而且從他個人的觀點上也都很成功。但實際上却都非必要的。日俄兩國不在美國的樸茨茅斯也自會解決其問題，而他也用不到派遣亨利懷特去支持法國與德國爭取它北非的海口與特權。真正

對於美國人民有重大關係的，還是老羅斯福對於菲律賓，加勒比羣島及巴拿馬所採行的外交政策。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他對於美英關係的政策；因為人們雖然也許沒有想到，而實際在兩次大戰中，民主政治的希望，整個文明的希望都寄在兩大英語國家的合作之上，美國雖是相當寡歡的國際舞台上的遲到者，它却清晰的見到支持英國海軍乃是一件非常需要的行爲，在英國方面其每一行爲都受有德國武力的威脅。在國際貿易上有德國競爭；在非洲有德國要求分潤；在歐洲有德國的三國同盟與德國的海軍野心，德國沒有計劃在西印度羣島及拉丁美洲取得領土也是靠不住的事——其一部份領袖人物當然希望在那裏有一個海軍基地。爲了極顯明的理由，美英兩國在遠東方面，在加勒比羣島及在海上通路方面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它們對於這些問題的政策便是日後所稱的「大西洋制度」。

等到美國決心表示要開鑿巴拿馬運河時，英國政府立即表示重大讓步以利其進行。舊有的克萊登——布爾瓦條約（一八五〇年）規定在任何運河上兩國的特權都將均等，而且雙方都不予以武裝。在華盛頓，國務卿海氏與英國大使談判的結果產生了海氏——龐恩佛特條約，於一九〇一年正式批准。如果美國意欲「建設，維持與管理」該項運河，英國方面便自動放棄其全部舊有條約權利。英國不要求「事前地位」，而這一種姿態，美國極表欣慰。事後不久在委內瑞拉債務問題中，英國的方針益使美國滿意。英德義三國對於卡斯特洛總統的背信政府都有不滿之處。在一九〇二年秋天，當它們不能取得付款時，它們便同意採取「合作的壓迫」政策。德英義三國海軍封鎖了委內瑞拉海岸，拘捕了一些砲艦並且轟擊了兩處砲台。美國願意使委內瑞拉受一番教訓，但是不希望有更壞的

情勢發生。英國在見到它的行爲引起了美國的反感後，它立即罷手。在英國國會裏他們還安排了一次辯論，指斥與德國聯合的舉動，同時反對黨方面還宣佈反對使用任何武力。美國人民比較了德英兩國的態度之後，自然偏袒了英國；事後老羅斯福還講了一個戲劇性的故事（不正確的，但是並非完全無據）他說如何令杜威海軍上將及其海軍準備行動，以壓迫德皇撤退其海軍。

在二十世紀初年英國政府又幫助解決了加拿大與阿拉斯加的邊境糾紛，其結果加拿大人的不快正與美國人的滿意一樣，根據一八二五年的英俄舊約，阿拉斯加的邊境當以「與海岸平行的山脈之峯頂爲根據」，這樣俄國方面可以保留一條寬約三十哩的海岸地區。美國自然承受了這一條地方。雙方爭持之點乃是這一條邊界究竟是沿着曲折海岸的多灣地帶的一條曲折的界線呢？還是祇以山峯爲主的凌空界線。加拿大人希望是後者，以便他們取得一部港灣。經過多時討論之後，這件事乃提交給英美加三方混合組織的一個法律裁判委員會，老羅斯福急於見功，盡力咆哮。其實這是不需要的；因爲美國的要求本是合法的，英國的法學家阿佛斯通勳爵每次都投美國的票。最後，在一九〇六年英國海軍重分爲三支主力艦隊，地中海區，海峽區及東大西洋區，在百慕達駐防已久的防備西印度羣島的艦隊至此亦被召返。這一個行動雖然是德國逼出來的，而美國此時在有了強大海軍之後，對於能在加勒比海上便宜行事，自是倍感高興。

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巴拿馬運河已經開工，老羅斯福在一九一二年向西部人民說：「我拿過來巴拿馬，祇有這樣才能建造運河」。前面那一句差不多就是實情。根據一九〇二年的一個法案，國會授權總統買進巴拿馬的法國開鑿運河公司的全部權利，同時向哥倫比亞政府取得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的

一條土地的永遠管轄權，以便開鑿工程。於是美國便向哥倫比亞政府進行談判。但是這個小共和國知道巴拿馬是可居之奇貨，不肯輕易出售。在華盛頓起草的一紙條文准美國控制一條六哩寬的地帶，被哥國國會否決。這種事在美國本來是司空見慣的，美國的參議院一向是慣於把好好的事情拆個七零八碎，可是老羅斯福却惱了，說這乃這哥國政府故意爲難，他還說哥國政府如何的貪污與腐敗，他此時已決心在國會於十二月裏重開之前，把運河區域拿到手裏，因爲他恐怕如果等到國會重開，他的計劃就要失敗。還有兩個強有力的因素也要他立刻行動。一個是那法國公司，已因一次較早的出售契約需要償付四千萬美元。另一個是巴拿馬的人民，他們恐怕如果美國不趕快開工，經過尼瓜拉圭的運河工程也許就要動工了，其結果巴拿馬人民忽然都同時想起革命那回事。由老羅斯福的一個密友主編的評論之評論月刊隨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如果巴拿馬叛亂了又怎樣？」叛變的消息充滿了華盛頓，美國立刻就派軍艦到了巴拿馬海岸。法國的特務人員在地峽一帶忙個不停。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在主力艦納許微爾乍開到哥隆港之後，國務院就向當地的美國各領事發出了一項指令：

「據報地峽方面已發生叛變。隨時以全部發展回報。隆密斯，代理國務卿署」。

美國駐巴拿馬的領事並不是蠢才，立刻就覆電說：「還沒有叛變發生。夜間再報。情勢危急。」過了一兩小時，他的報告又來了：

「叛變已於今晚發生，六點鐘，未流血。海陸軍官被困。新政府今晚組成」。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立刻登岸，阻止哥國軍隊鎮壓亂民，巴拿馬的使節立刻就被華盛頓接見，然後

用着可驚的速度，這個小共和國立即同美國簽訂了一個條約，將美國所需的那一條土地貶價一千萬美元讓給美國，並附帶規定了一個很小數目的年租。老羅斯福後來說：「如果我遵循習慣的保守方法，我就要向國會遞交一份二百多頁的堂皇的咨文，也許到現在辯論尚未結束呢」。可是我先把運河地帶拿在手裏，然後再令國會去辯論，他們一面辯論，運河也就一面開工了。一點不錯。在不到十年的時光裏，多謝哥塔爾大佐的工程天才與勾夏斯大佐的衛生及健康天才，運河已經可以隨時開放了。可是老羅斯福的專橫手段；却使全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大為驚愕。

其實老羅斯福總統的原意却真打算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促進邦交，祇是他的政策與結果時時自相混雜。當第三次汎美大會準備於里約熱內盧開幕時，他特地差遣國務卿陸特到南美做善意訪問，他明白的指出打算與拉丁美洲的各國爲友，他認爲門羅主義的原則乃是南方各國的主要防禦工具。可是他又在這原則上加了一項著名的副款，令別人都感到疑慮。他一面指出美國不許歐洲國家因各小國的不償債務，虐待外國人民與強取外人財產而採取強硬行爲，他却又聲明這乃是美國肩上的不能推諉的責任。美國方面要負責監督這些小國的行動。他在對付聖多明哥身上就表示了這種政策。在這個小國在一九〇四年有遭受外力干涉的危險時，他誘騙他們接受了一種美國財政代管制度，這件事爲了其後許多加勒比羣島上的保護制度開了一個先例。這政策本是爲了和平與秩序，而拉丁美洲各國却都擔心美國在開始侵略了。

在太平洋上，老羅斯福的態度也收到了淆雜的結果。日美關係已爲衆人焦慮之點。總統干涉了舊金山市與日本人的一項糾紛，因爲這裏的學校歧視日本人民。他盡了最大的努力總算使日本人的氣

平了，同時，還獲得了一項君子協定，禁止日本勞工的入口，引使舊金山地方當局採用更政治性的方法。但是又因為他認為應當發出一項警告，他却又派出一支艦隊去週遊世界，這些船艦曾訪問日本口岸，受了盛大的歡迎。這正是他的最出名的習慣語：「說話時平心靜氣，而手裏要拿根大棒子」。

歲月不居，美國不但成爲一個世界強國，而且還成了三四個最強的國家之一，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幾次海牙會議裏，它都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全世界上它對於民主政治的原則及自由貿易的精神都做法德上的聲援。雖然有老羅斯福的偶發的魯莽與塔虎脫總統的金元政策——利用外交方式來促進美國貿易與投資——拉丁美洲對美國的信任終於日漸增多，雖然偶有挫折，它對於英國及其海外各自治領的關係也日趨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在某一方面還是個孤立主義者，但是那種孤立情形却未能阻止它不被迅速的捲在大漩渦裏去，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烏得魯·威爾遜

在許多方面烏得魯·威爾遜都是自傑斐遜以後的美國政治中的最特出的人物。他是一位學者同一位智識份子，不慣於從政生活中的混亂局面，然而他却仍是嚴肅，堅強而創造力豐富。他既是幻學家與理想主義份子，復是林肯以來最澈底的實際主義者與富有正義感的政治領袖。在政治學上及國際問題上他都是個道德主義者，在他的身上，他那製定法典的祖先之精神獲得了再生。他有老式的拘泥於禮節的習慣，復有暴躁的戰鬥意識；他有專攻於原則的熱情，復有維護它的蠻勁。他的演詞裏沒有布利安的那種純樸，也沒有老羅斯福的那種真爽的魄力，但是他却有崇高的動人的詞句與富有詩情的美麗，自林肯以降也沒有人能同他比擬。他是一位政治學者，寫過好幾本關於政府的巨著。他自有其關於如何做總統的成熟見解；以及政黨組織當如何及美國在世界上當佔何等位置的主張，而且他還準備令這些見解及主張實現。國務卿蘭氏說他是，「純正，堅強，心胸高尚，感情冷靜」；而且他還在知識上倔強而易折，在遭遇逆境時，分外暴躁，在他的關係中全沒有個人的情感作用，他吸引人就同一項抽象的原則吸引人一般，而他絕不容許個人的愛憎影響他的政策，也絕不肯饒恕一個不長進的朋友。

威爾遜生活之大部都消磨在學者的研究室裏，做爲政治學教授與普林斯登大學的校長，在一九一〇年時新澤西的民主黨大亨們本打算捧他出來做一種政治商店的裝飾品，而結果他却把全部商店都囊括而去了。在兩年當中他把那些大亨們都逐出了政治的殿堂，把美國政治裏的最骯髒的新澤西區變成了一個模範的自治區域，在那個期間他在政治技術上大有進步，使他在後來運用得非常熟練與巧妙——那種胆量，那種感人的熱誠，那種堅決自認爲政黨領袖的技術，避開政治領袖直接與人民接近的方法，以及迅速而無情的攻擊的戰略。威爾遜在新澤西的特出的成就把他造成了全國景仰的人物，令他得到了似布利安那種人物的支持，令他獲得了總統候選人資格，同時他自己的透明的誠懇與其無比的競選的口才令他戰勝了老羅斯福。

威爾遜的就職演詞就是一個挑戰與諾言的混合體。他說：

「沒有一個人能誤會今日全國企圖使用民主黨的目的。它企圖使用它來解釋一個計劃上及觀點上的變更。有些老舊的環境，我們已經熟悉了的，它們已經潛入到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生活了的，現在已經改變了面貌，令我們在用批判的眼光看着它們的時候，不能不用新穎與覺醒的感覺……而一些新事物呢，當我們正視着它們打算瞭解它們真性的時候，它們却成爲我們所信仰已久與面貌甚熟的我們自己所信任的事物。我們已因重新檢討自己的生活而獲得了新的力量。」

然後就是一套以達成「新自由」爲目的建設性的改革計劃，這一套是既大胆又有全面性。威爾遜說：「我們已經列舉了應該改革的事項」。於事他就舉出「促使政府爲私人利益之輕便工具的關稅制度」，完全適於「集中現金及限制放款」的銀行及貨幣制度，「限制勞力自由及規定勞力機會」

的工業制度，無能及懈怠的農業經濟及純爲私人利益的自然資源的開採制度。在積極方面，他說政府「當爲人民服務」——保護婦孺及老弱的健康及福利。

這些改革工作當以最大努力及最有效方法完成，然而改革的程序却並非是「純屬於科學的無情步驟」。他說：

「全國人民在晚近深感不安，因爲有一種情緒在激動我們；我們知道了什麼是錯誤。理想的幻滅，政府如何被誤用變成了爲惡的工具。我們用以面對這個權益與機會的新世界之感覺，在我們的心絃上震蕩似上帝就高踞在面前一樣，在它的面前正義與慈悲已合而爲一，而裁判人與弟兄們都是一體。我們知道這個工作不僅是政治上的工作，但是這項工作很可以將我們裏外探索，看我們是否充分瞭解我們的時代，與我們人民的需要，我們是否爲他們的真正代言人與辯護者，我們是否真有那純潔的心思與堅定的意志以選擇那一條崇高的途徑」。

實施中的新自由

這些自是崇高的理由，完美的陳述出來，可是這位大學教授，莫名其妙的躍登了總統之位，他能把它們變成法律嗎？他很快的就表明了他是實事求是的。國會方面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開幕那天，威爾遜恢復了一個差不多已經被人忘却了的舊習慣，跑來親自致詞。他說：「關稅制度必需改變。我們一定要廢除任何與特權相似的規定」。這是一件充滿了危險的問題。自南北戰爭以後，從來沒有過真正廢除保護稅制的企圖；克利夫蘭祇取了保護主義者的少許讓步，而聰明的老羅斯福竟

完全避開，不談這個問題。然而阿拉巴馬州的安得梧與田納西州的赫爾却已經把新法案準備好了，在國會的那種習慣的延宕之下，總算很快的便把它通過。可是在提交參議院的時候，反對黨徒擠滿了華盛頓，一般觀察家都預言一八九四年的尷尬局面定將重演了。可是威爾遜突然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來抨擊他們。他說：「這真是國家的一種嚴重問題，一般人民竟無法表示意見……而那許多尊嚴人物竟企圖製造民意以壓迫民衆利益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慾」。這一個攻擊果然收效，在他就職以後六個月時，他終於滿意的簽署了一個改革關稅的法案，忠實的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實現了五十年中第一次真正的改革。

全國人士都坐直了，注意起來：這裏出現了一位說一句算一句的行政首長而且還把他的意見實現了。威爾遜一點不讓他的政黨停頓；甚至在國會還對於關稅議程糾纏不清時，他就提醒着說他在就職之日曾允許改革「那種銀行及貨幣制度，其原則以政府需要隨於五十年前就出售公債，完全爲了集中現金與限制放款」。這個問題與關稅問題一樣，也是裝滿了政治炸藥。全國人民早就深感覺沒有活動性的信用放款及貨幣制度之苦；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知道病症的性質，可是却沒有人設法救治。在老羅斯福任內，曾有過一次治標辦法，准許國家銀行發行緊急貨幣，同時還有過一個貨幣委員會提供了一個極爲複雜的，關於各國貨幣制度的報告書。但是徹底改革銀行制度的辦法却始終沒人注意。銀行家們團結在一起製定了一項法案以便他們永遠控制一切，布利安早就宣稱貨幣問題乃是最大的問題，現在才決定主張政府應該控制信用放款。威爾遜本人對於銀行事業的技術方面所知不多，但是他却曾讀過美國第一銀行及第二銀行的歷史著作，並關於其後來的財政獨立制度的實驗報

告書，所以他便贊成了布利安的意見。他說：「控制權一定要屬於公家，不屬於私人；一定要交給政府，那樣銀行才可以成爲工具，而不是事業及個人投資與計劃的主人」。經過長時間辯論之後才獲通過的聯邦儲備法案便是他努力的結果。它分散了銀行系統，對於落後的南方及西方也供給了銀行的助力，同時它還發行了聯邦儲備券做爲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具有彈性的貨幣。這個聯邦儲備制度的產生恰在千鈞一髮之時；因爲倘若沒有這種制度，美國政府恐怕很難渡過世界大戰的難關。

新政府的第三件立法上的成就乃是關於統制托辣斯方面。奈曼法案對於勞工的管制效力遠大過於管制大工業的聯合組織。而不久以前的調查明白的指出在工業，運輸業及銀行業方面的集中運動都在進展。布利安在民主黨的講台上寫着，「私人的專賣事業是既無法抗拒又無法忍受的」。於是在關稅與銀行的改革法案已獲通過之後，威爾遜便轉身過來打擊這一件惡事。一九一四年的克萊頓反托辣斯法案謹慎的爲了許多不正當的行爲按下了定義，禁止任意貶價以造成專賣，禁止用互任董事的方法結成工業上的大托辣斯，而同時如有任何違犯反托辣斯法案的行爲，當由董事長個人親自負責。同時還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以調查商業上的一切活動，接受一切對於不正當手段的控訴，並禁止「消極抵抗」一類的有害行爲。

農民及工人也沒有被遺忘，一個聯邦農業貸款法案，令農民可以出最低的利息借到他所需要的現金，還有一項倉庫法案，承認以糧食做爲借款的擔保品，對於平民主義者的舊有補助財政計劃給予有力的支持。在克萊頓反托辣斯法案裏有一項特別豁免工人的責任的並禁止使用政府壓力來解決勞工爭端——這一項禁令却未得法院的認可。關於工廠裏禁僱童工的也有兩個法案也通過了國會，却

被法院否決。一九一五年的拉福萊海員法案把一般的海員從多年的專橫待遇之下解放出來，第二年的亞當生法案明確規定了鐵路工人工作八小時的制度。

這樣在三年之中，威爾遜盡其全力通過了自林肯以來的最多的重要法案。他表現了無疑問的領導國會及政黨的行政上的能力。他證明了，在危急的時候，民主制度也可以做迅速而有效的行動。

民主的外交政策

威爾遜的外交政策也同他的內政一樣，與他的前任截然不同，老羅斯福在處理國際事件時很得意的拿着那根「大棒子」，而塔虎脫的却是所謂「金元外交」。這些政策無疑的曾使美國在國際政治上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另一方面美國却失去了拉丁美洲的友誼，而且還不必要的糾纏在許多國際上的外交及商業冒險行為，危及了美國人民的福利。威爾遜就職後第一個正式舉動便是撤銷銀行團向中國放款的許可，因為他「不同意該項放款條件或是責任的糾紛」。在同一星期之內他還表示了心思願意發展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之間的「友誼，並博得它們的信賴」。在不久以後，他復於旅行演講中費了許多詞句來特別指責金元政策的錯誤，然後又提供諾言美國將永遠不再使用武力來取得新的領土。情勢的發展雖然又引使美國干涉了幾個加勒比海上及中美共和國家的政事，可是在威爾遜全部任期內，他却堅決的拒絕利用干涉來侵略它國。

威爾遜政策上的困難很可以從美國對墨西哥的關係上充分的見出來。這一個不幸的國家足有三十年之久呻吟在狄亞茲的暴政之下，他把墨國人民變成了奴隸，將他國家任意出售給外國的礦商及

其它商業組織。在一九一一年時墨西哥的中下級人民發動革命，將狄亞茲逐出，另舉自由主義份子瑪迭洛爲總統。看起來很像是墨西哥的黎明到了，可是在不足兩年之內反革命運動在赫爾塔的領導之下不停的活動，終於推翻了且謀殺了瑪迭洛，外國的石油，鐵路，採礦及地產組織眼看着狄亞茲的時代又將開始了，都格外高興，大部份強國都趕忙的承認新總統的政權。可是威爾遜却不肯。他覺得承認赫爾塔便等於承認謀殺罪，而同時他也絕不肯受美國商人爲了其本身利益的慫恿。預見着他在不久將來的危機裏所採取的態度，他便說：「我們認爲正當的政府必需建築在被統治者的同意之上，而且如果不能以建於法律及公衆良心與贊許之上的秩序做爲基礎則絕無自由可言」。這一種基於道德觀念的承認政策在當時頗受抨擊，事後還被認爲是脫離了正軌與不識時務。德皇就曾說過，「道德倒是很好的，可是利益又怎樣呢？」可是威爾遜當時却見到，一如羅斯福總統在二三十年以後所見的一樣，如果我們默認了不法的行爲與暴力的收穫，其後果會變成多麼嚴重。

威爾遜不祇拒絕承認兩手血污的赫爾塔；他還設法使英國也來支持他的政策——這種支持恰好用巴拿馬方面的讓步取得。然而美墨關係急趨惡化，當赫爾塔在坦比哥逮捕了幾個美國海員時，威爾遜立即派遣陸戰隊在凡拉克羅茲登岸。戰爭已似不可避免，但是威爾遜絕不肯令事態的發展逸出他的控制。他把界線劃得很清楚，墨西哥人民乃是他交友的對象，而墨西哥政府却是他決心打倒的，最後他終於成功使戰爭不能成爲事實，而同時設法使赫爾塔立身於非常不利的環境之下，然後他抓住了這個墨西哥危機，把他的政策更戲劇化了，他以平等國家看待拉丁美洲各共和國，邀請了阿根廷，巴西同智利來共同解決這個糾紛。在它們都擁護了美國的政策之時，赫爾塔便不得不趕快逃

亡，令立憲派的領袖卡蘭柴出來繼任總統。然而困難尚未結束，當墨西哥的匪首非拉侵擾新墨西哥倫布城一帶時，威爾遜立即差遣潘興將軍率領了一支遠征軍去膺懲他，卡蘭柴對於是項行爲頗表不滿，而美國的好事之徒也就立刻主張對墨宣戰，可是和平還是維持了下來，墨西哥終於自己解除了它的威脅。這種「戒備的等待」政策雖被人指爲好事的；可是它却達成了扶助墨西哥及取得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之信任的雙重目的。

兩件別的事上，威爾遜政府還表現了他主張維持和平與尊重條件的不可侵犯性。這時已經做了國務卿的布利安氏早就堅信一切的國際紛爭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因之得有威爾遜的同意之後他便起草與別國談商的「留待」條約。其內容主張一切問題——甚至有關於國家體面的都在內——都可以提交仲裁與互讓精神去解決，同時一切作戰準備工作都要先「留待」一年再事進行。這種條約一共談商了三十起，有二十二起已經生效；德國明白的表示不能接受。在一九一五年時，日本已經在準備大事侵略的途中，它向中國提出了可恥的二十一條，美國立即抗議說這種行爲既違反門戶開放主義又破壞國際公法，布利安寫道，美國方面絕不能承認任何有損於美國利益與中國的領土與政治主權的行爲。

世界大戰及中立

但是對於美國和平的最大威脅還是來自歐洲。在六月二十八日一個塞爾維亞愛國志士開了一槍，其槍聲立刻便響遍全球；在五星期內整個的歐洲都被捲在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裏。美國的反應

是不相信與莫名其妙。當威爾遜總統正式宣佈美國的中立時，他的確代表着全體人民的意見；即使他勸導人民在思想與在行爲上都維持中立時，他也在代表着大部的人民。

然而美國人民在一九一四年時與在一九三九年時一樣都不能漠不關心國際情勢的發展，而無論在心理上抑在政府政策上，中立到頭來還是不可能。美國人民的情緒自始即劃分得很清楚。大部人民都希望英法比方面可以獲勝。美英兩國人民之間有着無數的文化，傳統，一般組織及一般見解相同之處；法國人民對於美國革命援助的熱情及法比人民的抗戰之勇敢也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祇有很少一部份人同情德國，其中大部是德國祖先的美國人，這時響應了「祖國的號召」，同一小部恨英國人的愛爾蘭祖先的美國人。遠在戰事爆發以前，德國在太平洋上，在中國，在加勒比海上的政策，德國軍人的暴行，及德國知識份子及政治家的狂妄早就引起了美國人民的反感，而他們的不宣而戰，蹂躪比利時之舉益使美國人深信德國的罪大惡極。同時他們也知道了德國是主張專制政體，如果德國控制了歐洲，它遲早總要與民主的美國發生衝突。

這兩點——同情英法與恐懼德國勝利所將產生的後果——終於決定了美國政策的路線。經濟方面的顧慮更加强了感情及政治方面的力量。美國人民曾在英法兩國有過大量投資。美國的工業急速的改組以適應英法作戰的需要，供給它們大量的槍炮，彈藥，及其他作戰工具，並獲利甚厚。美國的銀行變成盟方的代辦人，替盟方發行公債，而在替盟方在美國借款。美國的農產，才自戰前的不景氣復甦過來，也發現了英法乃是棉花，小麥及肉類的巨大而有利可圖的市場，而同時對德奧的貿易却縮至最低的限度，英國的封鎖把各中立國的商業也予以有效的控制。

然而促使威爾遜總統及美國人民感到參戰必要的却不是這些經濟問題，而是德國的「恐怖」作戰的政策。他們用了大量潛艇來襲擊商船，而不能拯救海員或乘客的生命。當英船盧西坦尼亞號於一九一五年被擊沉時，共有一千一百餘人喪生，其中美國人民佔一百二十八人，這一件事令全國都爲之驚愕而狂怒。德國允許不再使用這種作戰方法，威爾遜也就力請國人保持和平，但是相信美國應當備戰的人們與決心却日益增加了。同時威爾遜本人也見到了唯一可使美國避免戰爭的方法，祇有使戰爭趕快結束。在一九一六年全年裏他英勇的努力使各作戰國家說明它們的作戰目的，並爲了組織戰後世界的工作開闢道路。

在一九一六年的大選時，威爾遜當選連任，主要的是因爲他「使我們避免參戰」。但是他却沒有諾言，並沒有說他願以任何代價購買和平。在一九一六年初他曾向美國人民發出警告之詞，這些話德國的軍閥聽了，恐怕總難免心驚。他說：

「我知道你們都要我使這個國家避免戰爭。至此爲止我已經做到了這步，而且我保證我的言語，上帝的明鑒，我仍將如此做——如果是可能的話。但是你們還把另一項責任加在我們的肩上。你們曾吩咐我注意不許有任何事迹沾污我們美國的榮譽，而這件事却不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內，這件事要看別國政府的行爲怎樣，而不在美國的行爲不怎樣。所以也許不久就會有一天到來，在那時我會覺得不能使美國的榮譽與和平共存。請不要用那種不可能的相衝突的事來逼迫我吧。」

在一九一七年初德國政府認爲可在六個月內餓死英國人民，而在那時美國還不會生效之後，便宣佈重開無限制的潛艇政策。在幾星期內，有八隻美航被沉至洋底，然後又發現了一項德國企圖使墨

西哥及日本對美國作戰的陰謀，這時全國情緒就一發而不可遏了。到了四月二日，使榮譽與和平並存真的變成了「不可能的與相衝突的」事了，於是威爾遜便出現在國會裏，要求對德宣戰：

「領道這一個偉大而和平的人民去參加戰爭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尤其是去參加在一切戰爭史中最可怕與最殘酷的一次戰爭，似乎文明的生死即決於此日。但是正義却比和平更可寶貴，我們現在當爲我們所珍貴的理想去作戰——爲了民主，爲了人民自己在政府中發言的權利，爲了各弱小國家的權利與自由，爲了令全世界都可以由自由人民的意志所管理以實現所有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還爲了世界的最後解決。爲了這一件巨業，我們可以獻上生命，獻上財產，獻上我們所有的全部；滿心充着得意之情，因爲我們知道美國享受這種殊榮的日子已經到了，美國現在已經可以爲了它所寶貴的快樂與和平的原則來供獻它所有的血液與力量。願上帝祝福它，因爲它祇能這樣做。」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好星期五節那天，美國乃正式參加了戰爭。

戰爭

這時已經參戰了，美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擁護政府的決定以期取得全面的勝利。威爾遜的政策等待全國一致感到參戰的必要再行發動是正確的。不滿的團體此南北之戰時是既少又無力，無論在任何方面，他們都不能擾亂作戰的努力。

威爾遜總統說：「力量，最大的力量，全無疵瑕與限制的力量」，而全國也都急急的實現他這句話。後來沒有一屆政府表現過這許多作戰的智慧與效力，同時也從來沒有過一次美國人民似這次那

樣表現過他們著名的精力，創造力及發明的天才。威爾遜也證實其本人爲一位最偉大的作戰總統，控制着全部作戰機構，維持着國內與國外的戰鬥意志，從來沒有淡忘作戰的最終目標。他又得有幾位助手的極有力的幫助，如作戰部長倍克，財政部長麥加度同戰爭工業生產局主席巴魯區。政府方面不得不採行較任何戰爭期間所有的更有力的手段，而在實施時也能夠表現迅速及精力。政府變成了工業，勞動及農業上的獨裁者。它臨時管理了鐵路及電報。食物的需要激增，農業品的產量增加了四分之一，燃料的需要也增加了，煤產量也增加了五分之二。利用了借債及增稅方法，政府方面增籌了三百六十億美元，其中一百億美元借給盟邦政府，其餘的由美國自己用做作戰經費。尤其重要的乃是政府方面以其全力集中在大西洋的爭奪戰——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及夏天，盟方在處理已經顯然是失敗了。而現在利用了被捕的德國船艦，召徵起來中立國家及私人的船隻，並開始了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之後——一年之中建造新船在三百萬噸以上——盟國終於在大西洋上獲勝了。

徵兵法案通過得很早，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登記入伍的兵士已經超過二千五百萬人，這一個數目足可以表示這個西半球上的民主國家在人力方面是如何的雄厚。可是美國政府是否能夠把這支大軍訓練完畢，武裝起來，及時運輸到法國去阻擋德軍狂潮似的攻勢呢？這乃是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大問題。

第一批美國軍隊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法國登岸——這一批軍隊是匆忙運過去鼓勵士氣的，而不希望有什麼軍事效果的。在七月四日，這一支小軍隊，在巴黎的香榭李舍街上列隊走過，紅白藍三色的紙屑滿天飛揚。懷着洛描寫當日的情景說：

「我聽見了軍樂隊在演奏；它正在奏着前進通過喬治亞州。我不懂得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跑下樓去，光着頭就跑到了里勿立街上。在杜勒立宮的大鐵檻下面有一大羣人在街上疾走，沒有一點秩序，男的、女的、同孩子們都在高度的興奮中跟着我們那細長一排的穿着咔嚓制服的正規軍隊，他們正在輕捷的前進。法國兵士穿着淺藍色的制服也跟着他們一道走，挨得近極了，一盪走一面看，就好像第一次走進馬戲班的孩子一般。我們兵士們的身上撒滿了鮮花——四周的羣衆不住的歡呼，比起彼落的喊着：美國萬歲！」

但是這個祇是一支象徵軍隊；真正的美國陸軍還遠在美國的訓練營裏呢。

此時的需要極為迫切，因為一九一七年的戰局的確日趨惡化了。在十月裏，義大利軍隊在卡坡萊多大敗，盟方必需派軍赴援以阻遏奧軍的攻勢。一個月以後，俄國方面本來就因革命爆發而大為削弱其實力，現在復索性提議求和了。四十個德國生力軍團從俄國及巴爾幹前線急急的抽調到西線上來，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德國方面在人數上已經顯佔優勢，正準備對那削弱疲憊的英法軍隊做最後之一擊。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的第一次大攻勢開始；在不足一星期內，德軍就擊潰了英國的第五軍，俘獲了九萬人同大量的作戰品。在四月裏第二次大攻勢又開始了，海格將軍便發出了他有名的顛諗文告：「我們現在已經是背牆而戰了，我們既相信我們目的的正當，我們每一個人便都要奮戰到底。」六月裏德軍又開始了第三次攻擊，這時德軍在瑪恩河的右岸，盟軍方面推福煦將軍出來做最高統帥，同時英法政府向威爾遜總統說：「現在戰敗的危險已經異常之大，除非美國能趕快派遣軍隊到前線上來，補救盟方在人力上的劣勢。」

與時間競賽的把戲早就開始了。美國政府爲其自身指定超入的工作。海上運輸在各方面都佔着第一優先的位置，巨大的運輸船一艘接着一艘由美國港口中駛出，滿載着穿着咔噠制服的兵士。在三月份時，裝出了八萬人到海外去，四月份，爲十一萬八千人；五月份，幾乎爲二十五萬人。到了十月，美軍在法國戰場上的已有一百七十五萬餘人。

他們到的正是時候。先在曼狄地爾與唐地尼，繼在勃婁森林一帶，他們都表現了他們的能力，德國的最高指揮部本來沒有把美國援軍放在眼裏，現在也不得不承認說「這些美國軍隊已證實其爲勇敢，堅強與善戰的軍隊，傷亡全不能令他們胆怯」。但是大危機還在前面。在七月十四日夜半，德軍發動了他們期待已久的進攻瑪恩河大戰役，打算衝破盟軍的第一線，以直搗五十哩以外的巴黎。他們在各處搶渡瑪恩河，各處都成功了，祇除了一處，他們碰到了新來的美國軍隊，德軍參謀總長萊恩哈特寫道：「就在這瑪恩河上，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了我們精銳部隊所負荷的使命……第七軍團的各部都獲得輝煌的初步成功，祇除了我們右翼上的一點。這裏我們碰到了美國軍隊。祇有在這裏令我們的第七軍……遭遇了嚴重的困難。他們遇見這些新到的美國軍隊的意外頑強而不斷的抵抗。我軍團的其餘部份都已向前進展且有重大收穫，而獨有此一右翼部隊不能與其它方面配合，展至瑪恩河的南岸，以佔據適當陣地，便利戰事之開展。此種挫折便是我方第十步兵師團與美軍鏖戰的結果」。然後他又悻悻的說，「這些美國兵士簡直是殺之不盡」。到了十八日德國的攻勢已經窮竭了，於是福煦便調來美國軍隊去反攻，他們不但反攻了，而且還得了極大成功。潘興將軍寫道：「戰局的發展已無疑的有利盟方」。德國方面其首相赫特林的言語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於事後寫道：「在一九一

八年七月初時，我本已確信……在九月一日以前，我們的敵人就會向我們要求講和……那是在十五日。到了十八日時即使最樂觀的人們也知道什麼全都完了。世界歷史的關鍵竟於三日之內出現了。」

在九月裏開始了聖米契爾的大反攻。潘興將軍說：「我軍進展之速使敵人完全驚惶失措」。雖然傷亡人數達到七千，可是美軍却把德軍的陣地完全肅清，生擒了德軍一萬六千之衆。在第二個月裏百萬以上的美軍領導了繆斯河與阿貢河的總反攻，其結果隨摧毀了興登堡的堅強陣線，令德軍的作戰意志全渙散了。

同時威爾遜也清晰的說明了盟方的作戰目的，其確保勝利的功績也絕不在作戰的兵士以下。從開端時他就設法分裂德國的內部，一再聲稱我們的所以作戰並非是與德國人民爲敵，而是專門在推翻他們的暴虐而獨裁的政府。同時他還說明和平條款裏若不得當地居民同意絕不割劃土地或要求膺懲性的賠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裏，他致書國會時包括了著名的十四條，儼爲公正和平的基礎。這十四條的內容是：用公開的方法決定公開的公約；和平與戰爭期間的海上航行自由；廢除國際間的經濟壁壘；公正調整殖民地的要求；與俄國合作以建樹其國家政策及自決其政治制度；採取民族自決的原則來重劃歐洲各國國界；建設「國際聯合組織」以「互保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

這時德軍已經被擊敗，他們的盟國又瀕於崩潰，而美國生力軍後大量的湧到，德國政府乃認爲祇有立刻求和別無它策可使本土被侵。於是它就向威爾遜籲請，要求他准許以十四條爲議和的根據。當外交方面還在往來折衝之時，德國內部發生了暴動與革命——德國再事抵抗益不可能了。德皇便宣佈退位，逃出柏林，而歐戰也於十一月十一日宣佈結束。

國聯及孤立主義

至此爲止，威爾遜始終是一位手段極爲高明的領袖。但是在戰爭結束時，他却接連着走了幾個錯誤的步驟。他籲請人民選舉一個純民主黨的國會，而他們在不滿於他這種徧祖的態度之餘，令共和黨在參衆兩議院裏都佔了多數席位。他決定去親自參加和會，因而得罪了許多認爲總統不當離開本土的美國人士，而他到了歐洲之後，把他在那裏的地位也降低了。他沒有在他的和會代表團裏邀請一個特出的——甚至於有優秀能力的——共和黨人物。當他在一面犯着這種錯誤，一面厭戰心理，懷疑歐洲各國的動機，幻滅的感覺，及政黨爭鬥又逼及於美國全部。當他出發到法國去時，前任總統老羅斯福，悻悻而酸刻的警告「我們的盟邦與敵人」說，「現在威爾遜先生沒有任何代表美國人民發言的權利……他的十四條及其四項附加條款及其一切言詞，在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足以被認爲是代表美國人民意志的言語了。」

製造條約的人物們——威爾遜，勞合喬治，克利孟梭及奧蘭多，還有一大批較小的政治家——在恨，貪與害怕的空氣中聚會於巴黎——恨敵人，貪求殖民地及賠償，與害怕布爾希維克黨人。結果他們所得的和平不是談判的和平，而是強制的和平。凡爾賽和約把全部戰罪都加在德國身上，褫奪了它的全部殖民地，把它的世界都重予改訂而且還向它索取了鉅額賠款。別的一些條約創造或承認了新的國家多少是與威爾遜的十四條有些相符之處——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波蘭，芬蘭等等。但是威爾遜對於其它的一部份十四條裏原則却不得不放棄；他所以肯於讓步，是因爲他堅決相

信，一切的錯誤均可漸漸在國際聯盟的機構裏得到合理的糾正。

因為雖然在強大反對的壓力之下，威爾遜還能把國聯的組織明訂在條文之內。把世界各國組織在一起本不是一個新穎的意見，許多國家的無數人士都曾協助着廓清這一種主張。但是最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却純粹是威爾遜的創造物。它的作用在「促進國際合作並達成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一切國家均可以請求入會；控制權則在於一由各強國組成的，理事會那上層機構，與一代表全體會員國家的全體大會。國聯的會員國都要自誓「尊敬一切會員國家的領土完整與現行政治獨立，並絕不從事侵略」——著名的第十條——並同意以一切糾紛提交仲裁，並以軍事及經濟封鎖制裁任何不守國聯約章從事戰爭的國家。此外，還規定了裁軍的原則，委任統治地的政府組織，及創設永久國際公正法庭與國際勞工局。

當威爾遜攜帶着凡爾賽和約及國聯盟約回到美國時，他發現反對的情緒已洶湧的漫及全國。許多共和黨的領袖人物——如那位極端酸辛與徧祖的參議員洛奇——都認為這是打倒民主黨及侮辱威爾遜個人的良好機會，對於總統的私人仇恨抓住了一部人。德國祖先的，義大利祖先的及愛爾蘭祖先生的美國人民都找出理由來反對和約。對於某些一些復仇心切的人們，和約對德國是太寬容了；而對於許多自由主義份子則太嚴厲了。有許多保守的美國人則唯恐美國被捲在歐洲的糾紛裏，他們一再的申說，在百餘年中，美國一向是遠離「舊世界」的一切問題的。

可是有許多事實證明大布人民——至少是大部份受有良好教育的人民——都贊成國聯的成立，而在參議院裏，每一次關於和約的投票，贊成的人數也都不少於半數。如果威爾遜肯對於盟約第十條表示

妥協，甚至批准條約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數也許也可以得到。可是他不肯這樣。他向一個參議院的委員會說：「在我看來，第十條乃是全部盟約的主幹。取消了這一條，國聯就會變成一個辯論會。」但是共和黨方面的反對力量絕不肯讓步，威爾遜乃決定向人民做直接籲請，他在過去時常如此做，而他們也時常支持他對抗那批政客，當他在西部做旅行演講時，他的身體毀了，在九月二十五日那天他得了痺麻症，一直到逝世之日都沒有完全痊癒過。他所獻身的偉大目標全幻滅了。在一九二〇年三月裏，美國參議在最後一次投票時拒絕了國聯盟約，把美國在未來許多年裏指定在寡助而不榮譽的孤立主義裏。

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時，共和黨方面以空前的多數票重理國政，他們乃急急地把孤立主義訂做了他們的黨綱之一。威爾遜的健康雖然毀了，而無畏的精神却依舊，他隨於幻滅的心情中退到在野的地位靜觀他所預言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崩潰。他的生活，恰如他所極端喜愛的柏蒂格魯的詩句一樣，

不畏別人的指責

不受諂媚的誘惑

不因失敗而頹唐

同時與他一樣的

他以倔強的勇氣面對生命，

而以基督徒的希望面對死亡。

一直等到比上次大戰規模更大的與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震毀了這世界的一切基礎，人們才知認他所勇敢奮鬥的那些原則的健全性。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和平的問題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乃是歷史中最多事之秋。和平的問題同戰爭的問題一樣緊迫，而且還更難於解決，面對着這新時代裏政治家們的問題真是多得可怕。龐大的軍隊都需要復員，回到他們平時的生活。戰爭所造成的廣泛的破壞，都需要修理。巨額的戰債總要設法歸還，在這裏，世界各國祇有賴債與通貨膨脹兩條路可走，其結果都是一樣惹禍的。戰爭表現了現代科學及技術的幾乎無限的可能發展性；於是現在便要求它們來消滅貧窮與缺乏，提供相當程度的安全，改進公共健康，提高一般的生活水準。戰爭加強了人民的國家思想及好戰心理，使國際關係益增其嚴重性，而殖民地問題也愈趨複雜與微妙。因此一定要設法把國家主義的思想納入正軌，以恢復一般人民對於國際健全關係的信心，並終止對於殖民地及落後民族的壓榨行爲。尤其重要的乃是，在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各國的安全生存都需先有些法律或其它方法的保障。

爲了解決這些巨大問題，這新時代的政治家們可說是無能的。然而這一個情形却是有理可說的，並非故意的推諉。戰爭遺留下來的乃是一片死亡，荒涼，枯竭，仇恨與猜疑，八百五十餘萬兵士戰死在疆場上，二千九百萬人受伤或被俘虜，而後方的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們尚無法統計，舊的國家消

滅了，許多國王與政府倒台了，革命的狂潮席卷了歐洲的大部，那些倖免革命的國家不得不擔憂着它的後果，對於維持現狀的心思遠過於根本解決重擾着人民的各項難題的熱忱，戰敗國人民陷於赤貧境界，仇恨之心愈熾；戰勝者方面也差不多一樣貧窮，而且惴惴不可終日。這時全沒有大政治家的作風，也沒有遠見。

雖然美國避免了大部可怕的戰禍，而它却也一樣的受到了其它勢力的影響。美國與一般歐洲國家一樣，在戰爭結束時也嚐到了幻滅的滋味，隨之就復活了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的思想，同時它也有復員及建設種種實際問題。後來的幾位總統：哈定，柯立芝，及胡佛，在他們的任期內，都以這些問題爲其施政中心。

恢復常態

美國人民最關心的事乃是恢復常態。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厭倦了自由主義與改革，厭倦了國際主義——他們與大部歐洲人民所共有的態度。可是他們在參加這次大戰之後，却變成極爲強大，繁榮而自信。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二十年代的十年裏美國顯然有着兩種不調和的特徵——幻滅與自信，精神及文化上的疲憊與物質上的精力。

在戰後十年的政治方面，忠實的反映全國一致要恢復常態及追求物質利益的趨勢。哈定乃是一位態度和藹，相貌俊挺的俄亥俄州的參議員，他在一九二〇年當選時得了絕大的人民票數，其原因也許是爲了他在各方面都恰好與威爾遜相反。一九二三年他死於任內，當卽由副總統柯立芝繼任，柯立

芝是一位精明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他的慎審及行政效能博有許多人的擁戴，在一九二四年乃當選連任。一九二八年時，他拒絕再任候選人，於是總統職務落在以辦理法比俄境內慈善事業而舉世馳名的胡佛身上。

這些位共和黨人物的第一件大工作乃是將戰時種種恢復到和平時期的基礎上。這個並不僅指海陸軍的復員令他們獲有職業，還指着許多戰時機構的裁併，放鬆政府的管制，將工商業交還給私人去管理。胡佛後來說道：「在戰爭停止後，在我國及在一切其它國家裏的最大問題是政府方面是否繼續徵用與管理許多生產及分配的工具」。原則是很容易決定的；辦法却比較複雜，其結果引起了劇烈的政黨。即使威爾遜都要求撤消政府的干涉，在他當政的最後一年，鐵路事業已經交還給私人。共和黨人的態度自然更積極。新總統哈定說：「我們需要在美國有一個時期令政府少參與事業，而令事業多參與政府」。

於是共和黨人便盡力鼓勵私人事業，完全採取放任主義以進行其復原計劃。然而這種放任主義自是不純粹的。政府監督與管理的制度早已經根深蒂固，無法立即全部剷除，所以雖然反托辣斯法案的執行在一方面鬆弛下來，而政府方面却並未曾退縮到前三年中的那種地位上去，事實上在某幾方面——如在鐵路及農業——政府的管理在二十年代裏反而加強了。

政府自鐵路，商船及電力事業退出之舉，並不即是政府與事業脫離之謂。相反的，從一九二一年到現在，每一屆政府都加強了它們對於大事業的援助，祇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在一九二一—三三年的共和黨執政時期與一九三一年到現在的民主黨當政的新政時期之間的最大差別，乃是前者的所

謂「事業」並不包括勞工與農業，而後者却特重勞工與農業。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三位共和黨總統：哈定，柯立芝與胡佛，自是以其援助大事業的熱心著稱。商業部拚命的在海外開闢市場，它雖然自誇爲「國際貿易上的最可怕的進攻工具」，而却是各符其實的。稅捐方面，尤其是對於大公司的捐稅，都大量的減低，期望因此國內外的貿易都可以大量增加。而其最重要的結果乃是關稅方面却提至空前的高度。

這種高關稅制產生了重要的惡果。在大戰期間美國已經從一負債國家變成了債權國家，但是這種改變的重要性許多人都不瞭解。保護關稅政策本是一個新生國家與工業尚在發育期間的國家之自然政策；對於一個在經濟上已經成熟，正在力求市場之開拓的國家，實是不相宜的政策。麥金萊總統在一九〇一年就已經見到了這點，所以他當即提議廢止保護關稅制度而代以互惠協定的辦法，但是戰爭促進了政治及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國會方面惟恐歐洲及遠東的賤價商品充斥美國市場，乃決定再度採行保護關稅制度。其結果自然有百害而無一利。其第一個惡果便是其它各國都相率的採用保護關稅制，以事抵抗，美國的海外市場乃大爲緊縮，第二點別的國家即不能使其商品在美國銷行，便無法取得貨款，以償付它們拖欠美國的巨額債務。最後，美國不但失去了國際貿易的大部，而且還無法收回借給外國的債款。

世界關係

威爾遜的失敗及國聯公約的被否決，在美國是表示着孤立主義的開始，這種政策由共和黨人開

始，又由民主黨人繼行了許多年，很可以代表該時美國人民的情緒。美國人對於參戰及戰後的和平感到幻滅之後，又對於海外的擴展感到失望，美國就立刻退縮到一種保守與消極的政策裏，與十九世紀中葉英帝國的「小英國」政策差不多。

除了拒絕參加國聯及世界法庭之外，這種新孤立主義的最可注意的現象還有退出遠東及改變對於拉丁美洲的政策。其實在這兩件事上，共和黨人祇是追隨着爲他們先驅的民主黨人。

美國在遠東的擴展係以兩世紀交替時間的佔領菲律賓及宣佈門戶開放政策時開始。這兩項活動的動機是經濟的同時也是人道的。但是遠東的經濟發展可能性頗令人失望，同情在大戰後，人道主義的熱情也完了：軍事形勢的要求尙未顯著，除非對於很少幾個有遠見的學者。所以在大戰期間，美國使漸漸的放棄了門戶開放政策的大部——雖然從未放棄過原則——而日本遂在中國暢所欲言，毫無阻礙。還不祇如此，我們還未能如期建造成功太平洋艦隊，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天天在增強實力而我們却袖手旁觀。菲律賓的情形也有些不同。我們從來沒有把這個羣島看做美國的永久屬地或殖民地，我們管理這裏祇到非人能夠自治時爲止。一九一六年的瓊斯法案特別保證菲律賓的獨立，在一九三四年這項保證已經到了開始實行的階段。這年的泰丁斯及麥克杜夫法案規定了美國勢力逐漸撤退，在十年後使菲律賓完全獨立的詳細辦法，後來日本雖然佔領了該島，可是美國的諾言並無變動，現在美軍與非人正在並肩對日作戰。

對於拉丁美洲，在戰後的二十年裏，美國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菲律賓獨立法案及普拉特修正法案的廢除均於一九三四年通過。門羅主義在原則上的修正是始於威爾遜當政時期。在一九一四年的

A B C會議上，以及在別處，威爾遜企圖把軍方的門羅主義改變為多方的政策，而且他還獲得了相當的成就。共和黨人當政時並未變更這條路線，他們不但繼續予以施行而且還加以擴大。他們同威爾遜一樣對於拉丁美洲拒絕使用「巨棒」辦法。短期佔領了巴拿馬之後，美國立即以賠款交給哥倫比亞政府；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也自尼瓜拉圭的領土上及加勒比海上各國撤退；美墨關係大為改進；國務院方面，在柯立芝任內還正式宣佈門羅主義的對象不是拉丁美洲，而是歐洲，同時絕不含有使美國佔有優秀地勢的意味，在羅斯福總統任內，這種政策還是奉行不輟，普拉特修正法案本主張美國可以有權干涉古巴的政事，現在也自動的予以廢除。後來在幾屆泛美會議裏，還通過了許多條約與公約，指斥侵略戰爭的不合法，規定以仲裁方法解決一切糾紛的程序，主張撤除商業壁壘，同時宣稱「任何國家均無權干涉它國之內政及外交。」

雖然對於國聯是採行着孤立政策，而美國在事實上却無法與世界情勢遠離。即使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美國政府都領導着解決了國際關係上的一切煩難問題。其中最有野心的工作乃是由哈定總統在一九二一年召集的華盛頓會議，由其國務卿許士擔任主席。這個會議的目的係在促成列強海軍的裁減，及解決一部最麻煩的遠東問題。其結果決定了英美日三國的五五三海軍比數，某幾型艦艇的廢除，以及主力艦的十年停造協定。別的規定提供了保障中國的完整，太平洋上現狀的維持，以及太平洋上各地的建設及武裝工程的休建。但是不幸，英美忠實的遵行了這些條款，而日本却不會。所以會議的結果雖然似使和平的希望增強，而實際上却削弱了英美兩大民主國家，而增強了日本的力量。

哈定的繼任人，柯立芝總統促使六十二個國家簽署了巴黎公約，規定戰爭是國家政策中的不合法的工。關於賠款的楊格計劃及道威斯計劃都淵源於此，而胡佛總統也似乎領導了主張停付戰債的運動。所有的共和黨總統都力促美國參加世界法庭，而在每一次決議時，參議院裏主張參加的都佔有多數；祇因為三分之二的規定才使那議案無法通過。他們也都表示願與國聯的某一部份工作合作；在許多次大會裏，美國也都派有正式的代表參加，同時美國代表還參加了李頓調查團，在一九三二年指責過日本的侵略行爲。

戰後期間的社會情形

柯立芝總統說：「美國的事就是做生意」，這一句話正是美國社會在二十年代裏的恰當描寫。那乃是個物質主義與效能主義的時代，美國與別國一樣，一般人所最羨慕的，乃是：工程師，股票經紀人，掮客，電影明星。全國人口在十年裏增加了一千七百萬，財富的增加也與之相襯。雖然財富的分配並不平均，可是還沒有捉襟見肘的情形，而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也達到空前高度。人們都在大言新時代的來臨，每餐飯都有鷄，每家車房裏都有兩輛汽車，實際情形真也差不多。城市更大了，大廈更高了，公路更長了，財產更多了，汽車更快了，大學更大了，大事業的勢力也更爲加強，向上飛揚不止的統計綫令美國人都有着滿意之感。

在知識上與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這個時期乃是個妥協及保守的時期。雖如此，美國人却從未曾減低他們對於民主及自由的信念；他們反而認爲惟因其有民主與自由所以才有繁榮與安定。誠然當時

曾有激越的行爲，但是它們全都受到指責，雖有不公正之舉，而其犧牲者却無不挺身而起爲其自身辯護。自由主義的刊物，如民族及新共和不但暢銷，而且還極有勢力；宣傳反抗福音的詩人及小說家也廣受歡迎，報紙是自由的，不受箝制的；學院及大學依然是自由思想與自由研究的中心。在那些年裏，法院方面也強硬不屈的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那不僅是哈定與柯立芝的時代，也是小說家V辛克萊及海明威的時代，詩人羅賓生，魏立及朱萊的時代，編輯人哥布及李普曼的時代，與司法官布蘭台斯及荷爾摩斯的時代。

在這一時期裏最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乃是城市的增長與技術工業的改進。在一九三〇年時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居住於城市，而其中大部復居於大城市裏，城市是工商業，政府，娛樂，教育，文學及藝術的中心。城市的生活方式及觀念也侵入了鄉鎮。在電影，無線電，汽車，各大報紙的文章，全國性的廣告，及許多其它勢力的影響之下，地方色彩全被標準化的特點掩沒。即使在笑話方面，本來最容易表現地方特徵的，現在也失去了邊區地方的粗獷性，全變成了如紐約客所載的那種細膩的故事與漫畫。

在促成標準化的因素中，最有力的自是汽車，電影及無線電。它們的確是這一代人的生活中的最有力的新因素。在這三者之中，汽車的歷史最長，在某方面，也最重要。亨利·福特在九十年代中葉就製造了一種輕型汽車，可是一直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裏，福特廠的T型汽車及其它廉價汽車才成千的湧現在公路上。

在一九二〇年美國人使用的汽車約有九百萬輛；十年以後已達二千七百萬輛，這些汽車打破了孤

立主義，增加了生活速率，發現了許多消遣閑暇的新方法，令青年們獲得了自由，創造了許多大而新的工業，令幾百萬人獲得了工作，刺激了全國滿佈的公路網建築計劃，與鐵路發生了嚴厲的競爭，而且還在每年中造成了與南北戰爭一樣多的生命與肢體上的喪失。在幾年之中，汽車已不再是奢侈品而變成了必需品，也許是唯一的必需品。在經濟大恐慌發生時，一般人都最後才放棄汽車，而二次大戰時的車胎及汽油配售制，也令美國人爲之叫苦不迭。

電影與無線電雖比較新近，却與汽車一般重要。電影事業創始於本世紀初年，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它還不曾變成一種大事業，在一九二七年有聲片出現以前，它的影響也還是有限的。可是在二十年代結束時，每週去看電影的人已達八千萬至一億之數——其中有許多都是兒童。這個新年代的人物從電影裏得到他們大部的人生觀，有時是浪漫的但是大部都是錯誤的。對於許多人，電影都是逃避醜惡的現實及以永遠不會實現的美景自欺的工具，在電影裏永遠是惡必罰，善必賞；女人永遠是美的，男人永遠是英俊而矯捷的；富有的就快樂，貧窮的也滿足；所有的故事都有快樂的結局。直接與間接的，電影勢力影響之大簡直無法估計。它們播傳着流行的歌曲，教着禮貌，估量道德，而且創造着民間的男女英雄人物。因爲在全世界放映之故，電影乃是美國最大的勢力工具。在英倫三島，在蘇聯，在馬來亞半島，在阿根廷，在世界各處，它們都不斷的介紹着美國的不甚真實的生活。

無線電也是一樣有力的消遣，教育與標準化的工具，無線電在第一次歐戰時進步得很快，第一個商業廣播電台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在不足十年時間裏，幾乎每一個美國家庭都可以聽取各種娛樂節

目，新聞報告及音樂了。無線電與電影一樣也是一種大事業，同時也是爲了大量銷費，所以它的節目必需合於大眾的需要；仔細分析無線電的廣播節目也許比任何其它研究更可以瞭解羣衆心理。除了消遣之外，無線電還有兩項活動。一項是教育工作，雖然並不多——另一項是新聞及政治上的競選運動。值得注意的事，乃是無線電迄今還是藉廣告費收入來維持的私人事業，各廣告商付出費用來購買廣播時間及其節目以推銷他們的商品，這種私人經營無線電制度是與羣衆有利還是有害，迄今尙沒有一致的見解，但是一般人似乎都滿意現行的辦法。

經濟大恐慌

胡佛總統就職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當時的情形似乎自塔虎脫以來就沒有過那樣令人滿意。在各方面看來，全國似乎從沒有過那樣繁榮，社會從沒有過那樣健全。股票行市高得眩人，在每一個月裏都有數億之數的債券由投資的人們搶着買進，以期分享那人工造成的繁榮。工廠裏製造的汽車，電氣冰箱，無線電，真空掃塵器，及石油爐，都呈着供不應求的現象；鐵路上都是貨運累累，裝貨卡車在滿佈全國的公路網上飛馳個不停；成千上萬的新住宅；怪誕的殖民地式的，都德式的，歌德式的，西班牙式的或是現代式的都湧現在南部與西部的新興工業城市的四郊。胡佛誇口說：「我們在美國的人們比任何國人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裏都接近沒有貧窮的樂土了。」

然而即使在二十年代的繁榮表面上，都已經現出了裂痕。農民與工人都不能充分享受「新時代」的富裕，在戰爭時期裏，農民們已經擴展過度了；後面接踵而來的——似在南北戰爭時一樣——乃

是急驟的收縮。在一九二一年已經發生了一度農產品的跌價現象；到了二十年代中葉，農產品的價格又開始逐漸下跌，一直到「新法」生效之後，才行上升。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二年，農業收入從一百五十五億美元減至五十五億美元。其結果產生了大批的佃農及抵押行爲。到一九三二年時全國耕地百分之四十以上都由佃農耕種。

勞工的情形稍微好些，可是繁榮也不是無疵的。煤礦及紡織工業並未曾享有普遍的繁榮，技術上的進步令許多設備較舊的工廠難於競爭，造成了短期的失業現象。在二十年代的全部裏，失業問題時時威脅些社會。一九二一年時失業的人數約爲四百萬，其後始終未曾跌至一百五十萬人以下。許多財富都被百分之十的上層份子所吸收；例如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工資的指數祇從百分之百增爲百分之一百十，而投機利益的指數則自百分之百躍爲百分之四百十。

崩潰之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該月二十一日發生了第一次的股票慘跌，到二十四日那天，有一千二百餘萬股換了主人；到二十九日全盤都崩潰了。在月底時股票所有人在紙面上共損失了一百五十億美元；到了年底時，各種有價證券竟跌了四百億美元之鉅。無數的投資人都把他們的畢生積蓄付之東流。商店關門；工廠停工；銀行倒閉；幾百萬人失了業，在街頭流浪。成千上萬的家庭失去了住屋；收稅的情形也淒慘得令許多市鎮都無法使學校如期開學；全部的建設工程都停止了；國際貿易本來就受打擊不輕了，至此更跌至空前未有的低度。

這種大恐慌及繼之而來的長期不景氣，究竟是爲了些什麼緣故？雖然說它是因爲政府未曾干涉私人企業的過剩生產是正確的，而說不景氣祇是商業循環上的一種正常現象，却是既無意義又不能使

人滿意的。在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中有幾種因素顯然是造成最後崩潰的緣故，第一點是全國的生產力已遠超過消費力。同時大部的收入都落在極少數的人們手裏，他們立刻又把它變成了生產資本，而沒有落在工人，農民及薪水階級的手裏，而他們的購買力却是那全部商業系統的基礎。第二點是政府的關稅及戰債政策嚴重的阻害了美國商品在海外銷售的範圍，所以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全世界的景氣中，那個市場也陷於崩潰。第三點是容易的信用放款政策造成了信用放款的驟增，分期付款的辦法也大為盛行，還有無限制的投機，公債及私債達到了一千億至一千五百億美元之數，投機事業把股票及資產的價格抬高至遠超過其真正價值之上，最後，不斷的農業不景氣及工業上的失業問題，還有不停的財產集中的趨勢都造成了不健康的國家經濟。

無論怎樣解釋，人們不久都知道全國已陷於歷史上最惡劣的大恐慌裏。一八三七年的大恐慌繼續了三四年；一八七五年的繼續了五年；一八九三年的可怕的不景氣，到一八九七年春也宣告結束；而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二一年的恐慌都是一瞬即過的。可是一九二九年的却足足延續了十年之久。它是時間之長，社會上的貧困及痛苦之深都是史無前例的。在別方面，它也與前此的恐慌不同；這次顯然是過裕造成的恐慌，而不是缺乏的恐慌。它比一切其它恐慌都更顯著的指出現行財富與商品分配制度的破產。

這次恐慌既不是由於自然原因，而由於人造原因，所以就益感政府當積極行動的必要。可是此時却沒有實現的希望，胡佛並沒有排斥政府行動的意思，可是他却認為救濟工作乃是私人慈善組織及地方政府的責任，他說：「從國家觀點上看來，我們應當設法減免那些真正感到困難的人民之飢

寒」，可是他却堅決地拒絕對於失業的人們施行直接的救濟，他從最初期間就採用了限制恐慌至最小範圍的辦法，在他失敗之後，他又採用了一種理論說：「繁榮即在轉灣處」。在英國及其各自治領——還有許多別的感到類似困難的國家——都是大規模的施行直接救濟，堅決控制銀行業務，管理貨幣及信用放款，徵收巨額所得稅；津貼農業，並限制耕物，實施廣泛的公共事業工程及清除貧民窟，並且採行目光遠大的經濟計劃時，胡佛政府却祇肯從事有限的補救信用放款及津貼鐵路，銀行，及大事業的幾種辦法。

到一九三二年，失業的人數已達一千二百萬；五千家銀行關了門；商店關門的已達三萬二千家以上；農產品的價格跌至空前未有的低度；國家收入從一九二九年的八百億美元跌至四百億美元。全國的經濟組織似乎都在土崩瓦解，人民的情形也就慘不忍言了。

美國人是不慣於使用暴力或革命的，所以在這種危機裏，他們便希望着換一個領袖。由參議員諾里斯及拉福萊特領導的一羣進步的共和黨員都抨擊着胡佛的政策，可是他們的力量却不能奪過來黨內的領導權。在一九三〇年民主黨在國會裏佔勝，到一九三二年時，他們乃準備奪取下屆總統的職位，共和黨人重提胡佛為候選人，而他也還是籲請人民用「倔強的個人主義」以解決全國的危機。民主黨方面提出了法蘭克林·羅斯福，他不是紐約州州長，在州長任內他曾表現其自己為一富有創造力，勇敢而人道的領袖，他現在答應給人民一種「新政」。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獲得七百萬票的多數，勝利的走進了白宮。

羅斯福及其新政

羅斯福在他担任紐約州長任內已經取得了有能力及有社會觀念的令譽，但是在這一切的背后，他實在還有過長時期的政治學徒的經驗。他出身於富有的名族，畢業於克羅頓中學及哈佛大學，很早就打算步他的共和黨親戚老羅斯福的後塵，準備踏入政治圈裏。他早年的行事中表現了兩個特點都影響着他後來的事業：一個是精心於進步的原則，另一個是引起各種人民信任他的天才。他曾經參加過紐約州的代表大會，在威爾遜當政時期擔任過海軍次長，在一九二〇年做過副總統的候選人。然後在他的事業正待輝煌發展時，他突然患了「小兒瘧麻症」。他漸漸的掙扎着才恢復了他的健康，在那幾年遠離政治活動的養病時期裏，他仔細研究美國政治史，而且利用通信或當面晤談的方式結交了許多後來協助他的人物。在一九二八年他以絕大多數當選紐約州長，兩年之後以更多的票數當選連任。有這種背景及經驗，羅斯福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全國所有的最有見識的民主黨領袖。

這位新總統除了經驗及知識之外，還有一些別的優點。他與布利安一樣的從本能裏信仰一般人民，同威爾遜一樣深刻的理解民主。在政治上他是精明的，懂得領袖的藝術，而且還有使用適當語言以說明其意見的才能，同時也許是美國的第一位無線電廣播家。在手段他雖然有時投機，在目的上他却永遠不移；對於不重要的事他時肯妥協，而對於重要的却從不讓步；他知道政治既是藝術又是科學；他從沒有自欺過社會，可以用計劃來改造，政府的事可以變得同科學研究差不多。他是深研美國過去的學者，又充分瞭解他所生存的世界，而且時時準備計劃世界的未來。他信任政治人

才，但是也信任專家；對於人民意見很是敏感，可是既不躊躇使其改變，又不畏懼向它挑戰。他有極廣的興趣，不知疲倦的精力，與一種富有魄力的愉快精神；最初使他近身的人最後令全體人民都跟着他愉快起來。

對於許多同時人，新政都像革命。事實上它却與傑斐遜主義及威爾遜的民主思想一樣的保守。它一方面抵抗左傾的暴力，另一方面又抵抗右傾的盲目，它處處保護着美國民主制度的主旨——在憲法之下的利益均衡，人與資財的安全，及自由。

在哲學上新政是民主的，在手段上却是革命的。因為在十五年中立法上的改革都被阻塞着，現在它們決堤而出的情形頗像是暴力，可是在水勢稍退之後，人們立即知道那些溝渠還是舊道。新政的保守政策可說是始自老羅斯福；鐵路及托辣斯的管理可以溯源至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銀行及貨幣的改良早就由布利安提倡過，在威爾遜手裏且有過相當成就；農業救濟的計劃大部份取自人民運動者；勞工管理法大部取效於威斯康星州及奧勒岡州的制度。在國際關係方面，新政的政策都顯然是承繼着傳統政策上的加強國家安全，維持海上自由，支持法律與和平，擁護西半球上的民主。

實施中的新政

當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宣誓就職時，大恐慌的情形已經發展到最嚴重的階段，全國的經濟制度即將全部崩潰，羅斯福以驚人的胆量及精力來對付這種危機，在他第一任尚未屆滿之時，他已經強制着通過了前所未見的各方面的法案。羅斯福政府送給美國的新法案一部份是復興與救濟方

法，另一部是改革計劃；有許多自是兼顧這兩項目的的，人們永遠不易於決定復興與改革究在哪裏分野。在救濟工作方面，政府利用着聯邦公債——不久就收齊了幾十億美元——來補助各種專業。它推行了一種廣泛而寬大的方案，建造公共工程並貸款及房屋，公路，橋樑及地方改建工程，以刺激商業並減少失業人數。它製定了一種多方面的救濟失業方案，到一九四〇年時已經在直接救濟方面使用了一百六十億美元之數，此外還在各種公共工程上花費了七十億美元。它還創使了大規模的保養自然資源的計劃，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人民保養團，使三百萬青年獲得了工作。它還協助了鐵路，鞏固了許多設備的基礎，資助了許多逾期已久的改進工作。它恢復了煤礦及採油事業的秩序及安定。利用聯邦獎勵作者，戲院，音樂會及公共建築之裝飾計劃，它還補助了無數貧苦的作家，藝術家，及音樂家，使全國文化生活大為豐富。許多遠大的有關於農業及工業方案也都包括救濟的意義在內。

在永久性的改革方面，要以有關於銀行，水力，農田，勞工，社會安全及政治立法的為主。新政把銀行關閉了，然後令它們在較嚴格的監督及政府保障存款制度之下重開。它放棄了金本位，把美元貶值以便造成溫和而能控制的通貨膨脹以提高商品的價值。它規定慎重管理股票，債券及其它有價證券的交易辦法，並且擊破幾家大公司掌握全國的電氣事業，祇為少數人牟利的壁壘，它製定了商業上公平交易的法則，永遠滅絕浪費的競爭。它增加了富有階級及大事業的所得稅，填補了收稅法上的漏洞，並且澄清了多年的各州及聯邦間的關於捐稅的混亂局面。也許其次要的便是田納西河水利事業局的成立，利用國有的水電大閘並利用了一個偉大的經濟及農業復興計劃，發展着國內最

大的富源之一；這一項高度成功的事業實現之後，還在極西部開辦了幾處規模較小的水電工程。

在農業方面，其目的在恢復戰前的農產品價格，減少農產品的數量以避免剩餘，鼓勵土壤保養，令農民易於取得信用貸款，救濟佃農及半佃農，並且在國內及國外為農產品開闢新市場。這些目的都大部完成。一九三三年通過了農業調整法案，鼓勵農民領取政府津貼以自動減少某數種作物的產量。三年以後，最高法院將這項法案駁回，可是國會立即又通過了第二個更好的農業救濟法案。這項法案中規定如果農民們肯以其一部土地專種保養土壤的作物，則政府可以給與現金上的津貼。到一九四〇年時，全國已有六百萬農民參加了是項工作，他們平均每人得到政府百餘美元的津貼。這項新法案還規定着對於剩餘糧食及儲存設備的商品貸款以確保「永遠正常的穀倉」。而且還辦理了小麥保險。這許多辦法再加上美元的貶值與新市場的開闢，乃大事提高農產品的價值，以致在一九三九年時農業收入已為一九三二年的兩倍。農田信用放款局令農民們出最低的利息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農田安全局則以資助佃農購田及扶助半佃農復興為其主要任務。

在勞工方面，新政通過了，一大批劃時代的法案。一九三三年的國家復興法案以拓展工作，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禁止童工及保障集體議價的權利為目的。一九三五年，又被最高法院駁回，可是其基本的勞工條款却在兩項基本法律中得到改進：一九三五年的華納法案及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勞工標準法案。前者保障工人成立及通過其所選擇的工會來議價的權利，禁止資本侵害工會的任何會員，並且成立一勞工關係局以補充該項法案的執行。這一項法案曾引起劇烈的反對，可是它却令工人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公平待遇。在它的認可之下，舊的工會組織乃獲得了新生命，同時在工業

組織大會裏又產生了一個新的有力的新組織。這個新組織復活了舊工業武士團的工會主義，而且還把工會一向無法侵入的鋼鐵業，紡織業，汽車業及許多其它工業都組織起來。到一九四〇年時，這新舊兩個工會每一個都誇稱有五百萬會員了。公平勞工標準法案的目的是在規定「最高工作時間與最低工資待遇」。它規定每週四十小時是正常的時數，而每小時四角美元乃是最低的工資，同時它還規定僱用童工是違法之舉。

另一項有基本重要性的法案乃是保障工人，老邁及殘廢之安全的規定。在該時以前，這些事都是各州的工作。有幾州已經頒佈過有效的失業保險法及老年俸金方案，可是顯然的各州單獨的却無力妥善處理這種問題，因為它乃是全國性的。在一九三五年裏，國會方面乃通過一批社會安全法案，規定老年年俸，失業保險，對於盲者，無力自給的母親及殘廢兒童的恩給金，以及改善公共衛生的方法。這些計劃的資金一部來自資方，一部來自勞方；由各州執行而由聯邦政府監督。雖然在最初階段遭人反對，而不久這些社會安全計劃便得到普遍的擁護，在其後數年間，其條款益為寬大，而工作的範圍也益得擴展。

最後，羅斯福政府在行政方面也開始了重要而影響遠大的改革工作。政府中的各行政部門在多年來都是亂糟糟的一團，既浪費又無能，現在也重新改組，予以改進。海齊法案，也許是自一八八三年原案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規定了禁止政府人員的「蓄意不善的政治活動」，並且根除了政黨的貪污及浪費。在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總統痛感最高法院屢次駁回新政法案之空前事例，乃提出建議，要求改革法院。其辦法是要求年紀過老的法官的退休，向最高法院裏注射些新血

液；其目的是打算勸使法院方面恢復其傳統信仰，認憲法爲具有伸縮性的政府工具，而不是政府的障礙。羅斯福的提議又被駁回，可是他的目的却終得實現。在其後數年間，有七位法官或因年邁退休或因疾病死亡，總統乃得委任年紀較輕的新法官。這一個新法院對於新政較多同情，乃修正了其本身一部早期的決定。

戰爭的暗影

羅斯福的內政在實施時，同威爾遜一樣，時時被擾於國際事件的喧囂，在他的第二任尙未屆滿時，他已經清楚的見到國際問題的注意必將佔內政的上風了。威爾遜所亟希望實現的集體安全制度，自二十年代一直繼續到三十年代裏，都在日趨崩解。對於這種情形，美國一定要負相當責任。它所採行的孤立主義令國際聯盟失去了世界列強中最有力與最獨立的國家之道德與實際上的支援；美國的關稅政策促成了世界經濟大崩潰；自遠東撤退之舉召致了日本的不停的侵略行爲；而且鼓勵裁軍更使各民主國家裏主張顧及實情在海陸軍方面當有所準備的人士，爲之沮喪。

二次大戰爆發之源可說是根植在二十年代裏。日本覺得國聯已經緊閉了擴展之門，而且痛恨英美在遠東的力量。義大利不滿於它參加盟國所得到的酬勞，而它的驕橫的新領袖墨索里尼如飢似渴的想望着光榮。德國自因戰敗而志切復仇，同時在凡爾賽條件拘束之下自覺一日不能安枕。經濟恐慌，人口增加的壓力，社會的動亂及道德低落，都幫助着促使不滿於和平調整之迂緩的新領袖人物的出現，同時也鼓勵了向舊理論挑戰的新哲學的誕生。日本不需要什麼新哲學；它祇需要新武器就

夠了。義大利接受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在經過十年混亂之後，出現了一個半瘋的一次大戰的奧藉退伍軍人希特勒，他組織了一個國社黨，把政府搶在手裏。在三十年代初時，這三個國家都已經變成獨裁國家，都準備不但推翻凡爾賽及其以後諸條約而且還要推翻國際公法及秩序的全部組織。

自此以後，事態的發展快得逼人。每一個獨裁國家都輪流着實行侵略。每一個都建設起來它的作戰機構，威脅它較弱的鄰國，發動帝國主義性的冒險事業。這些冒險事業的大部都找到了很好的理由，而且其實現的方法也極爲巧妙，其結果大爲增高侵略國的地位，也並未引起各民主國家的劇烈的反對。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侵入滿州，製造了「滿洲國」的傀儡政府，從那裏它北面威脅蘇聯，南向威脅中國，義大利在多德堪尼羣島一鞏固了其地位之後，一面進攬阜姆，另一面擴大其利比亞版圖，然後又對阿比西尼亞宣戰以復活其羅馬帝國的美夢。在一九三五——三六年間把那落後而極有價值的王國強行包括在它的控制之下。德國廢棄了凡爾賽條約，重佔萊茵河區，大胆的開始大規模的重整軍備計劃。國聯抗議着，外交家惋惜着，民主領袖們指責着，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或一羣國家對這種獨裁式的野心施以有效的制止。

大部份美國人都以冷淡的心情靜觀着這些發展，當然的這種冷淡上是染有不滿的色彩。他們認爲這些發展乃是古老的帝國主義的爭奪之另一階段。他們同英國人與法國人一樣都還不大瞭解這些新出現的力量的革命性。他們不知道今日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比他們在近代歷史裏所遇到的任何勢力都要更爲危險，更爲可怕，他們反而深自慶幸，能夠遠離那不幸的漩渦，過着自足，富有而強大的生活，受着兩大海洋的屏障。

那時一般美國人民真是不容易瞭解危懸在他們頭上及全世界人民頭上的危機的真性。在過去美國曾受過軍事威脅，而於最後獲得勝利。這次却是一種新的事物，新而不可瞭解的，美國人是隨便的民族，從未知失敗與頹喪的滋味；如大哲學家珊大亞拿所說，美國人的心裏根本就沒有惡的觀念。他們絕不能相信，現在出現了一種新哲學否認着與打擊着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他們所珍視的制度。

美國與英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乃是個人。人是政府的來源。在社會裏人有着權利與自由；自決其信仰的權利，發言與著書，自行處理其事業，自選其工作，自決其結婚對象，自行養教其子女的自由，不受國家的干涉。不論我們的思想；行政或事業變成如何社會化，始終不變的乃是我們政府與我們經濟制度的終極目的還是在自由社會裏創造與保護一個自由的人。

對於這種哲學，德義日三國所採行的獨裁主義却恰好完全相反，獨裁主義的哲學思想把個人附屬於國家或種族之下。在法西斯蒂或納粹制度之下，個人是比較的不重要的，他的自由，他的權利，他的產業，他的志願與希望，他的社會及家庭關係，全算不了什麼。

這種關於人與國家的關係的極爲不同的看法乃決定了民主制度及法西斯蒂制度的分別價值。民主依從理智，而法西斯主義則依從權力，民主倚賴合作，法西斯主義則倚賴服從；民主信仰教育與真理的最後勝利，法西斯主義則把教育變成宣傳，把真理當做民族的或政黨的目的；民主發揚忍耐的美德，法西斯主義則鼓勵暴躁；民主實行公平相待，法西斯主義則主張欺詐與恐怖。其目的也是完全相反的。民主的目的是造成自由社會裏的自由人與個人的福利及快樂。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則爲國家，政黨或優秀民族的權力，財富與光榮。

在這種獨裁的極權義的主傾向日趨顯明之後，美國人就漸增其戒心；在德義日三國輪流侵略，把較弱的國家逐一加以摧毀之後，這種戒心就變成了憤怒。一九三二——三八年間發生了西班牙內戰，在那裏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軍隊及飛機幫助叛軍顛覆着共和政府，而各民主國家袖手旁觀，不行一事。正當外國軍隊耀武揚威的攻打着馬德里的門時，日本又引起了「中國事件」，這一事件年復一年的發展下去，終於促成了全世界的大戰爭。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強吞了奧地利；大日耳曼帝國已在逐漸組織。其次對象是捷克斯拉夫。在各民主國尚未從奧國被佔的震眩中清醒過來時，希特勒已經又向英美幫着締造的捷克要求割讓蘇台區了。英法的領袖要求把這個問題提交仲裁。在仲裁被拒之後，張伯倫就飛到慕尼黑去把捷克獻給德國的軍閥了。張伯倫在飛返倫敦時說：「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邱吉爾却說：「英國與法國必需在戰爭與恥辱之間選擇其一，它們選中了恥辱。而他們却將得到戰爭。」

美國人對這一切的反應，恐怕未來的世代不會回憶起來而有着光榮之感。他們幻滅於上次大戰的結果，惟恐被捲在新的戰爭裏，復堅決的自信一切關於和戰的決定之權都操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他們便採行了一種不惜任何犧牲以保持和平的政策，他們急急的放棄了他們的父祖們參加了兩次戰爭才取得的一部權利，同時向世界宣稱，不分是非，一切作戰國家都不能得到他們的援助。這種政策都包括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的中立法案裏面，它們禁止美國與任何作戰國家發生商業上或財務上的關係。

羅斯福總統自始即懷疑這些法案的是否高明，他的國務卿赫爾也是如此。於是羅斯福本人便決意

設法令全國人民認識國外情形的真性，同時在道德上與在軍事上把美國武裝起來以應付當時的發展。一九三七年他在芝加哥發表演詞要求在道德上隔離侵略國家。他痛斥日本的侵略中國，與拉丁美洲及加拿大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而且一再向國會說明增加軍費的迫切必要性。他警告獨裁者說：「用恐怖來維持和平比用武力來維持和平並無更高與更持久的價值」，同時他表示既不畏懼恐怖又不肯屈服於武力。當獨裁主義者的政策增其侵略性時，美國人的精神也就愈趨強硬。

戰爭

英國先受辱於慕尼黑，繼又因捷克的橫被摧殘而感到極端的憤怒，這時也在積極的重整軍備，因為現在他們已經清晰的見到綏靖政策已然完全破產了。可是希特勒却不肯待到英美在軍事上與它一般強大的時候。在一九三九年春天與夏天裏，他都不停的威壓着波蘭，要求他割讓但澤與波蘭走廊；在夏季將完時，他突然與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蘇聯，締結了一項協定，這樣他的地位更無可估計的增強。所以在他與波蘭的談判尚在進行時，希特勒便動了手。在九月一日那天，他的軍隊開進波蘭國境，而他的飛機立即廣泛而猛烈的毀滅着波蘭城市。兩天之後，英法兩國爲了信守它們的諾言，便向德國宣戰。

德國在兩個星期裏便擊毀了波蘭。蘇聯爲了決心保護它自己的國境，以便準備那不可避免的戰爭，也自東面開入波蘭，結束了那不幸的國家的命運。其後是一個長時期的膠着狀態，祇有猜疑，恫嚇的心理戰爭，到第二年春天，希特勒已經準備做第二場廝殺，毫無警告的，他的軍隊便開進丹麥，

又進展到了挪威。英國曾急急的赴援那些堅忍的北方人，可是結果慘敗；在一個月另幾天裏，這南國的資源全部都落在德國手裏。在五月十日德國又西進侵入中立的荷蘭與比利時，還有法國。這一國戰役也不過持續了一個多月。其結果，荷蘭淪亡，比軍投降，法國也崩潰了。英國的遠征軍，也祇有在精力與勇敢的奇蹟出現之下，才從敦刻爾克撤過了英吉利海峽。

英國孤立着，可是此時英國已非慕尼黑時代或挪威遠征失敗時代的英國可比。此時的英國乃是深深的記得在一千年中沒有令外族統治過他們的國土的英國。莎士比亞曾誇口說：「令世界的三面都武裝來侵吧，我們也要打他們翻身」，現在這種得意的法螺在邱吉爾身上得到了回音，在這一位偉大的領袖的手裏，此時握着英國的命運與自由的生死之關鍵：

『我們將再度證實我們自己能夠保禦我們的島嶼家鄉，挺過戰爭的驚濤駭浪，比暴政的危脅更爲長生，如果必要就作戰無數年，如果必要就獨力奮戰。……即使巨大的歐洲土地與許多古老而聲威素著的國家都垮了台，或落在德國特務的魔掌裏，或垂死於納粹黨人的一切惡政之下，我們都不會動搖或自承失敗。我們將支持到底，我們將支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要在海上與陸上作戰，我們的信心要日益加強，我們的空軍要日趨強大；我們要守住這海島，不管要我們付出多少代價。我們要同敵人在海岸上拚，在登陸地點決死，在田野同街頭上鏖戰，在山崗上肉搏；我們永遠不投降。即使在將來，可是我絕不相信，這個海島的大部或全部都受到淪亡之慘禍，我們在海外的帝國，由我們的海軍來武裝與保衛，也要作戰到底；一直等到，在上帝的安排之下，那個新世界，用它全部的力量，來拯救與解放這個老世界。』

「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可是那是在什麼時候呢？波蘭受攻之舉在美國引起了自釋奴運動以來所未有的激烈爭辯，不祇在國會裏，即使在每一張報紙上，每一個公共場所，全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激越的爭辯着。羅斯福以最大的力量要求廢止中立法案諸項規定；在長期的辯論之後，他才得到國會的同意，通過了「現款自運」的法案，令各作戰的民主國家得到了美國資源的供應。法國崩潰之後，大部份美國人民才領會到了德國作戰機構的實力，而那年夏秋的英國的廣受空襲才令他們知道，倘使英國垮了，美國將獨力對付歷史上空前可怕的武力威脅。

面對着這種可能的情形，國會方面才通過了天文數字一般的整軍預算；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也成立了一種共保西半球領土的集體安全的協定；美國與加拿大組織了聯合國防局；同時也開始了約及一百萬人的平時徵兵的軍事訓練制度。比這些措置更爲重要的，乃是羅斯福與邱吉爾二人之間的戲劇性的協議，以美國的五十條逾齡的驅逐艦，換得了英國的從紐芬蘭到英屬圭亞那的一大串海軍基地。羅斯福說這是自購買路易西亞那州以來，在美國國防上最重要的一個步驟，而邱吉爾却說：「這使用英語的兩大民主組織，美國及英帝國，爲了它們互相的及一般的利益，不得不將其一部份事務混合在一起」。這真是預言似的說法。

羅斯福該時已經繪定了全國人民要遵行的道路：可是他能使其實現嗎？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美國人民又到了自決其領袖人物的時期，領他們渡過到當前的危險年頭。民主黨方面不顧兩任的傳統，又推了羅斯福出來做候選人，共和黨方面選了一位政治上的生客，印第安納及紐約的威爾基。民主黨及其領袖堅決的以支持英國爲其政策——這種政策也許會引使參戰。共和黨及其新而缺乏經驗的候

選人肯採行相反的政策嗎？威爾基在內政方面拚命攻擊新政，可是堅決的不肯抨擊援助英國的主張。威基的，在這種危急的時候，他是贊助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徵兵制，贊美驅逐艦的交易，而且還提出諾言，如果當選了，他決不逃避總統所規定的與國會所遵循的道路。這真是一項偉大而具有政治家風度的決定，同時證明了在威爾基身上，共和黨獲得了一位有勇氣，智慧與眼光的領袖。

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重行當選，他現在既重得證明人民在堅決的擁護他，他便有力的推進他的政策。當國會於次年一月重開時，他便提出了租借法案，其目的是以克服中立法案的諸多限制為主。這一項建議允許美國將任何國防武器或設備租給或借給任何安全與美國國防有關的國家，經過長期的辯論之後，是項法案終獲通過，於是在它的明見的規定之下，不斷的飛機，坦克，原料，食物及其它物品乃似潮水一般流入英國及其盟邦。這種行為自然是違反中立的，可是現在美國一心以擊敗德國為職志，當然無法斤斤計較於國際公約的規定。其它一樣不中立的行為也跟着來了——捕捉軸心國船隻，凍結軸心國資金，讓渡油船給英國，格陵蘭的佔領，以及稍後冰島的佔領，擴展租借的範圍及於新的盟邦，蘇聯，還有——最後，在美國船隻屢次遭受潛艇擊沉以後——總統所頒佈的對於任何敵人潛艇的「當場射擊」的命令。

同這些實物供給幾乎同其重要的乃是民主國家作戰目的的規定。八月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會晤於中大西洋某處，其結果產生了大西洋憲章，其中所包括的原則，便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個較好的未來世界之希望」的根據。這些原則乃是：不擴展其領土；不得當地人民同時，絕不變更領土；一切人民自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一切國家享受自由貿易及所需原料的權利；國際間的經濟合作；海

上自由；廢除使用武力爲國際關係上的工具。這些正是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穿着更新的與更簡單的衣裳出現了。

看起來美國遲早終將對德作戰的；祇是那時間也許會拖得很久。美國已經有了決心，可是它還沒有決心出之痛快的一戰，同時，遠東的情勢却驟然的緊張起來。日本已經正式的參加了軸心，現在利用着英美在歐洲作戰，無暇旁顧的時機，正在大胆的推行它的「新秩序」——令大日本統治全部遠東以及太平洋的新秩序。試行綏靖政策無效之後，英美便採用了更堅決的態度。可是還是一樣的無效。日本軍閥現在已經握有全部控制權，他們已經嚐過了勝利的滋味，現在自認爲對於更大的勝利也極有把握。在十一月裏，當蘇聯人民正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門前英勇的苦戰時，當英國人正忙於大西洋的決戰時；日本便大規模的向法屬越南增兵，一面在泰國邊境準備空軍基地。到了十二月六日，情形已經極爲危殆，羅斯福乃用了私人名義致電日本天皇，要求與他共同行動以維持和平。看起來，日本天皇恐怕根本就沒有收到這一紙電文。因爲日本此時已決定從事近代史中最冒險的一次賭博了，在十二月七日星期日那天，它以摧毀一切的猛力打擊了美國在夏威夷，關島，威克島及菲律賓一帶的前哨。

八十年以前，民主詩人惠特曼寫道：

「長久了，太長久了美國，

旅行在你祇由歡欣與繁榮中認識的平坦而和平的道路上，

可是現在，現在啊，向苦痛，前進中學習，與最險惡的命運搏鬥，不退縮，現在去孕育，向全世界人昭示吧，你的子女團結在一起時究是何等模樣。」

在惠特曼所寫的那一次偉大的南北戰爭中，美國已經向全世界昭示了它的子女是何等模樣。在當時，他們正如林肯所說，乃是「世界的最後與最大的希望。」現在它又有了一次向全世界昭示的機會，與再一次證明它是自由國家的機緣。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民主制度及理想之安危所繫的歷史空前偉大的決鬥，其危機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十二個月裏達到了頂點。在那一個極端黑暗的年頭裏，沒有一個人敢有把握的說是民主國家還是軸心國家將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次大戰的轉捩點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的最後三個月裏才出現。這時蘇聯人民在史達林格勒發動了壯烈空前的大反攻，把圍攻的德軍全部解決，促成了德國的最後崩潰，亞歷山大將軍麾下的英國軍隊也在開羅門前的艾爾阿拉敏一役中獲勝之後，開始將德義聯軍在北非逐退；而英美兩國的生力軍，在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登岸之後，也開始佔了這一帶土地。這幾步行動，據邱吉爾說，乃是「開始的結束」。在這幾度勝利之後，盟方的前進之勢很少有過中斷，而且即使有挫折，其時間也極短；戰爭的趨向已經無疑的大變了。因為在鐵摩盛科亞歷山大及艾森豪威爾諸人背後，蘇聯的，英國的，尤其是美國的各種工廠都在大量的製造着飛機，坦克，大砲及軍火，令各軸心國的工廠，無論如何也望塵莫及。

可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的那一個暗淡而令人焦灼的年頭裏，德國軍隊一面在歐洲威脅着要佔領史達林格勒與高加索，另一面在非洲逼追着亞歷山大港的防線與蘇彝士運河；而日本人却蠶擁而踏上了菲律賓，馬來亞，緬甸及荷屬東印度，那時候的危險真是間不容髮。盟方各國的每一分力氣都拿了出來堵擋軸心的猛烈攻勢。美國人民自有史以來從沒有團結得這樣緊過，現在他們的自我犧牲及

用力之多令第一次大戰真是顯得微不足道了。

美國在珍珠港的損失慘重得都不敢在當時加以公佈。在全國所有的十五艘主力艦裏，有五艘被炸沉，三艘受了重創；真的，日本人在一擊之下竟使我們主力艦的半數以上失却了活動的能力。另外十艘戰艦，一個水上乾船塢，以及約二百五十架海陸軍機也被擊毀了或重創了；同時停在菲律賓的轟炸機也差不多被全部消滅。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幾天之後，英國的兩艘偉大的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也被日本飛機炸沉在暹羅灣裏。這樣，日本就在太平洋上佔有了壓倒的優勢，它隨即開始迅速而廣泛的活動。他們在陸軍及空軍方面都佔有優勢，就一舉而佔香港，沿馬來半島南下，攻佔了強大的新加坡；席捲了馬尼刺及菲律賓羣島，祇有一小隊美兵及菲人在巴丹半島表現了一度絕望的英勇抗戰；最後還征服了人口稠密而物資豐富的荷屬及英屬東印度。日本把滇緬路也切斷了，把中國孤立起來，同時還佔領了安達曼羣島。在某一個短促的時期裏，印度，澳洲，夏威夷羣島及阿拉斯加都受到威脅。

工業動員

同時，成羣的德國潛艇都把它們的活動中心移到西大西洋及加勒比海上來，令美國沿岸佈滿了破骨殘骸。甚至在密士失必河口及長島岸外都有船隻被魚雷擊沉。在珍珠港事變後十個月裏，據不完全的報告估計聯合國方面共有六百條船隻被擊沉——其中大部都是美英所有。潛艇的威脅漸漸的克服了。獲航制度，飛機，驅逐艦及快速巡邏艇有效的使用之後，已令一九四二年六月損失一百十艘

船隻的紀錄，到十月時減為十一艘。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大部潛艇均已駛離美國沿岸一帶海面。加強潛艇作戰的結果之一乃是巴西因其船隻被擊沉而參戰。另一項結果便是促成美國開始了空前龐大的造船計劃。可是在珍珠港事變後的六個月裏，噸數的損失却極為嚴重，油船的大量損失都有一定度危脅着歐洲的作戰機構，一般的觀察家都擔心着惟怕無法供應英蘇兩國的急需了。

現代戰爭乃是全面戰爭；它要求着國家的全部工業生產力及大部人力的總動員，羅斯福總統在當時所要求的生產目標在平時都會使全國嚇倒：在兩年之內他要求生產十二萬五千架飛機，八萬五千輛坦克，二千五百萬實足噸數的船隻。全國的主要力量全集中在作戰方面。它的全部活動——農業，工業，礦業，商業，勞動，投資，交通，甚至於教育與文化工作——都在某一部或全部被安置在新的或擴大的管理之下。需要徵募的金錢是空前巨大的數目，需要召集與訓練的兵員差不多是第一次大戰時的二倍；原料使用的情形會許多人擔憂我們的石油及鐵礦資源將因此而永不得復原，許多大工業出現了，尤其是鎂工業及人造橡皮的工廠。驚人的新技術也出現了，如船隻及飛機的大久生產。美國極西部因為接近太平洋的關係，在工業方面突飛猛進，驚人的人口流動也發生了，許多美國大城市更為增大與擁擠了。全國人民的生活在上千種方面都變了樣——其中有一部份一定是永久而影響深長的。

在連續的徵兵制度之下，美國的武裝人口在一八四三年底已經達到一千萬，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時已為一千一百一十萬之數。同時全國各地都在盡力的充實工廠，造船廠及其它主要工業的工作及管理人員。在戰爭爆發以前，全國受有薪給的工作人員約為四千七百萬。而在一九四三年底，全

國從事作戰或其它主要工作的男女已有六千五百萬人，政府方面是企圖令它增爲七千萬。在美國全部歷史中，從沒有似此時要求過如此大量的工人，鉅額的聯邦金錢——一九四二—四三年度的總額是一百八十億美元——都用在設立或擴充作戰的工廠裏面。這樣，政府就國有了許多大規模的緊急造船廠，從石油及煤裏每年提煉八十萬噸橡皮的驚人設備，一個大的鎂工業，全國大部的鋁工業，還有無數的較小工廠。在政府的保護之下，美國的全部汽車工業都於事實上改製飛機，飛機零件，坦克，裝甲車及其它作戰工具。機器的生產也大量的增加。在某一時期，戰爭生產方面受着兩種主要缺乏的障礙：缺少高度技術的工程師及工頭，以及缺少精確工具，可是這兩項困難終於一九四三年克服。在戰爭爆發時，鐵路事業還深陷於不景氣的狀態中。但是它們幸而都維持着它們的設備與軌道的良好情形，因此在一九四二年中，它們終能打破了以往的貨運及客貨的紀錄；在一九四三年亦復如此。同時雖然有大批青年入伍，農業機器益發難得，而食物的生產還能夠維持前所未見的水準。在一九四一年它超過了前此一切的商標，在一九四二年亦是如此，一九四三年還是如此。事實上，一九四三年的產量比一九三五—三九年的總合平均量還要高出三分之一；這項成就得部份的歸功於政府的保養土壤的政策。

因爲美國不祇要武裝它自己從事全面戰爭，還要扶助它那些艱苦不堪的盟邦。在這方面，開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時，租借法案的總額已經達到二百十五億美元之鉅，其中約十分之九爲物資，其餘爲人力。輸送到英國去的租借物資在九十億美元以上，另有三十億美元的輸送到了地中海一帶，美蘇間的交通雖然極爲困難，可是蘇聯收到的租借物資還在六十億美元之上。租借法案裏的主要物

品爲食物，飛機，彈藥，坦克，大炮及汽油；如果我們說英國所以能於一九四二年秋天在北非從事反攻，蘇聯所以能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克敵制勝而且不停的追擊，乃是完全由於租借法案之故，也絕不是誇大之辭。此外還有大量的反租借也值得注意，尤其是英國，它從其自身的生產中也供給了蘇聯大量的飛機及其它作戰工具。

在戰爭的貪婪的要求之下，美國工業的某一部份成就就是極可觀的。其中以造船業最爲特出。亨利凱撒及其它工業領袖們設計了一種新的大規模生產的方式來補充傳統的造船技術，他們利用着電焊，及其它新方法的結果，一艘一萬四千噸的貨船建造時間已從數月之久減至數週或甚至數日，第一艘所謂自由輪，一派特立克·亨利號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下水。在兩年當中，下水的貨船已超過二千一百艘，其實足噸數在二千一百萬噸以上，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個月份裏，就有一百〇六艘自由輪參加航運。它們平均的建造日數是四十五天，有一個太平洋岸上的造船廠，在不及三十天內就能造成一艘貨船。一九四三年美國造船的總產量，比一九三九年全世界的商船總噸數還要增加五分之一。

全國的鋼產量差不多已被利用至最高點之後，美國在一九四二年的鋼產量乃達到八千六百萬噸，一九四三年復增爲八千九百萬噸。這個數目差不多已經等於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世界總產量，一些「新金屬」在第二次大戰裏比在第一次大戰裏重要得多了。多謝近年來造成的幾個大水電發電水閘，鋁的生產在一九四三年竟超過了一百萬噸，而鎂的產量（每比鋁更輕三分之一）則超過了十六萬五千噸。全國對於人造橡皮的製造也極感興趣，日本的勝利幾乎把美國的橡皮來源全部褫奪了，而橡

皮的儲量也異常之低。可是這些新工廠的成就却遠超過了一般人的期望。到一九四四年中時，美國及加拿大的橡皮產已爲長年生產八十萬噸——超出了從前平時的入口額。

可是最重要的却是飛機製造業，美國工業對於戰爭勝利的最大供獻，大概即是各種飛機的生產，羅斯福總統要求在最後每月生產飛機一萬架，在最初的建造工廠，改裝工廠，補充工具，修整工具的階段渡過之後，產量乃費力而急速的激增。幾種高度有效的戰鬥機都出現了，對於巨型機也給予特別的注意——先是空中堡壘，繼爲超級空中堡壘——以白晝飛行準確轟炸爲其特長。一九四二年各型飛機的產量是四萬九千架；一九四三年是八萬六千架；一九四四竟達到九萬六千架。這個數目，再加上英國的大產量，已足以使聯合國在西歐及太平洋上握有制空權，對於武裝蘇聯也有着極大的貢獻。到一九四三年底時，飛機工業共有二百五十萬工人，該年的生產價值共爲二百億美元；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工業部門。從賴特弟兄及基特霍克的創始時期到現在，美國的進步已是如此了！

政府管理

美國人民知道了全國安危及民主政治的存亡都繫於此次大戰之後，他們便同意於承受前所未見的嚴格管理與限制。國會方面連接着通過授權總統以最大的權。限來管理農業、工業、勞動、工資、物價、原料、運輸、及工廠。於是羅斯福總統乃接二連三的頒佈了許多政令，將其權力之一部委託給政府的許多重要行政官吏，戰時政府裏有許多人事上的更動。但是不論其任期久暫，全國人

民終於熟知了許多重要作戰部門裏的十來個人物，他們在其所處的範圍中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其中包括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他專管戰時訂貨及一切的軍火生產；戰時人力局局長麥克納特，專司動員全國男女人力並使其發揮最大力量，物價統制局的前任局長漢德遜及繼任局長包爾斯，負責規定物價及租金的最高限，以及規籌物品分配種種；經濟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管理通貨膨脹與處理因戰爭而發生的脫節現象；伊克斯，兩個有關於生產，儲藏，及石油與硬燃料交易的機構的主持人；國防運輸局局長伊斯特曼，管理戰時的鐵路及航海活動；斯退丁紐斯，租借法案的副主席；戰時情報局局長戴維斯，也利用報紙，無線電，電影及其它方式將正確的戰爭情報傳給美國人民與全世界。雖然難免嚴重的錯誤，這戰時政府在第一年之後已經可以順利的進行。在無數方面，商店，辦公室及家庭的活動都受了政府訓令及政府活動的影響與支配，對於許多人，其生活都全部改頭換面。可是抱怨的人比在第一大戰時少得多。一個原因是危機更爲迫切，另一個原因，是人民已更習於政府的管理。

政府的開支異常之大，工資及薪金的增加極速，而一般銷費物品的製品又被限制得那樣嚴格，有許多美國人都擔心物價會脫韁而逸，無法追蹤。許多人都記得第一次大戰期及其以後的物價驟增；他們還想起了德國人的可怕的經驗，這種人民方面的顧慮引國會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通過了一項緊急物價統制法案，到十月時是項法案的權力又被加強，還包括了工資及農產品的價格，物價管理人漢德遜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屢頒命令，規定了許多商品的最高售價。同時他還採行步驟減低一些製造商及批發商的定價。雖然國會都一般的反對使用津貼的辦法來抑平物價，而該主管當局還是採

用過這種救急辦法。這些處置都不是十分有效，所以在一九四二年裏，批發價格指數及生活程度指數都增加百分之十。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初人們對於通貨惡性膨脹的戒懼就愈形迫切。可是物價統制局方面，雖然面對着一個遲疑不決的國會，却表示貫徹的決心。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它頒佈了「堅持戰綫」的命令；禁止物價再行提高，把工資及薪金也凍結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數字上。除非有糾正待遇不平或補助生活所需之不足外，不得再事調整。農民及工人組織都強烈的反對。可是它誓不讓步，一九四三年的批發指數祇上升了百分之二。

一般說來，勞工方面已爲勝利獻上了其全部力量，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總統立即召集勞資雙方的代表，要他們互相提供諾言在戰爭結束以前，絕不採用罷工或拒用的手段。這種事，自是無全部實現可能的，戰時勞工局立即組織成了，其中有委員十二人，平均代表資方，勞方及人民三方面。不久，增加工資的問題就尖銳化了；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戰時勞工局便交給各較小煉鋼廠家的老闆，一種所謂小鋼決議，其中要求他們把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以配合自一九四一年初至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生活上漲的情形。是項原則後來也應用在其它工人組織上。有許多工會，尤其是工業組織全體大會，在各大規模生產組織裏有許多羣衆的，都抱怨說，這種增加不夠。可是政府雖然對於聯合礦業工人及其它一些組織增加了較多工資，而一般說來，它還是維持着小鋼決議的原則。而許多薪水階級的薪金還沒有加到百分之十五。

在一九四三年初，各工人組織已誇稱共有會員一千二百萬人。美國工人聯合會及工業組織全體大會各自聲稱有會員五百萬人，鐵路同盟及礦工組織的人數也不少。工人組織對於羅斯福政府的影

響始終很強。工人爭持的次數既不多也不算嚴重，可是他們對於戰時生產却有過一些不必要的而令人不安的障礙。有四次，因為聯合礦業工人的罷工，致使全國一時面臨沒有燃料的危機，其最後解決方式都被認為是對於工人讓步太多。在德特里奧，阿克隆及西雅圖三城都發生過許多次戰時生產工業的罷工。國會方面在盛怒之下，不顧羅斯福的否決，在一九四三年夏天通過了司密斯——康納利罷工統制法案，這項法案雖不禁止罷工，却提議採行較嚴厲的手段來減少或根絕罷工的行為。在那年將盡時，全國又將遭遇鐵路總罷工的危機，羅斯福乃毅然決定，命令陸軍部長暫時收管全國的鐵路；工人的要求事後也得到妥協的解決。總觀一切，這作戰期間乃是工會激長及繁榮的時間。

債與稅

雖然一般人都感覺到了捐稅的日日增加；可是若把戰費天文數字告訴他們，他們恐怕卻不會十分注意的。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國家負債共為一千三百六十七億美元，在一九四四年底時，已經超過二千六百億美元（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大部來自於幾次特別戰債募集運動。可是稅額之大都會令三十年前的美國人認為是在發瘋，止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財政年度，徵自人民的直接稅約為二百億美元，徵自公司組織的直接稅約為一百四十億美元，出廠稅五十億美元。這樣捐稅一項便負扣了戰費的三分之一。繳納所得稅的美國人年年增加，到一九四四年時，已達四千萬至五千萬人之數。

美國的鉅大債務自將引使極大的財政及經濟問題乃是一件極顯然的事；因此一般人的結論都認為

如欲解決這些問題，戰後的國家收入必需使其增加，而且還要維持不墜才行。

海軍及陸軍活動

在戰爭初起之時，政府方面便決定了三項基本原則，都取得了全體人民的贊助。其一，爲先致力於歐洲及非洲，然後轉向至太平洋；其二，爲全國的每一分氣力全需要表現出來，與英國，蘇聯及中國使用其全力一樣；其三，軸心國家必需無條件投降。

在珍珠港及新加坡慘遭敗績之後，太平洋上會急忙的組織起來一支美英澳聯軍。海軍力量增強了，空軍力量，本來在日本急急前進期內，微不足道的，現在也出現了。英國在錫蘭島上擊退了日本空軍的進攻，才救下了這一個重要的印度基地。然後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出現了第一次重要的海戰，珊瑚海大戰，就在澳洲的北面。這一次海戰很是特別的，因爲美國艦隊與日本艦隊竟然未曾謀面。全是由航艦上起飛的機羣進行惡鬥，用彈雨轟炸下面的船隻。美國方面受了相當損失，而日本却有二十七艘船隻被擊沉或重創，結果不得不掉首逃逸。這是他們海軍的第一次敗績，可是後來還有許多呢，幾星期後（六月三日——六日）發生了決定性的中途島之戰。在六月三日那天，美國飛機發現了約五十艘運輸船及三十艘戰艦向夏威夷方面東駛。第二天，日本飛機便進攻中途島，可是美國的陸上及航艦機羣却同時出動攻擊那隻龐大艦隊，把日本的四隻航空母艦全數擊沉海底。日本海軍立即逃逸，而美機在尾追中，又擊沉了兩隻重型巡洋艦，三隻驅逐艦，並重創三艘主力艦，日本雖然受了如許損失，它還能在海上維持主動，祇是爲時已無多了。

因爲在十一月裏，美日海軍在瓜達爾康納爾島外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惡戰，其結果，日本完全慘敗。他們損失了一艘「金剛」級的主力艦，兩艘重型巡洋艦，還有差不多二十艘其它船隻，美國方面則祇損失了兩艘輕型巡洋艦，及六艘驅逐艦，此後日本海軍乃蓄意避戰。太平洋上的主動乃無疑的落在美國手裏。多謝華盛頓方面的遠見，在一九三八——四〇年造成了許多的新船身，現在強大的戰艦乃紛紛下水。在珍珠港被擊沉或重創的戰艦也迅速的被修理完竣了，回到海面時比以前還要強大。在一九四三年時美國太平洋艦隊在數目上及在力量上都無疑的超過了日本艦隊。這種新形勢的象徵之一乃是阿留辛羣島一帶的活動，日本人於一九四三年五月被逐出阿圖島，八日後被逐出吉斯卡島。

在一九四三年初，太平洋上的保守戰已逐漸演變爲攻擊戰。麥克阿瑟將軍在逃出菲律賓之後，將其總部設在澳洲；在這裏遂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美澳聯軍。在新幾內亞方面，聯軍先在這裏佔領布納及撒曼達地角，繼又肅清了巴布亞的敵軍；然後便開始轟炸西方的雷區及撒拉茂。在三月裏，日本派遣了一支大護航隊來雷區增援，在畢斯麥海裏被美機攔擊，全軍覆沒。然後，在夏天裏，雷區及撒拉茂相繼爲聯軍攻佔，同時澳軍還佔領了新幾內亞北部的拉姆河谷。一九四三年底聯軍復進攻布肯維爾及新不列顛，以夾擊日軍在拉布爾的重要基地。麥克阿瑟以少擊衆的成就真是不壞，同時在一九四三年底（十一月二十——二十三日）美國海軍也向前進東京的路上，做一次大步的躍進，進攻了塔拉瓦及吉爾貝特羣島中的其它二島，登陸的作戰部隊在塔拉瓦遇到了堅強的工事及兇猛的抵抗，其結果美軍死亡一千之後才能將該島佔領，日本守軍五千則全數陣亡。可是吉爾貝特羣島除了可做

良好的空軍基地外，還有許多別的用處。亞洲大陸上沒有什麼重大發展。祇有蒙巴頓勳爵於一九四二年十日飛抵印度，指揮中美英印四方面的聯軍。

在一九四二年裏，美國的戰艦與飛機都不停的活躍於大西洋戰場上，壓迫着德國的潛艇羣；而美國的軍隊則大量向英國集中。在該年七月四日美國飛行員第一次出動轟炸歐洲的德軍佔領區。在六月裏，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以及大批的英美參謀人員（他們已經成立了聯合組織）會議與華盛頓，議定那討論已久的攻入軸心本土的計劃。在十一月八日出現了該年最重要的軍事行動，大批的英美護航隊滿載着軍隊，在海空軍保護之下，登陸於法屬北非的西岸。雖然岸上的法守軍在親德的維琪政府指示之下曾企圖抵抗，可是盟軍還是在阿爾及利亞，夏蘭，卡薩布蘭加，利奧台港，及許多其它地點立穩了脚跟。盟軍在艾森豪威爾二級上將統率之下經過了一番惡戰之後先將阿爾及利亞加以佔領，然後推進至突尼斯，與自埃及與特里波利西來的亞歷山大將軍部下會師——他們不久便將北非海岸全部佔領。在突尼斯最後會戰時，英國軍隊約佔英美法聯軍的四分之三。一九四三年五月七日聯軍攻陷突尼斯與比塞大港，到五月十二日，最後的一部份德軍投降，不久以後便在阿爾及爾成立了北非法帝國的臨時政府，由戴高樂及季洛特將軍聯合統制。

在一九四三年裏聯合國各大領袖間，連接着舉行了幾次重要會議，都顯然以遠見的結果為其目標。五月時邱吉爾又來華盛頓與羅斯福會晤，八月裏英美於魁北克舉行作戰會議，然後據公報所稱，在「檢討了全世界的一般作戰情形之後，決定了有關於英美海陸空軍各方面前進的必要決策」——九月裏，三國外長——美國的赫爾，英國的艾登，蘇聯的莫洛托夫——會議於莫斯科。他們決定成

立歐洲顧問委員會，總部設於倫敦，以計劃與建議有關於國際大事的共同行動。然後，會同了中國的駐蘇大使，他們復發表了一項四國宣言，說「他們承認在最早可能期間成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的必要，該組織當以愛好和平各國的主權平等為基礎，凡屬該類國家，無分大小，均可參加，以維持國際上的和平與安全」。這乃是威爾遜的國聯理想的適機的復活。美國情願擁護此一組織的決心可見於參議院裏的康納利決議案及衆議院裏的富爾布萊特決議案中的一部分詞句，他們特別提示贊成美國參加一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以保障世界和平。

可是一九四三年最重要的國際會議却舉在該年年尾。在十一月末時，羅斯福，邱吉爾及中國的蔣主席會晤於開羅，其結果，他們一致決議堅決的對日作戰，褫奪它用武力奪來的一切領土，包括滿洲，朝鮮及台灣。然後羅邱兩氏又前往德黑蘭，與史達林會面；參加會議的還有莫洛托夫，艾登及美國國務院的哈利曼。其結果，三大領袖發表一項共同宣言；聲明美英蘇三國在和平與作戰的目的上完全一致，它們決心和諧的合作，並希望有一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機構」。在十二月初時，羅邱兩氏與土耳其的總統伊諾奴又舉行了一次開羅會議，其結果也發表了一項宣言，聲明他們「在對於世界情勢的態度上……完全一致」。這些會議都大為鼓舞相信有秩序的世界社會的人們，令他們認為更有在戰後組織一強有力的機構以抵制侵略國家，並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紛爭的必要。

但是德黑蘭會議除了討論世界和平方案之外還另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它決定了蘇聯與美英聯軍聯合行動的具體計劃。在一九四三年裏，蘇軍不斷的向前推進，解放了它許多的被佔土地，而且擊敗

大量的德軍。在那年年尾時，英美聯軍在義大利的南端登陸，佔領了西西里全部，然後漸漸的向北推進，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的五月，才能夠總攻羅馬。可是美軍的正式歐洲大戰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才開始。在那一個可紀念的日子，英美最高統帥方面，以艾森豪威爾任總司令，蒙哥馬利任前線總指揮，以四千艘船隻，一萬一千架飛機，以及大量的空運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諾曼第半島登陸。在幾天之內，他們就攻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沿岸的堅壁。在三星期中，他們佔領了瑟堡及半島的大部，俘獲德軍五萬之衆，表現了壓倒德軍的優勢。然後他們又分兵東進與南下，很快的便佔領了不列坦尼全部，在八日中午已威迫巴黎。這一個名都在八月廿五日解放，全世界都爲之鼓舞萬狀，同時進攻的力量日益增強。艾森豪威爾的部隊向前疾進，把賽因河以東的法國領土全部加以收復，此外又解放了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的一部。另外一支美法聯軍在法國南部登陸，沿着羅恩河谷北向疾進，而英勇的法國解放軍則把大部地方的德軍都加以肅清，祇除了自羅恩河口至洛亞河口間的幾個海岸城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軍已威臨德國的邊境。德軍猛烈的反撲，可見它尙未完全枯竭，可是那六個月的戰役却已收到偉大的結果。法國及比國全境都解放了，德軍被俘八十萬衆；死傷的德軍至少尙有數十萬。

同時，蘇聯軍隊似潮水一般湧入德國的東疆，在仲夏時節，已經攻達了東普魯士邊境及華沙郊外。然後，它又開闢了南部戰場，蘇軍似秋風掃落葉一般席捲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大部；到十二月時，蘇軍已在攻打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大門。這樣，盟軍的鐵箍越來越緊，而從天上，盟軍的飛機也不停的摧毀着德國的工業與城市。在一九四五年的元旦來臨時，德國的失敗與

滅亡之運已經注定了。

在太平洋上，盟方也在到處探着攻勢。經過中途島，瓜達康納爾，及畢斯麥海三次大戰後，盟方已經把海上及空中的優勢自日本手中奪回，同時這種優勢還逐月不斷的增長。先是遲緩的，繼而迅速的，日本的外圍防線乃全部崩潰，一直到最後它的本土都在猛烈的打擊之下了。在一九四四年夏季中葉，美澳聯軍已把新幾尼亞的全部日本軍隊加以肅清，祇除了西北一隅之地；同時在佔領了新幾尼亞海外的奴佛島之後，麥克阿瑟將軍的機羣已經可以轟炸菲律賓羣島南端的達佛島了。遠在北方，海軍在大膽的躍進攻擊中先佔領了距離東京祇一千四百六十五哩的塞班島，然後又收復了關島，這樣，美軍力量便正面威脅了日本本土至其加羅林羣島中的土魯克強大基地的航線，不久，塞班島及關島都被改為美國P二十九式空中堡壘的強大基地，自十二月起。這些巨型轟炸機幾乎每日空襲日本的本土。

這些勝利昭示着美軍可以早日進攻菲律賓，於是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在珍珠港召見尼米茲及麥克阿瑟時便同意此一行動當於最早期間促其實現，當麥克阿瑟於一九四二年初離開菲島時，他曾說：「我將要返來的」，現在經過了近三年的準備期間後，他已決意實現其諾言了。在十月二十日那天，久經矜盼的攻擊開始了，一支龐大的美國軍隊，在大艦隊支持之下，在那天登陸於雷伊泰島。在兩個月的惡戰當中，島上的日軍全部被殲，而美軍則一直推進到呂宋南面的明大諾島。雷伊泰之戰使日本海軍損失了近十二萬人，而日軍在企圖赴援島上絕望的守軍時，受到了現代歷史上空前的海軍敗績，日艦被擊沉的幾達六十艘。

在這些敗績正在注定了軸心國的敗運，而重建世界的問題也正在被人認為與作戰一般嚴重時，美國人民又到了改選其總統的時候。有些人極惋惜在這種嚴肅的作戰時期內，還要顧及政治問題；可是大部份美國却欣喜於有一次機會在戰時與危機間同在平時一樣，表現其民主的作風。民主黨人四度選出羅斯福來擔任候選人；共和黨方面則選出了紐約州長杜威，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都誓言作戰至勝利之日為止，並願在戰後從事國際合作的工作；兩黨政綱的不同之點乃在內政方面。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總統又獲全勝，比其對手多得了三百萬票，在四十州裏取得了三十六州的擁護。

在作戰數年間，美國社會中已發生了重大變動。其中有幾項是使人受惠的——如美國黑人地位的增進；婦女在全國各方面參加活動之增加；教育的加強，大部由於軍事要求而感到必要；在日常生活上，許多新科學，新醫藥，新技術的程序及觀念的施行。其它，如兒童犯之增加，成千家庭的毀滅，人口的脫節都因戰爭而發生，雖然足可惋惜，可是恐亦無法避免。現在清清楚楚擺在面前的，乃是全國必將面對許多戰爭的，內政的及外交的問題，都將試驗其能力及智力至極度。可是在他們已經證明能應付戰爭的難題至如此驚人的程度，美國全體人民當在其面對未來時，絕不減却其在其全部歷史中所表現精力與樂觀精神。

——完——